遇罗克

遗作与回忆

遇罗克：1942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分学生，因撰写《出身论》于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3月5日执行），年仅27岁。

徐晓 · 丁东 · 徐友渔／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遇罗克

遇罗克

遗作与回忆

徐晓 · 丁东 · 徐友渔 / 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友渔等主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

ISBN 7-5059-3277-2

Ⅰ. 遇… Ⅱ. 徐… Ⅲ.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遇罗克—纪念文集 Ⅳ.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40005 号

书　　名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作　　者	徐晓　丁东　徐友渔　主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奚耀华
责任校对	董华
印　　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4.5
插　　页	8 页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277-2/I. 2485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1967 年，遇罗克刑前最后的留影



中学文革报

毛主席語录

創刊号

出身論

刊登在《中学文革报》上的《出身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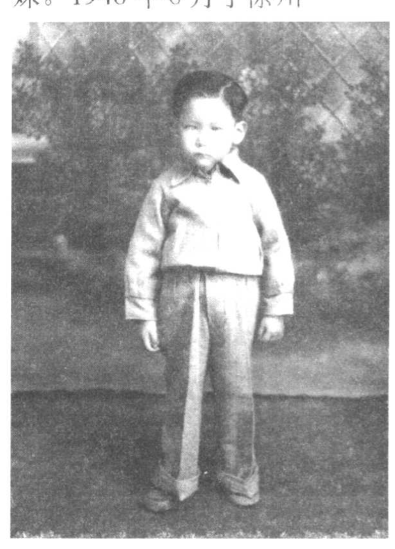
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1936年于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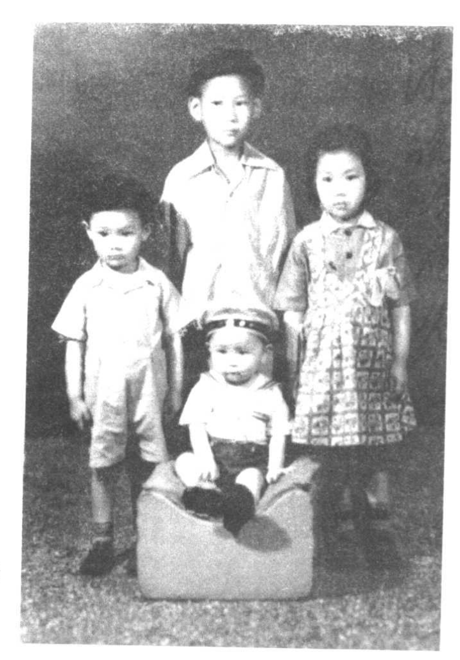
五岁的遇罗克与母亲和妹妹。1946年6月于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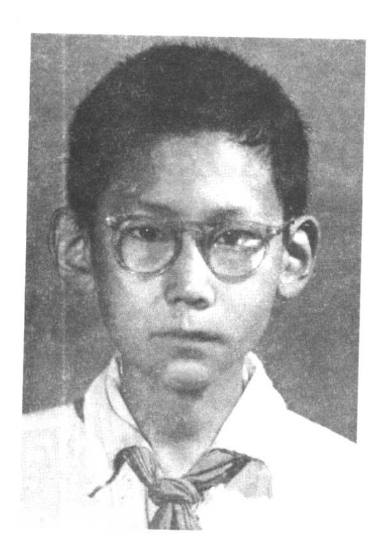
1947年2月28日，妹妹周岁生日



1946年—1947年间



1951年6月1日，六一儿童节时四兄妹合影



1953年—1955年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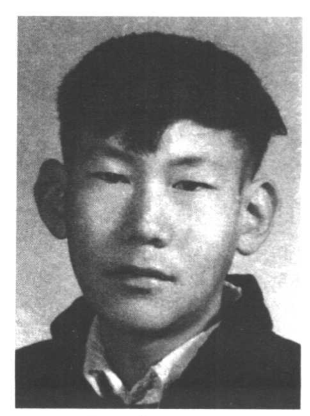
1954年6月与妹妹



母亲与四兄妹。1955年元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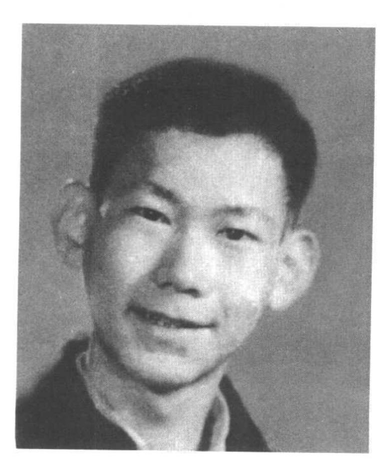
1954年，11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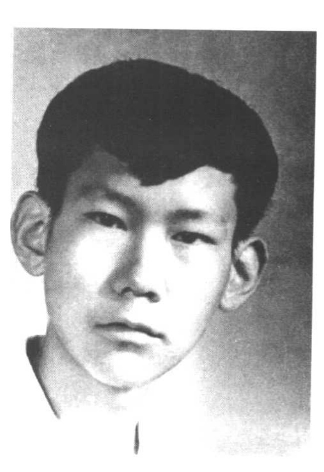
1959年



1960 年— 1961 年间与外婆、母亲及兄妹



1960 年



1961 年



1967 年与朋友们到北京西山郊游



妹妹遇罗锦，弟弟遇罗文、遇罗勉。1970 年

惨遭迫害高峰的一年
一九七〇年
罗克刑前一个月照于北京
妈妈题字

母亲为遇罗克弟妹合影题字



1963年春节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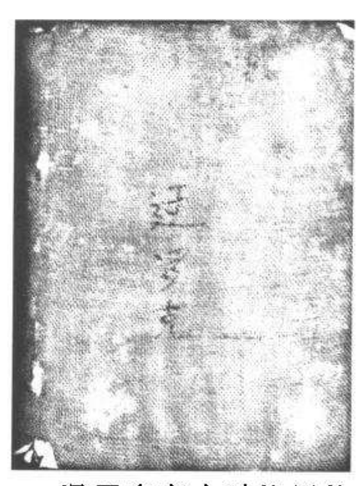
遇罗克父亲遇崇基、母亲王秋琳。80年代初



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右）、遇罗勉（左）。1997年5月10日



遇罗克在红星农场时使用的英语教科书



遇罗克高中时使用的《俄华小辞典》。封面有遇罗克的签名



由北京四中牟志京、王建复、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65中)共同创办的《中学文革报》

编前的话

徐　晓

遇罗克写《出身论》的时候我 11 岁，刚上小学五年级，从上中学的姐姐那里知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著名的对联。我家虽然不是黑五类，但姐姐却是对联的反对派。一次在灯市口女中开辩论会，操场上的高音喇叭传出会场上昂扬而嘶哑的声音，我也站在校门口想挤进去看热闹，但被穿黄军装扎武装带的红卫兵挡在了校门外。那个晚上，姐姐似乎是彻夜未归，急得母亲一次次到校门口去找。

1968 年，我正在读中学，只是从来不用写作业，也不记得参加过考试，大批判会和忆苦思甜会是那时候的主课。我曾经在一次规模盛大的斗争会上发言，批判的对象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刘自立，他是本校初三的学生，罪行是张贴反对毛主席、反对教育革命的大字报。我在批判稿上深挖他的反动根源，认为那就是他那被打成叛徒特务而且“畏罪自杀”的父亲。可见，“对联”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模式而深入人心。很多年后，我和我的斗争对象成了朋友，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老党员，曾经陪同周恩来出访过非洲 14 国，并参与过

“九评”的写作。

就在这一年，遇罗克被判处死刑！两年以后，遇罗克被枪杀！

1972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姓氏有点特殊的名字。那一年，我认识了赵一凡并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给我推荐了许多书，介绍我认识了许多人，给我讲了许多故事，其中之一就是本书中《魂兮归来》一文中的主人公郑晓丹。一凡在讲述了晓丹因为维护遇罗克写的《出身论》而被迫害致死的故事后，含着泪说：“如果晓丹活着我一定会让你们认识，你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以后，我通过一凡认识了晓丹的妹妹红丹，并与一凡、红丹等数十人一起因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罪而被捕入狱。出狱之后，一凡对我说：“在狱中我只担心你，从没担心过红丹，因为她毕竟是晓丹的妹妹。”1988年，一凡病逝。我从他遗留下的信中才知道，当年晓丹曾经热烈地追求过一凡，一凡与当时很多人一样，认为年轻人应该以革命为重，不应该儿女情长。晓丹死后，一凡为没有接受她的感情而后悔万分。我在遗物中还发现晓丹的父亲在1979年6月12日写给一凡的一张名信片，其中说：“关于晓丹材料，写就后直接寄海淀区委办公室郑晓丹结论揭批查组，你要留底稿，我回京看你的底稿就可以了。”从中可见，对于晓丹的平反，一凡是做了努力的。一凡曾经保留过大批文革资料，其中当然有遇罗克写的全部文章。据说，《光明日报》为遇罗克写平反文章时，曾到北图去查找《出身论》，但最终还是馆员辗转从一凡那里才借到。

因为曾经爱着一凡的晓丹，因为与我同案坐牢的晓

丹的妹妹红丹，遇罗克之于我似乎有了特别的意义；编《遇罗克与〈出身论〉》这本书对我来说似乎也有了特别的意义。

遇罗克和晓丹被害已经整整30年了，一凡去世也已经10年。但愿这本书的出版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然而仅此是不够的！

本书的作者之一牟志京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遇罗克被判死刑后我哭了，我非常后悔，如果不办那张报纸，《出身论》的影响不会那样大，遇罗克也不会被杀害。"对此，我在《幸存者的不幸》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牟志京当然无法证实自己的逻辑而为自责找到确实的根据；别人也无法推翻牟志京的结论而使他的自责丧失根据。其实谁都清楚，遇罗克之死不是某个人的责任，也不是哪张报办不办的问题。事实是，遇罗克在劫难逃，遇罗克必死无疑！这不是遇罗克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离经叛道者的命运，如同张志新。况且，遇罗克正义的声音毕竟穿过黑暗，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炫耀的资本；遇罗克淋漓的鲜血已经使众多苟且者无地自容。……尽管如此，牟志京仍然不能够推翻他自己的逻辑而放过自己。"1995年，牟志京从美国回京探亲，我们曾有过一面之交，那次他讲到，遇罗克被判决后之所以没有马上执行，是因为他出奇不意地表示，要交待自己参加"5.16"的问题。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只是执行又延迟了近两年。遇罗克这样做，是出于他性格中一贯的幽默感，还是出于策略，想使事情发生转机，我们现在谁

也无法考证。但是显然，一个年仅27岁、有着如此生命激情的人，是绝对不会甘心在追求的路上倒下的。

然而，他真真切切地倒下了。不只是倒在枪口下，还倒在十几万人齐呼的"打倒"声中，倒在十几亿人无言的沉默中。如今，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哪方黄土掩埋着他的尸骨，无法为他的坟冢栽一棵绿树，添一抔新土。

我不知道，如果当时让我上台发言，我是不是会像批判刘自立那样慷慨激昂？如果我在现场，会不会和在座的十几万人一样振臂高呼？诚实地说：我会。我想，如今被这本书所感动的大多数人，如果扪心自问，恐怕都会做出这种肯定的回答。

那么，遇罗克、张志新们之所以会死，就不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了。

但愿，千千万万赞成过"出身论"并深受"血统论"之害而没有被压垮的中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千千万万反对过"出身论"并身体力行地坚持过"血统论"而良知没有泯灭的中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不曾知道有过"血统论"与"出身论"之争，不曾听到过遇罗克、郑晓丹其人的年轻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能够回过头去看——看英雄的血、平民的泪；能够静下心来想——想我们民族和个人付出的与得到的；能够拍着胸口问——不只是问历史、问社会、问他人，更重要的是问自己、问人性。

1998年11月1日

序

徐友渔

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苦受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实质，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

6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在这场浩劫中，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夺去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思考和对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思想家并不以年龄和地位为条件，遇罗克遇害时，年仅27岁，原为北京市人民机器厂的徒工。他聪明过人、品学皆优，但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虽一再努力，仍被拒之于大学门外。他见诸于世的文字，主要是本书收录的《出身论》等；他还深入思考和研究过中国的经

济、社会和历史等问题，但那些耗费心血和充满睿智的篇章，尚不知流落何方。

思想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时过境迁之后，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和“皇帝本来就没有穿衣服”的童稚之言在内容上似乎没有差别，但要向长期统治社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谬见挑战，要让千百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恢复自尊自信，只用一支笔把谬见的传播者逼到墙角（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必然会作拼死搏斗和疯狂迫害），则只有胆识俱佳者才能担此重任。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中国处于深重黑暗之时，傲视强权，解放精神奴隶的宣言，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具有深远的意义。

现在的青年，可能很难理解出身问题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那么重要，遇罗克为什么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见解而献出生命。这一切都需要从头说起。

出身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广大青年而言，它更是前途攸关的大事。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公民、青少年乃至儿童，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在诸如参加政治组织、评选模范、就业、参军，尤其是在升学等问题上，人们因为家庭出身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尽管在一个新型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对于不少人而言，他们的历史不但是本人永世受罚的根源，而且还祸及三代，儿子儿孙们也要终生承受其罪孽的负担。不少优秀青年升学、参军无望，空有壮志而报国无门；不少人在等待就业的队伍中，永远排在末尾，以至穷困潦倒、流离失

所；在农村，“地、富子女”多半只能与贱民通婚，许多农村干部因为和“地、富女儿”结婚而失去职位，还有的“地、富子女”一辈子无缘娶嫁。

“阶级路线”是一个革命的政治概念，任何人都不敢对之置疑。但是，在一个自称为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搞起了论功绩据以封妻荫子，追血缘必定祸及三代的封建宗法的一套呢？

认真说来，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传统中，这种所谓的“阶级路线”是完全名实不符，没有任何合法地位的。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阶级路线应指：“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根据当时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态度的基础上提出的分清敌、我、友，确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基本政策。”[参见《辞海·政治法律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第5页，以及高放主编《社会主义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3页。]如果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定义，那么只能说这二者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在正统定义中，阶级路线涉及作为阶级或阶层的群体，而不涉及个人；它依据的是群体中人们由经济状况而决定的阶级地位，而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毫无关系。比如，许多革命导师、革命领袖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参加和领导推翻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队伍甚至吸收和容纳过本人曾经具有地主、资本家、军阀等身份的人，革命要消灭他们所属的阶级，但他们作为个人则有可能、有资格进入革命队伍。

这项歧视政策自然会引起社会关系的紧张，领导层

中的明达之士一有机会就以宽松、温和的方式解释阶级路线。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于1961年代表党中央对北京高校毕业生讲话时说："对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不应该片面强调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革命者……对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我们都要同对待工农子弟一样，当成我们自己的子弟来教育，不应该在工农青年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国青年》,1961年,第17期,第4页。](遇罗克在《谈鸿沟》一文和别处用的就是这段话)1966年1月31日，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在青年和学生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在家庭出身问题上"重在表现"的政策。

当然，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长时期内，总是极左的作法占上风，虽然有时某些明智的领导（特别是学校领导）会真正"重在表现"，给"出身不好"的青年一线生机。但当文革风暴骤起时，血统论挟"革命运动"之威，露出狰狞面目，肆虐神州大地。宣布"重在表现"政策的彭真处于首批被打倒的"黑帮"中的第一位，这使得血统论红卫兵有恃无恐、趾高气扬，认定这项政策是彭真的"修正主义纲领"、"变天复辟的黑货"，以此为罪名斗争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虐待昔日的同窗、校友，被阅受虐待者不但被叫做"狗崽子"，而且被强迫当众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1966年7月底，血统论红卫兵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在狂热的革命口号后面，是赤裸裸的封建专

制思想和血腥的、法西斯式的残忍。在署名为"北京红卫兵"的传单"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中,他们说:"几千年来,地主老爷传宗接代维持统治还不是要靠家传吗?"他们对出身不好的人说:"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要像父兄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聚到刺刀尖上,挑出你们的五脏六腑,那你们就活该倒霉!"

北京炙热的8月被命名为"红八月",在这个月,北京6中的校舍变成了审讯室,墙上用人血大书"红色恐怖万岁!"在这个月,红卫兵在大兴县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打死斗死300多人,其中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才出生38天,有22户被斩尽杀绝。"红色恐怖"运动并不止于1966年8月,亦不止于北京。当"阶级路线"和派性及武斗相结合时,野蛮屠杀达到了高潮。比如,1967年10月,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由民兵执行,抓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在此前后,湖南的道县、邵阳县等地,也发生大规模集体屠杀"21种人"(地、富、反、坏、右、军、警、特等)及其子女的事件。

在了解了阶级路线和文革中泛滥的血统论之后,才会明白遇罗克的《出身论》为何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引起具有不同身份和利害关系的人的密切关注,或是衷心拥护,或是恶毒诅咒,也才会明白遇罗克是如何单枪匹马地向何等样的庞然大物挑战。

遇罗克的文章在当时不但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超前性。他表面上是力图捍卫和恢复"重在表现"的政策,但实质上是站在"人权"的立场上要求人的尊严和平

等。他在"出身论"中提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谈鸿沟》中,他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在理论上,遇罗克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坚实的支点:家庭出身并不等于本人成分,而在这一点上,不论是阶级路线的提倡者,还是血统论的鼓吹者,都是无法驳辩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把二者混为一谈。一个血统论者可以指明遇罗克家庭出身"不好",但无法证明"按成分区别对待"的政策可以导致对他的歧视合理,因为他本人成分是工人,为什么一个工人的儿子因为自己家庭出身"红"就有资格凌驾于本身即为工人的人之上呢?遇罗克敏锐地指出,在当时中国社会,"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之中。"

在文革中,猖獗一时的血统论因为被中央文革小组宣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而遭到声讨和批判,这是否意味着反血统论的《出身论》的胜利?这是否意味着遇罗克依仗文革发动者的威势而取得胜利?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中央文革小组不支持血统论,是因为它的出现干扰了他们的战略部署,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血统论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他们这一次发动政治斗争的目的,是要在最高层搞清洗,即"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整出身不好的人,他们要调动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来达此目标,而不喜欢分散火力。因此,他们一开始把首批红卫兵捧上了天,支持他们"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酿风潮、造声势,形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但当血统

论红卫兵把运动引向“群众斗群众”时，他们要严厉指责和采取措施了，因为这一轮斗争的敌人在党内领导层。

遇罗克的《出身论》也是利用这混战的间隙出场的，但“全面专政”并没有留给他多少活动的余地。《出身论》冒头不久，就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宣判为“大毒草”，他本人终于被文革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实际上是作为思想犯）处决。

明白了遇罗克斗争时的艰难处境，明白了当时文革局面极端的混乱和复杂，我们才可以用历史的眼光解读《出身论》等文本，懂得“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属于文革的专门术语，理解遇罗克只能使用文革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派”之类，理解他在文章中随大流地以贬损的方式指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刘邓路线”、“北京市旧市委”，以褒扬的口气提及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人。那个年代的任何文章（包括反《出身论》的文章）要想公开发表，都只能使用这样的话语方式。当然，我们决无意做无原则的拔高和曲意辩解，说遇罗克为了战斗而正话反用、反话正用。在当时，任何人都不可能洞察一切，深知文革运动的底蕴和具体目的，预知文革的最后结局。我们只有理解，遇罗克也会无例外地受当时文革形势的影响，在读他的文章时才不会以辞害意。

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不过，遇罗克确实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从他在 1966 年所记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早在 5 月 10 日，他就从对邓拓的大批判中，看

出那场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更高级的人物。当江青打着“批文艺黑线美化帝王将相”,将“革命样板戏”的成果据为己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时,他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他最坚持的是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当精神奴隶,这些,在1月18日、2月6日、2月15日、5月4日、5月23日的日记中都有反映。他和文革中涌现出的其他知名理论家不同,他不是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或“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去铺排出一个表面异端味十足,实则不过是诠释文革路线的理论体系。他的思考具有根本性,他的逻辑出发点与文革主流思想毫无关系,他坚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只能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他坚信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是不正义的,就像基于民族、肤色、宗教信仰的歧视是不正义的一样。对于歧视的提倡和辩解,不论来头有多大,都吓不倒他,不论诡辩披上了多么华丽的外衣,都被他揭露无遗。

遇罗克和《出身论》的本质,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真理重于生命。我们编选此书缅怀他,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





目录

遇罗克遗作

附录

回忆

评论

遇罗克遗作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与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能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中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出　身　论*

编者按：

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一跎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呢？

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唯出身论。

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不是别的，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论。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分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

---

* 原载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编者按为《中学文革报》编者所加。本文注释为《中学文革报》编者所加。——编注。

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分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还是它，使许许多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志至今坚持其错误。还是罪恶的它，使多少同志至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面畏缩恐惧！

同志们，这样可恶的东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打倒它，哪里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国的颜色就必将发生改变！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们，你们不是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吗？你们不是要发动起千千万万群众共同战斗吗？那么，你们就掀起一个狂涛巨浪，彻底冲垮反动的唯出身论的堤岸吧！到了那一日，千百万群众就会冲决束缚他们的一切，和你们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也只有到了那一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会彻底被葬入坟墓，中国的颜色才永远永远是鲜红的。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发表的《出身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说，它的出现好得很！它宣告了反动的唯出身论的破产，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出身论》敢于冲破社会上旧的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向尚有强大社会势力的反动唯出身论宣战，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出身论》的出现，不免要被一些人认为是株大毒草，但这算得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也曾被认为是毒草，然而今天却成了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们深信：反动的唯出身论虽然貌似强大，但它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只是一

只腐朽的纸老虎，革命的《出身论》今日虽是星星之火，明日必成燎原之势。

同时，我们认为，由于作者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有限，由于对社会进行的调查研究不够全面。《出身论》必定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热切希望广大的革命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来衡量它，并真挚地欢迎同志们对《出身论》提出批评。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

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面我们就从毛主席著作和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副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副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着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分。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彻底改革。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属于一种错误路线，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

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二、重在表现问题

如果你没有理由驳倒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也驳不倒现在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也不得不赞同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重在表现”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说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可见他们对这项政策根本不理解。让他们来解释这项政策，就必然会任意歪曲。限于篇幅，这里只检查三种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1. 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这样讲：

“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①] 这是不看对象。

××同志解释过这句话。她说：这是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份子讲的。××同志的解释是甚么意思呢？举例说，恩格

① 《出身论》刚发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写。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在团中央九中全会上讲这个话的李雪峰及其一流人物，现在都成了怎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本文注释均为《中学文革报》编者注。）

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杰出的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份子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社的代表。我国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能不能因为他们成份不好而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呢？不能！我们要重在政治表现。这就叫"不唯成份论。"我们认为相反的情况也适用于这个公式。对成份是矿工，但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革命的份子，也要重在表现，也没有一点可以轻恕他的罪恶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铭是地主份子，但他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毛主席赞扬说："不管甚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人害言，亦即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归为哪一范畴。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说："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知，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见得就是同一个阶级的

成员，这一点连阶级敌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运动期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道，一个反革命富农分子，因为三个儿子检举了他，夜间持凶器砍死、砍伤了他们。又据一份传单，市内某公社工厂书记——一个蜕化的变质分子，临自杀前，亲手溺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也不会为自己报仇了。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什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份论都没有道理，那么唯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有些人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今天的社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2. 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份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在本文第一个问题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绝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如果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

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超经验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吧，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唯一的标准是出身吗？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出身这一条吗？

十六条中的第五条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谈到要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有出身这个根据吗？

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①] 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

---

① 《出身论》刚刚张贴时，在这句话的旁边，写满了“大毒草”、“胡说八道”之类的话，发泄够了谭力夫之流的廉价的愤慨。他们有眼光，因为这正是《出身论》的主题。可是历史毕竟是无情的。今天不少红卫兵组织已经引用这句话做为自己的组织纲领了。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宣言写道："过去的红卫兵组织只能由所谓‘红五类’子女组织和参加，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谨向这些组织的大无畏的行动，致以革命的敬意。

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着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蹋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要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3. 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的同志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 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因为：“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又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同志还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惧怕毛泽东思想，不贯彻党的政策，又怎么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绝不会在接班人的条件中写上出身这一条的，因为他的政策最正确，路线最鲜明，在他领导下，青年也就最保险。否则，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错，也

是不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像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不像！这是“阶级偏见”，它和无产阶级无缘，和小资产阶级倒挺亲近。这些人头脑里没有树立公字、私有意识浓厚，所以度己度人，没有不变样走形的，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1]

我们必须相信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分人抬高一部分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允许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当然，任何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都应该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这样即使影响不好，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变阻力为鞭策。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堪设想了。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 1961 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

---

① “自来红”是北京的一种月饼的名称。

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吗？于是谭力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上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像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北京日报》也大登红五类出身青年的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二、"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四、"……"。假使这就算迫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样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寿终正寝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之时，每年大学招收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五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

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此。根据北京市教育局印发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搞男女关系，有偷盗行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别人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并未见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也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

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呢？那么，贫下中农子弟出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①]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此。北京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②]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

---

① 农村中有的地区曾规定：小学升初中时，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其他占十五分。

② 我们建议有志于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做一下社会调查。可以在本单位调查一下出身好的青年多少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多少人？担任行政职务的比例是多少？党团员的比例是多少？有没有因为出身不好而限制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此外，还可以翻阅一下 1964 年以来《中国青年》等刊物。同志们可以看一看，在这样的被修正主义集团控制的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阶级路线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和我们今天某些人的观点是何等相似。

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被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啊！”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密切到这个地步，“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驳斥这种毫无见地的议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这正是修正主义份子一手造成的；那么，资产阶级份子为什么要压迫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呢？这不奇怪吗？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不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哪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特别是1962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这些阴谋家便慌了手脚。当前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

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密锣紧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便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的挂羊头、卖狗肉，搗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弟便只好是第四、第五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反动的修正主义份子的这套做法，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

的前奏。[1]我们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主要还是从右边抹杀了阶级路线。因为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份子，包庇资产阶级份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入党内，给某些五类份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项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都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等，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

---

① 在我们历数修正主义集团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罪状的时候，竟然有人指责我们为修正主义集团“涂脂抹粉”。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直到现在还认为压迫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大功一件。要说谁迫害了“狗崽子”，按照他们的混蛋逻辑，那不是给谁涂脂抹粉又是什么？

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迫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更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1966年7月初稿

9月定稿

11月修改

谈 "纯"*

联动是声名狼藉了，但联动的原则还被某些人奉若神明。不是常常听得到这样的怪论吗？"你们组织的成员都是什么出身？"如果对方回答："什么出身的都有。"于是乎他们就会大摇其头，说："不纯，不纯！"

"不纯"？这个词多么耳熟！

窃据了中央文革副组长、全军文革组长的刘××不是大讲红卫兵的出身要纯、纯、纯吗？谭力夫不是也要他们那一伙纯、纯、纯吗？联动更纯得可以。要是谁的老子没有福气当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连边也不要沾。可惜！提倡唯出身论的纯字号的人物，大都没落到好下场。不论他们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下台的，但我们推测，和唯出身论的思想基础总是沟通着的。这个推测有没有根据？假使有功夫，同志们可以研究研究。

这且不提。有趣的是：今天大力提倡"纯"的，已经不再是联动诸公了。他们的老子是英雄还是反动，实在大有讨论的必要。假使老子反动了，还偏要喊"老子反动儿混蛋"，

---

* 原载1967年2月2日《中学文革报》第2期，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编注

混蛋的口号还能算数吗？所以除非是毫无羞耻之心的，多半不挂老子这块金字招牌了。实际上，今天继承联动衣钵的，往往是被联动排斥过的，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激烈反对联动的那样一伙人。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了。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危害大众的东西，大公无私的人要造它的反，私心杂念颇重的人有时也要造它的反。前者提出的口号是“造反有理”，后者的口号是“造反有利”；前者要粉碎的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说：“我们要取消一切特权阶层”，后者要取消的只是它的表面的一部分，他们说：“为什么你是特权阶层，而我不是”；前者要扩大革命队伍，并把表现杰出的同志吸收进来做中坚，后者则采取关门主义，唯恐人多手杂碰掉他们自封的乌纱帽。一个坦荡荡，一个长戚戚，同是造反，本质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也。

那么，你们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不是反对纯洁阶级队伍吗？非也！我们是坚决提倡纯洁阶级队伍的。在我们的队伍里决不允许一个剥削阶级份子混入，但是我们的标准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你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是出身；我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根本的分歧。

你们认为出身相同的人都是一个阶级的，出身不同的人都不是一个阶级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认为：是不是一个阶级的，要看他们有没有一致的目的、纲领、方向、行动，而不是看他们的出身。出身相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相同；出身不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不同。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谭力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贫民家庭的，就都是一个阶级吗？时传祥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赫鲁晓夫也跟你

一个阶级吗？出身不好的人就跟你不是一个阶级了吗？王光华烈士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马、恩、列、斯、毛这些伟大的导师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按照你们的标准去纯洁你们的“阶级队伍”，势必把谭力夫、时传祥、赫鲁晓夫都拉进去了，势必把王光华这样优秀的战士都排斥走了。下过这么一番去粗取精的功夫，你们的队伍将会纯洁到何种程度，等你们冷静下来自己做结论去吧！

依照我们的标准纯洁阶级队伍，就不会发生你们的弊病。我们的标准就是一个，这就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拥护它的，我们吸收；反对它的，我们不要。执行它的，我们吸收；抵制它的，我们不要。特别是在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吸收，不高举的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的队伍就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坚硬如金刚，纯洁似水晶。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这就会是一支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

的确，我们的成员出身是不同的，不同的岂止是出身？性格、年龄、经历、性别等等不同之点还多的是。但是，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好像是一种元素，在这毛泽东思想的大熔炉中，经过一番冶炼，就会变成一块再也分不开的化合物。这个化合物比起以前单个的元素来，真不知要强硬几万倍。

的确，你们的成员都是相同的，但共同的思想基础却不见得相同。你们不能熔炼成化合物，而只是一堆貌合神离的混合物。你们当然可以夸口说：“我们的颗粒都是圆的。”但也只是圆的而已。雨一淋就会流掉，风一吹就会扬开。实在成不了事业。

目前，正当左派大联合，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全面夺权的时候，还有人企图形“左”实“右”地混进阶级队伍，大讲

唯出身论的“纯”，我们对他们的最好的回答就是：要做化合物，不做混合物！

“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去年十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出现了几个跳梁小丑，这些小丑是西城、东城、海淀三个纠察队阴魂的化身，他们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诽谤中央文革小组，辱骂亲爱的××同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挑动武斗，制造混乱，查抄革命组织，散发反动宣言，种种罪状，举不胜举。这些小丑，就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们以自己的滔天罪行，招致了革命组织的共同征讨，招致了西纠、东纠、海纠等反革命组织相同的命运。如今他们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是在群众之中，“联动”已经成了反动集团的代名词。各种小报，无不罗列他们的丑事。唯有知音，也远在大洋彼岸，实在爱莫能助。用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的话来讲，算是咎由自取。

从联动表演的乌烟瘴气的场面里能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在我们与之几个搏斗的回合之中，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我们不由得想起列宁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示了一个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换句话

---

* 原载1967年2月10日《中学文革报》第3期，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编注

说：我们能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剖析一下联动的本质呢？

迄今为止，正因为没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从思想上击溃联动，所以他们还不服气，还在没落中挣扎，还在失败中狂吠，还在梦境中描绘凯旋的场面。正因为我们没有从本质上揭露他们，没有触动他们的灵魂，所以至今还有一批年幼无知的小家伙，心甘情愿地充当殉葬的金童玉女，并且还准备继纠察队和联动之后，成立其他换汤不换药的组织。从理论上击溃联动，显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任务。

用阶级观点分析联动，对于那些只善于贴阶级标签而不会做阶级分析的同志是个难题。假使联动分子都是些黑七类狗崽子，那也就另当别论；可是，他们偏偏是出身在光辉耀眼的家庭里，他们的老子都是十三级以上的大干部。说他们要复辟，要阶级报复？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太坏，打上了资产阶级烙印？很不容易为这些同志所接受，于是只好存而不论了。

联动成员不但以自己的出身迷惑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他们坚持自己的本质是玉洁冰清的，他们犯错误是纯属偶然的。按照最近替联动的幽灵大唱挽歌，抛出“评《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话来说：“虽然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没有疑问，这种不要脸的腔调“表明幼稚比表明恶意更多些”（马克思）。我们批判联动的同时，也不能不对阐明联动思想基础的“评《出身论》”进行严肃的批驳。毛主席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我们就根据这一教导，尝试一下，怎样应用阶级斗争学说来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课题。

联动的骚乱告诉我们：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是资产阶级复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继承人。

"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的宠儿？"清华附中红卫兵受不住这样尖锐的论点，忍不住用谩骂代替了论证："这些混蛋！"（显然这句话不像是骂自己）。但是谩骂摧不垮铁的事实。请看！

一、物质上的特权阶层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着教育部门的时候，给高干子弟安排了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一个新型的少爷阶层。

最近被革命群众查抄的联动老窝——八一学校，就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陈设之豪华，其生活之优越，完全是培养资产阶级幼苗的理想的温床。"他们住在花园式的校园里，校内有动物园、游泳池、假山、大观园等等。一般教职员工成了某些贵族少爷小姐的集体保姆，动辄遭到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辱骂。"（据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传单）每逢周末，小轿车排成一条长龙，迎来送去，川流不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是一个小姐少爷的安乐窝。据：每个学生除去国家负担吃、穿、住及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发给十八——二十五元零用钱。我们可以和下面几个数字做一比较。国营农场的一个壮劳动力，每天工资八角；一个社员的收入比它还要低。一个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费用是每口人每月十二元。但是军工大读书的一个普通学生，只零用钱一项，就达二十几元！这样的青年哪里懂得艰苦朴素？怎么不大肆挥霍？只要看看联动开会时，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叼着烟卷，穿着呢子衣服，乱放花炮，大嚼特嚼酱肉、点心、水

果糖，便很令人痛心了。此外，高干子女可以任意挑选“理想”的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任意调校。一些培养国家特殊人才的地方，不仅剥削阶级子女无权问津，就是广大工农子女也只占极少数。一个青年人，长时期在这样脱离劳动人民的环境里生活，就必然会像毛主席所说的：“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的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我们奉劝那些主张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联动的成员之一——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得不承认这一论断。但他们想用“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不可分割”的论点来分庭抗礼。他们说：张地主的儿子接触的必然是王地主、李地主。这个狗崽子看见自己的爸爸剥削贫农，“想来”是不会感动的。这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论》的读者群主要是今天的青年人。迄今为止，还真没有看到修正主义分子开办过“地主子弟专类学校”。所以张地主的儿子从上小学起，经常接触的必然不是一些地主。而且“想来”也没有“福气”见过自己的老子剥削贫农。但是，这群联动分子的论点对他们自己倒很合适。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圄于自己的集团之中，连十三级干部以下的子女都耻于交往。只有他们才有权力依靠父母的功勋，享受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就很少接触到劳动人民，也就根本不能领会毛泽东思想。

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控制宣传和文化部门的时候，也拼命造就这些青年的贵族心理。

翻开以前的杂志、报刊，回顾以前的戏剧、电影，以教子为题材的故事多得惊人。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某甲，一个出身好的青年被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坏了。某甲的朋友（是个出身相同，而且一点缺点也没有的青年）和某甲的父亲（是个当权派）就开始帮助他了。怎么帮助呢？不是要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是要他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而是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晚上，带他到烈士陵园前，宣读一份血书，于是霹雳一声，这个青年就翻然醒悟了。前中宣部网罗成群的末流作家，大搞这类作品，难道不是别有企图吗？他们歪曲阶级斗争的规律，要人们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敌对阶级了。而高干子弟是最理想的青年，即使暂时有个别人落后一些（那时无数事实迫使这群阿谀成性的作家也不得不客观一点），但只要等到打雷的时候一念血书，便可以臻于完美了。假若事情真这么理想，今天的联动问题也就用不着伤脑筋了。可能是血书丢了的缘故吧？旧中宣部如今是批臭了，可是由他们制造出来的盲目优越感却被接受下来。正如造谣者被抓住了，谣言却被相信了一样，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不少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是不够艰苦朴素的，个别的甚至到了腐化糜烂的程度，当然也有很值得景仰的律己极严的首长，但是因为他们终日为国事操劳，对子女的教育未必是深入细致的，至于一般当权派，大家都深有体会，他们过去对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都是不够的，何

况对子女？所以，一个青年人，长期在这种经济地位中生活，很容易养成奢侈、放纵的毛病。正如列宁在阐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特点时所说的那样："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我们奉劝那些大讲出身好家庭影响就一定好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联动的喉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只承认别人的家庭影响不好，不承认自己的不好。要是他们不把家庭影响神秘化，那么，他们成为特权阶层的"理论基础"不就动摇了吗？所以，他们就用上级的口吻教训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真正应该告诫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们！出身不好的青年几年以来承蒙帮闲文人讥讽嘲骂，承蒙好心的同志无休止的提醒，对自己的家庭总是存在戒心的。大多数青年是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往往老子说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反对什么。我们应该相信这些青年人，是能够在他们的老子磨刀霍霍的时候，把老子揪出来的。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接受了党十七年的培养；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主动地抄了自己的家，向毛主席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但是，对于相同的家庭影响，对于那些"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谁的抵抗力更强呢？你们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正像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所说的："我的红爸爸、红妈妈，用通

红通红的烙铁，给我打上了鲜红鲜红的烙印！"这样，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红烙铁的时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东西，你们就用同感去接受。你们就容易饮鸩如蜜，夜郎自大，放松思想改造。你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在你们中间已经形成一道深沟，筑起一道高墙。你们的危险，不在哪一个莫须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你们，而就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此之谓也！

三、丑恶的灵魂

长期受修正主义的毒害，长期以贵族自居，长期放松思想改造，势必使一部分革干子弟的灵魂，变得十分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请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吧：

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在武斗当中，制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例如：

浇、烫、烧——浇：被打的人昏死过去之后，用凉水猛浇其身，使其清醒，然后继续逼供拷打。烫：用滚开的水向被打的人头部猛浇，受此刑法后，人的头皮脱落，脸色红肿，胸前背后都是烫伤，惨不忍睹。烧：凶手最初是用一根火柴烧被打人的头发，后来竟发展到用整盒的火柴烧，另一做法是把火柴燃着后，向被打的人脸上按，或向嘴里塞。

吊、踩、刺——吊：凶手有时拿人命开玩笑，将活人做上吊的试验，用绳套套在被打人的脖子上，猛力踢倒他脚下的凳子，使其悬空，吊到半死，又猛一松绳子，使其重摔于地，再找人做人工呼吸使其苏醒继续受刑。

踩：被打者躺在地下，几个人轮流踩之，受此害者往往

内脏严重受伤，上吐下泄，大便不能自控。

刺：凶手用木枪猛刺受害者，直至刺得对方躺下为止。

跪、剁——跪：凶手将凳子翻过来，令受害者跪在凳子上，长时间不得起来。有时令受害者跪煤渣，使跪者两膝疼痛难忍，鲜血直流。

剁：凶手用刀剁受害者背部，直剁得血清渗出，方肯罢休。

磕响头：凶手令受害者给他磕响头，如果磕得不响，就用脚向他头上猛踩，受此刑后，受害者大都脑震荡，记忆力衰退。

诸如此类的刑罚，名目甚多，举不胜举。

再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杀死19岁的学生王光华的，而他的全部罪过，只因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王光华被带到六中“劳改所”，刚一进屋门，西纠头目之一姜××马上抽了他一巴掌，随后又被带入里屋，令王脱去上衣，解下皮带。这时屋里屋外都有看守，戒备森严，屋里的暴徒均为西纠队员，他们兽性大发，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对王使用惨无人道的暴行。用木枪向王猛刺，并用枪托劈头盖脸向王打去，使之无法忍受，倒翻在地。十来个暴徒手持各种凶器进行为时30分钟的毒打。王肋骨被打断三根，昏迷过去。这时，一个西纠队员一面踢王头部和颈部，一面恶狠狠地说：“触及触及你的灵魂”。有的一边打一边大声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即要武斗不要文斗）。就这样王光华被打死过去几回，后经“劳改所”中“黑帮”给予做人工呼吸，才免除一死。

9月28日上午，王光华已经面部青肿，浑身重伤，危在旦夕。去厕所时还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上，小便出血。事态

已这样严重，可是一小撮人还不死心，而后，栗××和陈××等又曾殴打王光华，逼他写材料。写不出来仍是一顿毒打。恶毒的看守也为虎作伥。在残酷的法西斯暴行下，就在9月28日下午两点左右，王光华被这群暴徒活活打死了。夜晚，12点多钟，趁夜深人静，就把王光华的尸体送到东郊火葬场焚尸灭迹。

还可以看一看，一个在旧社会颠沛流离的老工人是怎样被活活地害死的。

退休老工友徐霈田（76岁）于10月3日下午，被六中红卫兵领导，西纠队员王××和陈××带到淋浴室。他们说：“给你洗澡。”于是这群暴徒们开始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个老工人。先是用冷水泼身，只听老人惨叫：“冷啊！冷啊！”然后又用滚开的水向老人头上猛浇。王××，陈×× 等人一面浇一面狞笑着说：“老头子，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人被折磨的死去活来，连声惨叫“热啊！热啊！饶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兽性更是大发，反而浇的更厉害了。老人的头皮被烫去一层。当老人勉强爬向宿舍时，已经奄奄一息，不省人事了。4日早晨，徐要求医治，但他们不许出屋，不给医治。当天10点40分徐又被王××，陈×× 等人拉到后院，进行种种毒打和戏弄。他们强迫76岁的老工人学哭，学笑，令其吃屎，喝尿，过够瘾后，又把徐嘴堵上，带到后院厕所中，将徐吊死。这群暴徒真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竟扬言徐上吊自杀了。

老工人徐霈田在旧社会里，没有死在国民党侦缉处的手里，侥幸死里逃生。今天，这位有三四十年工龄的老工人却死在西纠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手里（以上均摘自北京六中红旗公社公布的材料）。

无独有偶，一中的刑罚和刑具也足可以与六中比美。而且打死了人，还得让“劳改犯”（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去和死人亲嘴握手，说：“亲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见一中传单）这就是联动的前身，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称之为“好同志”的那些人！

我们奉劝那些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的同志，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中的这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少。……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

为联动招魂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摆出一副让贤受禅的高姿态，说什么“随着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主力军了”。触及党政军的领导机关，碍高干子弟何事？说穿了，就是这些高干子弟的老子已经成了黑帮人物，再靠“老子反动儿混蛋”吃饭就该打自己的嘴巴了，只得忍痛把他们割爱。实际上，以前谁又承认你们这些“好同志”是主力军呢？这样一些嗜血成性的人配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吗？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清华附中红卫兵装腔作势地说什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 20 年以后的今天。”算了吧！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不正是你们这些——西纠、东纠、海纠、联动这一伙人当政了吗？不正是今天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杀人凶手但具备了那样心灵的人当政了吗？你们和你们的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当然左派的面孔担任了一切领导职务了吗？那么，20 年以后的今天，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不仅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

里，世界的命运也要葬送在你们这群败类的手里！

"我们打人，动机是好的！"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你们打人，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的"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去打所谓的"反革命"的。不管你们打谁，在客观上就起到箝制了革命群众之口的作用。你们威胁着左派，吓唬住中间派，这是多么为大众所唾弃的效果！你们为了逃脱罪责，妄想求助于别人看不见的动机，那是站不住脚的。你们真的有为无产阶级事业贡献终身的动机吗？那么你们的联动就不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了，就不会大冲公安部，就不会高呼："刘××万岁"了！今天都没有好的动机，难道当初就会有吗？很明显，你们的动机就是要做××路线的宪兵队。就是要扑灭革命烈火的刽子手！

我们要郑重地指出："评《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不了整个革干子弟，更代表不了整个红卫兵。我们敬佩那些进行过刻苦的思想改造，不以出身当作包袱的革干子弟。这样的同志，总是革命子弟的多数。因为我们从来就承认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承认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我们是承认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我们是反对以出身来分界的，我们没有忘记，运动初期，一些优秀的红卫兵发表过"致爸爸妈妈的公开信"，他们勇敢的承认自己的家庭影响不是鲜红的。我们也怀着十分的感激心情，铭记着一个来访者——某校高三年级同学的话，她对接待人员说："我是革军的女儿。我完全同意《出身论》。"接待人员问说："有人说《出身论》对出身好的有压力，那么，你不感到有压力吗？""不，我不

觉得。我只觉得十分高兴，因为有更多的青年又可以和我一起闹革命了!”听着！自以为血统高贵的小丑们！这是多么伟大，宽阔的胸怀啊！你们是不配替革干子弟说话的。让你们的大作和联动的在天之灵一起见上帝去吧!

四、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小撮处于贵族地位，具有卑鄙污浊的灵魂的高干子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宠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准选民。

正是这一小撮人，在“评《出身论》”中散布流言蜚语，杜撰最高指示，造成一片假象，好像复辟力量的继承人不是他们，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故说什么“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即使非常积极，也要拼命看他们的实质。”“不管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革命的重担反正不能落在他们身上。”言外之意，重担他们是挑定了。这显然是违抗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接班人条件的。我们不能不指出，哪些人会变成资产阶级最可靠的金童玉女，也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固定是一些人的。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矛盾。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往往互相区别。这时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期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局部

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那么，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像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土改时期，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反右斗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吗？不是，都不是。固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自有它特定的主要矛盾。十六条中的第一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五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条也指出：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可见，在目前主要矛盾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正在开展的广泛夺权斗争，说明了这个矛盾达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在阶级斗争的新阶段，资产阶级必然会寻找新的机会，新的舞台，新的代理人又必然寻找新的御用工具，必然会使用新奇的、巧妙的、隐蔽的手段，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唆使他们，挑动他们，利用他们和自己一起演出复辟的丑剧。而不幸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正是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这样，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顶峰，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西纠、东纠、海纠、联动等反革命组织就应运而生了。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我们奉劝那些顽固地坚持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保险，出身越好越保险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

论》的这个论点："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复辟力量）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

"这真是奇谈怪论！"在联动的招魂术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这样喊道。他们或许会反问："谁敢说我们要复辟？难道我们希望蒋介石回来吗？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吗？"替你们说句公道话吧，你们的确不希望蒋介石回来，的确不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但是，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辟了，贝尔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股东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同样的×××××等等篡权分子，也并不打算请蒋介石回来实行独裁，也并不让原来的剥削分子发号施令。难道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不够用吗？他们不是早已建筑了八一学校，哈尔滨军工大这样的复辟温床了吗？西纠，东纠，海纠，联动不就是修正主义合格的苗子吗？你们在"评《出身论》"中，一口一个资产阶级屠刀，殊不知和平演变并不希望刀光剑影。而到了关键时刻，敌人的屠刀也绝不会落在你们的绿军衣上，正是你们用双手接过去，挥舞着它，砍死了王光华，砍死了徐霈田！这不是复辟吗？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或为了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的利益，最后为了你们个人和你们反动小集团的利益，行凶、抢掠、捣乱、破坏，这种种行为，就是复辟！你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不希望蒋介石回来，就不承认自己搞复辟活动。

联动就是自觉地搞复辟活动！当然，这是指他们整个组织而言。至于个别成员，总是有自觉和盲从的区别，自觉和受蒙蔽的区别，改正错误和坚持错误的区别。而清华附中红

卫兵，过去是联动瘟神的膜拜者，不知闭门思过，却等待秋后算帐，不知痛改前非，却到厂矿农村捣乱，拒不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平等的革命权利，拒不放弃自己得天独厚的贵族地位，今天又妄想借批判《出身论》捞取发言的机会，当作一根救命的稻草，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告诉你们：如若“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你们“抛到茅厕去”，那就悔之莫及了！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唯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一种怎样的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着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并成了怎样一种荒唐的观点，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身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共同革命，共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吧！

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中学文革报》嘱咐我们写一篇悼念郑兆南烈士的文章，这个题目出得好。郑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壮烈的诗。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英雄业绩不朽！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反动路线的混血儿——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耍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度过了47天。在她奄奄一

* 原载1967年2月21日《中学文革报》第4期，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编注

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炙手可热的刘××、李××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有恃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像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革命的青年要对

毛泽东思想老实。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热和光。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一种人而不可轻信前一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二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郑兆南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

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乌七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

现”这样一条黑线。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分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了。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南同志打成“反党”分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一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过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出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育。”

“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这是她多年以前刻苦改造自己的

结果！这是她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结果！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一个又应该算做堪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竟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谰言吗？用得着涕泪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屑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

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麇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三、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像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拿着鞭子，像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候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两元钱！……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扯谎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深更半夜，她

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为了证实这些话，《中学文革报》的记者访问过亲眼目睹郑兆南同志受害的学生家长，其中有老工人，有干部，所谈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莫不唏嘘感叹！听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叙述，再想一想毛主席的话：“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任何一个革命同志都会对罪恶的××路线引起愤恨，这是一条多么残酷的路线啊！

然而，在当时，那些挥舞着皮鞭耀武扬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篡夺革委会大权的保皇分子，那些默许行凶、遥控大局的工作队，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这一群张牙舞爪的活疯子用了这么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头脑如此清醒的郑兆南同志逼到和他们一样疯狂的地步！你当真以为他们是在打“地主狗崽子”？你以为他们当真要让她“背叛家庭”！那才是梦呓！他们打她，是因为她紧紧跟着毛主席，打她，是因为她听了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了！而什么家庭出身黑七类八类的，那才是招摇撞骗的幌子！

但是，这些人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在这种情况下，像郑兆南同志这样的处境，很容易迷惑、张惶或者误解。但是，她非但没有为个人的安危所忧虑，反而为纯洁红卫兵的组织而担心。遗书中是这样写的：“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我建议在运动后期，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分子，不能允许他们玷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

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再让我们回想一下，郑兆南同志一个人，关在阴暗腐臭的牢房之中。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刺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长夜，整整47天！也许她真的疯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她一直琢磨着怎样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真正能代表党的人。她坚信："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这就是她对待阶级敌人的最好的回答！

我们再强调一遍，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是一个地主出身的人！你可以不解释事实，但无权篡改事实。事实就如此。郑兆南同志的这种感情究竟算不算得无产阶级感情？你看她对毛主席、对党、对真正的红卫兵，是多么爱戴，多么关心。不管处境多么恶劣，不管反动的东西把红旗打得多么高，伪装的多么好，而英雄的郑兆南同志总是最能听到党发出来的真正声音！同属于无产阶级的同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他们的思想总是沟通的。这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在起作用。我们简直不愿意再提起"联动"那一小撮败类。他们的出身倒不错，可是同郑兆南同志比较一下吧！一个是侏儒，一个是巨人；一个是粪土，一个是金石！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出身并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决心！

四、论至死不渝的战斗精神

按照革委会里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想法，郑兆南是被他们整个制服了。由于内脏损伤，她已经浑身浮肿，遍体疮痍，白血球接近到最低点，看来没有几天活头，更不会有什么斗志了。为了减轻罪责，他们就把郑兆南“释放”了。

到医院去治疗吧？第一句话就是“病人什么出身？”听了答复，便被拒之门外了。郑兆南同志感到胸口闷，想喘又喘不出来。特别是在晚上，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在一个椅背上，放一个枕头躺在枕头上。她的面前放上纸笔，因为她“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安危的问题）要向党说。”她要继续战斗！她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那时候外间还不知道××受批判）进行浴血的战斗！但是白天她不能写，怕引起还不十分懂事的女儿的思想混乱，只有在晚上，她才向党倾吐自己的心曲。这时，她还对唐锡阳同志说：“即使市委不处理我这封信，将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用大字报贴到学校去，也表明我对革命的态度。”她就是这样满怀胜利的信心，克服了难以形容的困难，把这封长信写下去了。

到了第四天头上，信还没有写完，郑兆南同志的病情恶化了。她咳嗽、吐血、坐不住了。锡阳同志把她送到第六医院，大夫先是不收。几经周旋，再和五十二中交涉，最后才勉强收下了。郑兆南同志躺在候诊室里，最后和死亡搏斗。她第一次喊叫起来。她是想把死神吓走？还是想倾吐她向党还没有说完的话？这就不得而知了。她的女儿唐桦劝她说：“妈妈，你学学麦贤得、刘英俊吧！”“妈妈，大夫答应给你看病了！”大夫走来了，开始听她的心胸。需要安静。郑兆南的眼

睛已失去光泽，她的嘴唇发乌了，可是她还是咬紧嘴唇，有一刻没有出声。不过，这时候她已经不行了。一个年轻的、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折磨死了！

人死了，还没有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她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败坏她的光辉的名字！受蒙蔽的群众中，包括她的女儿，13岁的小唐桦。她对父亲说："你不应该哭！妈妈死得轻如鸿毛！"在她的眼睛里看来，妈妈是被"群众"打死的，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唐桦呀，你今天所以有这样的好品质、好思想，其中不是也有你妈妈的一份功劳吗？你不是也清楚地记得，她在灯下和你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思想要求你，给你讲英雄人物的事迹吗？难道你从母亲那里受到过一丁点地主阶级的教育？锡阳同志为了不给女儿加重思想负担，几乎含着眼泪回答她："你要和妈妈划清界线，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这就是在反动路线的统治下，革命同志的"永世不得翻身"！不仅郑兆南本人要戴着"假左派"的帽子被"群众"打死，连知情的爱人也要嘱咐女儿和她革命的母亲划清界线！

直到亲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召以后，锡阳同志才把这两封遗书给女儿读了。这天晚上唐桦哭了，第一次哭了，伤心地哭了。是党和毛主席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妈妈的权利！

可以想象，郑兆南同志是在怎样一种逆境里战斗的。但是是什么东西支持着她致死不渝地为党的事业战斗的呢？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思想，正是她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正是她对党无限的忠贞！联系起她平时行动刻苦要求自己的精神来看，这决非偶然了。郑兆南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女儿。革命的同志不应该再套上修正主义集团制造的

死框框，因为她的出身而贬低她。更不应该像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如庸人看历史的伟人，拿破仑是一个伟人，他做了许多好事，也做了许多坏事。"我们只能根据郑兆南同志的阶级立场，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和她的功绩来给她的一生做一个正确的评价。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谈到的："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得到同志的纪念。""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今天，五十二中的革命群众起来了，全市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郑兆南同志得到了昭雪了。其他单位受过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也得到了或将要得到昭雪。这种令人鼓舞的情景，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当革命群众真正夺权以后，那些出身啦、职位啦、级别啦等等死框框是再也不会害人了。那些小汇报啦、只重表面不重表现啦等等修正主义统治手段，是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你的表现是革命的，群众自然会认可；你的表现是反动的，无论你的嘴巴多么伶俐、血统多么高贵、手腕多么圆滑，群众也会把你扔到垃圾箱里去。因为那时的天下，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天下。那时的人们，是敢想敢说敢干的真正大无畏的人们。那时的思想，是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思想！

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鼓舞踏着她的足迹继续战斗的勇士，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从血的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训！

让我们把一首战歌献给郑兆南的忠魂吧：

春雷天降起东风，浩荡污浊横扫空。

恨黠苏修一片土，喜瞻马列最高峰。

千年大业奇勋建，九域熊焰异彩虹。

神鬼“何其毒”计破，雄兵誓死捣黄龙。

谈鸿沟*

编者按：在学校里，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对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对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并且延续到现在，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谈鸿沟》一文是着重针对血统论进行探讨和分析的。现选登出供大家研究，希望同志们读后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进行辩论。

《出身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首长在1961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热心的读者便写信来问，这位首长是谁？是不是黑帮分子？可以请同志们放心，这位首长是个"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不是黑帮分子，你们查一查1961年的《中国青年》，就可以找到这段话。

引用这位首长的话，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想说明存在鸿

---

* 原载1967年2月27日《中学论坛》第1期，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编者按为《中学论坛》编者加。——编注

沟这种现象不合理；第二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事实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经存在了。不但存在，而且已经“不可逾越”了。这对于今天多忘事的贵人，是一个最好的答复。他们不承认××集团歧视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勉强承认一点，也只承认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青年才受歧视。大概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谈这个问题，过不了一年半载，他们就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即使不说这些贵人过去曾经为虎作伥吧，不说他们今天用不承认来逃脱罪责吧，起码也可以说他们本人体会不深，不懂得在反革命集团压制底下是什么味道。

有不少同志不理解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而这些同志往往在现象面前停住了。实质是什么？他们并不懂得。比如产生鸿沟的渊源是什么？反映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危害作用？说明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不知道，自然也找不到填平鸿沟的方法了。的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蕴藏已久的矛盾激化了，爆发了。“对联”出来了，谭力夫出来了，红卫兵纠察队和联动也都出来了。面对无数丰富的事实，这些同志迷惑了。他们本来最善于责备别人没有阶级观点，但他们自己却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事实。他们认为，谭力夫就是谭力夫，好像这么一个上了三年大学的蠢学生有本事一手扭转乾坤似的。他们既闹不清谭力夫怎么会成为谭力夫的，也不想知道为数颇多的群众在当时接受它的思想基础。直到《人民日报》1967 年元旦社论发表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是“血统论”在作祟。但也就到此为止。不少人还以为自己既不是联动的一员，也不是谭氏麾下的战将，大概血统论和自己

毫无关系吧？于是，当那篇与血统论宣战的《出身论》出来的时候，这些同志便跳了起来。他们一方面高喊“打倒血统论！”(因为人民日报社这样写的，他们虽然还迷迷糊糊，但也是要喊几声避避嫌疑的)，一方面又高喊“打倒《出身论》！”(这一回他们清醒了，因为这和他们头脑里的混蛋东西大相径庭了)。于是他们也继承了联动的衣钵，在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乱撒传单，大放二踢脚，大有联动少爷还魂之势。因此，如果说只是谭力夫和联动一小撮人有“血统论”观念，大部分人没有，那实在该为那一小撮人抱委屈了。血统论这种东西历时已经很久了，大约有四五千年了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自已头脑里有没有血统论的烙印，倒是值得深思的。

下面我们就系统的谈一谈血统论和有关鸿沟的几个问题。

一、血统论的历史渊源

在奴隶制社会，血统论这种东西就挺时髦了。比如在古希腊，那里的人起名字，先要把老子的名字冠在前面。比方老子叫贺拉斯，儿子就叫贺拉斯的×××。这和联动张口老子闭口老子是很相像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雅典城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对于体育运动是十分重视的，举行一次运动会就好像过一个最隆重的节日。在这次运动会上有兄弟二人得到两项冠军，哥俩就把老子抬起来，绕雅典城走一周。于是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便对这个老头子喊：“喂，你得到这样的幸福，还不死吗？你还想得到更

大的幸福吗？还想做天神吗？”于是乎老头子一高兴就呜呼哀哉了。这样的事情今天的人看来，实在荒唐。你儿子是冠军，碍得着你的事吗？但那时候的人就是这么个思想感情。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相传那时有个叫做舜的皇帝，他的爸爸是个十分可恶的瞎老头子，几次要害死他，但他还是替自己的老子隐瞒这些事，直到他做了皇帝，也还是没有再提起。多半他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老子反动，他便是混蛋了。因此还是不说的好。

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的伦理关系发展到了极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社会的常纲，是定而不可移的伦理道德。据说有一个牧羊的人，看到自己父亲偷了羊，便揭发检举去了，这件事让圣人知道了，他便大摇其头说：不大对头。汉朝有个皇帝叫做刘邦的，他在当皇帝以前就是个大流氓，时常到他哥哥家去骗饭吃。有一天他哥哥家的饭熟了，但偏对他说没熟，好不给他吃。等到刘邦做了皇帝，应该分封诸侯了。照理说，姓刘的都得是诸侯。可是他的哥哥分封不分封呢？刘邦一想，自己的长兄表现可不好，要是按重在表现的原则，那是不够资格的。不过后来到底是血统观念占了上风，他的哥哥还是被列为藩镇，只是叫做“剩饭侯”，多少还不能忘记表现。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记得，贾府有位凤姐。凤姐为了修缮大观园，得找个监工的。她明明知道贾府里的人没一个不贪污，可也偏得找姓贾的。找姓甄的不行吗？不行。因为封建的伦理观念不允许她这样做。明朝有一个叫做方孝儒的犯了罪，依我们的想法，他犯罪把他杀了就完了。但是没那么容易，得“灭门九族”，连他的老子、老娘、再加上其他的亲戚，再加上亲戚的亲戚，都得杀掉。这下子可真是斩草除根了。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的这一套伦常关系

编进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二十四孝”，内容主要就是谈儿子、老子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归根到底一句话，便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不是英雄怎么办？儿子也偏得说他是英雄，即便老子反动透了顶，儿子也得像尊敬英雄那样尊敬他，其目的无非还是证明自己是个好汉。今天不是还有“共产党员”给自己反动的老子树碑立传吗？多半是读“二十四孝”读得太熟的缘故吧？现在似乎有一种风气，谁只要讲历史，谁就是别有用心。干脆告诉你们，省得你们猜测。我们讲这些，就是给明着暗着推崇血统论的人一面镜子，也照照你们的尊容，看和历史上的那些古董是不是有一二分相似？封建社会有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有怎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怎样的上层建筑；有怎样的上层建筑，就会有怎样的法律、习惯、道德和伦理观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阶级关系也不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样复杂。加之交通的闭塞，物物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所造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就造成了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因此，血统论变成了统治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的理论基础了。那时候出身和成份差不多是分不开的。老子打铁，儿子拉风箱。例外的情况很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说法。比如：“这位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我是学生出身”等等，那并不是说我的爸爸就是学生。封建社会不像今天这样大分化、大变革、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今天资本家的儿子已经不再做资本家，而出身挺好的联动诸位反倒变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一丘之貉，出身和成份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封建时代的家庭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下面摘录《共产党宣言》的一大段，供大家参考。“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凡是资

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这些算作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告诉我们，我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几千年来维持封建社会生存的血统观念带到了今天，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剥削阶级传统观念都要破产的关键性时刻，它们更要进行垂死挣扎。变换各种面目（甚至是极“左”的面目）束缚革命、阻碍革命、破坏革命，那实在是必不可免的事。谭力夫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做为封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命运必定是被革命的车轮辗碎！至于那时候为什么他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通。如果我们掌握了起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由此证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之中。诚如主席所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

长期存在。”他老人家又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正是这种剥削阶级的血统论，发展到了今天便是唯出身论，给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有时达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它在运动中自己蹦出来，让我们将消灭它的战斗部署提到议事日程上，因此，打破它的束缚，消除它的阻碍，防止它的破坏，填平它所制造的鸿沟，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迫待解决的任务之一，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都是责无旁贷的。

二、从三个方面看鸿沟

其一、家庭影响神秘化

一个人受不受家庭影响？肯定是受的。但是究竟什么家庭给予一个人什么影响？在一个人的表现中起到什么作用？答案是有原则性分歧的。由于家庭出身好的青年不理解家庭出身不好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理解家庭出身好的，往往将对方的家庭影响神秘化了。

不少同志忘记了今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一提到剥削阶级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剑影，以为这些家长每天就是教儿子怎样杀人。一提到高干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书，每天都要给儿子讲怎样高深的道理。这些同志从修正主义分子一手炮制的小说、电影、戏剧、刊物上面承受了这个概念，信以为真。其实这些东西恶毒就恶毒在让青年人不理解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得和平演变是什么。假若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天只提防磨刀霍霍，而忘记了糖衣炮弹；假若高干子弟只对自己的家庭

一味迷信，而忘记了高等生活的侵蚀，那么，或者使他们放松警惕，或者走到极端，造成了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这都是对革命不利的。又有一些同志忘记了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以为家庭给了你什么影响，你就接受什么影响，似乎一个人没有一点可以选择的自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于一种影响，有乐于接受的，有勉强接受的，有引起反感拒不接受的，也有无动于衷的。对于家庭影响也如此。今天的青年人接受了党十七年的教育，对于拿枪的敌人是能够认识清楚的。如果还有哪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在家里磨刀，那个结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对于家庭一般说来是憎恨的，因此，对于家长的言论，他们就有了免疫的能力。他们时时将自己放在与家长对立的一方，这样，他们在克服坏的影响方面便有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少爷们，那些自认为最懂得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庭之中的少爷们，却很容易忽视自己家庭的坏影响。一旦他们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坏影响，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也会当作富有营养的东西接受下来。殊不知，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都有市场。对自己的家庭丧失警惕无疑是危险的。

更有一些同志把家庭影响夸大到了无可形容的地步。他们以为除去家庭影响就没有其他影响了，即使有，也得受家庭影响制约。毛主席有一段话，证明了这些同志的荒谬。他说："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教育（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并且能克服家庭影响的。毛主席说的还是解放以

前的情况，解放以后，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情况会怎样呢？恩格斯在解答“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时说：“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和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失。”

正像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驳斥过的政治庸人那样，今天摇头晃脑的血统论者们念念不忘家庭，念念不忘老子，活脱脱是个封建社会的遗少。革命的导师是这样批判他们的：“你们却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难道你们（资产阶级）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里还谈到：把东方的家族形态看成绝对的，是不合理的。这种家族形态只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

我们所以要引用这样多的经典著作，无非是想证明今天大喊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大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们是群什么东西！他们的水平比起那些用资产阶级偏颇观念灌昏了脑袋的政客还不如！看到他们对家庭这样神秘化，简直让人想起宽袖方巾的时代，十足是一群蠢货！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革命群众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说，这一不是将家庭当作社会上的细胞的那种关系，也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目前我们国家的革命人民正处在一种无产阶级同志式的关系，这就像毛主席所说的：

"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反动的唯出身论妄图改变这种局面，分化革命队伍，以达到其复辟目的。

其二、政治表现神秘化

把家庭影响神秘化了，自然要把本人表现也神秘化。因为这样一来才符合封建时代的种种格言。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什么"将门出虎子"，这些陈词滥调都被血统论者奉为至宝。

他们首先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都了不起，行堪观止，字字珠玑，一举一动都值得记在将来的回忆录上。

这么一来，就造成这些青年盲目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贬低出身不好的青年。怀疑他们，轻视他们，处处以狭隘的偏见观察他们，把他们万分平凡的举动也看得大有申饬。搞得他们紧张、麻木、自卑甚至心理变了态。女十二中有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长期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竟以为自己顺心的事都是错的，自己不满的事都是对的。她们看了某一篇文章，先是觉得挺高兴，可是立刻就责备自己，回去写了篇批判文章贴出来，不过后来听说这篇文章让某位领导人肯定了，她们可大大慌了手脚！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这还有什么朝气蓬勃可言！她们的心灵简直是经受了无可救药的残害！而残害者不是别的，正是封建的血统论，正是目前大大流行的唯出身论！何其毒也！手头还有一张铅印的传单，是四个学校在运动初期联合组织的红外围。红外围的组织当然都不是出身好的。他们写道：只有革命的左派才能加入自己的组织，可接下去便说，"这个组织要绝对地服从红卫兵的领导"，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格打勿论"！多么典型的奴才性格！你已经是革命的左派了，还要绝

对服从一个既非党团，又非无产阶级先锋队，只不过出身好的红卫兵领导之下。大概领导你们的都是超左派了吧？以上这两个例子，说明了青年之间的这道鸿沟已经多么深，多么宽，多么不可逾越了！在学校里，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气氛，一派是专门汇报思想的，一派是专门听汇报的，前一派必然产生阿谀奉承，阳奉阴违的能手，后一派必然出现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老爷。真要问他们是怎样成了混蛋的？不是别的，还是万恶的唯出身论把他们逼出来的！

其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任何一种腐朽的思想，都会被剥削阶级所利用。过去修正主义集团大大利用了血统论，运动初期××路线也在出身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道鸿沟越挖越深，务使我们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想把革命队伍缩小，以利于消灭之，二是想分而治之，三是想拉拢、利用一部分青年做他们顺从的复辟工具。有一段时期，他们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真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中学文革报》和其他中学生主办的报纸常常有这方面的报道，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有一张铅印的表格，是一位司机同志托人转交给我们的。他说："请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人看一看，给他们做个参考。"不负盛意，我们把它抄在下面，以飨同好。

学习驾驶员的条件

（一）驾驶员的培养对象：

1. 驾驶员的培养对象要贯彻阶级路线，以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烈军属子弟为主；对家庭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原则上不培养。

2. 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看其政治表现，如果能与反

动家庭划清界限，经过有关部门审查确属没问题的，可以适当吸收培养一些。

3. 所培养的机动车驾驶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好同志。

(其余两条从略)

这仅仅是培养一个驾驶员所需要的条件！这张表很能说明问题。在第1款中，是两个不问表现，一不问“红五类”出身的表现，哪怕这些人是联动的刽子手，也要被“贯彻”进去；二不问“黑六类”出身的表现，哪怕是聂元梓、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也都拒之于门外。第2款似乎是重在表现了。这一款是针对除去黑六类以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那不用说，就是小业主出身的了。这回重在表现了。可是，一要划清（划清了还不相信），二要审查（审查到了没有问题），才能培养“一些”！根据出身这么一鉴别，于是乎再也用不着进一步审查了，便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好同志”了！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这种现象究竟能不能容忍！这不过是千万个例子中的很小的一个。凡是克服了偏见的革命同志都可以为我们证明这一点，举出你亲身经历的更多事例来。

社会地位是这样悬殊，还谈的上什么团结，什么了解？更谈不上共同战斗了。有的只是隔阂，是生疏，是淡漠，出身真是压死人啊！

以上我们就从家庭影响神秘化这个方面，从政治表现神秘化这个方面，从社会地位的平等这个方面，分析了在青年之中存在不存在的一道鸿沟。我们说，是存在的。它的存在是由血统论，唯出身论一手造成的。它严重地阻碍着我们革

命事业的发展，阻碍着我们的前进，到了彻底填平它的时候了！

三、填平鸿沟的办法

我们必须用阶级论代替血统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干革命。阶级论就是“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这里所说的成份不是出身。比如你成份是个工人，是个学生，这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不能唯成份，不是说是个工人都是革命的，还得看表现。这和出身都毫无关系。让那些死抱着家庭粗腿不放的人见鬼去吧，这个鸿沟我们是填定了。

革命的同志要在斗争中填平这道鸿沟。过去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这道鸿沟把革命青年分开了，使他们站在天河的两岸，遥遥相望，几乎使运动夭折。现在，我们应该在彼岸此岸共同填土，让它变成一道通途。这道鸿沟只能在大联合中填平，在夺权斗争中填平，在斗批改中填平。只有共同斗争才能彼此了解，才能克服神秘化的倾向，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识别一个人表现的好坏，才能验证一个人所受影响如何。那些受过一些委屈躲在家里不愿出来的同志，应该鼓起勇气，重新投入战斗了！那些压制过别人，无形之中帮了修正主义分子的忙的同志，也应该扪心自问，努力改正了。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涤荡我们脑海中的剥削阶级观念，才能使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改造成一代新人。而要使这些都不至于变成空话，要使中学革命运动不至于冷冷清清，要使今后的革命能顺利开展，我们首先应该强调：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我们讲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屈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不在于他的性格，不在于他的年龄，而在于他的表现，在于他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高不高？思想改造得好不好？通过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决不是出身好的人一定比出身不好的人表现更好。联动的骚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党历来是主张革命青年应该平等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他亲手拟定的接班人五项条件中，并不曾提到“出身”二字。他的那篇足以鼓舞我们青年无限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是对所有革命青年说的，不是对某一阶层的青年说的。我们的导师早已为我们指明了航程，谁要想扭转它，想阻碍它，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鸿沟等待着我们填平，血统论、唯出身论等待我们消灭。革命的年青人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在斗争中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向一切腐朽的东西开战！胜利必将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

——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旭日战报》，不惜以六版篇幅，对《出身论》大肆攻击，发表了一篇又长又臭的文章“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阶段出现，是必然的。

大家总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当火势燎原的时候，是反动的血统论配合着××路线将这场大火窒息的。随着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反动的血统论又找到了旧同志。它配合着保皇派别、联动份子、××路线的忠实信徒，配合着社会上的习惯势力，再一次进行新反扑，这当然是“必然”的！

该文的作者实在没有时间概念。《出身论》出现在去年秋天，当时大联合、大夺权还不是高潮！有的却是西纠的猖獗，联动的骚乱。《出身论》敢于面向这些嗜血成性的反动组织下战表，敢于动摇他们的特权地位，即使缺点再多，也足以使庸人惭愧。而那时候你们这些好汉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谁人不知你们轻院东方红承认过谭力夫的讲话，承认过反动对联！你们可曾触动过你们的错误思想，哪怕是一丝一毫！即使是现在，指导今年运动的元旦社论明确地批判了反动的血

---

* 原载1967年3月6日《中学文革报》第5期，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编注

统论，又有哪个人看过你们的表态！如今你们在批判《出身论》——这个向反动的血统论的宣战书上充当英雄好汉了。你们和轻院“红爆队”大联合了。就连你们的编辑也不否认他们是保皇势力和执行反动路线的顽固份子的大杂烩，你们为了装门面，竟和血统论的崇拜者，联合在一起“批判”血统论了，岂非咄咄怪事？而发表于贵报的“红爆队”们的大作中，不知道从《出身论》的哪一节找出“男女关系”这一条罪状，这大概就是他们要批判的血统论吧？

该文（指“大毒草……”云云，下同），首先从理论上，继而从政治上否定《出身论》，我们有必要逐一批驳，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批驳，批出他们趁此机会攻击毛泽东思想，颠倒历史之真实目的，我们就是要暴露这些跳梁小丑们肮脏的灵魂。

一、《出身论》从理论上“铲除”不动

该文反驳《出身论》的第一个论点：“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并能克服家庭影响”。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须要提出“社会影响不大于家庭影响，社会影响不能克服家庭影响”。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笔者）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又说：“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它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请看，家庭影响又起“很”重要的作用，又是“基础”，又不容“忽视”，显然家庭影响是远远大于社会影响的，是社会影响所无法克服的。这是放屁！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否认内因也是由外形成的；但

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内因和外因有着质上的不同。我们处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为外因，是同时存在的。尽管从总的方面来说，一个是强大的，一个是相对弱小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情形又有异样。他总有自己的选择性。对于同一种影响，往往有的人起同感，有的人起反感；有的人爱好，有的人厌恶，有的人强烈，有的人淡漠，有的人接受，有的人抗拒。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即如你们，为什么和血统论的倡导者红爆队大搞联合，而不和反血统论的人搞联合，也是内因起了作用。

对于家庭影响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上的好影响是强大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因此，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从小受的社会教育，就是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教育。长大以后又知道阶级斗争，知道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再强调一遍，从小（照该文作者唯一清醒的时刻所说的话，即刚刚脱离“本能”，刚刚有了“思想”的年纪，亦即从 7 岁）起开始长期接受这种思想，这就形成了内因。这时对于自己的家庭影响就会是反感而不是同感，是厌恶而不是爱好，是抗拒而不是接受。当然这也是指一般情况，例外也是有的。不过不管诡辩者怎样曲解例外，真正了解了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就不会把家庭影响看得神乎其神了。

返回来再看社会影响是不是能够克服家庭影响，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为了证明该文作者对于毛主席著作是怎样的不学无术，我们摘录一段毛主席的话就足够了。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

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教育，是社会影响吧？可见，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不是家庭影响，而是社会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教育儿童的结果。

但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却立论：家庭影响是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基础！

在发难的开头，他们本来说，《出身论》的这一段是“不值一驳”，却驳了三千字。不幸的是那驳的结果，原来是他们自己违背了最高指示。

该文在做了这样的“文字游戏”之后，又反驳《出身论》的第二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大”。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有着紧密联系的。”

发生作用，固然是对的。我们说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并没有说一点没有。但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则大错而特错了。

出身和表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个中间物，那就是“影响”。

正如一位老工人所讲的，出身、影响（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表现是一条索链的几个环节，那边烧热了，这边不见得热。

表现和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和社会影响。因为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思想是表现的根据。所以，表现是受社会影响制约的。

对于一个人的表现，家庭影响自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不过不是主要作用。毛主席和××同志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只有家庭影响和一个青年的出身才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新社会，社会影响和出身是没有多大关系。今天的学校都是无产阶级开办的学校，并没有地主子弟学校或资本家子弟学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同样是社会教育。当然，对于高干子女，出身和社会影响常常是有关系的。例如寄宿制高级学校，即那些只供高干子女享受的修正主义温床，就是和出身有关系的。不过，举出这个例子，对你们的结论实在太不利了。因为这只能证明出身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并不好。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提的好。

出身只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家庭影响又在表现中占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与表现关系甚小。

光是论证到这一点，已经足以动摇血统论的基础。但是，我们还要证明，出身即使和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尽管这个论点会使“炮制”该文的“混蛋”们暴跳如雷。

“当然在部分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个别反动的。”——谢谢，这是该文作者神志不清时提供给我们的论据。

联动成员的出身都是最上乘的，但是陈××同志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并不好，因为这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相反，列宁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但他从哥哥姐姐那里受到了很好的革命影响。毛主席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尽管他的父亲是个富农，但是他从母亲和家里的雇工那里，受到了

许多好影响。无论血统论者多么一厢情愿，一个老子总是组成不了一个家庭的。

这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

“这是少数！这是例外！”“这不是主流！”血统论者振振有词地念咒了。不过，既然已经承认是“少数”、是“例外”、是“支流”，那么，就是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它存在的道理，就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阶级敌人还是少数呢，但并不等于没有。那么，说明这些例子的道理是什么呢？该文作者说不出。别人说出来，他又跳脚！

这个道理，《出身论》说得很清楚：一个人的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联系了，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如此说来，出身和构成表现的次要因素——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

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出身只能作为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这几条气势汹汹的好汉，在两次碰壁之余，开始反驳《出身论》的第三个论点了：“出身不是成分”。按照辩论的原则，它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就是成分”。

它们正是这样做的。该文说：“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也就是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出身……”显然，作者是把成分当作出身了。

把成分当作出身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是，老子是老地主，儿子是小地主；老子是老高干，儿子是小高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也。

我们在论证“出身不是成分”这个论点时，有这样一个论据：“毛主席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蒙作者费心，找到了原话。原话说：“从它们的家庭出身看，从它们的生活条件看，从它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于是它们便手舞足蹈起来：“殊不知毛主席在讲这一段话时首先就讲到了家庭出身。”按照他们“混蛋”（对不起，这是借用）的头脑所得到的“混蛋”的结论，便是“哪一个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就应划归哪一个阶级范畴。”真要给他们讲点初级历史了，可怜的大学生！请问，当时能上得起学的知识分子，什么家庭出身的居多呢？显然，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居多。可是，他们的大多数偏偏不属于剥削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前面援引过的毛主席的话：“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都雄辩地证明了：“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划为哪一个范畴。”

出身不是成分，儿子的职业不是老子的职业，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浅显的道理吗？“出身不由己”，所以是死框框；成分可选择，比如，从前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放弃了继承权而参加革命的，如今也有成分不好的人改造好了摘帽子的，所以是活框框。既看成分，也看表现，是对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是不对的。因为成分和表现是密不可分的。地主的表现和贫农的表现就是不一样。而出身和表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有的甚至是一点也没有关系（例如列宁）。所以，用一个死框框，同时又用一个活框框衡量一个人，是为《出

身论》反对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愿意对“出身”这个词做做正名的工作。“出身”有两个含义。今天普遍的用法是指父亲的职业，亦即家庭出身。我们文章里的“出身”，都是指家庭出身。出身还有传统用法，是指阶级出身，即本人过去的职业，亦即本人出身。例如：第一个发明电器的爱迪生是报童出身，不是说他父亲是报童，而是说他本人过去曾做过报童，在我们的文章里一般是用“成分”代替了。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常常有着不同阶级的属性。所以，在我们看到一些材料的时候，有必要分清哪个是出身的时兴用法，哪个是传统用法。

既然出身不是成分，请问铲除《出身论》的劳动能手们，你们何曾见过：“一、有出身论，二、不唯出身论，三、要重在政治表现”这样的阶级路线？你们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党的阶级路线！

由于你们连这样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所以就写出了那样狗屁不通的文章。的确，《出身论》是提出“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对于过去长期受压抑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是会起一定积极作用的。但你们抗议了。你们说，这就是“他们还梦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出身不好的青年骑在人民头上来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何谈重新二字？显然，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你们又说：剥夺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正当权利，“这就是我们党的阶级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制度。”你们多么恶毒地挑拨出身不好的青年与党的关系啊！请问，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吗？对地富反坏专政，难道对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人也专政吗？出身和成

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一个堂堂大学生，把影响也看成老子，把儿子也看成老子，横竖都是老子，念念不忘的也只有这个老子，简直高举老子这面大旗死要赖皮了。倘不是犯了偏热狂，就是中了修正主义流毒太深，大概快不可救药了。

你们想驳倒《出身论》这三个主要论点吗？遗憾的是你们只停留在谩骂的水平上，一个也驳不倒。你们在理论上"铲除"不动《出身论》，因为《出身论》是以毛主席著作为依据的，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你们这几个神志昏聩、头脑混沌、思路紊乱、词不达意的家伙们妄想及锋而试，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到了极点。

二、《出身论》从政治上"铲除"不动

有一些人信奉这样的原则：用理论打不垮人家，就希望能用帽子把人压垮。看来，北京轻工业学院就很有几个这一流人物。

帽子之一是："挑拨各种不同出身的青年之间的关系，蓄意制造宗派对立。"这个帽子要是给反动对联戴上倒是合适。但我们何尝提出过"老子英雄儿混蛋，老子反动儿好汉"这样的"鬼见喜"来过？并没有。我们只是提倡"出身不同的青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而且我们深信这是党一贯所主张的政策。难道提倡平等，就是"制造对立"吗？你们真是到了发昏的地步了。

挑拨关系的恰是你们。正是你们恶狠狠地说："老实告诉你们"，（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这是根据毛主席著作的哪一章哪一节？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哪一条哪一款？你

们还煽惑说，“这是党的阶级政策”。用你们的话说：“作者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你们也许会诡辩说：我们是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前面加了定语的啊！我们指的是“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原文如此不通，非笔者引错）之云云的青年啊！

参照上下文意，那么不甘当“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剥削家庭阶级出身的青年，就可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了吗？显然，这也是要被你们否定的。所以加上了那一大长串的定语，足以证明了你们逻辑上的混乱，思想上的空虚。这样你们就越来越糊涂。比如对于没有定语的，而又不是工农家庭出身的青年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是没有答案的。

退一步说，你们加上了定语，我们暂且认可吧。那么，试问：“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出身好的青年——例如联动分子——能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呢？无论现在你们和这帮家伙怎样联合组织“批判《出身论》联络站”，在那里暗递秋波，恐怕你们口头上也不敢承认这一点。用中国人的话，简洁地说：坚持反动立场的（哪怕是出身好的）青年，也不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可见，这里只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问题，而不是家庭问题。只是表现问题，而不是出身问题。只是定语问题，而不是主语问题。是你们把本质的东西变成了定语，把非本质的东西当成了主语。因为自己的荒谬，而在那里“怒不可遏”，这个脾气可真发得没道理。

你们或者会大叫：出身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没有呀，出身不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全部呀！应该说今天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无论什么出身的都是少数。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过了。现在再退让一步，就说即使如此吧，也

只要提出“凡是不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一个口号就可以了。因为照你们的结论，只要这样一提，自然而然就把出身不好的人排除了，把出身好的人留下了。你们既然认为出身是表现的唯一的原因，表现是出身的必然的结果，那么，表现之中已经包括出身了。用不着把这二者相提并论了。可是你们偏偏要齐头并进。其实，文化革命以来的表现，用不着问老子，自己最清楚。不过你们怕谈表现。因为一谈表现，你们就吃亏。对你们这一小撮人，不拉出身这面大旗做虎皮，岂不露出庐山真面目？特别是对于你们的联动“小将”，这就更不利。

那么，是谁“为害人虫混进革命阵线进行活动提供了组织路线”呢？不是别人，正是你们。

是谁在挑拨关系呢？不是别人，也正是你们。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请听你们自己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吧：“我们就是要考验你们！”“你们”——根据下文，是指出身不好的青年，那么，“我们”是谁呢？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吗？这些英雄哪里比得上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这样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你们还要考验人家，配吗？如果，这里的“我们”是泛指出身好的青年，则又大错特错了。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应该接受党的考验。可是，他们中间，不存在什么特权，不存在一个是考验别人的阶层，你们分出了这样的阶层，不是挑拨关系又是什么呢？

帽子之二是“为××路线喊冤叫屈”。什么是“××路线”呢？照你们的说法是“抽掉了重在表现的政策中的阶级内容，而把‘重在表现’变成了‘重在表面’。”或者说，是“剥削阶级子女受修正主义宠爱”，是“不讲出身”。这是最疯狂地颠倒了历史！如果说什么是“重在表面”，那么，只问出

身，不问表现就是最严重的“重在表面”。因为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出身和阶级内容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只有成分才是和阶级内容有关系的。即如你们，对于出现好的联动分子那样客气，而对于出身不好的不问其表现如何都那样霸道，实在就是典型的“重在表面”。

血统论既然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得那样顺手，那么，这个古已有之的东西，也不会不为修正主义集团所利用。血统论的作用，就是缩小革命队伍，扼杀革命热情，制造人为的对立，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哪一个反革命份子不欢迎这种东西！

我们在《出身论》中“受害问题”里举出了大量的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例，这都发生在××集团统治时期。今天本报发表的这一篇调查材料，也发生在文化革命之前。有无数事实证明了旧团市委推行的是“唯出身论”的反动路线。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血统论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

我们控诉××集团形“左”实右地推行血统论，你们则说没有那么一回事。请问，这到底是谁“为××路线喊冤叫屈”呢？是我们还是你们呢？

你们颠倒了历史，但历史是忘得了的吗？问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现实。你们为××集团翻案，把他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罪行，美化为实行了一概平等；把他不讲党的阶级路线，美化为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为了让反动路线推行“血统论”，继续歧视、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并使它合法化，同时也为了减轻你们过去迫害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罪责！总之，你们是想推行比××形更“左”实更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最恶毒的是，竟把修正主

义集团欠下的这一笔血债记在党的帐上！

是谁告诉你们，××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是现实吗？非也！是中央文件吗，中央确实发表过一篇社论，谈到××的招降纳叛。可是，这里指的降和叛，不是出身，而是成分。指的是××招降了一些无耻叛徒，反动权威，蜕化份子，奴才走狗，哪里说的是出身？于是，头脑简单的勇士们又迷惘了，既然××招降的是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又怎么可能迫害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呢？如果，你连这也迷惘，那么，你可以回答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情景，这总没忘记吧？那是千真万确地迫害了剥削阶级子女了吧？告诉你们，这恰好证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广大的剥削阶级子女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正和广大的出身好的青年与修正主义集团不是一个阶级范围的一样。那么，是谁告诉你们，××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

不是别人，是××路线。是××路线指使他们的喉舌，所谓新改组的《北京日报》告诉你们的。翻开那时候的报纸一看，北大的孔繁不是大喊陆平优待"狗崽子"们吗？从此开了先声。至于孔繁是什么东西，现在大家都了解了。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演出了。"对联"问世了。血统论变本加厉了。回顾历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以《旭日战报》为首，召集了三十个学校，大为××翻案，莫须有地大讲出身不好的青年"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纷纷出笼，他们自称'左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借批判形'左'实右为名，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工农子女之实。"好一副不准人家革命的赵太爷的劲头！今天有哪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专门打击工农子女了？工农子女也有左、中、右之分，工农子女和

非工农子女一样，既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集团，假使有个别的工农子女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理应所有的子女（当然是要革命的子女）共同打击之，其实这并不是打击工农子女，而是打击反动路线。你们把打击反动路线当成打击工农子女，这是对工农子女最大的诬蔑；你们又以工农子女为幌子，不许人家打击反动路线，实际上是肆无忌惮地包庇与袒护。你们颠倒历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你们和修正主义集团，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

历史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小心你们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帽子之三是"拼命地鼓吹反动的'阶级熄灭论'（疑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对于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们，错了一个术语也算不得什么怪事），鼓吹荒谬的'阶级调和论'"。

在我们的《出身论》中，一直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我们强调无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强调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强调了与反动路线的斗争。我们所没有强调的，所不赞成的，所激烈反对的，是"出身好的青年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之间的斗争"。我们说，这是人为的鸿沟，理应填平。

但是，"聪明"的该文作者，说我们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就是"阶级调和论"！在他们看来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两个对立着的阶级。

这个帽子，提出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

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将要贯串整个社会主义的始终，阶级斗争要持续五代到十代。

今天的阶级敌人诚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剥

削阶级分子。那么，下一代的阶级敌人是谁呢？解放快 18 年了，上一代已经遵照自然法则而将近老迈了，下一代却成长起来，逐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部门唱主要角色了。对于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反动对联告诉我们："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阶级敌人有了。老一辈一死光，他们的儿子就会是阶级敌人的替死鬼！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点也不甘示弱，他们追随反动对联之后，继续把剥削阶级子女当作新的阶级敌人看待，谁替剥削阶级子女说话，谁就是"摇旗呐喊，为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阶级斗争的规律当真是这样吗？

毛主席亲手拟定的十六条告诉我们，"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看来，主力军并不只是出身好的人。

那么，革命的对象，即阶级敌人是谁呢？过去揭出来的敌人姑且不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来，这个新登台的阶级敌人，也还不是出身不好的人。

特别是通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泛滥时期，特别是通过西纠、联动骚乱时期，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以出身来划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够多么荒唐！

歧视、排挤、打击出身不好的青年，绝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接班人）的阶级斗争。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经验告诉我们，否定式的回答要比肯定式的回答容易一百倍，我们择易而行，可以这样回答，绝不能把唯出身论当作下一

代阶级斗争的规律。

而以轻院为首的这一小撮人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斗争的学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观点。从而搅乱了阶级队伍，放跑了阶级敌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调和论”。

《旭日战报》发表的这篇“臭文章”（这都是借用原话），通篇没有提血统论的一条罪状，没有列举血统论的一条表现。但为了遮掩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在文末居然也喊出了“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足以使不明真相的人迷惑，以为《出身论》的就是血统论。实际上，什么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呢？这篇洋洋大观的铲花文章，就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它反血统论是假，反《出身论》是真。因为《出身论》嗅出了他们思想深处血腥的血统论的秽气。《出身论》当初可以作为进攻西纠、联动的武器，当然更不惧怕你们这群蟹将虾兵。我们既不怕你们的大帽子，也不怕你们的人身攻击，不怕你们沿街卑鄙的造谣！让你们在真理面前颤抖吧！

轻院东方红公社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它是要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继续受血统论的迫害，它是在挑拨广大的出身好的革命青年与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关系，它是在颠倒历史，替××翻案，它是在抹杀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没有忘记，前一阶段中央文革率领着革命小将，费了多么大的心血，才扭转了血统论猖獗一时，独霸一面的局面！可是，现在轻院东方红公社及红爆队这一小撮人却含沙射影炮打××同志，竭力把已经前进的历史拖回来。我们说，他们完全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而是怀着狼子野心，企图实现上述一系列丑恶目的。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反动的血统论正在反扑，同志们千万要提高警惕！

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

——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小撮人（即《旭日战报派》）摆出一副狗气杀的架式，与该院的另一种小报联合起来，又拾起血统论的大刀，要和《出身论》血战到底了。

他们纠集了三十个学校不多的几个糊涂虫，其中包括他们的联动“小将”，要开“批判《出身论》誓师大会”了。遗憾的是响应者寥寥无几，终于没有告成。他们并不甘于失败，上窜下跳，妄想“以数量压倒质量”，大造声势。在他们特刊一号上，用了六个版的篇幅，非要铲除《出身论》不可。

我们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上给了他们致命的批判。我们说：《出身论》在理论上是铲除不动的。

聪明编辑们果然不再在理论上碰壁了，他们开始反击《出身论》的第二部分：“受害问题”，我们还记得，是他们说“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个理论是贯穿整个《出身论》的第一线。这次回避了理论，“受害问题”（这是实际问题）又成了“精髓之所在”了。

对于他们的朝令夕改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人总是顽而不会固的。

好，你们要辩论“受害问题”，我们就辩论“受害问题”。

---

* 原载1967年4月1日《中学文革报》第6期，署名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编注

不过，事先告诉你们，稻草是捞不到的，这正好会暴露出你们的“精髓”。

“受害问题”这一节，举出了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各方面大量的事例，证明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不像×、×路线控制的《北京日报》所说的，是受修正主义集团的宠爱，相反的，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你们承认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呢？这是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但你们说这是“特例”，“特例就是诡辩”，于是你们就以阿Q精神得胜还朝了。

不过，要反驳我们，总得举出相反的例子呀！说起来令人寒心，你们有关社会方面的例子只有两个，我们原封抄在下面。

其一，“在控诉××集团时，京郊的贫下中农愤怒揭发道：××之流，在四清运动中大喊大叫什么以后地富子女叫什么名字，需要研究，总不能叫他们地富子女吧？他们还别有用心的起了‘新式农民’之称。贫下中农还揭发了××之流在一个生产队以搞“青年联合会”为名，不仅吸收了百分之三、四十地富子女，而且还让一些地富子女掌握了“青年联合会”的各个环节。复查时，还改划了一批地富子女为‘劳动者’，企图使青年一代混淆阶级界限。”

其二，“有的贫下中农这样说：以前他们（指地主）的孩子上洋学，咱们上不起，现在还是他们的孩子能上学，咱们还是不能上……，这也许是个特例，但是值得深思！”

第三个例子呢？没有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得出来了：“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草率，而是因为人家“不必多费笔墨的缘故”。

无论是从我们长时期的社会调查的结果中，还是从全国

各地广大农村青年的成千封来信中，本来很容易挑出大量事例证明你们在说谎。不过，因为我们的“特例”都是诡辩，不如你们的“特例”那样“值得深思”，看起来，这样作的结果，对你们的花岗岩脑袋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请听我们问几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

去年夏天，当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写出《出身论》，进攻猖獗一时的血统论的时候，你们还在沉睡，或者说正在帮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你们都没放过一个屁。谁都知道，你们轻工业学院在“辩论”对联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一边倒。在白色恐怖下，几乎没有一个“黑五类”子女不承认或不默认自己是“混蛋”，也没有一个“红五类”子女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好汉”的。当然了，你们东方红公社诸公也“绝对如此”。按理说，血统论统治得这样结实的地方，在今天大家都批判血统论的时候，应当有所作为，哪怕写一篇文章，装装门面也好。但你们却连这一点表示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或许如你们所说：“谭氏路线要反，××路线也不能放过呀！”先说说你们思路的糊涂。谭力夫不过和你们一样，是从蠢人堆里挑出来的区区大学生，他算得了“什么氏路线”？就说有个“谭氏路线”吧，它和“××路线”究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以告诉你们，“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围绕着我们党的每一次政策，都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哪里还有什么第三条路线呢？

再退一步，就如你们所说吧！“谭氏路线是形‘左’实右路线，××路线是形右实右的产物。我们总得杀退两边进攻的敌人啊！”为了给批判谭力夫讲话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血统论

的人加上一个罪名，你们不惜把××算作谭力夫的对立面，从而把他的“形”也变“右”了。你们真正觉得谭力夫形“左”实右吗？未必。不过事情相隔不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刚刚将“谭氏路线”置于死地。大家对谭力夫讲话的流毒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件也还记忆犹新，这时候，你们不得不咬着牙根说，这是从“左”边杀来的“敌人”。但××迫害这些青年的事件究属这一些了，大家的印象可能淡漠了，这时你们便指鹿为马，把××说成是形右的，以为搞了这样的把戏，就可以作为你们打击反对血统论的同志的借口了。不过，我们要问：××路线真的形右实右吗？

党中央通过它的刊物告诉我们：××集团推行的是形“左”实右的路线。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请问，你们是和谁唱对台戏？

你们的那两个特例，是想说明××路线不仅是本质上的右，也是外形的右。请问，这个形“左”又“左”在何处呢？

你们回答得了这几个问题吗？

颠倒历史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64年以来的历史吧！

1964年5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一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

那么，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毛主席分析了几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看，

第一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的复辟活动、恢复封建的宗族活动和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第二是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第三是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活动；第四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的活动；第五是贪污盗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没有单单把地、富子女提出来呢？

没有，一条也没有。到了 1964 年 9 月，为了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亲手炮制，×××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出笼了。在这株毒草里，就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修正”得面目全非了。修正主义分子首先否认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该文件说，即使是那蜕化变质的 5%，“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只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其次有否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且不准许向雇工剥削等现象做斗争。该文件说，不应该给当时猖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富裕中农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甚至不应该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百般包庇这些人，还让其中“公认能干”的，继续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接着又混乱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阶级队伍。对于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可以不讲“成份”（注意，是本人成份，而不是家庭出身），而只能根据抽象的“德”、“才”标准来衡量他们。同时，那些贪污盗窃、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也还可以是“依靠对象”。把修正主义分子提出来的政纲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几大表现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把本质上的许多东西抽去了！那么，阶级斗争还剩下了什么呢？只剩下他们不敢更改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这一

方面了。

但是依照宇宙的自然法则，到了 1964 年，这群地富分子很多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们一死，别的剥削分子又都被否认了，岂不是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和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公开顶牛了吗？为了掩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掩护他们自己），为了掩护真正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迷惑视听，这群修正主义老爷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个阶级，那就是“出身反动的青年”！该文件分析约占农村人口 10%（其实远不只此）的地主、富农子女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时说：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父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这就是新的阶级敌人。多数呢？“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还站在十字路口”。这就是新的特殊“阶级”。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即便是他们，也“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不用说地富子女本人，就是和他们通婚的干部，也要“抓紧教育”。以上这些，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阶级斗争的“创造”。可见，最先提倡“血统论”的，最先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也正是修正主义分子。

《旭日战报》派说：“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是不是指的以上这些规定呢？你们还要“左”到什么地步呢？非得把地富子女全部搞成敌对阶级不可吗？

那么我们要问，究竟怎样划分阶级？毛主席告诉我们，划分阶级有两个标准。一是经济地位，二是对于革命的态度。难

道在解放后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地位吗？没有。那些真正具有特殊经济地位的，比如投机倒把分子、雇主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反而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那么，是根据“对于革命的态度”才视出身反动的青年为敌人的吗？也不像。假使真的以此做标准，首先那些蜕化变质的干部，那些贪污盗窃分子，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人就应该算做敌人了。但这些人又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何况，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大部分算做“站在十字路口”、“划不清界限”的集团，也是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他老人家和他的战友们多次告诉我们：大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这样看来，把“出身反动的青年”算做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便毫无道理了。其实，这也只是出自真正的阶级敌人的政治上的需要而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政治原则的。

把敌人拉进来，谓之“实右”，把自己人打出去，谓之形“左”，这就是我们在《出身论》中所分析的：“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进党内，给某些五类份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旭日战报》及其同伙清华附中的联动分子，两次为这一段“笑掉大牙”，但是我们偏偏把这一段再写出来，直到你们的大牙一个也不剩为止。

我们也觉得可笑。但我们笑的是：所谓谭氏与××，所谓的××与你们，是何其神似！更可笑的是，谭力夫和你们这群小丑，一起在那里拾××的余唾，却还把自己打扮成反×的英雄！怪不得在最近一次辩论会上，你们还公开为谭力

夫讲话辩护呢！

修正主义分子的好梦是不长的。毛主席在1965年1月亲手拟定了"二十三条"，及时扭转了这个局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出身不好的青年了，却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决策人和他们大大小小的喽罗！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只字没有提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怎样的走在十字路口，相反的，即使对于他们的老子，还规定："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又说，"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掉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请看，二十三条中对待地富分子态度，恰好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待地富分子子女的态度！同样的文件，还有1964年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这里也丝毫没有提出身。这就是说，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只要你按照五项标准去作，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

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不禁高呼：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你是多么英明啊！

但是阶级敌人并不死心，他们还在煽阴风，点鬼火，他们的影响也远没有肃清。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搏斗，血统论、唯出身论这些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货色，就赤膊上阵了。请看：

×××1966年8月的讲话说："他们（指地、富、反、坏、资）的儿女要报仇呀！有杀父之仇儿子不报孙子还得报。"又说，"对他们的子女……要提高警惕。"还说，"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对在场谈话的多年

革命的老干部，还这样讲："你们情绪不对，有几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你们的思想感情不对，值得警惕。"（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的材料）。我们都还记得刘×的检举吧？她说：当她向×××汇报"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被同学奉若神明的时候，"×××微笑地听着。"按理说，出身地主家庭的×××，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他的老婆，本来应该不爱听"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不过，他们听了还是很高兴。因为具体到自己，那是"值得人深思"的"特例"。当然，对于大多数人，可就"基本如此"了。要举出郑兆南、王光华这样的例子呢？那可又成了"诡辩"的特例了。

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这都说明家庭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强调家庭出身，并不等于强调阶级斗争。再重复一遍，本人出身，即阶级出身，即过去的成份，当不在此例。我们反对血统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血统论和修正主义决不是毫不相关的东西。

可敬的《旭日战报》一小撮先生们，却张牙舞爪地大喊大叫："把出身放在第一位，这是党的政策！这是阶级观点！"请问这是谁家的党？什么阶级的观点？当修正主义集团在出身问题上和毛主席对抗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围绕着阶级政策决战的时候，你们究竟是站在哪一边？你们是为谁唱颂歌？

也许你们会不服气。"我们是为修正主义路线唱颂歌吗？我们不是把修正主义的头子××排成了头朝下吗？"的确，你们是这样做了。我们早也没有把你们看得多高明。你们纵然很反动，但真的到了"抚哭叛徒的尸体"的时候，你们却还没有那样一分狗胆。你们有的只是"狼性"。据说阿拉斯加有成群奔驰的饿狼。当它们的头目因为多消耗了体力而精疲力

尽的时候，它们就把它吃掉，再往前奔跑。你们正是这样做的。你们可以毁坏修正主义分子的外壳，但你们却拼命保存他的精神。你们的愿望就是，××可倒，×××可倒，但他们印在你们头脑里的思想，他们为你们制定的反动路线，却要永远传下去。而你们竟说：这是“党”的声音！这难道不是为反动路线唱颂歌吗？

当我们的《出身论》到了农村的时候，革命的贫下中农子弟写信热情地支持我们，地富子弟也是十分赞同的。他们说：“读了《出身论》，知道党和毛主席是爱护我们的！迫害我们的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饱含热泪读着这些信件，但你们这一帮无耻的小丑，却嚎叫：“就是不给出身反动的青年以平等，就是要无限期地‘考验’他们！”而你们竟说，这就是党的政策！

你们的嚎叫根本不是党的声音，这是××1964年9月已经喊过的，是×××1966年8月还在喊的，你们是为他们唱颂歌！可惜“时兮时兮不再来”，如今你们的颂歌已经是回光返照，已是无限空虚，无比忧郁的垂危着的挽歌了。不过你们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你们在同党的政策对抗的时候，尽量把自己摆在“左”的位置上，认为失败以后，还可以落一个“认识问题”，而并非立场问题。你们错了！形“左”实右，本质上是右，还是立场问题。谭力夫不是立场问题吗？他何尝不如你们聪明！你们的立场是十分反动的。

历史早就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1930年，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立三路线”的“左”倾路线时，王明等假革命派却批判“立三路线”的“右”，从而庇护并发展了“立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今天，毛主席又发起批判××集团执行的形“左”实右的路线，而刘

××却利用他的宣传工具，说××执行的是形也没有什么“左”，倒是实右形也右的东西，接着便有《旭日战报》、《教工战报》……一群英雄好汉，跟在刘善人屁股后面跑。请问，这究竟是为哪一条路线捧场呢？

若不彻底清算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有重演历史丑剧的可能。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各种卑鄙的攻击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曙光即在前头。”

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

《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

常洞瑶：齐声唤同志，你好！现在全市都在争论《出身论》了。上次和你谈过话以后，我简直把《出身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甚至认为《出身论》的一切反对派都是坏蛋。不过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转过脸来，听见相反的意见，就认为《出身论》的作者是个透顶加双料的混蛋了。可是，我想这次我是再也不会动摇了。因为我刚才听见一大群人在议论，他们的论据又是那样有力。我想即使是你听到了，也会改变原来看法的。

齐声唤：是吗？什么样的论据让你这么信服？能讲给我听听吗？

常洞瑶：当然可以！这一大群人说：《出身论》在为修正主义集团翻案。

齐声唤：怎么证明《出身论》是为他们翻案呢？

常洞瑶：那你还用问我？《出身论》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修正主义集团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吗？不是写着："修正主义集团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了"吗？

---

* 原载《只把春来报》（日期不详），署名北京25中齐声唤战斗小组。为了对"血统论"的批判更有力度，遇罗克采用了正反两方辩论的方式。——编者

齐声唤：这就是说，谁主张出身不好的青年从前受迫害，谁就是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了？你的意见是这样吗？

常洞瑶：你是知道的，我本来没有什么意见。这是那一大群人的意见。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意见。

齐声唤：好的。如果反过来，谁要主张出身不好的青年在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之下没有受迫害，没有被专政，谁就算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当然更不能算翻案了？

常洞瑶：这个推理是符合逻辑的，我想。

齐声唤：你刚才说的那一大群人，显然主张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没有对他们实行专政。是这样吗？常洞瑶同志。

常洞瑶：是的，他们是这样主张的。

齐声唤：好朋友！如果你认为那些人的观点和你一致，你能不能设身处地的代替他们回答我的几个问题？我不需要你长篇大论的解答，只希望你说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样对我们共同提高认识或许是有帮助的。怎么样？

常洞瑶：试试看吧。我不见得回答得好，不过这是很有趣的。

齐声唤：请听我的第一个论点：对于地富反坏分子，对于不属于人民范畴，而属于敌人范畴的，也就是说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的人，我们的政府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你看，刚才那一伙人会同意吗？

常洞瑶：这当然用不着怀疑了。

齐声唤：如果某甲说修正主义集团没有实行专政，而是对其中的一些人招降纳叛了，那么，我们就认为某甲是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并没有替他们翻案，对吗？

常洞瑶：我想，对你这个说法，别人是没办法反对的。

齐声唤：再比如，某乙说修正主义集团对所有的地富反坏份子都实行专政了，并没有招降纳叛，那么我们就认为某乙是在为修正主义集团涂脂抹粉了，是替他们翻案了，你看那群人同意这个说法吗？

常洞瑶：他们会同意的。

齐声唤：我们说：是地富反坏的子女不等于是地富反坏分子，你该不会反对吧？

常洞瑶：不反对。

齐声唤：所以这些青年不属于敌人范畴，而属于人民范畴。

常洞瑶：不见得吧？比如他们杀了人呢？

齐声唤：那只能说因为他杀了人，所以成了敌人，不是因为他是剥削阶级份子的子女，而成了敌人的。同样的，出身好的也可以杀人，他们也可以成为敌人。在这里并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表现（或者说是行动）定罪的。对吗？

常洞瑶：似乎是这样的。

齐声唤：把话拉回来，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属于敌人范畴，而属于人民范畴，不属于敌我矛盾，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的同志们意见如何？

常洞瑶：他们也只能说同意。

齐声唤："人民自已不能向自已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这是最高指示，违反了它，就是犯罪，你们同意吗？

常洞瑶：当然同意，当然同意！

齐声唤：好了，我们马上就会得出结论来了。如果某甲说：修正主义集团对一部分人民实行了专政，那么，我们就

认为某甲是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并没有替他们翻案，对吗？

常洞瑶：对。

齐声唤：如果某乙反对某甲，他偏要说：修正主义集团对这部分人民根本没有实行专政，人民能够享受的权利，修正主义集团都让这部分人享受了。那么，我们就会说某乙是在替修正主义份子涂脂抹粉了……

常洞瑶：岂止是涂脂抹粉？简直是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应该把他抓起来！

齐声唤：且慢！不要忘记，你一开始曾说过：那一大群人是主张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没有对他们实行过专政的。看来，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的，不是《出身论》的作者，倒是诬蔑他为敌人翻案的那一伙人了？

常洞瑶：似乎，似乎是这样的。不过，也许修正主义集团并没有那么严重地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吧？

齐声唤：就算是这样，就退一步说，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他们吧，而作者偏要说迫害了，这只能说是增加了修正主义集团的一项罪名，尽管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增加罪名算作翻案吧？至于修正主义集团是不是真的迫害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不是真的给他们精神以压力，肉体以摧残，是不是剥夺了他们做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受的许多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许多权利，大家都可以调查。这一点，连《出身论》的最激烈的反对者都是公认不讳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批判文章就是这样，他们承认文章中所举的例子确是事实，确实有理，他们之所以还反对这篇文章，是因为他们认为一部分人民受压迫，是合理的，是正确的。谭立夫的讲话也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连同他们的

弟弟妹妹是没有政治前途的，但他也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的思想固然反动，可是到底还肯于面对现实的。而你所信服的那一伙，就连这一点勇气也没有了。

常洞瑶：啊呀！这么说，这一伙人是透顶加双料的大混蛋了？我又赞成《出身论》了。再见！

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

——反驳步曙明

大作经×××转交，已经拜读了。我们的头早有好多人预约要砸了，今天才蒙你来砸，实在是晚了一步。老实说，你算不得一条好汉。既然气势凶凶，为什么不署上名字呢？（按：步曙明，不署名的意思），还是色厉内荏吧？

实在没有答复你的必要。但你的论点还是流行的，特别是因为你在文章中而且就在标题上引用最高指标，大大地玩弄了捍辩法，竟然从绝对真理中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我们就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这比单纯维护《出身论》的观点，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毛主席以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以他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告诉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分子，对此做了随心所欲的解释。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得多了。当北京工业大学的革命左派要夺谭力夫的权的时候，他就喊叫：“我看见牛鬼蛇神笑了！”最近有人攻击××同志，也说：××同志的讲话使阶级

---

* 原载1996年1月27日《首都风雷》第一期，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编注

敌人高兴了。今天你也继承了他们的伎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右派分子，说他手舞足蹈了。我们实在奇怪，为什么在你们讲不出道理的时候，总有敌人应声而出为你们服务呢？你们默契得这样好，多半是有勾搭的吧？

看来我们不得不花费点篇幅，在你们混沌的头脑里加点辩证的东西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对于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和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解释。后一种解释只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务使最高指示僵死而后快。

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敌人本质上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果敌人表面上拥护，实际上反对，我们就不仅不能反对，而且要拥护。例如国际修正主义集团也说要援助亚非拉人民，但那是口头的，实质上是压迫亚非拉人民的，我们当然就要援助这些人民。

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对同一件事物而言的，切不可为同一名称不同概念的两件事物所迷惑。例如：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盛赞他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出过"联俄"这一口号。我们指的"俄"，是列宁的苏联，绝不是今天变了颜色的苏联。苏修也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联俄"，他们却把"联俄"之"俄"，代换成今天的苏联。表面上看似乎都是拥护"联俄"，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

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目的而言，不是指手段而言的。如果被手段的同一性所迷惑，就会歪曲这一英明论断。例如：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设想被斗的敌人何尝愿意武斗？但我们要文斗，是要触及他们的灵魂，他们要文斗，是想保

住狗命，伺机反扑。看来手段都是一个——要文斗，但目的是不同的。

不了解本质和表面的区别，不了解同一名称不同概念的区别，不了解同一手段不同目的的区别，就不能解释上述这些情形，就不能判定敌人拥护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什么。就不懂得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在这里如何应用，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让我们看一看，《出身论》中提倡，“出身不好的青年应该享受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一口号，敌人是拥护还是反对？如果，有子女的剥削阶级分子只是从眼前狭隘的家庭观念（资产阶级的所谓父子感情、母子关系）来考虑，他们也许是拥护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口号，和他们的根本目的绝对不同。我们既不是要光耀他们的门楣，也不是要帮他们复辟。相反的，我们是要把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纳入无产阶级阵营，在政治上，而不是在肉体上，使剥削阶级断子绝孙。不用怀疑，从这个长远的利益考虑，阶级敌人是反对的。他们宁可让自己的子女受歧视，从而扩大他们的阵营；逼上他们的梁山，也决不愿意让这些青年加强我们无产阶级队伍。

步曙明做不出这样细致深刻的分析，以为拉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右派分子来，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是何等幼稚！

我们和步曙明的根本分歧，决不是因为《出身论》有什么缺点，而是对待出身不好的青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这些青年是属于社会的，还是属于家庭的？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正如出身好的青年之中绝大部分一样）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还是资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按照《出身论》的话说，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是否就是同一个

阶级的成员？如果你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理应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理应是出身好的青年的阶级兄弟，那么，这里就不存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无产阶级夺权的问题。

如果真的是夺权，那也是向资产阶级老爷夺权。因这这帮老爷（无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队）都不给真正革命的青年以权利，特别是他们为了装出一副左派面孔，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更不给这些青年以应有的权利。这样，他们就把应该属于最广大群众的权利，最大限度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怎么能不向他们夺权？你步曙明非要说人家向你夺权，岂不证明你这帮老爷是一个垃圾箱里的货色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们反对的是什么，革命群众应该拥护的是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你可以夸口说："我比你们'左'；你甚至可以说："我左得比你们跨过了真理的界限！"（当然，那就是荒谬绝伦了），可是你没有理由说："我比你们讲阶级路线。"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是规定依靠什么人，打击什么人的。如果把应该依靠的全部依靠了，把应该打击的全部打击了，就是讲阶级路线了。如果把应该依靠的打击了，把应该打击的依靠了，那就是破坏党的阶级路线了。既然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你偏偏不给他们应有的平等的政治待遇，偏偏让他们处在准备投降归顺的地位上，还奢谈什么"阶级路线"，简直胡扯！

阶级斗争也绝不是象你想象得那样，只要人为地杜撰出一个敌对阶级，比如把一部分青年硬性地算做是敌对阶级，然后与之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了，以为这样一来社会就会向前发展了，这真比荒唐还要荒唐！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通过这次文化革命，我们看到，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是出身不好的青年这一阶层，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不承认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只承认人为的阶级斗争，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还奢谈什么“阶级观点”，更是胡扯！

黔驴技穷，最后来个“我不懂！”不懂有什么光荣？无知怎么能是理由？不学无术算哪笔资本？好不知羞耻！

你的大作我们就拜读到这种程度吧，正如列宁说的，上帝是允许青年人在一定时期说这种蠢话的，你的愚蠢正是资产阶级路线给你造成的。假使你读了我们的这个反驳，还受不到启发，依旧执迷不悟，继续对我们挥拳呐喊（只因为我们替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说了话），那么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再容忍，整个无产阶级也是绝对不会饶恕你们的！

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口碑传颂的清官们判了死刑。他认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个假海瑞。他引证了几页史籍,并加以分析,说海瑞根本没干过好事。无怪乎有的同志读了这篇评论大摇其头,深感有划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必要。

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

如果就剧论剧,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其缺点绝不是因为把海瑞写得太高大了,太英雄了,恰恰相反,吴晗同志多少还担心遭受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攻击,不客气讲,还有点怕,还不敢把海瑞写得更英雄些,更高大些;还拘于史料的限制,还没有把海瑞更理想化。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竟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大块儿文章,作者看到剧中海瑞讲了“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这么几句话,就认定吴晗同志有意在宣扬封建道德观!那不正是吴晗同志为了暴露海瑞的历史局限性才加上去的吗?

说假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真海瑞有没有可以赞扬的地方呢?姚文元同志既然把海瑞认定为地主阶级的一员,认定

---

* 原载1966年2月13日《文汇报》。——编注

他每时每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自觉的忠实捍卫者，因此就无法解释海瑞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绩。在史实面前，他就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否认，二是贬低。姚文元同志真武断得可以。他说平冤狱，那是惑人视听；退田，那是为小地主服务；实行一条鞭法，丈田纳税，那是徒有其名；修吴淞江，这总是真的了吧？不，姚同志偏偏盯住史书的“一月竣工”四个字上。说一个月根本不能完工，想必是张冠海戴，记错帐了；那么，或许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总不会太虚妄吧？姚同志却说：穷人无钱着白衣，因此大不可信。我看，若说有一种人曾犯过考证癖，姚同志大概就犯了否定癖了。

海瑞做了叛逆本阶级的事

封建社会中的道德观、伦理观是错综复杂的。封建正统观念不管是多么肤浅，也会有一点儿本来属于人民的东西，非如此就不能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傻到自缚手足的。正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但也许这一套会骗住一两个本阶级的“痴子”，真的相信了仁义礼智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甚至连皇帝也看着不顺眼了，上疏骂一骂，我们也不必非得说他是自觉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因为他的阶级观念还不很明确，我们得原谅，他到底是四百年前的古人了。海瑞在当时正是被称为“痴子”的。而这种痴子还是对人民有益的，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的。他虽算不得天下的救星，倒也无愧于一方的护法。不过请姚同志放心：这种人是不会推迟农民起义的。在矛盾尚未激化以前，部分的改良总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在漫漫长夜之中，在统治阶级的泥淖里骤然出现一个有棱角的人物，并且肯为对立阶级做一点事，哪怕只有个别人

物吧，不也没有基础吗？这在某些人看来真是不好理解。但不善于理解历史的人却无权擅改历史。阶级斗争是尖锐的，阶级关系也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是一个阶级或是一个阶级的绝对代表。我们既应该看到反动阶级通过宣传、利诱、欺骗、暴力会给革命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一些不良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数众多的革命阶级通过反抗、斗争、磨擦、接触会给反动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较好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尽管不是对等的。像海瑞这样一个出身非豪贵，处世很清廉的官僚，从人民之中接受了一些好影响，做几件叛逆本阶级的事，我看是用不着全盘否定的。这用阶级观点分析满可以说得过去，只不过使滥贴阶级标签的人感到困惑罢了。正因为海瑞有功于农民，所以才有怨于统治集团。他几次被贬，一次几乎掉头，始终未成显官，被迫闲居达十六年之久，最后为了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响，到古稀高龄才被起用，不久也就呜乎哀哉了。我想：这只能说海瑞在某些方面是站在农民立场说话的，否则也太冤枉了。

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

姚同志或许会问：你说海瑞是属于人民的，而皇帝却说海瑞是他的，海瑞死后被谥为忠介公，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人民不应该站在皇帝的反面吗？姚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就像得了把柄似的，很发挥了一番。不过倒要请问姚同志：我们的标准何苦去以封建阶级的标准为转移呢？他说谁坏，我们就非得说谁好不可；他说谁好，我们就非得说谁坏不可，这不容易上当吗？我们确认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最科学的，我们的立场是最坚定的，那么我们自己要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可以怎样评价，何必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呢？其实，敌我两方面都推崇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常见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就

以海瑞为例，皇帝一看自己的臣属被拉到人民那一边了，海瑞陡然一变，成了一个神话似的人物了。人民的海瑞和自己的官僚唱了对台戏。放在明处一比较，人民的海瑞太高大了，自己的群僚也实在太污浊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把死去的海瑞夺回来，算在自己的名下。因为皇帝（也只有皇帝）认得真海瑞，他虽不大喜欢真海瑞，却也没什么太大的仇恨，海瑞生前已被人民神化，因此待其一死，赶紧加封，好乘机把假海瑞夺回来。他这时就忘记了当初排挤海瑞，想杀他的头了。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实际上纪念的是两个海瑞。这两个海瑞都不是真的，不过是皇帝那个比较真一些。问题不在于皇帝怎样讲，史书怎样写。倒是我们今人该持何看法。一种是科学分析方法，一种是机械主义的方法。不分优劣，一古脑儿交给了皇帝，说这都是陛下的，我们不要了。我看这是赔本买卖。那样一来，四千年来的历史也就无一可继承了。从未见先进阶级有如此恨遗产者！也从未见不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成为先进者！海瑞本人接受过人民的影响，史书上又夹杂着来自民间的传说，海瑞的形象就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你偏说曲折的我不继承，非要继承直接的，那么，对不住，这样的史书还不曾有过。

我们大家都讲应该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和戏剧问题。姚同志说他是那样做的，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试图这样做的。但是我绝不能和姚同志得出同一结论。因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日　记

1966 年

1 月 2 日

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是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一封信，见《资本论》附录），借题批判近来报刊上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1 月 27 日

读完《论语释注》。怪不得在 18 世纪法国哲学家之中，有的人对孔子推崇备至。我觉得孔的学说所以远胜于庄、墨、韩子诸家，其原因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明确地提出学问为政治服务，明确地提出圣人可以企及。因为圣人并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学而知之的，这就是把学术公开化，而不是神秘化了。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的原因是不学无术的缘故。

1 月 28 日

读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全盘否定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是反对的。但

是如果在他的理论面前顶礼膜拜，也同样不正确。

1月29日

那时我国对外积极争取和平……对内则受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影响，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致使国家建设欣欣向荣、国外颇孚众望。治国者庶几可以无为而治矣。今天则不然。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十足的愚民政策！

2月6日

《人民公敌蒋介石》乃陈伯达所作。……始知蒋介石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

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矣！

2月7日

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谤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

2月10日

寄去《红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给悄无声息地退回来了，报纸上一些无聊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上面划得满是大杠杠、小杠杠，我重读了一遍，又给日报寄去了。

2月15日

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的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和母亲以及来和父亲下棋的棋友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生活在今天对我来讲，成了干干净净的零。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未来只有胜利，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既无胜利也无损失罢了。我要是害怕，那不十分可笑吗？

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是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4月30日

读完了（法）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我总觉得，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历史上进步的继续。梅特里那种细致地观察、点滴的探索，在今天就没有继承。我们架空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固然，梅特里只考虑到生理原因而没有考虑到阶级原因，这是不对的。但一反而为之，也不能不算是偏颇。我们终不能否定，梅特里哲学也有其合理性。难道这就是大变革吗？不！哲学是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的。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

5月1日

看芭蕾舞剧《白毛女》。……就其所费的人力和所取得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每逢抒情就缩手缩脚。……重事不重情，当今艺术之流弊。

5月2日

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教，决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5月3日

××××××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5月4日

《波斯人信札》："我设想在某王国内，人们只许可土地耕作所绝对必需的艺术存在——虽然土地为数甚广，同时排斥一切仅仅归官能享受与为幻想服务的艺术，我可以说，这个国家将成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何谓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代的共鸣。孟德斯鸠可谓不朽，其洞察力已经逾过二百多年了。

5月7日

目前开展反对美化帝王将相的运动，而毛主席诗词中就出现了许多帝王将相。毛主席是批判他们呢？还是歌颂他们呢？今天一切都要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南，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利的，但也没有人敢提，因为这确实需要一定的魄力。

5月10日

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5月13日

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晚间骑自行车到故宫角楼，凝望护城河水和黑黝黝的古代建筑，自问：努力够了吗？修养够了吗？都不够。可以休息吗？能够自满吗？前途还漫长着呢！

5月14日

看了受批判的电影《舞台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说的（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禁演《祝福》）："连这样的戏都不让演，还让演什么呢？"

5月22日

报刊上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革命，我是颇有感触的。

一、工农兵参加论战。谁掌握报刊，谁就掌握工农兵。工农兵批判的不是言论本身，而是不许"敌人"破坏社会主义。因此，报刊上所谓的工农兵论文，现在看来是批判邓拓的，但不用掉换几个字就可以变成下一次运动批判其他人了。工农兵哲学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最大的障碍是幼而失学，现在又没有自修条件，要想在一天十多小时劳动之余，要想在民兵、会议等活动充斥之下，写出一篇文章来，那是十足的谎话。事实上，广大群众对这件事是不关心的。

二、（略）

三、争论双方：现在被批判的一方是过去代表党的。例如，邓拓是市委书记。《北京日报》是市委报刊，《前线》是市委杂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而开火的一方则是上海文联的姚文元、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文汇报》，即使是《解放军报》吧，也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高炬"。……这么看来，要说攻击党，大概应该指那些民主党派的报纸。可是这时急急忙忙把工农兵搬出

来了，如果不是确定了谁该受批判，是不肯轻易搬出这个法宝的。……内幕真复杂，只把局外人蒙在鼓里。

5月23日

《解放军报》曰：政治好，业务也可以不好。……很显然，假使政治好的人反而不如私心杂念的人钻研业务时干劲足，不正说明政治的无力吗？事实上，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主席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敢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

5月31日

傍晚车间开会批判邓拓，老工人发言，回忆解放前痛苦生活，声泪俱下，但和邓拓毫无关系。

6月3日

详读《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胡适的通信，实在是一般学术问题，且有相当民族感情，可惜谬解。

6月4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谁也不知××、刘仁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吴德又是何许人也。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会同样敲锣打鼓的。——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6月7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6月12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做为明证。

6月17日

听弟弟、又听母亲说，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李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

6月26日

读《中国散文选》，是五四诸家选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没法比拟的。

7月6日

工作是难耐的寂寞，幻想充满了脑际，对于我，革命的欲望是多么强烈呵！

7月18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实地刻画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

7月29日

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方向是直指当权派……所谓当权派云云，亦可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为什么群众“哄”起来？那是积了多年的怨气，这次导而发之。正因为客观上解决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问题，社会才得以进步。才能出现某些大快人心的现象。可是，又因为口号提得不中肯，宫廷政变迅速，致使准备不足，而是呈现混乱状态。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8月3日

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宋相当沉着……会

上下雨了，群众多一半都找到了伞或是避雨的地方。宋挨淋，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我同情他吗？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过，……把干群拉到敌我矛盾上来，害处多么大呵，既制不服对方，又说不服自己。为此让他淋到大雨里，岂不枉哉？

8月5日

近来听说"红卫兵"，亦即中学生，身穿军人服，戴领巾……都是革干子弟，今天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狗崽子"等词出现了好几处。说有人对他们行凶了。……谁敢哪？这都是流氓把戏罢了！……实在太嚣张了。

8月8日

晚间开会斗宋玉鑫，但宋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种气节是值得学习的。假使他认为是对的，就死也不能说是错。革命，只能信托给有气节的人。

8月31日

这个星期着力写出身方面的论文，改名为《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这几天所以搁笔，是因为毛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过分攻击红卫兵的话只得不说了。

8月22日

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个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方红的大街不下五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五十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是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红旗了！

8月23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字号全砸了。荣宝斋遭到最大的浩劫。还有人声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我又看了青年会（基督教）也站满了红卫兵，大改了模样。

据说红卫兵砸人的家，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别人的像，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8月26日

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附录

评《出身论》

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是一株散发着修正主义臭味，企图用它腐朽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在我们的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以便取而代之的大毒草。

这篇精心的创造利用许多在前一阶段受资产阶级形“左”实右的反动血统论的迫害而现在要起来革命，起来肃清其影响的人的正当的情绪，来进行挑拨离间，企图把水弄浑，从中渔利。

让我们揭开这篇文章披着的用时髦的“革命”词句，动人的“事实”编织的美丽外衣，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一具怎样的骷髅和灵魂吧！

一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抱怨出身不好“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然后不惜笔墨地用几乎一版的“受害问题”来说明他们怎么在“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受到“令人发指”的歧视和迫害。学不能上，“工农革干子弟优先”了。好容易上了，又“往往享受到不同等的政治待遇”，受人白眼。干什么事都得填那可恶的“出身”，结果干什么都困难重重。城市如此，乡村更不好过。运动以来红卫兵又对他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在“与美国黑人、印度首陀罗、日本贱民等种姓制度”相近的摧残下，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等等、等等。

他们说了这许多（有些确是有理）。但是且慢，看其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帮助红卫兵认识、改正以前的错误吗？是为了让大家去同情他吗？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它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受压抑最深（一定要注意'最深'二字）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这就一下子泄出了自己的天机，这些人要造反，要翻天！

再让我们研究一下这受压抑最深的人是谁吧。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工农子弟不是；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宠儿"，这些混蛋！一般出身的吗？受压迫固然深，但还不配这个"最"字。很明白了，这些人就是指反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那么这些人怀着这么大的仇恨要造谁的反，翻谁的天，不是很明白了吗?！何其毒也！！！

更卑鄙的是《出身论》的作者在工农革干子弟中进行了恶毒的、不可饶恕的挑拨离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什么革干子弟是一、二、三类，工农子弟只是四、五类，后者也是受前者压迫的云云。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还不知羞耻地说出自己当这个队伍中坚的理由，"受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受谁的压迫？反抗谁？）并且他要"捍卫党的阶级路线了"。他们应该团结一切受压抑的人。在这里，他们狡猾地说受了和他们相同压抑的还有"工农出身的青年"，并且还可以团结那些虽"没受压抑也没偏见的青年和其他革命青年"。剩下就是没受压抑的（或压迫别人）有偏见的人了。一语道破，就是指革命干部子女，这是多么狡猾多么恶毒的挑拨啊！

文章的用心很明白了。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为这个黑中心服务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裹在这个灵魂外面的皮肉是什么。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一切反动势力总是希望人们忘记阶级的存在，忘记阶级斗争；总是企图混淆阶级界线，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

这篇文章毫不掩饰自己对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的反感，竭力使人相信“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仿佛普天下的人不分什么阶级都列入“人”中，并且就像他们头上共有一个太阳那样共有一个真理了。这是多么荒谬！我想，作者一定很相信苏修的“和平竞赛”可以使帝国主义者放弃剥削了吧！这种典型的修正主义观点早被驳得体无完肤了。在这里，我们只想告诉你们一个简单事实，即：帝国主义的“真理”是掠夺、金钱，修正主义的“真理”是投降、土豆烧牛肉，而马列主义的真理是对这些人“造反有理”！

《出身论》的作者又想出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于社会影响”。而不分你我，社会影响又都是一样的。我们认为，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是不可分割的，并且都是有它的阶级内容的。每个阶级都是由人和家庭组成的。每个人绝不可能像鱼一样超过阶级界限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一个人所受的家庭影响从属于他家庭所处那个阶级的影响。一个人所受的社会影响也首先并且最多地是受他家庭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俗话说：富有富客，穷有穷客。张地主的儿子首先接触的是他爸爸的朋友王地主、李地主……及他们的儿子，受的影响当然是地主影响。后来张少爷看见贫农为他家种田交租子，但

他并没因此“感动”，因为他爸爸告诉他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贫农的儿子首先和最多接触的是组成社会的贫农这一部分。总而言之，社会影响对每个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是有其阶级内容的。

这些人还理直气壮地质问：能说我们“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照此说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剥削阶级就不存在吗？这种胡说八道实在不值一驳。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当然不能算剥削阶级。但是他们和自己的家庭在思想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绝不是一厢情愿的“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那么轻松。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越是接近社会主义，剥削阶级自己复辟的可能越小，他们便更加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后代身上，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他们头脑中。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出身论》作者毫不例外地用资本家出身的恩格斯成为无产阶级领袖来说明其也可如此。我们要说，如果恩格斯在世，他也绝不会给你们更好的待遇的。理由很简单，恩格斯正是因为认清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才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作者又说，马恩列毛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绝不是偶然的”。我们要问：难道这是必然的吗？！

至于武则天用上官仪女儿当侍从一事只能说明这样一点：任何阶级内部的纠纷都是服从他们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的。我们告诉《出身论》作者：和你们愿望相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恰恰是很重视出身这一条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因为想试试你们这些“千里马”能不能复辟而把大权让给你们的。

在这里《出身论》作者又搬出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拉入党内，给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但是，“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即他们的后代）真是天下之奇谈！风马牛不相及，令人笑破肚皮的逻辑！然而作者却一本正经地说教道：“这不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也要问：这到底是谁和谁，哪个阶级和哪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呢???

“但是”，作者说，“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指反动剥削阶级）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说：不对，地主的变天账绝不会交给贫农儿子的，资产阶级的屠刀上却沾满了红卫兵的鲜血。

我们不必再去驳斥那些七拼八凑的逻辑了。我们大家已经很明白，《出身论》作者的关键在于抽去在人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这条纲。而我们却要牢牢地记住林彪同志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三

《出身论》观点所代表的那些人是远远不会满足于没有阶级的“人人平等”的，他们应当是“社会中坚”，但理由是什么呢？这时，他便笑吟吟地打出了他们的传统王牌“重在表现”。

这些人为了给自己壮胆，断章取义地说“重在表现”是毛主席的观点，但是毛主席的“重在表现”和你们的所谓

“重在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后面我们要告诉你们毛主席的重在表现是什么，让你们好好高兴高兴。

《出身论》先在出身和成份上进行了愚不可及然而自以为得意的咬文嚼字后得出结论说：“出身不是标准”“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然后干脆说：“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这真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照此推下去，岂不成了“儿子英雄爹好汉，儿子反动爹混蛋”了吗？让这些更糊涂更反动的人去批判血统论的“对联”，简单是岂有此理！

这些人还振振有词地为抹杀出身找出理由，因为“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好漂亮！真是谢谢你们的劝告！但是我们更懂得只看表现不看出身，我们就会滑到修正主义泥坑里去，葬身于阶级敌人屠刀之下。

《出身论》作者之所以要人只看表现不看出身，是因为自以为表现好，而那些讲出身的人是“表现糟糕的人”。这论调并不新鲜。在学校里，有些人总是认为工农革干子弟调皮捣蛋，粗暴骄傲，而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却总是“非常积极，非常礼貌”。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

>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他有两本日记，一本上尽是改造思想、毛选心得以及对一些人的无耻吹捧。这是给组织和大家看的。但另一本日记上却尽是名利、女人，充

满了剥削阶级霉烂腐臭的味道。这才是他的灵魂！丑死了！丑死了！这些人就像画皮一样，其面极善而其心极伪也！难道我们能相信这种人的“表现”吗?!这些人还好。像那些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记反动日记，行凶杀人的剥削阶级后代不也是一个个笑容可掬，道貌岸然吗？这些当然是极少数，但他却是在一个总的水平上的产物。这些两面三刀的伎俩要党“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但这我们是看透了的,请听：

> “现在的革命干部子女,在学校里的表现是中等而且偏右的。最积极的往往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不管他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的，反正革命的重担不能落到他们肩上。”

真是一针见血，真是人间还有青霜剑呀！

《出身论》作者在这里抛出了一个新鲜的吓人的东西。即：剥削阶级子女是受“修正主义”压迫最深的。我们说，这有些是对的，因为你们到底过不上解放前你老子那种人上人的生活。现在到底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呀。你们所指责的主要罪行：大学“优先录取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正是无产阶级伟大的战略目标，我们的科学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继承人统治下去了！但是修正主义分子却给这些人开了方便之门（当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大破坏和迟缓了这个战略。也正因为如此，你们才可以在这里这样嚣张地挑拨、谩骂、欢欣雀跃、得意忘形。修正主义分子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工厂农村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能得以贯彻也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胜利之

处。你们还指责“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我们说谢天谢地，如果这点再作不到，现在中国要成什么样子都难以想象了。你们对无产阶级国家这些正确的东西感到那么压抑那么不可容忍，表现了你们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一种什么样的本性呢?!

你们说：“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这一下道破了你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正居心，真是不打自招。

退一万步说吧，就算黑五类子女在学校受修正主义的打击最深吧！但照此理最初反抗的应该是剥削阶级子女了，但为什么逆风耸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奋勇宣战的是以红五类为主的红卫兵呢?《出身论》作者一定会说，他们（黑五类子女）受压抑太深，太自卑，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前畏缩恐惧。但是我们要问：那么当时保卫修正主义领导、打击围剿红卫兵时，那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怎么那么自信那么挺身而出，而没有一点自卑没有一点畏缩恐惧了呢?《出身论》作者，你们怎么回答呢？怎么为此辩解呢?

这些人又说：“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我们认为革委会的同志们的确很多受了利用，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出身好的缘故。

我们要指出：随着运动的迅速发展，随着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先锋和生力军了。在高干子弟身上有着不可饶恕的缺点，严重脱离群众就是其一。但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就是它使干部子弟第一次真正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致命的缺点：

>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如果干部子弟还不接受以往的教训改正自己的弱点，发愤图强，那么根本不用谁打击，很快就要完蛋了！

对于干部子弟的这些缺点，广大革命同学，尤其是工农子弟，这些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不记仇，不报复，尖锐地诚恳地对我们进行了批评。对此，我们深受感动。广大同学是通情达理的，广大同学是了解我们的！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指出，一小撮怀有反动的阶级情绪的分子现在正乘机刮阴风，放暗箭，到处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带领一些不明真相的组织对红卫兵和革干子弟抄、杀、打、骂。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这是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行阶级报复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我们一千个相信，一万个相信，广大工农子弟，广大的革命同志们决不能看着红卫兵的鲜血染红绿色的军装（这鲜血曾染红我们共同的红卫兵的袖章），决不容许别有用心的人把脚踏在我们战友的身上！不会的！决不会的！！！他们一定会揪出这些别有用心的异己分子，严厉惩办他们的！

革干子弟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少数堕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当然不在此例）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助

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人才可以来各自“表现”一番，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革命的同志暴露了缺点，革命的异己分子暴露了他们肮脏的灵魂，这同样是两件大好事，同志们要好好用毛泽东思想鉴别一下各种“表现”，千万不要错过良机。

《出身论》的作者及它的吹捧者，我们希望你们放弃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如果你们不愿放弃，而且有胆量论战的话，我们决心奉陪到底，而且心甘情愿，我们应当是唯物论者。我们不指望从笔墨中赢得自己的胜利，我们要让历史来作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几十年以后的明天。

清华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阶级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共产党就是要干革命，就是要兴无灭资，就是要讲成份，就是要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古今中外历史上，哪个阶级不贯彻它的阶级路线？难道只许地主、资产阶级老爷专我们的政，不许我们造他们的反吗？他们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反动逻辑，真他妈混蛋透顶！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反动派，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要大搞我们的阶级路线，兴无灭资，彻底革命！

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十七年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看成份！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工农革干子弟表现得特别积极，特别勇敢，目光最敏锐，斗争最坚决。而出身坏的，绝大部分表现混蛋。不依靠工农革干子弟，还依靠谁？难道还要依靠那些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混帐王八蛋们吗？难道左派里我们不占压倒多数，反而他们占上风吗？不！领导权必须由我们工农革干子弟牢牢掌握。唯成份论固然不好，无成份论更是混蛋！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其中，尤以各

---

* 原载北京6中红卫兵主办《红卫兵报》，1966年11月1日，作者：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编注

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于污泥，怎样不染？几千年来，地主老爷传宗接代维持统治还不是要依靠家传吗？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基本如此！有的家伙把工农革干子弟与地主少爷相提并论，表面上不偏不倚，其实折衷，骨子里反动！干革命，就要看成份，我们就是要有成份论！

对于出身坏的，我们的态度是：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请滚蛋，反革命的叫你完蛋！要革命，就要真正与家庭划清阶级界限，与工农结合，脱胎换骨，彻底改造。对他们重在表现，首先就重在对阶级路线政策的表现。一听“阶级路线”就抵触就反感，就骂街，就跳起来，就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样的人，也是要革命吗？这样仇恨党的政策的家伙，就是反革命？对这种混蛋，不能团结 ，只能专政！

党的阶级路线，是分清敌我，纯洁队伍最锐利的武器，是阶级敌人篡权复辟的大障碍。对它，什么人拥护？什么人反对？革命人民最拥护，地主资产阶级老爷及其忠实的狗崽子们最反对。其最具体表现，就是仇视，疯狂攻击，反对工农革干子弟。

“你们工农革干子弟有什么了不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老爷们，少爷们：在你们眼里，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的祖传“真理”，就是“工人农民天生蠢笨”，我们呢，自然“头脑简单”，一不会投机钻营，个人奋斗，二不会阿谀奉迎，溜须拍马，虚伪做作，“重在表现”，三不肯迎合你们那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读死书，死读书……总之，对个人成名成家不感兴趣，却净叨念“革命”“共产主义”……等等你们不可思议的东西。真个“呆头呆脑，傻里傻气”“有什么了不起”呢？老爷们，少爷们，老实告诉你们：你们那套发了

臭的“了不起”的烂货，我们压根不稀罕！从心眼里讨厌！我们最热爱的，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最信仰的，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最关心的，是我们先辈血汗开创的人民江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绝大多数工农革干子弟，根子好，思想纯，作风正，对党和毛主席感情朴实，没有虚假，私心少，革命性强。一旦在三大革命实践中锻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马上就成为最勇敢、最聪明的人。比那些骚里骚气的少爷小姐，这就很了不起！“工农革干子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论调与“工人农民天生蠢笨”都是地主资产阶级老爷腔，都是站在反动立场上，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理论”，是疯狂反阶级路线的具体口号。我们要把它彻底打烂！谁敢这样胡说八道，我们就撕烂他的狗嘴，跟他刺刀见红！

“干部子弟就是养尊处优，坏透了！”老爷们，少爷们，你们自己过去养尊处优，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作威作福。如今，你们被专政了，痛苦了，骂一句“养尊处优”。你们这样骂，无非是因为我们父母当了“官”，对你们专政，你们骂我们“坏透了”无非是因为我们跟父母学，跟你们作对。你们实在不舒服，于是破口大骂。你们骂对了！我们父母就是要当革命的官，专反革命的政，我们就是要学习革命前辈，跟着毛主席，对你们造反成性，与你们为敌到底！你们骂我们，真是难得的荣光。我们对你们，就是要坏，越坏越好！

“你们仗势欺人！盛气凌人！”说得对！我们就是要仗无产阶级专政之势，欺你们这些社会主义革命为敌的人！我们就是要大盛革命小将的正气，大凌那些反动的坏人，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你们不满意吗？随你便！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怕你们造反！你们胆敢翻天，我们就立即坚决镇压！老爷们、少爷们：过去你们当政之时，当初黑帮专我

们的政，压得我们抬不起头之时，你们是何等猖狂！那时你们为什么屁也不放一个？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之下夺了权，翻了身，扬眉吐气，你们就大喊："不要盛气凌人"?对你们这帮混蛋只有彻底造反！只要你们不脱胎换骨，彻底改造，彻底背叛本阶级，就得永远挨欺！

"出身不好，就不能革命了吗?""你们不团结我！"只要你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与工农结合，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当然可以成为一个革命者。一切真要革命的，我们一定团结，一切可以革命的，我们一定争取。但是，一提阶级路线，就说不让你革命，就说不团结人，这又发自什么感情？如果谁死守着自己老子那套反动的阶级立场，阶级偏见，阶级报复情绪不放，还用"团结"的旗子保驾，还打着红旗反红旗，向左派进攻以抗拒改造，抗拒革命，那就是妄想，白日作梦！对于这种反动家伙，首先不是团结，而是斗！斗过来了，再说，斗不过来，那就专政！根本谈不到团结！我们的团结，是左派吃掉右派的团结，此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团结！

"出身不好，就是倒霉！"少爷们：你们"倒"什么"霉"?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什么人才感到"倒霉"?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们：我们很知道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父母今天被人民专了政，跟他们一样作威作福当老爷是办不到了。老实改造，又不甘心。本想利用暂时存在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向上爬，走个人奋斗的白专之路，钻进大学，混他个"教授""专家"当当。小汽车，小洋房，白大褂，实验室……舒适优裕，名利双收。虽不如过去那样显赫，却也自在，可以不到"乡下"去"受罪"了。而且，说不定还可以捞点政治资本，把住点权，"和平演变"，重新上台，依然故我，光宗耀祖……万万没有料到来了个可恶的阶级路线。卡死了这

条“飞黄腾达”的“通天”之路。而且，旧教育制度被砸个稀烂，资产阶级“教授”“专家”等等你们心上人就要绝种了！美梦黄粱，好不悲伤！而那些历来为你们所看不起的工农群众及工农革干子弟，却要直接掌握文化科技各阵地，打破你们的垄断。工农兵直接掌握理论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你们实在不甘心，一肚皮怒气冲天，于是哀鸣发自内心，呼曰："倒霉"。让你们剥削就叫"不倒霉"，不让你们剥削，就叫"倒霉"，这就是你们的逻辑！

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们：过去，你们父母当政之时，对我们是那样凶残狠毒，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剥削压榨，为所欲为，特别对于我们革干子弟，更是斩草除根，抓住就杀，一个不留。我们有多少小兄弟、小姐妹、小伙伴，刚出世不久就惨遭毒手！这血海深仇，我们是一笔一笔都要清算的！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如今，我们父母跟着毛主席打下了人民江山，我们当了政，对你们非但不如此，反而准你们上学，给你们指明出路，让你们到工农中去脱胎换骨，彻底改造，给你们以革命的机会，要你们成为社会主义时代新人，这是何等仁至义尽，何等宽宏大量，这又有什么“倒霉”？你们心中非但不感毛主席之恩，颂共产党之德，反而诬之为“歧视”“倒霉”，骨子里顽固地坚持你们老子那一套反动的阶级立场，阶级偏见，阶级报复情绪，仇恨阶级路线，仇视工农革干子弟，一有机会，就疯狂反攻倒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叫不知好歹，恩将仇报，混蛋透顶！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就要像父兄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聚到刺刀尖上，挑出你们的五脏六肺，那你们就活该到霉！

阶级路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父兄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打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鲜血凝成的，字字千钧重！它是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阶级路线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一切。我们要以生命捍卫它！谁胆敢歪曲，反对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我们就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先辈血汗打出了它，我们就要继承下来，发扬下去，永不失传！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把阶级路线大旗举得高高的，艰苦奋斗，逐步争取、教育、改造、团结绝大多数要革命的人，组成我们旗帜鲜明的浩浩荡荡的阶级队伍，向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

让那些地主资产阶级老爷少爷们向隅而泣吧！让他们去暴跳如雷吧！让他们去胆颤心惊吧！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及其孝子贤孙，将革命进行到底！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北京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翻印

宣判反动“对联”的死刑*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友们：

在今天的大会上，我们又要谈起在中学风行一时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丧钟敲响了，作为疯狂执行反动路线的对联，死期到了！

林彪同志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反对群众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在工作组撤出，十六条发表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关于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所谓“大辩论”和在对联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谭力夫讲话，正是这种新形式的典型表现。

---

* 这是1966年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一个大会发言，发言人是“北京四中东方红公社”的代表。据报道，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先后在会上作即席讲话。

出席大会的有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刘志坚、张春桥、谢堂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

两万多师生参加了大会。

此讲话刊登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政治部、宣传部主办的《兵团战报》，1966年12月21日，第5期，第5—6版。——编注

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的所谓“大辩论”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它猖狂地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十一中全会上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进攻，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物向毛主席的路线进行疯狂反扑所做的舆论准备。

对联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单纯的阶级路线问题，那些有意把对联一个劲地往阶级路线上拉，继续宣传什么“红五类”“黑七类”观点的人，是想让广大人民群众继续束缚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之下，永远得不到解放。对联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生死搏斗的问题，也就是关系到文化革命能否深入发展的问题。关于对联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批它个落花流水。上揪下扫：揪住那一小撮幕后策划者，拉出那一小撮阴谋把矛头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黑鬼；横扫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群众中的影响，从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资产阶级的四旧，它的核心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它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水火不相容。它用奴隶主义代替毛泽东思想。它把群众看成愚民，把自己看成救世主。它是私字当头，怕字当头。这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再加上运动初期黑帮头子××在各校贯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遗毒；派到一些单位的工作组仍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排挤和打击反对他们的工农革干子女；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同学中的对立等诸方面原因，就是对联提出的背景。

对联的提出虽然在主观上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但是正由

于对联本身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剥削阶级血统论，坚持和宣扬这种反动观点就更是错上加错，因此对联成为压制、迫害群众的一根大棒，对联的流传成为一种新的形式代替工作组，继续推行反动路线，干了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想干又不敢大干的事，其危害如下：

一、保护反动路线。对联在许多地方被利用来打击反工作组错误路线的革命少数派。把革命少数派中出身好的叫做“叛徒”，“败类”，把革命少数派中出身不好的叫做“狗崽子”“混蛋”，他们打着反对“阶级报复”的幌子，招摇撞骗，吓唬群众，这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难得的护身符，对起来造反动路线反的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我校一次关于工作组、革委会问题的辩论会上，一段对话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一位同学给革委会提意见说：“革委会凌驾于群众之上，俨然像个小皇帝……”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现在就是有人借批工作组来打击革委会，打击革委会就是打击革干子弟，打击革干子弟就是阶级报复！我们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你是什么出身？”

那位同学回答：“我出身工人。”

质问的人想了想又说：“那——因为是基本如此，出身好的也有败类！”

够了，这短短的两句对话，还不能让人深省吗？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给革委会提意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保了下来，校园是越来越冷，越来越沉闷。这就是对联的极大的恶果，它不就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败类”了吗？它不就是保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吗？

二、扭转运动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人为的制造“阶级对立”。这副对联既不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

去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持有不同观点的和出身不好的群众。当时不就是有人在说什么“我们对斗争黑帮不感兴趣”吗？不就是有些学校出现了“向资产阶级雏鹰宣战”这样公开煽动群众斗群众的大字报吗？一些中对联毒很深的人，采用了对待阶级敌人的方法对待出身不好的同学，公开叫嚷什么“红色恐怖”（这本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污蔑），对同学实行“专政”，甚至有的学校把出身不好的都拉去劳改，殴打同学……使运动发生了很大的曲折。

三、不能团结大多数。这副对联是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的典型代表，丝毫没有一点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影子，它大肆宣扬“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谬论，自己不想革命，也不叫别人革命；因为，一个人将来会怎样，这是命里注定了的。你出身不好吗，命里注定你是混蛋！他们打起“阶级烙印”的幌子，恐吓群众，作为反对革命的遮羞布，实际是否认主观因素起决定作用，否认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当时在各中学不是都流行着“对出身不好的就是要以斗争求团结，斗争后看能团结了再团结”这样一种说法吗？这些人实际上根本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去帮助他们认识到阶级烙印，同家庭划清界限，而是从斗争的目的出发，去打击他们，骂成“狗崽子”“混蛋”。请问，这样怎么能团结大多数呢？

四、对出身好的成长不利。出身在劳动人民家庭的同学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但是也必须看到阶级斗争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只有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三大革命中摔打，才能成为真正的好汉。这副对联实际上是抹杀阶级斗争，抹杀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必要性，抹杀了自觉革命，不断革命。当时风行的“自来红”的

观点正好说明了这点。在各校辩论会上，就是有人在大喊：“我们就是自来红！里里外外红！红透了！”就是有人挖空心思地歪曲毛泽东思想，制造什么“老子从小和工农结合论”，说什么：“我出身工人，从小就和工农结合了，就是好汉了！”请问，按照你们这种逻辑，阶级斗争究竟还存在不存在？现代修正主义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怎么产生的？这副对联对出身好的同学成长极不利，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五、唯观点论成风。辩论的结果，造成了极不民主的作风，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谩骂、起哄成风，毫不讲道理，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压人。不进行实质的辩论，而是大叫大嚷。对联的“辩论”是武斗的开端，有些人公开的宣扬武斗，说什么“儿子皮带保江山，牢又牢”，手提皮带，气势汹汹，独占辩论台，肆意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严重的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压制不同意见，打击不同意见的人，使人们不敢讲话。“反革命”“右派”的帽子满天飞。有人当时把这副对联改成“同意我的是好汉，不同意我的是混蛋”，这正是唯观点论的最生动写照。这种极不民主的现象压制了正确意见。直到前一阶段许多学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仍点不起来，这是很大的原因。

六、唯出身论成风。当时普遍流行讲话、干事、甚至进校门串联都要报出身，并美其名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报了出身可以全面看人！”当时唯出身论的现象极其严重，不是毛泽东思想决定一切，而是出身决定一切。现在有的人还伺机为对联翻案，说什么：“对联虽有许多缺点，但是它确实触动了出身不好的人的灵魂！”这简直是强盗的逻辑，公然为反动路线评功摆好，难道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左派，

锻炼了革命左派的意志，这也算是反动路线的功劳吗？

更有些地方唯成分论和唯观点论加在一起，某校一个红卫兵说得实在，他说他加入红卫兵是唯成分论把他唯进去了，但是唯观点论又把他唯出来了。有些人为了反对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不是从意见本身着手，而是千方百计地从别人出身上打主意，为了反对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可以造谣把别人父母打成黑帮、反革命。更奇怪的是，某校一些人为了反对一个观点正确的人，（这个人出身革干，但先父是国民党军官，生下他三个月后就死了，母亲嫁给一个革命干部）说他三个月的家庭影响大于十六年！同志们，当时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就是这样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的。

这就是这副对联的严重恶果，对联的滔天罪行。对于这样的对联，我们必须给它判死刑！

对联为什么能挑起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扭转运动的大方向呢？就是因为一些人打着所谓的“阶级路线”的幌子，来吓唬群众，对于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必须彻底揭穿！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一切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

同样，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阶级路线”。

这副对联也是这样。某些人首先在群众路线问题上就是不相信群众，看不起群众，把自己看成是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把群众看成是“愚民”；唯我独尊，只许同意，不许反对；“好汉”嘛！唯有他最革命，它反映到阶级路线问题上也就必然是唯有出身好的最革命，唯有同意我观点的最革命，大搞宗派主义，大搞关门主义，大搞什么所谓的“纯洁阶级

队伍”这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东西。

形“左”实右，“左”在阶级路线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形，右在群众路线上不相信群众的实，这就是这副对联的反动实质，这就是当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新特点。

这副对联打着“阶级路线”的幌子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耍阴谋，放暗箭，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那些别有用心动不动就打着这副对联喊“阶级感情强烈”的人听着：在群众的问题上，假的就是假的，什么“阶级感情深厚”啊，什么“恨过头”了啊，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伪装统统应该剥掉，遮羞布统统应该撕去，赤裸裸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倒是真的！

如果老是让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板起面孔吓唬小孩子，那么将来出了修正主义，人们岂不还要唯唯诺诺地不敢造反，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十六条为什么贯彻不下去？不是明明遇到来自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最大阻力吗？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那么碰不得？不是明明有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在作保镖吗！

十六条怎样才能深入人心？必须坚决、彻底、干净毫不留情地把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批臭，打倒，破光！

这是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大厮杀，是人们灵魂深处的大搏斗，群众是英雄，还是自己是英雄？相信群众，还是相信自己？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还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考虑，我们一定要以“老三篇”为武器，破私立公，把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打翻在地！

由此看来，对联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脊骨，它的矛头

直指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直指毛主席的根本路线即群众路线。

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必须砸烂，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必须揪出！

同志们，在我们彻底批判对联的时候，请大家想一想难道以下事实是偶然的吗？

一、六月初，文化革命开始，刚刚罢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官，大长革命人民志气，大灭修正主义威风，同时也大灭反革命修正主义“重在表面”政策的威风，这时，北大附中两个同学争吵，一方给另一方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致×××”的对联，为什么那时没有辩论起对联、辩论起阶级路线问题呢？不是说这副对联是针对××的吗？

二、为什么在北京，七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下令撤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些学校刚开始批工作组，有的学校还没开始，却半路里杀出一个对联来？在全北京各校马上流传开来，扭转了注意力，扭转了方向，不但保了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继续了反动路线，愈演愈烈，急剧扩大，直线上升？

三、为什么八月初中央文革小组×××、××、××、××等同志都为对联发表了谈话，指出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后来对联的辩论仍在进行，以至扩大到全国？

四、最最值得注意的是八月一日——八月十二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了，在会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激烈斗争，为什么在两条路线斗争针锋相对的时候，出了个对联，为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波助澜？

对联不是明明在配合右倾机会主义者演出一场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合唱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允许挑动群众斗群众，对联却偏偏在底下挑动群众斗群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联却用来压制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反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对联却说革命群众是“别有用心”“混蛋”“叛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联却说：“我们对斗黑帮不感兴趣！”……毛主席号召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联却在群众中千方百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评功摆好，拼命翻案。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潮配合的这样紧密，这样默契，难道是偶然的吗？

对于这一切我们就是要揪，揪到底！对于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必须刨根问底！

这副对联究竟指向谁？这副对联究竟反映了什么？这副对联究竟要干什么？这副对联究竟为谁服务？“鬼见愁”到底谁见了愁？骂的是谁？

它和《海瑞骂皇帝》一样凶狠恶毒！它叫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叫又不敢叫的声音。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猖狂反扑所作的舆论准备。

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同志们！阶级敌人把暗箭对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对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对准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准了十六条！我们还在干什么呢？我们竟还被敌人蒙在鼓里，当我们伟大的领

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革命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上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拼死决斗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保卫了毛主席，捍卫了毛泽东思想了吗？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

是谁，是什么人竟然这样丧心病狂地利用我们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重在表面”政策的阶级感情，通过对联反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

我们绝饶不了这一小撮人!一定要把这群黑鬼揪出来!砸烂它的狗头!!!

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怀着无限的阶级感情用我们的头颅和鲜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捍卫十六条！不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绝不罢休！不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绝不收兵！！

谁敢为对联翻案，就砸烂谁的狗头！

谁敢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就砸烂谁的狗头！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誓死保卫毛主席！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前　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正当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所谓"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学文革报》抛出了《出身论》这株大毒草，绝非偶然！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体现。对此，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这些反动的家伙们，怀着对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心情，向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射出一支支毒箭。

他们拚命地鼓吹反动的"阶级熄灭论"，荒谬的"阶级调合论"，为××路线喊冤叫屈，摇旗呐喊，为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夺权制造舆论准备。他们还梦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反动的《出身论》借批判"血统论"这个形"左"实右为名，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目前，这个反动的逆流已经泛滥于全国，流毒甚广，影

---

* 原载1967年2月25日《旭日战报》特刊。——编注

响极其恶劣。既然他们放了毒，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消毒！这个反动的思潮不肃清，他们的反革命的猖狂反扑不打退，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就不能实现。

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将大毒草《出身论》砸它个稀巴烂！把它连根铲除！

一、我们就是要讲“出身”

《出身论》的作者为了完全否定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拚命施展其形而上学的诡辩手法，来达到其险恶的目的。他们说什么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不应该过多地强调外因。而外因中又是“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这样就基本否定了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但是《出身论》的作者还觉得不过瘾，又进一步胡说什么“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个人的出身对其世界观的形成的影响。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企图抽掉阶级内容，大谈所谓的“重在表现”，为××路线翻案，我们必须揭穿这个鬼把戏。

《出身论》作者的诡辩伎俩是不值一驳的，他们虽然提出了所谓内因与外因，但是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内因，什么叫外因。《出身论》的作者企图避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孤立地来谈“内因”，孤立地谈“主观能动性”，这是很荒谬的。我们说，世界上没有超然的内因，一个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

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思想是由于不断接触社会生活（这里包括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逐步形成的，尤其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孩子一出世，只有本能，而无思想，这时他首先直接地较多地接触的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接受这些事物的影响，所以说，一个人的家庭影响往往是为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打基础的。因此，想以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来否定家庭的影响，那只能是枉然。

可笑的是《出身论》的作者刚刚讲了“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以后，又自相矛盾地胡说什么“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触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又说，“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这时作者却只字不提本身的世界观也即内因对接受这些外因的决定作用了。这种片面强调社会影响，把一个青年看作没有思想的物体而可以任意加工的说法同样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用这种唯心论同样不能为你们否定家庭影响提供任何理论根据。

×××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月的总结中说到：“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毛主席和我们党从来都是特别重视人们的阶级成份，阶级出身的。同时也反对唯成份论。”又说“不重视阶级成份，阶级出身，是很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很错误的。这些观点，必须批判。”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份论，第二不唯成份论，第三重在表现，也即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其出身，还必须通过主观努力，通过阶级斗争的长期检验，这才能证实自己的世界观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出身论》的作者企图否定成份，否定出身，片

面地强调“重在表现”那是永远办不到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他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

父母及亲人的言行是代表着某一阶级意识和作风的，当然他们对孩子的影响也就带有阶级性了。“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剥削阶级所影响给孩子的是剥削有理，是对新社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以至于把他们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子女的身上，从地主和资本家那里是根本找不到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影响的。而工人和贫下中农所影响给自己孩子的则是翻身的喜悦，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当然在部分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个别反动的。但是这不是主流。两个阶级的家庭给予其子女的影响是完全对立的，这是铁一样的事实。一个反动家庭的思想意识与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本不是谁服从谁的问题，而只能是一个灭掉另一个。谁否定这一点，谁就不是马列主义者，谁想反对这一点，谁就是反马列主义。

《出身论》作者不承认有“家庭影响”却说“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不好。”因此得出结论：“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一个思想反动的地主老子，能给自己的孩子以什么好影响呢？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不仅没有与其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反而站在反动的老子立场上，美化了剥削阶级的家庭影响，贬低了工农家庭的影响。企图把所有不同的家庭影响拉到一个水平线上来，求得平衡，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出身论》中还有一个荒谬的地方就是否定阶级烙印，离

开阶级分析，而去片面强调"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照此说法，社会上就不会有坏分子了。因为他们早被真理"感召"过来了。真是太令人可笑了！这纯粹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邪说"。我们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一般地说，那些地、富、反、坏、右是不会受其感召的，那些受剥削阶级家庭影响较深的人，也是不会很轻易地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须经过一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果离开了阶级分析，去谈什么真理具有"感召力"，那岂非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二、"重在表现"是有阶级内容的

《出身论》作者花了很大精力，在其臭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极力企图完全抹杀家庭影响，从而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一前提下提出了所谓"重在表现"的问题。我们说：出身和家庭影响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看出身，就是要看不同阶级对其子女的影响，要看阶级烙印，决不是像作者先生所说"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

××的所谓"重在表现"之所以反动，就是因为他歪曲了毛主席提出的"重在表现"政策，他抽掉了这一政策中的阶级内容，而把"重在表现"变成了"重在表面"。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坚决造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政策的反。可是，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企图伺机翻案。今天，正当革命群众奋起批判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时，社会上的一小撮混蛋，以为机会来了。于是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妄想借机排斥打击工农子女取消党的阶级路线，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复辟阴谋。

《出身论》作者为了否定出身对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的影响，在使尽了形而上学的诡辩手法以后，竟公然歪曲主席思想，这是万万不可容忍的。毛主席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内。”可是作者先生说：“毛主席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那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那一个范畴。”炮制《出身论》的混蛋想用此来说明，你也是小资产阶级，我也是小资产阶级，要讲成份嘛，咱们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谁也不比谁强。即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殊不知毛主席在讲这一段话时首先就讲到了要看家庭出身。这只能是作者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

《出身论》作者为了反复证明其不讲成份的所谓“重在表现”是正确的，于是就挖空心思地找论据。他胡说什么，只有像地主、资本家那样处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的人才能在思想上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他们所谓“‘有成份论’的根据”，而对于剥削阶级的子女，因为他们没有剥削，他们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因而就不应该给他们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了。这纯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难道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意识，不影响其子女吗？如果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不算剥削阶级烙印又算什么呢？作者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出身论》作者用“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为根据，

得出出身和表现“毫无干涉”的荒谬结论。这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决不是和表现“毫无干涉”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离开了阶级分析，就无所谓“表现”可谈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有些出身好的青年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一定要彻底批判，但《出身论》作者却以点带面，把少数人的错误夸大成所有工农子弟的错误，拚命贬低工农子弟。妄想在批判形“左”实右时趁火打劫，把工农子弟压下去，非置于死地而后快。与此同时，《出身论》的作者还恶意地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如武则天。把阶级分析说成是“以人害言”，说我们的党“不识千里马”“糟踏了千里马”。这是从《三家村札记》中才能找到的黑话。他们把矛头指向谁不是很清楚了吗？

三、矛头对准了谁？

“出身论”假借批判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谭力夫为名，大肆诬蔑、谩骂工农子女，说工农子女是受修正主义宠爱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此来丑化工农子女，以便达到他们打倒工农子女的丑恶目的。奇怪得很，像谭立夫这样的人物在工农子女中能占多少？难道你们不承认大多数工农子女是好的吗？是革命的吗？

“出身论”的炮制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恨之入骨：他们反对党的阶级政策，反对学校向工农子女开门的正确方针，反对党的干部路线，反对

兵役制……。

老实告诉你们，现在就是我们工人、贫下中农的天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那些还没有真正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那些仍然和他的反动老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我们就是要让出身好、表现好的工农子女去掌握枪杆子，就是要让这些人去掌握国家的机密机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规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联。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这就是我们党的阶级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制度。我们若没有党的阶级路线，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们的政权就不可能巩固，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那些反对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混蛋们，任何谩骂和狂吠都是枉然的，都是不济于事的。我们就是要有这种"阶级偏见"，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这种"阶级偏见"怎么行呢？想否认阶级的烙印，否认自己受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不做痛苦的思想改造，不做脱胎换骨的变化，就想混入革命队伍，把自己打扮成为英雄，这是痴心妄想！

你们不是大喊："收起你的考验吧！"告诉你们，我们就是要考验你们，就是要看你们是否真正的背叛了自己的反动家庭，是否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这是完全必要的考验。对你们不考验是不行的，你们越是害怕考验，就越是要考验你们，要革命的那还怕什么考验呢？

"出身论"的作者还恶狠狠地说："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

度的根源，这正是修正主义一手造成的。”看！他们的用心是何等险恶呀！他们已经气势汹汹地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疯狂反扑了。已经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施展了“三家村”黑店老板的鬼把戏，含沙射影地向我们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假借反对形“左”实右、“血统论”，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为牛鬼蛇神喊冤叫屈。大叫：“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受压抑最深的青年勇敢战斗吧！”

看这杀气腾腾的叫嚣，不是十分明显地看出，他们要号召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起来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大干特干了吗?!他们要翻天，要进行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反革命夺权了。看！“出身论”作者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结束语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又说：“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阶级敌人是懂得这一点的，他们总要在政权问题上和无产阶级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企图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出身论》就是一篇公开号召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为反动势力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出身论》又是一篇杀气腾腾的反革命复仇书。目前在全市、全国不少地方有那么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孝子贤孙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纷纷出笼，他们自称“左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借批判“形“左”实右”为名，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工农子女之实。

企图把犯了一些形“左”实右错误的工农子女不管轻重，都一棍子打死，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甚至这些混蛋企图把那些出身好的，从运动开始就一直按毛主席的教导，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组英勇斗争的闯将一脚踢开，把他们排斥在夺权组织之外，进行趁火打劫，混水摸鱼，扰乱我们的阶级队伍达到他们的篡权的目的。《出身论》正是配合这种反革命夺权而出笼的，以制造舆论，使其夺权合法化。《出身论》代表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我们务必提高革命警惕，揭穿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今天出现反动的《出身论》，是必然的，它告诉我们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于死亡的。毛主席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既然《出身论》自己跳出来了，我们就坚决铲除它。铲除毒草好肥田。对于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潮必须痛加批判。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出身论》这株大毒草彻底批判、批臭，把《出身论》的后台揪出来示众！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作战组、宣传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

有人诬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成长在红色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我们的老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毛主席最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党和毛主席有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的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受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而你们是在资产阶级高级玩意、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受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只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崽子们：你们有人极端仇视我们这些“自来红”，我们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些出身革命家庭的“自来红”比你们出身反革命的“自来

---

* 这篇血统论的代表作流行于1966年7～8月间，代表造反派红卫兵的《兵团战报》于1966年11月重新刊登此文，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编注

黑”，资产阶级的“自来白”，要强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强的无法比！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的革命立场最最最最坚定，我们对党，对毛主席最最最最热爱，我们革命之心最最最最红。

我们有没有缺点，有！但这比起我们的优点来是次要的！为了革命要彻底，为了我们红得更纯，缺点我们一定要克服的！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权力，谁敢反，我们就坚决专他的政，要他们的命！以前，我们这些“自来红”，被那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王八羔子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我们老子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可他们的后代反而低人三等，连那些资产阶级小崽子都“不如”，今天，有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自来红”扬眉吐气了！往日我们矮三寸，今天是顶天立地的人！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以及他们的崽子，和一切大大小小牛鬼蛇神斗到底！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这个反我们造定了。不反到底，死不瞑目！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我们不但自来红，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放心，我们这些“自来红”，一定要读一辈子您的书，听一辈子您的话，一辈子按您的指示办事，一定把红色的江山给您保下来，把您的伟大思想红旗插遍全世界！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

做顶天立地的人*

工农革干子弟们，我们过去受压迫、受排挤、受打击、受尽了凌辱、受尽欺负。现在我们要翻身、要造反、要做主人。

过去一些工农革干子弟在敌人软硬兼施、名利诱导的情况下，唯唯诺诺、不声不吭，做了一名不闻不问的小人。

一些工农革干子弟造反未成，灰心丧气，敢怒而不能言。一些工农革干子弟甚至开始蜕化变质，成了敌人的马前卒，牺牲品。

现在，我们要站起来革命了！要造反了！

还能再“老实”下去吗？眼看着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兴风作浪，赤膊上阵，屠杀我们的阶级弟兄却无动于衷？不能！不能！不能！再“沉默”下去，千百万人头落地，大好江山丧失干净！

还能再“畏首畏尾以小人自居”吗？让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当官作老爷，俨然以老子命令威胁我们？不能！不能！不能！再这样下去，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就会重新夺权、重新掌权，在精神上压倒我们，而我们仍然是敌人精神上的奴隶。

不能呀！千万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志们哪，过去我们矮三寸，现在我们要做顶天立地的人！

---

* 清华附中高655班是红卫兵发起者之一。这篇血统论的代表作流行于1966年8月间，代表造反派红卫兵的《兵团战报》于1966年11月重新刊登此文，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编注

班里大权我们掌，核心小组要永远为你们服务！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们要批判一切旧制度，打击一切反革命，我们要“神气十足”、“作威作福”，要以高姿态出现在高655班。我们要喝斥那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不准翻天，如若乱说乱动，立即镇压！

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任何非工农革干子弟对我们必须尊重一些，不准恶意中伤！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还要敢于做工作，和群众紧密结合。谁要有思想问题，我们最有责任去工作！我们要成为高655班的革命先锋，任何革命工作都要成为全班的榜样！

我们有责任，有权力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主人！懂吗？我们是主人！

光荣的、伟大的、自豪的工农革干子弟们，放手干吧！谁敢动工农革干子弟一根毫毛，就砸他个稀巴烂！

让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做主人！

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

高655班核心组（即领导小组）

一九六六年八月

凡是敌人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

——驳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

去年十月我和同学经天津、武汉到广州，沿途都有《出身论》的踪迹。回到北京以后，发现这红色的都城简直染上了《出身论》的狂热。很多人为它奔走相告，竞走抄写，像是得到了什么牛黄狗宝。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份传单只要一被我看见，我就都在上面写上："这是一株大毒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我们红后代就不能允许它自由泛滥。我怀着阶级的仇恨（而决不是像文章的注角上讥讽的那样，是发泄什么廉价的愤慨，我的这种感情是作者这样的庸人一辈子都理解不了的），坚决要把它批臭、批倒！坚决要把文章的作者——对党有着刻骨仇恨的家伙揪出来，抄他的家，砸烂他的狗头！和我抱有同感的人不少，传单上也写满了这样的话。在这里谨向消毒的战友们致敬！

可敬的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专家们！《出身论》的确有市场，但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你们知道它为什么人欢迎吗？告诉你们：我亲看到一个家伙在传单前面手舞足蹈地说："这下可有人替我们说话了！"当场被我们揪住。经了解，他是个右派分子！

听我们宣读一段最高指示：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

* 原载1996年1月27日《首都风雷》第一期，遇罗克的《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一文主要争对此文所写。——编注

衡量一下，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替谁说话了吧！

你们的大作怎么能不为敌人拥护呢？你们包庇他们的子女，不号召这些受毒最深的狗崽子（当然不是说所有黑七类青年都是崽子）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反而煽动他们夺无产阶级之权，说什么："不管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可以成为革命左派，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还诱惑他们不要人家（按指无产阶级）恩赐的团结，不能只做人家的外围。你们还把革命群众理所当然地教育、改造他们，称作是种姓制度的新形式。你们想一想，也请受你们蒙蔽的青年想一想，这对谁有利？你们不是要剥削阶级传种接代又是什么？不是要他们光耀门楣又是什么？你们公开替剥削阶级做宣传，用心何共毒也！

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不能给剥削阶级子女以平等的政治权利。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等于承认，老一代剥削者死光了，也就没有阶级存在了，这实在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不管文章作者怎样掩饰，也嗅不出一点点阶级观点的影子（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我们向不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的受它欺骗的青年再三疾呼：阶级斗争，阶级观点，阶级政策！你们只要想一想，要按照文章的口号去做，什么人拥护，什么人反对，就不难得出结论来了。

文章可批判的地方很多。这些专家在学术问题、理论问题上故弄玄虚，在概念定义上大做文章，大用诡辩法，企图吓唬我们这些土包子，干脆告诉你们：我们看不懂！

再一次宣告：权，过去在我们手里，现在还在我们手里！你们黑七类青年夺不去。你们只能老老实实，投降归顺，决不许得寸进尺。否则，请以你们的老子的下场为戒！

步曙明

从对联谈起*

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工人，这一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

有人说它"糟得很"；有人虽然稍加赞许，但也不能全然否认一个"糟"字，在"但是"后面作文章；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

有人说："上联不利于出身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下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修正主义大讲所谓重在表现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出身不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修正主义用"红色包袱"把广大工农革干子弟压得抬不起头来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何其不公正啊！

什么是大多数呢？在修正主义办的大学里，"自来红"们暂时是少数，但就全国和全世界来讲，他们是绝对的大多数，即使在大学里也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大多数，请你们放心，我们会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我们的大学！就眼前来讲，混蛋们也决非大多数，职员、自由职业者、普通知识分

* 这是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和刘京在1966年8-9月间贴出的一篇大字报。原载上海市中学1968年编《思潮集》。——编注

子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们，请你们不要疑心，你们的老子大多数不属于反动之列，即便是黑五类的子弟，你们也可以想想，虽然老子反动，你们是否是混蛋？我们热烈希望你们做“基本如此”之外的人。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是不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有的同志讲“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后来又产生了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这两副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

第一副对联描绘了一个基本状况，是讲唯物主义的，第二副对联指出了发展前途，是讲辩证法的。“基本如此”加上“应该如此”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

这两副对联的确触动了某些人的灵魂，有的同志加上三个字“鬼见愁”或“鬼见怕”，很有意思。有的同志不敢触及某些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小王国，老是不痛不痒、马马虎虎，以求得和平共处。“岂不知，哄来的孩子，终究不是自家的孩子。”“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否则，貌似爱之，实则害之！

有人写了另两副对联和前两副对联唱对台戏，一曰：“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自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形而上学。”

这对“红五类”子弟是多么可恶的戏弄。对“黑五类”子弟又是多么卑鄙的挑拨。

二曰：“老子革命儿应继承，老子反动儿应造反——重在表现”。

在这里红与黑半斤对八两,“不偏不向”都叫作重在表现,阶级分析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这简直是××言论的翻版!四副对联这样针锋相对,难道不发人深思吗?有人问我们:“你们说党在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什么?”

我们说:“我们理解就是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去牢固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知识分子子弟和一切革命师生,就是左派的主力军。”

又有人问:“哪一个文件哪一条这样写了?”

我们说马列主义教导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进行实践、进行创造。对阶级路线的这个理解就是在进行创造,就是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创造,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了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不信也请你们到实践中去检验!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谭力夫

反动的唯出身论在工厂*

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小组发表的《出身论》这份材料后，触及了我的灵魂。的确，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你们所反映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我虽然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弟，但我也同样遭到了“唯成份论”这条错误路线的迫害。地富家庭出身的或与其亲属有关系的子女，就更要遭到不应有的打击和迫害。因此，我对这条路线的体会是很深的。我愿意以一个工人的身份，协助你们把这个工作进行到底，给你们提供有关资料，并参与我个人的观点，供你们研究时参考。

我是矿山上的一个钳工。几年来，由于我们单位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他们顽固地执行着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大肆歪曲党的政策，践踏阶级路线。高喊“阶级路线”呀，“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呀，喊的很“左”，做的很右，他们偷换了阶级斗争的概念，转移了斗争的方向。这样以来，他们就在地富子女身上大揭老底大作文章。他们却逃之夭夭，逍遥法外。

他们打着马列主义的红旗、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由于他们长期盘据着这个井口，唯成份论的现象非常严重，影响甚广。至今谭力夫的流毒还在我井口到处泛滥。下面就把我们单位的情况简介如下：

---

* 原载《中学文革报》1967年4月1日。——编注

从他们掌权以来，把大部分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青年工人（有好多他爷爷是地富分子，他父母还是革命干部）都调离了机电岗位，去干采煤工作。曰之：机电工作是要害岗位，对这些人不放心，害怕出了乱子他们负不起责任。看来他们对党是忠诚的，其实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正是由于他们这种错误作法，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例如：65年初，把一个富农家庭出身的五级绞车工，以借口绞车房是要害岗位，将此人调出。又把他们的心腹之人一个二级无极绳绞车工，调来顶替这个角色，由于操作不熟练，头一天就造成了蹲罐事故，造成停产两天没出煤，检修费用花了两千多元。

有的夫妻两口，因其一出身不好，不顾家庭有无困难，就将双方工作调开，有的调离相隔七八里路远，有的女方早晨跑去上班，晚上还要赶回来给小孩喂奶，给家庭造成很大负担。

党为了照顾生活困难的职工，每年都有好几次补助。这种补助，凡是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或与其家庭有关系的，不管这个人的工作表现如何，困难再大，一律没有，把他们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等同起来看待。父母有了罪，子女也要遭殃，这种惯例似乎成了一种阶级政策。这不是人为地让他们的子女也要形成一个阶层吗？这样下去对立面越来越扩大了，那么何日才能过渡到没有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呢？

对于工资改革，级别调整，几乎也拿出身问题做为一个先决条件。出身不好的，不论工作好坏，技术高低，政治表现如何，没有较好的领导基础想升工资一般是很难的。有的几乎几次都轮不上一回。因而使这些人长期在思想上背着出身的包袱，对工作、技术也失去了上进的信心。比如两个人

同一工种，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技术好，政治表现也不错。一个出身好，技术不好，政治表现一般。但后者比前者却要占绝对优势。出身不好，好像就要低人一头，成了先天罪人，终生悔恨。这样一来，使他们形成一种甘居中流的思想，自然是很容易的。

每逢节日、假日安排检修时，首先得把参加检修人员的名单呈报到保卫科。一个个进行档案审查，多少牵连一点问题的都不能参加。理由是这些人都不牢靠，不能信任，害怕出乱子。奇怪的是还是这些人平常工作的地方，为什么平时不害怕，偏偏在检修时却要对这些人大加怀疑呢？这不是人为地要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阶层吗？

除此之外，提拔组长、班长、队长，只要是出身不好的或略微贴点边的，不论其工作能力如何，政治表现好坏，都统统不行，以“唯出身论”决定一切。这样长久下去必将使这些人丧失前进的信心，悲观失望，工作劲头不足，如果让这一大批人的工作，长期处于束缚状态，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他们的最大积极性，对我们国家的事业，必将是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由于这种风气的盛行，使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在平常工作中“怕”字当头，不敢接近他们，只怕连累了自己，只好与这些出身不好的人疏的远远的。有些领导对某些人的表现从内心里感到佩服，也有心培养他们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但由于这条鸿沟的隔离，不得不对这些人放弃希望，一些群众也只好对这些人感到惋惜，抱怨地说：谁让你们投胎到地富家庭呢？命里就注定了你们该倒霉，这怪谁呢？这种抱怨都不是从辩证观点出发的。这都是信仰唯心观的人对这些人带来的毒害。这决不能怪他们。

由于以上这种倾向的严重存在，对于出身不好，入党入团问题也就可想而知了。有的也就干脆把这些问题抛到九霄云外去，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事情，更谈不上再让他们从主观上去努力了。

我们的书记曾经在一次青年大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党员团员不要和地富子女结婚。已经结过婚的要加强教育，没有结婚的就不要再结了。"看！连婚姻问题也规定政策来限制了。可是我在党章、团章和婚姻法上，从来也没有见到此类规定，谈到出身问题，这也许是新的创举吧？

更有些个人主义严重的领导，处处总是先把个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只害怕损害了个人利益，害怕与这些人贴得近了受影响，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们办事总是缩手缩脚，胆小怕事，任凭让自己"左"一点他不怕，一提地富出身他就魂不附体，怕的要命，万一路线执行的有问题了，怕负责任，怕犯错误，怕开除党籍，怕丢乌纱帽。因此他们一"左"再"左"，一直"左"到与党的阶级路线相对抗的地步了还不知觉。他们身上背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包袱，所以他们就不可能坚持原则，处处按毛泽东思想去办事。只好采取人云亦云的态度，成了谨小慎微的伪君子。在他们脑子里灌满了奴隶主义的思想，养成了盲从作风。一些领导干部都是这个样，何况群众呢？那就更是小心翼翼，唯命是从了。

文化大革命以来，刚成立红卫兵、赤卫队的时候，在宣言上就明确规定：必须《红五类》出身。在这个充满极"左"的幌子下，竟连中农出身的也不要了，并且把许多贫农、工人出身的，也要翻出祖宗几代，连门亲戚，逐个进行审查，只要能捞到半根稻草，也要大加怀疑，大做文章，把你一脚踢开，这种作法竟然达到如此地步，这真是形"左"实右的

实右，极端到了极点。

出身不好的或历史上有污点的，能够捞到半根稻草的人，如果在运动中站到保皇派一边就什么事都没有，哪怕问题再大的人也敢吸收。如果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那就要骂你“狗崽子”“兔崽子”“王八蛋”等等。在你的把柄上大放厥词、大作文章、借此来攻击革命造反派说：“队伍不纯”“右派翻天”“牛鬼蛇神”“反革命窝”“大黑店”等等恶毒语言。攻击的有些革命造反派也不敢团结这些人了。让那些出身不好的在运动中只好靠边站，要嘛就加入他们的保皇组织。

以上仅是我们单位存在类似情况的片断，供你们在研究时参考。

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注：以上谈的被调换工作的同志，不是因为这些人犯了什么错误，或其家庭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这些天真的老爷为了贯彻他们所理解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而才这样做的，也是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他们还借此机会把别人拉下来，把他们的亲信安插上去。

铜川煤矿一工人

1967年2月22日

鼓起勇气闹革命*

《中学文革报》编辑部：

您报创刊号发表的《出身论》，我荣幸地通过朋友转借，看了一遍。真是一篇好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起的效果也很大。您们，写这篇论文的调查小组的同志，大概都是原来不出名的小将吧？我敬佩您们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而且能把学到的真理，来解答问题，来为革命服务。

首先声明，我是一个年青的工人。但出身不好——地主家庭出身。高中毕业，未被大学录取，在社会上做了二年临时工，才侥幸地进工厂工作的。总的说来，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

文章《出身论》，从头至尾，每个字，都敲在我的心眼里。我捧着它，一气读了三遍。

其实，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于出身不好的同志所制定的政策，是英明、伟大的。可恶的是，有人把它篡改了！今天，您们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旁征了很多材料，论述了很多事实，驳倒了很多谎言，使那些篡改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政策的人体无完肤，使毛主席的阳光真正照到我们的心坎里。您们的文章，看来只是一张纸上的几行字，但它被人们接受了，会变成多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啊！它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无法计算的！

说实话，几年前，我是一个敢冲敢闯、活泼愉快的人。可

* 原载《中学文革报》1967年2月10日。——编注

恨的是我遭受了“唯出身论”的打击，未老先衰，变得沉默寡言。平时，很少说话，唯恐言语“走火”，那就是“立场”问题哪！于是，在党的利益受到损失，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受到一些人攻击时，我则咬着舌头，让血和泪往肚里咽！哎！我们无形地被剥夺了保卫毛主席的权利。

这是社会上存在“出身问题压死人”的影响，这也是我个人私心杂念在做怪。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我第一个值得向你们致敬的是，在去年7月份就动手写了《出身论》这样的好文章！《出身论》，是自古以来独一无二的，是关于这方面的好文章，而且，是在反动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鬼见愁”的压力下，杀出来的，我佩服你们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我佩服你们革命的胆量！

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反动口号刚出现时，我这个“鬼”确实“见愁”过，但！它只“愁”了我几天，我就从这个苦海中杀出来了！

我是一个24岁不到的青年工人，解放时，我还在穿开裆裤，我受的教育，全是党的教育，我受的影响，全是社会主义的影响。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江西省委、南昌市委和我厂党委，大胆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我遵循毛主席的教育：“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容一小撮坏蛋挖社会主义墙脚，我们不容他们与毛泽东思想抢阵地。我大胆地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我大胆地痛斥保皇派张××的大字报（像北京谭力夫之流者）于是，在运动初期，我上了黑名单，险遭毒手。

今天，形势大好，革命造反派扬眉吐气了。（这次运动，

我可自认为是革命造反派)，以前，我虽在辩论中、大字报中遭到围攻，在他们挑动的武斗中，我受过伤，但我反觉得荣幸。我在捍卫毛泽东思想之战中，贡献了一份力量。

现在，我在江西化织厂革命造反司令部搞宣传，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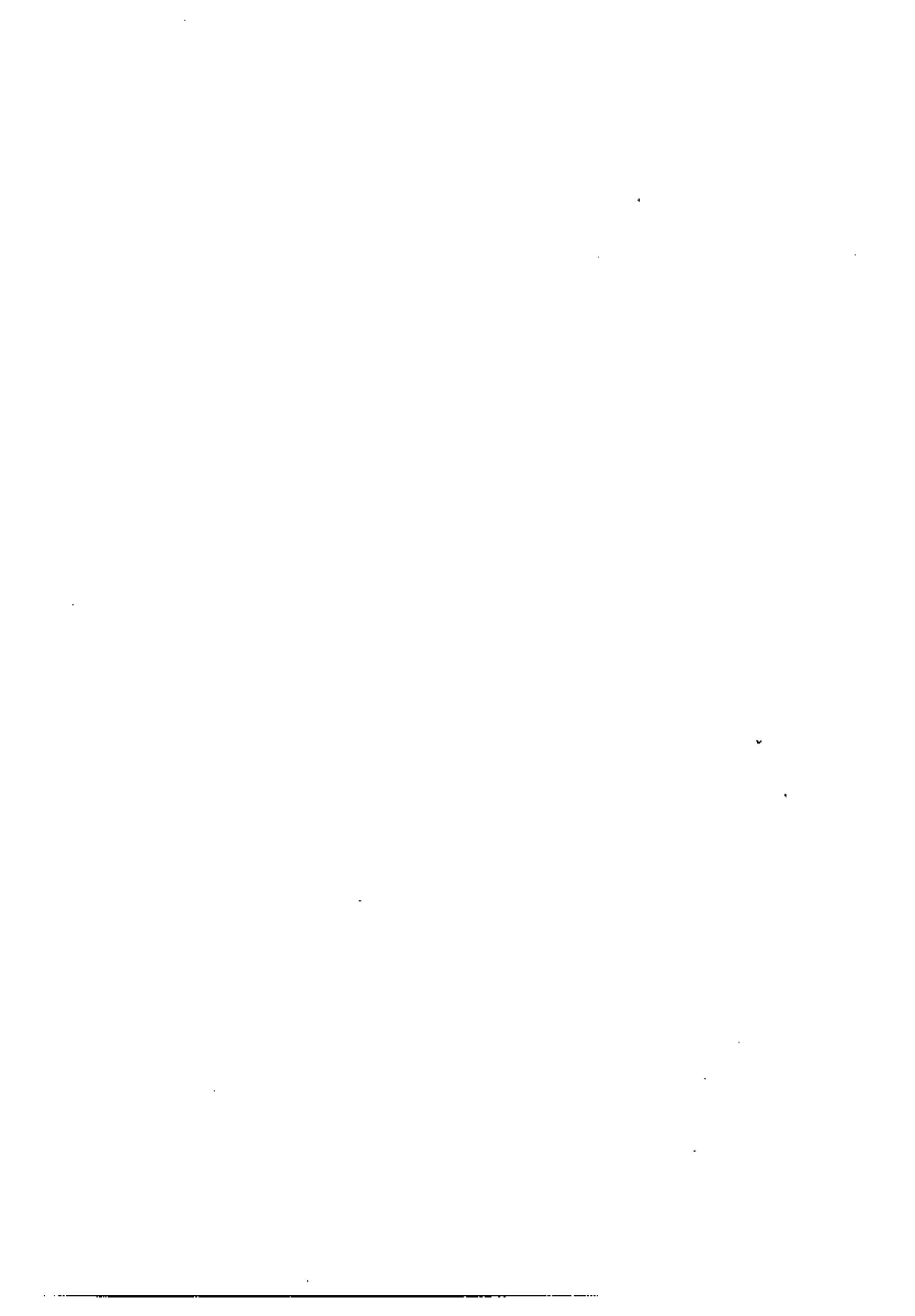
江西化织厂化织车间　刘平西

元・24

附：我盼望《出身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我还希望你们能继续写下去。

元・27





回忆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第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叶式生

我所结识的遇罗克

凡人，自然不都是英雄；
英雄，首先都是凡人。

我早就想写一点忆念罗克的文字，几次提起笔却又放下了。我常怀疑，那样一个戴着圆光白框近视镜，常常孩子气地咯咯笑着的青年，是否真已在杀气腾腾的刑场上饮弹倒下。即使在得知这恶讯已经十年之后，我也还止不住时而遐想，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突然接到他一封信，几行端正而略带局促的字迹会为我澄清那个误传的消息，或者告诉我，那其实是一种舆论手段，现在冤案大白，他已平安归来，像电影、小说中常见的公案故事一样……

一　奔赴农村

我最初听到他的名字是在 1961 年 2 月初，那时我们被同期分配到北京郊区一个人民公社。当时我们都是刚出校门半年的高中毕业生，一九六〇年高考中“考爸爸”一轮的落选者。

比起经受了“砸四旧”、“大串联”、“反潮流”等新式洗礼的后来者们，那时的中学生们自然幼稚得多了；但总算也约略感受了1957年不平凡的春天气息，身历耳闻过把炒菜的铁锅捣碎在“炼钢炉”里大炒的豪举和接连放射巨型粮食卫星的伟业，消化过随之而来的“双蒸窝头”[①]和“小球藻”[②]。消化未完，又初尝了家谱至上论的滋味。这些经历比起50年代前期的同龄人，就又丰富得多了。

同期分来的高中生约有七八十名，实到一半左右，大抵都是因“血统”原因被淘汰的落第者，区别只在有的是“先天不足”，有的是“后天亏损”罢了。遇罗克和我便属于后一类，但亏损先后又有所不同：他的父母在1957年双双成为“右派”；我的父亲在1959年上书言事，扯了扯“为民请命的破旗”。所以他的家谱修订版比我的早出两年（100年后又都恢复了原版，那是后话了）。但殊途同归：1960年高考时都正好用上。

正式报到是1961年2月10日。记得那是个欲雪无风的阴天，十几个刚报到的新农工把简单的行李装在社部门外的一辆大车上，各自坐着被卷儿，大车起动，我们走上社会的第一步路就从这里开始了。

七八米宽的一条土路，两边无树，视野很开阔。远远望见路北一片暗绿色的冬小麦田，田间坐落着十几排干打垒的蔬菜温室，那里便是我们的首批集中点——园艺队温室小队。

天气阴湿寒冷。但看看同车的新伙伴们，互相攀谈着，情

---

① 不增加粮食分量而扩大了体积的窝头。即将一屉窝头蒸两次，即吸收更多水分，以慰饥肠。此法名为“双蒸”，当时曾被大力宣传推广。——作者注

② 又名“人造肉”，取湖沼中浮生的藻类植物发酵即得。——作者注

绪都挺热烈——一种充满新鲜感，急于一试身手而又带些负气情绪的热烈。至少在我自己，确是很受了多年学校教育的熏陶和《暴风骤雨》一类文章作品的影响，抱着近乎狂热的幻想，又夹带着失学的牢骚情绪，到这里来的。

农村?那是社会空气和自然空气同样澄明洁净的地方。物质生活的清苦是自不待言的。但那算什么，那里有的是纯朴忠厚的农民！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相待以诚，是全不理会什么“家谱”的；每一颗赤子之心在那里都将同样得到鉴察。呃，我将要和那些白胡子大爷和黑胡子大叔一起早出晚归、栉风沐雨、灯下交谈，双手和他们一样结起硬实的老茧；炕上一灯如豆，我正挥汗执笔，帮他们给远地亲人写信；热心肠的大娘大婶们嗔怪地抢走了我磨破待补的衣服，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哼，大学？不要拉倒！

车上交谈中，一个六十五中毕业的姓李的学生告诉我，他有个同学一块儿分到这里，六号就来报到了，比规定日期早了四天。名字奇怪因而易记：遇罗克。

这名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好，虽然是间接的。上学时候，所谓“假积极”者留在同学中就最招反感。想不到初来此地，先就听说了一位：他分明是想挣个先入为主的好印象罢了。李见我反应冷谈，就没再说下去。

谁料不久之后，他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冲击。

正式报到后，二十来个学生安排在温室，我在其中；三个学生安排在相隔一公里、同属园艺队管辖的菜园，包括先期到达的遇罗克。另有些学生分配到其他大队去了。

白天是新鲜而吃重的劳动。晚饭洗漱之后，读书无桌凳可依，而且新到一个陌生环境，书一时也读不下去，便早早

地熄了灯，大家挂挂挤挤钻进被窝里谈天，第一话题自然是高考，第二则是书本。这天晚上话题不知怎地扯到了“红学”中的一些繁琐考证，我带着几分不敬的语气，提起郭沫若先生的“斑疹伤寒说”[1]，博得了一阵采声。于是黑暗中有人判断说，我一定是报的文科，而且是看过点书的。我解释说自己其实报的是清华建筑系。话没说完，就听那个姓李的学生插了话，隔我三个被窝说道，和他一起分来的遇罗克也是报考理工的，但语文水平特别高。

“呃，他报的哪儿?”

“地质学院。”

“怎么个高法?”

“《资治通鉴》他都看完了。”

“哦?! ……”

这真是大出意料！刹那间那个间接的第一印象整个被推翻了。《资治通鉴》我是知道的，而且父亲就收藏得有。但那半人来高的线装大部头，我从来没敢问津过。这个企图“先入为主”的遇罗克，竟把它读完了?! ……不，善营权谋的人是决不会来沾惹此道的。这样说来，他竟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人了? ……

唔。五官端正，面庞清秀——我呆瞪着黑暗中的屋顶，禁不住在心里勾描起他的形象来——眼睛?自然是又大又亮的，但是带点儿羞涩。风度翩翩，温文尔雅，不过说话爱脸红……

一个多月以后，我从温室调到菜园，从此干活住宿就都

---

① 见郭沫若先生的《〈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的一种解释》。文章考证曰：本回“魇魔法叔嫂（宝玉、凤姐）逢五鬼”，实系两人双双发了“斑疹伤寒”，并从而推定此前浪荡公子秦钟的早夭，亦因此病云。——作者注

同遇罗克在一块儿了。然而怎么也料想不到，初次见面非但没能使我大慰平生，反而对他读过《通鉴》的传说也发生了怀疑。

他的形象与我的构想大相径庭，使我非常失望。前额要说宽是也可以说宽的，但毫不出奇。整个脸形连同鼻梁却显得太长了，淡淡的眉毛，细长的眼睛，还是单眼皮；更令人扫兴的是那一双耳朵，颇有点“扇风”。只是戴上那副圆光白框近视镜时，一双眼睛才亮亮地挺见精神，还算差强人意。

我在上工的路上，从旁观察他的步态，就越加扫兴了。他身板单薄，又稍有些驼背，走起路来头部略向前倾，随着大而慢的步子轻轻向前一点、一点、一点……使我想到闲庭信步的鸵鸟。

唉，哪有一点儿学富五车的书气和羽扇纶巾的风度呢？简直没法把这个形象同博大精深的《通鉴》联系起来。克制了半路，我终于忍耐不住，向他提起了关于《通鉴》的传闻。奇怪！他不加然否，只淡淡一笑，仿佛有不足为奇的神气！我于是想起出门前他掖在兜里一本原文版的《史记》，便问他何不借一种注释索引完全的本子。

“我不爱看带注解的。”他并不转过脸，头部微微向前点动着，淡然说。“翻来翻去太麻烦，思路也受限制。”他两眼微眯，平视前方，白镜片上闪动着许多同心圆；双臂前伸，两手相迭，压着过肩的铁锹把，一个毛巾碗袋吊在胸前；随着头部的点动一晃，一晃……

我看着他的侧影，心里说：“太自负了！我就不信你处处都懂！”

貌不惊人，执著自信。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二 青春作伴

一条东西走向的土马路。路北是开阔的大田和葡萄地，路南是绵延风障遮护下的菜园。路两边夹道排列着参天矗立的加拿大杨，春夏时节浓荫满地，十分幽静凉爽。路的西端是我们的集体宿舍所在的大队部，东端连着我们干活的地方——菜园小队。上工下工，每天两度往返，我们一道从这“哑铃”形天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这条路上，我们逐渐了解了彼此的简单身世和志趣爱好，熟悉了彼此的长处和弱点。一些“关节点”上的相同或相似，使我们很快亲近起来。

清晨，镀满金辉的杨树梢头，鸟儿们在梳妆嬉闹、千啼百啭。午间，一路娇憨而单调的蝉鸣，使这条林荫道更显幽静。傍晚，林荫下暮色已浓，远望西边天际，夕阳余辉却悠然托出地平线上一带依依村舍；缕缕炊烟，袅袅升腾在天幕上，宛如一幅静中寓动的淡墨山水画。路边池塘里，青蛙们正节奏分明地齐声问答，仿佛永远不会疲倦；偶尔乱了节拍，就会出现短暂的休止，而果然也就能很快等齐，好像它们都在各自的洞中鼓着眼睛，注视着一个无形的指挥似的。哦，多么充满生机的路！周围是新鲜的环境，新鲜的人，新鲜的劳动，新鲜的疲劳，新鲜的愉快。于是，我们一式扛着铁锹。迈着悠然的步子，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种种五花八门的有趣话题：从赵大爷当长工时如何以巧妙的“打腰儿”手法把刁难穷哥们儿的长工头拉得“趴了架”，到电井池液面高度与出水口流量的函数关系；从苏格拉底怎样与希庇阿斯论“美”，到丁大个吃西瓜的速度赛过吹口琴；从王安石的“孟尝君特鸡鸣狗

盗之雄耳!”，到夏目漱石的“四碗炸虾面，但不得笑”……

他十分健谈，尤其喜欢辩论，全不像我揣测的那样，说话爱红脸。他的话音总是不高不低，平平静静，既无低回咏叹的“……”，也极少激昂慷慨的“!”，但明亮清晰，平和中见思考，条理中露智慧。说到开心得意处，他会自己先咯咯地笑几声，再转脸观察听话人的反应。这时我常常故意绷住脸，做出淡漠的样子，以免给他过多的得意。

“你又半天不说话了。”他有时忽然发觉有些异样，便不无扫兴地看看我。

我心里一笑，但仍不说话：我本来就是要用淡漠给他扫扫兴的。他那狡黠的机智，曾是怎样地使我气恼啊!

辩论是他的一大嗜好，也是他的一项突出才能。他的思想的敏捷深邃，许多有独到见解的火花，往往就在这当中闪射出来。有时虽也难免偏颇，但决非信口雌黄，而是经过了认真思索。“文史哲”是他最为擅长的领域，在这方面他常能使同龄青年们为之折服。而在他本非特长的其他论题上，他也从来不肯轻易败退，有时甚至还能败中取胜。

一次我们几个人同行，不知谁提起了这样一个题目：究竟是地绕日转还是日绕地转?

“当然是地球绕太阳转了!”我信心十足地说，同时估计到罗克一定又会独出心裁，但这可不是他的“领域”，我一定得好好挫挫他的锐气!

果然，他不假思索地说：“也可以说太阳绕地球转——相对论么。”

哈!这回你可说漏了!相对论我可看过一点儿，根本和这两码事。“相对论跟这毫无关系。”我尽力不露心里的激动，痛快地反驳道：“谁绕谁转就是谁绕谁转，这可没什么‘相

对’的！”

“从太阳上看是地球绕太阳转，从地球上看是太阳绕地球转，怎么不是相对的？”他转过脸，圆镜片后边一双长眼睛射出光来，挑战地盯住了我。

“从另一个恒星上看呢？谁绕谁转？”我早有所料，从容回出了致命的一句。

“地球绕太阳转。”他眨了眨眼睛，说。

“这不完了！”我果然获得全胜，便用力强调一句道：“这才是最客观的！”

“可见是参照物取的不同，结论就不同。——还是‘相对’的。”

“唔？！……”我一时乱了方寸，竟无言可答。他咯咯大笑，不等我醒过梦来，早趁势把话题扭开了……

每逢这时，他的神采便骤然焕发，与平常判若两人；一双细长的眼睛调皮地张开了，机智、狡黠，带几分善意的嘲弄，在镜片后面亮亮地盯住了你，常常不待终局，就挫折了你继续论争的勇气。这时他那咯咯的笑声是多么得意，多么天真哪！倘不是我常能成功地用淡漠拘住了他，他不定多少次要雀跃了呢！……

他不但机敏自信，也像所有十几岁的青年一样好胜好奇。探索新境、险境，是他的莫大乐趣。一天傍晚，我们同在食堂外空地上吃饭，看见两个老农工边吃饭边下象棋。他有些遗憾地说：“我原来挺爱下棋，可怜这儿没什么人能跟我下，招儿都搁生了。”这话顿时撩起了我同他一试高低的欲望，但听他的口气，又有些不敢造次。而且宿舍里没有棋子，也就罢了。

不料棋子竟自己送上门来。

一天，有位出名的棋迷老孟揣着棋盒，慕名来找罗克下。罗克不知为什么，说说笑笑间把老孟转嫁给了我。我奉陪了三盘，老孟尽了兴。但他收拾棋子时忽然灵机一动说："哎，你们俩摆一盘看看？"

罗克闻声放下书，抬眼看着我。我早已跃跃欲试，此时却心跳了。但他已经站起来，说："那就来一盘吧。"说着走到我床边，竟自坐下了。

没有回路，我只有低头摆子。心里决定：步步小心。

开局几步他出手很快，几乎不假思索。我也提起全副精神相抗。终于双方进招都慢下来了。

"唔？"我盯着他刚开出来的"横车"犯开了嘀咕：两三步内分明"没棋"，一只离了"根儿"的底马却亮在了我的炮口之下！这……？不！他是惯于诱人入彀的！

我悄悄抬起眼光：他正漫不经心地揪着指尖的倒拉刺儿。一发觉我抬头看他，神色立即警惕起来，觉察到棋盘上大约有什么不妙了。

"……哟！"他扫视棋盘，不由一惊。随即右手微微一动：想要悔棋，又有些顾忌。

乓！——我立即打掉了他的底马。还没来得及高兴，他飞快地一个"炮二进五"，"卡"住了我的"右屏风"。"这下你可上当了！这叫声东击西！"他说着开心地笑起来。果然从此我一路被动，终于败北。

"这叫'顺炮横车弃马局'。"他满意地收拾着棋子说："你看过《桔中秘》没有？"

"没有。翻过点儿《中国象棋谱》。"

"那书没劲。老是'双方平稳'，不如《桔中秘》杀法痛快。"

他最喜欢的就是“弃子入局”的杀法：在表面劣势中出奇制胜。对手越强硬，他的情绪越饱满、着法越凌厉，而遇到那种每子必争、追来躲去的纠缠棋手，他就兴致索然，有的反会输掉，而且一次索然，再不奉陪。后来为同他抗衡，我曾大钻了一通棋谱，每到自以为可以一试时，就同他较量两局。结果常觉奇怪：直到我修炼到能下两盘“盲棋”的程度，也只是同他和过几局，战绩反不如我能轻易制胜的某些对手。

知难而进，愈难愈进。他这性格即使在下棋这类无关宏旨的小事上，也毫不例外。

他像许多有才华的青年一样好胜而自尊。然而能像他那样不自欺、不妒嫉，善于正视别人长处和自己短处的青年，就不易多得了。一次他同一个姓麻的学生谈论维尔高尔的小说《海的沉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麻是个出奇高傲的青年，近乎目空一切。

“混蛋。都是混蛋！”他常常轻蔑地说着这句口头禅，用以评价周围一切有意无意冒犯过他的对象。

“你说说，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麻双手抱颈，仰在罗克的被子上问。罗克坐在床边，认真回答了。

“喊！简直不沾边儿！你完全看拧了！”麻不屑地拿出左手，凌空比划着，给罗克开讲起来。那俨然的“庭训”口气，连我这个旁听者都忍受不住了，何况在我听来，他那番高论实在离“边儿”更远。但一向不肯屈从于人的罗克，竟那样一动不动坐在床边，专注地听着，听着……

“你干嘛不驳他几句？让他那么狂！”上工路上我忿忿地问他。

“外国文学，我是没他看得多。”……

他就只答了这么一句。

三 交叉路口

这一段欢快热烈的日子，不久就成为带苦涩味的回忆了。环境在不断给这些狂热的心降温，使它们日渐冷却下去。他们的粮食定量从相当现在七岁儿童的标准线上猛增了十斤；这一张粮票在那个“瓜菜代”的年月又是何等珍贵！但是，对这些渴望着精神上的温暖关怀，渴望着满腔热情的宣泄的青年们说来，它却并不是首要的东西，更不是唯一的东西。

环境提出的要求越来越明确：体力。他们屡曾向往、并为之激动下泪的那些热烈动人的场面，终于没有来。倒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压抑感在无形地增长着，增长着，日益分明起来了。

离开温室不久就听说，同来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小学生贾××，因“殴打温室小队长张××，蓄意行凶报复”，被开除了。

不久就又听说，温室又调出了五名学生，被分散安插到几个相距很远的小单位——因为他们结成了“反党小集团”。

不久就更听说，我们原来都是“反动学生”、“有问题的学生”，“不得不到这儿来”的。……

既是“不得不来”，不少人也就不得不去了；自然都背着“逃兵”的恶谥。也有个别年龄较大的，便逐渐转向“现实主义”——开始筹建未来的小家庭。

温室、阳畦里四季如春，各种小苗们日渐长大，成了茁壮的植株，结出了丰腴的果实。这里面也有这些“不得不来”的青年们一份劳动。比起在冰封雪冻中顽强生长的松柏

来，它们自然稚嫩柔弱得远了。但是，它们不是也都雄辩地证明了，本不是一切苗株都非得在风雪严寒中挣扎成长，才能造福于人类么？人们既肯为种种植物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使之造福于人，为什么倒不肯把这环境也提供给你们自己的许多同类呢？委屈、失望、迷惘，我曾暗中泣下。但对那些不辞而去的人，又依然抱着正统的蔑视。这也许是坚持留下的人多曾有过的矛盾心情吧。这矛盾既使我对再度升学感到无望，又时而心造出一种自慰的幻想：我们并没被人遗忘，我们正在接受考验，有一天我们说不定会突然被抽去重上大学，因为我们毕竟是有志于学，也能够学好的学生……

在听到陈毅同志给六一届高校毕业生做报告，许多人当场激动流泪的情景时，这幻想骤然强烈起来。然而幻想毕竟是幻想。几经冷热之后，它终于自生自灭了。我感到精神世界出现了日益加深的裂隙，消沉、颓唐在向这里侵袭，我不得不调用大量抽象的高等数学公式去填补：富里哀级数、曲面积分、台劳公式、五色定理……。然而脚下的地基好像仍然在沉下去，沉下去……

正当我和许多同来者一样感到了彷徨苦闷的缠扰而难于独力摆脱时，一个同龄青年在不言中帮助了我。他比我年长有限，却显得那样成熟、清醒、坚定、乐观。他就是罗克。

作为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青年，血统论在他跨过第一道人生门坎时给他的沉重一击，当然也使他深感愤懑。当时他曾套用鲁迅先生的《自题小像》写过一首七绝，其中有“血荐轩辕荃不察”一句，抒发了他的志向和激愤。

但他并未停留在个人遭遇的感愤里。在同来者中，他是最先从这里摆脱出来，把个人遭遇同众多的他人遭遇相联系，从而开始把出身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的。

当时菜园雇用着不少临时工和合同工，多数是附近村里的社员。其中有不少体格健壮、五大三粗的棒小伙子，干活十分麻利；但毫无一般农村小伙的“庄稼脾气”，干活、评分都是随叫随到、百依百顺，从不跟人打打闹闹、骂骂咧咧。特别是他们受到明显的不公平对待时那种逆来顺受的态度，使我越来越感到纳闷。有时我作为局外人已经怒上脑门，他们自己却低眉顺眼、一声不吭，而周围的人也都处之泰然。我困惑，不平，终于猜不透其中的名堂。

但后来，罗克向我揭开了这个奥秘：他们都是地富子弟，因为在村里干活受歧视，才到这里来当临时工，想用委曲求全换得一只“铁饭碗”。罗克首先从一个姓孙的小伙子身上开始了他的社会调查，陆续和许多当地农村青年交上了朋友，这才逐渐了解到那些和我们一样受到血统论压抑打击的“毫无脾气”的小伙们的隐衷。我在那里猜测、不平的时候，他却已经自己动身寻找谜底去了。

“在出身问题上受到歧视打击的不仅是我，不仅是我们，还有大量的别人。”这个简单的结论是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青年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得出来的。这结论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那些现象也早不值得困惑了。然而在二十年前，不光这结论，连这问题本身也还被锁在保险柜里，肯去求解的又有几人呢？

真正的探索者必然是坚定乐观的。血统论的打击可以使他愤懑，促他思索，却不能使他的童心归于泯灭——他毕竟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上工路上，罗克总是谈笑风生，时而和路上碰到的老农工们随便地开几句玩笑。碰到哪位女工大嫂抱着孩子，他会跑上去拉住孩子的手，挤眉弄眼地做出种种怪相，直逗得孩子张皇失措，这才咯咯笑着走开，自己也像个孩子一样。收

工后一起在食堂外的空地上吃饭，他会忽然一语不发，紧闭着嘴一蠕一动，神态夸张地大嚼，两眼却盯住你，等你发问。

“怎么了你？牙疼？”

“你就这样吃饭。像个老太太。”

真不知他哪来的这些闲情逸致。

干活时，我已经越来越小心地避开人多的地方，常是独处一隅，免得同那些好奇心过强的大嫂们搭话。她们已多次使我感到难堪。

“你十几啦？”

“十八。”

“初中生儿吧？”

“高中。”

“哟！都念完高中啦？那还不接着念大学？”

“……”

“家里不让念了吧？”

“……让。”

“没考上啊？”

“……嗯……”

“唉？不是听说……”

“你别紧着刨根问底儿了！你当考大学那么容易哪？我们兰子她姨那俩孩子，刚上初中，大考还好几门不及格呢！甭说人家考大学了。”

这好心的解围使我更难受。我真想对大嫂们说，考试我一点也不觉得难，我当过文理四门“课代表”，是全市高中数学竞赛的候选人之一，也是全区高中成绩展览中八篇展文的作者，毕业统考总分的全级第一名……

但我不能说。自尊心的暂时满足必将引来进一步的追问，

使我更加难堪，把我推离人群更远……

“嗨——！伊拉克儿——！刚才是怎么啦——！”“哈哈哈哈……”

在我独自闷头干活的时候，常会忽然听到远处不知哪位大嫂喊上一声，接着整个风障道里便掀起一片由远及近的哗笑。抬头望去，便见罗克正慌乱地用衣袖擦着额头、鼻尖上的白毛汗，然后无所谓地笑笑，躬身拾起挑翻在地上的扁担，或拍拍身上的浮土，就又若无其事地干去。每到这时，我的眼光常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出好远。凭着自己的切身体验，我深知他那比我更单薄的身体要在那根扁担下面显出轻松无事，需要动用多么大的精神力量。更使我自愧的是，他不过比我早进菜园一个多月，却有这么多人同他随随便便地玩笑了。

“伊拉克”是那些爱笑爱闹的女工大嫂们送给遇罗克的雅号。这个奇特的中外谐音，得自当时大量引进、妇孺皆知的伊拉克蜜枣。

岁月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悄然流逝。一件又一件日常小事迭加起来，终于使我看清了一个近在身边的对比：他来农村的热情比我扎实得多；否则决不会有这样的清醒、自信、坚定、乐观。

但他能做到的，我又为什么不能呢？

对！坚持下去。一切都会改变的！

四 “少年幸遇读书风”

这是罗克当时写下的一首七绝中的一句，指的就是我们

那间集体宿舍的读书风气。

那间宿舍坐落在大队部大院的东北角，一长排青砖北房的最东端。住有八个人：除罗克和我，还有同期分来的一个学生王大绩，他在邻近菜园的果树队干活；两个原市委党校教员现为“右派分子”的老范和老冯；一个下放的中学教师和两个老农工。爱读书的占绝对多数，不爱读书的少数对读书也并不反对，因此这间宿舍在整排房里总是熄灯最晚。这种局面大约在我们来前就由老范和老冯开创出来了。他们两人的刻苦精神对三个后来的青年都是很大的鼓励。不过他们是“右派”一节，我们当时还没听说，也一点儿没看出来。他们都晒得黝黑，干活十分熟练，抬大筐、打阳畦毫不吃力；收工回到宿舍，一脸盆菜花叶加把盐煮煮，吃得比我们还香；偶或分得些超产粮或胡萝卜，也都欢呼雀跃而且斤斤计较。只是那一身洗白了的灰制服和过分整齐的补钉，使我猜测他们也是精简下放的中学教员或银行干部。后来得知真相，再看其人，果然“右派”也：每天晚上，他们都在灯下顽固地读着《政治经济学批判》、《斯大林全集》、《经济研究》之类曾多少有助于他们成为“右派”的书籍。

看谁最后熄灯，无形中成了三个青年和两个中年人心照不宣的一个竞赛科目。为了不妨碍两位早睡的老工人，老范每晚按时把吊灯拉到床头，用报纸围起一个灯罩。罗克于是也让弟弟给做个土台灯，灯柱和底座是木头削成的，灯罩是画报纸糊的，放在我们三个新农工共用的“桌子”上。这桌子也是取法老范自制而成。取装运化肥农药之板条箱一个，过水风干备用，复取砖头若干：箱壁朝上——“桌面”平矣；箱口朝里——“抽屉”阔矣；砖分四棵——“桌腿”牢矣；支于床头——“椅”自出矣！每天晚上我们先轮流在这桌子上

练半小时毛笔字，然后各自看书。当时我的自学科目是高等数学和无线电电子学，罗克则抱定他的哲学和文史。我们都想吸引对方改弦易辙，时常互相兜揽：

“你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真不如多看点儿哲学。”他指指手边的《世界哲学原著选读》。

“怎见得你这更有用?数学是一切精密科学的基础——也许还包括哲学在内。”我回手拿出一本鲁金的《微分学》，“棒极了！你——”

“你政治上太迟钝。”他遗憾地说。我报之一笑。

于是每天晚上在这盏土台灯下，我们各据一方，以“微分方程”、“特性曲线”和“斯多噶主义”、“感觉的集合”分“桌”抗礼，彼此都以比对方后钻被窝为快。罗克体质不如我，坐熬往往先败。每见他强抑哈欠，镜片后面的细长眼睛机警地窥察我的动静，我就越是抖擞精神，做出毫无倦意的样子，迫使他先铺开被窝。

但他躺下之后可还有名堂：先摘下眼镜在枕头旁边放好，然后从褥子下边拿出一本线装的《邯郸记》之类，卷在手里，继续看。而我的公式和曲线在被窝里却只利于催眠。所以常常次日醒来看到不知何时熄灭的台灯，才想到还是他睡得更晚。哦，那盏土台灯下，有着怎样宁静的夜晚，怎样愉悦的紧张啊！可惜后来这间宿舍改做别用，我们一起搬到了菜园宿舍，昔日的安宁便不复存在了。其时我也拥有了一张“桌子”，但同时也告别了“特性曲线”们，迷上了毫不相干的古典戏曲和英语。而罗克则依然抱定他的哲学和文史。在这种心照不宣的逐日打熬中，我渐渐发现、认识着内在的他，也发现、认识着内在的自己。不错，对浇水、抬大筐来说，高斯和亚里士多德、“宫商角徵羽”和“否定之否定”是距离同

等的。但是为什么他的自学兴趣那样专注，我却常常被突然萌生的兴趣牵着乱跑呢？我不能不承认，他的自学有某种既定的目标在吸引，我的则不过是一种“宁愿学而无用，不愿用而无学”的积习罢了。

罗克身上有这样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只要你不甘颓废，那么在同他共处时，你就不能不调动起全部自尊和毅力同他竞争，以做一个值得他结交的人为快。他的自信和毅力，反会照出你的盲目虚浮的影子，助你自省，激你奋进。当环境对一个人的求知和上进无所要求甚至压制，平庸颓堕极易被接受的时候，这样一个伙伴是何等珍贵啊！

对自学者，还有什么比时间更宝贵的东西？晚上的集中时间固然最须抓住，白天劳动的间隙时间也大有可为。“打歇儿”（工间休息），就是读书的极好时光；而罗克作为全小队唯一的戴表者（说“唯一”不大确切，因为除他那块破表外，还有老范的一块。但老范连人带表都是“右胳膊那边的”[①]，自然不便动问），有时还能使这点时间略有延长。

天棚外是灼人的酷暑。席头中央男工们分摊甩起扑克；女工大嫂们纳着鞋底拉家常。劳动之余，背贴着冰凉的席子躺在天棚下，在周围的喧声笑语中领略书里的奇情胜境，是多么惬意的事！本来规定的打歇儿时间是二十分钟，但扑克甩起来很难收场，先后两位小队长又都是扑克迷，所以实际上很少有短于四五十分钟的时候。为此园艺队长和支部书记干预过好几次，结果都是不出三天就故态复萌，后来也就听之任之了：当时正是强调“劳逸结合”的时期。

“伊拉克儿，该着了吧？”小队长有时估摸着工夫不短了，

① 老农工们用以指称“右派”的隐语。——作者注

就随口问一句，但眼睛仍在“大鬼”上。

“还早呢。”罗克顺口答音，眼睛也根本没离开书本。但这答话却正对问话者的心思，于是扑克“接茬”甩，鞋底“接茬”纳，书也“接茬”看。

不过最理想的白昼读书机会还是在浇水的时候：这是机动时间最多的活儿。但为利用这些时间，我们也付出了可观的代价：除多次挨训之外，还比别的同来者“缓转”了一年一级工。我们都弄不懂，反正要老半天才改一次畦口，允许坐看水往低处流，为什么就不许看几页书呢？

“那不行。”队长的理由简单明了——“你们瞧瞧，谁跟你们似的？”

罗克看看我，扬扬眉毛。是啊，这也难说不对。

但好像仍然难说看书就一定错。大看不许，其于小看何？只要勤看勤停，勤停勤看……然而——

“跑水啦！”

几次刚刚由“停”转“看”，就听得远处一声呐喊。掖起书前后巡视一遍：水情正常。

一次改完畦口，我抱锹枯坐，静观水往低处流，观赏着实了然无趣。隔畦一望，忽见罗克神色反常：他面朝着我坐在对面的小龙沟背上，两手托腮，正盯着地面出神。

“咦？……难道他果然从流水中发现了什么名堂么？”我立即戳起铁锹，绕了过去。

哈！一本书！书页摊开，放在他面前的小龙沟背上，书角压着土块，被大白菜掩护着；他正用“想心思”的姿势偷看呢！

我立即移植了这发明。果然从此不再听到远处的呐喊。

真所谓“得陇望蜀”，“看大龙沟”又成了我们共同觊觎

的职位。它包括三项任务：上工前打开电井，使水能在上工时流达它该去的地方；浇水过程中确保大龙沟不跑水；地将浇完时估准时间把电井关上，使沟中余水刚好够用。三事备，其余时间均可自理，多么令人向往！

可惜争取多时，终告败绩。这时才弄清它原来是个照顾活儿，我辈年轻而且“力壮”，自然没份儿。

读书时间之源开挖越苦，读书对象之源就越显不足。

当时我们每月工资三十元，蔬食布衣怡然自足，烟酒皮鞋均无嗜好，除再补贴少量家用外，其余部分都用于买书。不过这“部分”终究有限，所以就打开了图书馆的主意。

先是去“首图”办了一张集体外借证。用不多久又饥肠辘辘了。于是又想办一张可以借阅大学读物的外借证。

罗克便去了。答曰：这要有大学学历的证明方可。

是——这样的么？我们懂了：大学学历的人，永远看大学程度的书；中学学历的人，永远看中学程度的书，小学学历的人……呜乎！好个一劳永逸的学历台阶！

罗克偏就又有话说。天知道他借鉴了哪位纵横家的辩术，二进“国子监”[①]之后，居然举着一张书卡回来了！

连声夸赞。自叹弗如。几个“终身高中生”传看这张“大学程度”的外借证，好生得意。

然而罗克的口才虽能克服借书之难，于读书之难却有无可奈何之叹。

第一个难题是宿舍的拥挤。菜园这间宿舍比原来大队部那间面积小，住人却更多，二十多平方米内均布着十一个人，一律铺板加条凳。因邻床们每每在梦中互以拳脚相加，我们

---

① 首都图书馆馆址。——作者注

不得不公举罗克为首，一同去申请疏散。答复是按集体宿舍规定标准每人二平方米，本室尚可增员两名有余，最近正拟安排。于是罗克匆忙率众告辞，归做内部调整：除三个墙角外，令余床一律垂直墙面，两两结对，间距以都能下地穿鞋为度。自此疏散增员遂并作罢论。

第二难题是嘈杂。此时房中住户除罗克和我还有：一个同期分来的学生，年龄较大，正在筹备成家；爱说爱唱的老园工、急待续弦的赵大爷[①]；原某京剧团剧务、业余“花脸”张大爷；四个分配或复员来的新农工；老搭档范、冯二位。同人们相处很和睦；但身世爱好的歧异和读书派居于绝对少数的局面，使嘈杂成为必不可免的。每天傍晚收工归来，这间宿舍里便先后或同时回响着令人抓耳挠腮的有线广播喇叭；除正常声音外万籁俱全的自装再生式交流收音机；张大爷振聋发聩的——“怀抱着，幼主爷，江山执掌！”赵大爷苍凉悲壮的“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

后来天公作美，喇叭自行报废了。罗克和我暗中庆幸了好几天。谁料塞翁失马——又来了一管竹笛！每在收音机和两位大爷相继“鸣金收兵”、读书渐入佳境之际，耳边突然奏起声如裂帛的笛子，令人全身为之一颤，自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往往吹到笛膜破裂。置若罔闻实在太困难，于是罗克和我不得不偏安到附近的一个蘑菇窖去。那是果树队的一间宿舍，孤立旷野，有门无窗，潮湿而阴暗；但只住着同伴王大绩和一个初中毕业的新农工，十分清静，还有一张真正的桌子。每晚收工之后，我们带上饭碗和书本，吃过饭便直接

---

① 罗克当时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小说《蘑菇堡垒和菜花老人》就是以他为原型，在这里写的。——作者注

到这个蘑菇窖来读书，着实享用了一段安静时光。

可惜时隔不久，这蘑菇窖又改作它用，我们只好各归原地。“噫吁嚱！喧乎闹哉！读书之难难于钻地缝！”我的牢骚来了。罗克却只一笑，平静地说：“环境本来如此，没有理由因为你的出现而改变，除了自己去适应，没有别的办法。”怎样“适应”呢？白天十一小时的劳动，自然不能有丝毫懈怠，所谓适应之道，也只有俟诸深夜而已。那时我曾写过一首答罗克《寄友》诗的七律，中有一联是“夜阑灯下读青史，蜡尽窗前望启明”，所记便是这一段自学时光。

第三个难题来自昆虫界。夏天收工回来，室内光线已很暗淡，这时你拿起搪瓷饭盒信手在空中一挥，就会听到轻微的叮咚声——撞上了编队巡航的蚊子。明乎此，要在灯下静坐，就须“重装上阵”：老蓝制服和长裤自然是越厚越好；血肉丰满部位，尤以设有补钉为佳；注意扎紧袖头裤脚，以防“陈仓暗渡”；诸事备，再加一盒清凉油。盛夏时节，这身披挂真也有些难耐，何况又在收工盥洗之后。但历久也就都能胜任愉快了，大约我们都没有多余脂肪的缘故。那时除偶尔休息进城外，夏令服装对我们几乎全无用处，就因为它上工时显得太厚，收工后又显得太薄。

蚊子到底气数有限，一过中秋也便威风扫地了。苍蝇可真是福寿绵长，终年繁衍，生生不息。而且越到天冷，越是纷纷来聚，密匝匝占领了手巾绳和灯头吊线之后，便满天星似地静坐在天花板上，挨挨挤挤。倘有谁不慎拽猛了手巾，便“嗡—”地一声，霎时搅出一片混沌世界，至少七八分钟之后，才能大致恢复原来秩序。但若干散兵游勇，从此也便不断往来袭扰。因冬蝇生机萎缩，不似夏蝇灵敏矫健，挥之不去，所以恼人更甚。

“简直欺人太甚!”善于自制的罗克有时也不免会焦躁起来。于是我们一齐抡起破衣服，同它们混战一场。结果当然总是一败涂地，自己更增气恼。退而静思，终于心悦诚服，不敢再贸然寻衅了。不但不敢，而且将毛巾永远转入脸盆，以示和睦相处之意。

罗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夜复一夜地读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哲学笔记》、《反杜林论》、《世界哲学原著选读》丛书等大量马列经典和哲学书籍，还写出了发表在《北京晚报》、《大众电影》上的小说、评论和许多未发表的诗词、散文。这时他还不过二十岁。

五 “前村无路凭君踏”

越是多读书，就越是不能满足。自学到1962年夏天，看到高校招生的消息和简章时，我们又萌动了升学的欲望。报名要经大队和公社两级批准，不会太顺利是可以预料的。罗克有二进国子监的光荣资格，自然就又成了申请谈判中的首席代表。

大队接待我们的是莫副队长，三十来岁，来前听人说他也是高中毕业生，我们便谬托知己，特意找了他。不料竟适得其反。

“你们已经考过了嘛！应该安心了嘛!”莫副队长横坐在椅子上，左胳膊肘搭着椅背，右手的小拇指挖着多毛的长鼻孔说。

“我们不是瞧不起农村，是希望能再多学点儿东西。按简章规定，我们不是也可以报考吗?”

“那好吧。你们一定要考的话，先告诉你们：如果考不上，我们这儿也不要了。”莫副队长淡然地说，眼睛斜瞟着窗外，办公桌上的皮鞋底正对着我们，像个大巴掌一摇一摆。

“我们努力争取。考不上还在农村干。”罗克尽量平心静气地说。

“你们知道考不上就别去嘛！既然去就一定有把握嘛！”莫副队长的指尖在椅背上有节奏地轻轻地敲着，说话间左脚又蹬到了椅子后边的文件柜拉手上。

我们几个互相看了一眼。终于还是罗克克制地说：“听说你也是高中毕业生。希望你能理解我们……”

“噢？”莫队副眼白一翻，手脚同时放下，说：“你们消息倒挺灵啊！谁告诉你们的？！”

……

出来的路上，我们纷纷抱怨晦气。

“想不到，单单找上这么个丧门神！”

“同性相斥。他要不是高中生也许还好点儿。”

“算了吧。我早知道考不成。”

“没关系，直接上公社。”只有罗克不灰心。

公社有位袁主任，是个老干部，对我们果然很支持。于是罗克、大绩和我一起报考了师大中文系，另一个学生报考了清华大学。

经过这一番跌宕，升学愿望反而更强烈起来。随着紧张的复习，信心也在逐日增长。是啊，简章明确允许，公社又支持，只要能考好，怎见得还取不上呢？再说，陈毅同志去年刚讲过那些话……

……出了考场，我们互相对题，信心更增。

“我那篇作文写得挺痛快。”罗克显得轻松愉快，问道：

“你做的哪个题目？”

“《说不怕鬼》。”

“我一猜你就得选这个题！刚才听说有人把‘本国语文’四个字当成了作文题，太紧张了！……”

我们高高兴兴蹬上自行车，离开了师大考场。路上大家商定，从现在起把别的书都先放放，专看文学。我们觉得，尽可能多做一些准备仿佛确是有必要的了。上次是根本没有考不上的思想准备，结果真没考上，这次有了双重准备，也许偏就出现相反的结果？至少……

一个多月很快过去了。这期间我们履行了议定计划，一齐把自学时间全部用在了文学上，一旦入学，我们要学得更快更好。8 月 24 日下午，我们如期接到了通知，立即聚到了一块儿。一见面四个人就急着互问结果：

“你怎么样？是第一志愿还是第末志愿？”罗克挺轻松地问我。

“哪儿也没要。你呢？”我预感到我们要分手了，但也尽量轻松地回答。

“我也没有。你到底考上哪了？别诚心逗了！”

“你肯定考上了！到底是哪儿？”……

四个人都认定别人是故意说着玩儿，又都坚持说自己没考上。于是互看通知，顿时都沉默了……

×××同学：

今年的高等学校招生是根据择优录取的原则录取的。你未被录取。特此通知。

……

一式四份通知书，再次验明了我们的“择劣”对象身份。

这结果是如此明显，人们无须多问就从我们的脸色、行止上看出来了。但莫副队长还是宽容的，并没有履行除名的诺言，我们都获准留下来了。至于处境，当然又大不同前。“两回都没考上，还有什么可说的？不光家里有问题，自己功课也不怎么的！”“嘿，早要死了这份心，哪至于现这二回眼？”……

无话可说，只有格外努力干活。然而临时接替罗克记工的人再也没把记工本移交给他，就那样“替”了下去……

万没想到，事后不久竟听一个同支部书记很接近的青年说，我们几人本来的确都考上了，但调档时大队硬是卡住不放，理由还是……

原来如此！

这消息对我们的打击比那张通知本身还大。罗克听了，沉默了好一会，才说出一句话：

“真没想到还能有这样的事。看来咱们都太幼稚了……”

时隔不久，传来蒋帮要窜犯大陆的消息，我们这里也作了征兵动员。动员会一散，我们立即都报了名。

是的，到前线去！大学不能要我们，这里也不愿要我们，可我们，还年轻，心并没冷，更不黑，它是红的！也是热的！……

我们谁也没被叫去检查身体，也再没听说过有关征兵的一个字，像根本不曾有过这几个青年报名的事情。

想一想，也还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菜园里再也听不到罗克咯咯地笑了。

“伊拉克！这儿跑水啦！”

他默默地扶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从龙沟边站起来，扛上

铁锹走过去，一声不响地把水口子堵上……

夜空如一片深潭，点点寒星在神秘地眨眼，月亮早已落下去了。四野静极，只有路边高大的白杨树在夜风中沙沙作响……

我们在宿舍后边的林荫路上已经默默徘徊了许久。

“实在不行，咱们就去钻象棋。也许只有这一样是不用看家庭出身的。”

我心头一紧。“实在不行”这样的话，我还是第一次从罗克口中听到。我不知怎样答他，只有沉默，沉默……

人的自制能力究竟是有限度的，何况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一天打歇儿时候，罗克的反常举止使我受到了更大的震动。

有个叫张小四的青年农工，平时常爱跟罗克说说闹闹，拿他干活时出丑的故事当笑话，当众抖落着玩儿。罗克也总是嘿嘿一乐，很随和地同他玩笑。这天不知张小四说了句什么，罗克竟登时涨红了脸，一言未发就扑了上去，两人在地上滚了起来。罗克那清瘦的身板好像突然增长了无穷的力气，霎时简直不顾一切了。围观的人开始还在一边打气助威，以为两人在闹着玩儿，终于还是小四发觉不对头，赶忙松了手。

“真急啦?!”小四爬起来，拍拍满身的土，瞪着惊诧的大眼睛看着罗克，喘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罗克依然红着脸，但谁也不看，微微喘息着，一声不响地坐到一边去了。好一会，他的神色才渐渐平静下去，眼里仿佛露出一点愧疚和自责。张小四在一边愣怔怔望着他，嘴里还反复念叨着这同一句话：

“怎么了你，真急啦？无缘无故的……”

是啊。他无法明白。他一向无忧无虑，因为他一身清白；

虽然罗克本也一样……

同罗克交往几年，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冲动得失去了自制。此后很长时间，他的情绪才渐渐复原。但路上碰到上下工的熟人，也只是简单招呼一下，很少再像过去那样说说笑笑了。

出身，你这无所不在的幽灵！

六 “路也迢迢夜也长”

千顷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长。

这是罗克写于这年冬天的一首诗。这里面有他的感愤和优伤，更有他的决心和抱负。重复的打击接连落在旧伤上，总是倍觉沉重。他一时停步，沉默了。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却进入了更艰苦、更深入的寻求和探索。

巨石抖，
欲把乾坤搂。
千古奇峰人共有！
——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
山下渺渺茫茫。

来路崎岖征路长。
哪堪回首眺望！

这首词是我们同登香山归来，罗克写下的。这些诗词都作于我们共同练习的时候。当时罗克、大绩和我都读了些古典诗词，有时就一起习作几首。我那时写的多是些摹拟“山水田园”派的东西，后来回想，唯有汗颜。大绩的诗常有清新之句，但往往又失之感伤。罗克的则大都很有气魄，激情洋溢，前引两首便是代表。当然也还有情调与此迥异的句子，如“曲堤枫影小桥孤，那只白鹭游过无？”、“留得几尾鱼作伴，绿草茵茵卧读书。”之类轻灵秀隽的抒情小品。但这在总数中占的比例很有限。后来罗克离开公社时，曾提议三人各选十几首，合为一集，由我用小楷抄录，每人一册留作纪念。遂逐一抄成装订，取名《凝秀》，上面提到的都包括在内。当然，它们没能熬过“文化大革命”。

1962年冬至1963年初春间，市文联的杲向真、邱仲侠同志曾来公社联系扶植业余文学青年，罗克很受她们注意。这对他的写作情绪是个不小的鼓励。

一次我休息回来，罗克对我说：“咱们办张小报吧。形式多样一点儿，每人写篇东西，除了文联，还可以给同学朋友们看看。”

“我没兴趣，也没什么可写的。”

“已经商量好了，有你一篇戏曲笔谈。”他说着看看大绩，诡秘地一笑。

“?! ……”我顿时一愣，猛然明白了——他们偷看了我枕边那个红皮本子！

“怎么样？”罗克得胜地笑了，又像以前一样。

于是我只得挤了一篇谈京剧音乐的东西，把关于装饰音变化与人物情感关系的一些随感发挥了一番。他看完第一句话就问：

“这是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抄别人的，我没兴趣。”

他满意了。二话不说，提笔就刻。

独立思考是他的一贯性格。有无独到见解，则是他衡量自己和别人作品的第一条标准。这次他自己写了一篇散文《涿县纪行》。记得其中写到的好多东西是当时文艺作品极少接触或不曾接触的（例如“粮票”，就是那时文艺创作中必须回避的东西，虽然倒也不曾见有什么成文法规），但具体字句已难追记了。

转眼冬尽春来，园艺队体制变更，扩编为一个直属公社领导的新单位，而莫副队长竟升迁至此，成了我们的顶头上司。情知不妙，我们只有尽量回避。孰料种种特别关注还是时时降临，终于在一次愚蠢的顶撞之后，我立竿见影地成了“援送”新建汽车队的两个“力工”之一，就此离开了菜园。这时老范和老冯早已回原单位继续接受“监督改造”，读书派只剩罗克一人留守，处境自然更艰难了。坚持了两个来月，他终于也搬出来，到附近村里租住了一间农家小房。后来那家搬走了一户房客，他立即订下房子来找我，于是我们又住到了一起。

这是个比较破败的农家小院。三间北房，东西各两间厢房，都是坯墙泥顶、纸窗户。西房两间隔开，北间稍大些，我和同队的小许合住（租金 5 元，对我们的工资总额说来实在不是个小数目，将其一分为二，就不大感到切肤之痛了）；南间住着罗克。

他这间泥屋更狭小，所以也更显得低矮。四壁是黄褐色的泥墙，一铺后山炕占去屋内近一半面积，中上身高的人伸手可及报纸糊就的顶棚。前窗下支着一张岌岌可危的“桌子”——其实就是一个画着雨伞、写着“请勿倒置，谨防潮湿”字样的包装箱盖，钉上四根细脚伶仃的木棍儿，摇摇晃晃，不堪一推，但好在两面倚墙，一面靠人，倒也没处可倒。桌角摆着一摞书，旁边是那盏土台灯，灯罩还是原来的。菜园许多青年人的家就在这村里，时而有人来找罗克聊几句，或托他进城时代办点杂事，但都不久留，因为案头墙上贴着一张逐客令式的“陋室铭”——

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

我觉得这未免使人难堪。他有些无奈地说，不论“鸿儒谈笑”、“白丁往来”，耗费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无暇多顾了。

是啊，不为换得可供读书思考的时间，他又何必从本来低得可怜的生活费用中再挤出一份房租呢？这时期他除了马列经典和哲学书籍外，又加修了中学时期学过的俄语。他的外语禀赋比较一般，在菜园时我们常就路上所见或谈天中偶然提及的东西互相考问英、俄语的表述方法，发现他在这方面往往反应较慢。然而此后不久，他就达到了能为科技情报所从优录用的水平，足见他下的是怎样实在的功夫。

无风的冬夜，郊原上的农家小院凄清、宁静，好像连窗外飘舞的雪花降落在地面和屋顶上的声音都能听见。嘿，这可真是读书的极境——如果能再添上一个小火炉的话。

一个奇寒的深夜，大雪纷纷，时而轻扣着屋门和窗户。一纸之隔的屋内，除了一个灯泡、两个活人之外，没有零度以

上的东西。脸盆里的残水早结成了冰碴。我紧裹着棉外衣坐在纸窗前，觉得阵阵寒气不断从脚下，从窗外，从头顶上袭来，正在把我吞没。我终于撂下书站起来，猛力搓手跺脚，顿觉各部关节咯吱咯吱地，似乎都胶住了。忽然，屋门一开，罗克带着一股风进来了，手里举着一本书，闪披着棉衣，那神情仿佛突然发现了什么寻觅已久的珍贵东西。

“写得实在太好了！这本书你一定也得看看！”他情不自已地赞叹着，随即指着翻开的一处划了红线的地方说：“你看这几句话说得多好：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

他的情绪立即感染了我，我忙接过书，回看封面。土黄色书皮上有一幅肖像，下面印着：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 梭

“太彻底了。实在太彻底了！”罗克独自在一旁踱步赞叹着，他右手习惯地扶着近视镜框，左手插腰，闪披的棉衣在身后鼓起来；仿佛勇士出征时飘在身后的斗篷。他那沉思的眼睛、豪情满怀的形象，同这间狭小的土屋，同周围的寂静和袭人的寒气，形成了极强烈的对比，至今还历历在目。

后来这本书就留在我手里。“文革”中曾同《马恩全集》、《狄德罗哲学著作选集》等一起被抄去，现在终又回归，成了罗克留在我手中唯一的一件遗物。书里有他留下的不少旁批，其中有热烈的赞语，如“智慧！远见！伟大！”，也有断然的驳斥，如“矛盾！”、“不通！”等。从这也能看出，或褒或贬，他都不是盲目出之，而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

1964年初，他离职回城了。行前他在这间土屋墙上留下一首诗：

物去人飞陋室留，
斯人知唱不知愁。
欲问斯人今何去，
远到天边撼地球。

这真是他自我勾勒的一幅绝妙速写，虽然用了夸张的笔触。是的，他有深切的爱、深切的恨，却没有哀愁。对真理的坚定探索使他日益深信不疑：这里虽并不需要他唱，整个时代却终会需要他的声音！

七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罗克思想敏锐过人，笔头也十分迅速。1964年秋，他根据梁斌同志的小说《播火记》改编过一个京剧剧本《绿林行》，后来给中国京剧院看过，说剧本改得不错，但因原作涉及什么“路线问题”，没能采用。这剧本除我代写了一场外，写其余各场他只用了不到三周的业余时间。

然而在他本无兴趣的某些知识领域中，他却化费过旷日持久的笨功夫。

1965年初前后，我曾接到他一封怪信，信的“附页”反而比正文长得多，开列着一长串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学习题，要我代答。我很惊异，不明白当年我对他的数学诱惑怎么会在几年之后突然生了效。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满意的，便立即做

出答案寄给了他。

不久我去找他，才发现他确是在钻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讲义》，但并不是因为突然对数学本身发生了兴趣，而是为了读懂黑格尔和康德！

“学完这几百页的数学讲义，至少得用读几千页哲学书的时间！”

“那也没办法。”罗克微微摇摇头，对自己挺不满意似的说：“看黑格尔有时就很费劲，到康德那儿有些东西就更不懂了。数学看来真不可不学。”

我看着他，心里很感动。想不到为了打造一把钥匙，他竟肯花费这样巨大的代价！他的探索愈加刻苦了。这是否说明目标在他心目中已更加清晰了呢？

1965年初冬，姚文元的“号角”文章发表了。罗克来信让我去找他。进了他那间自己搭造并戏称为“冰窖”的小屋，才坐下他就问：“姚文元那篇东西你看了没有？”

“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很牵强。清官比赃官还坏，简直不通。”

“就是啊！”他看来早已想了很多，见我有同感，情绪立即高起来，“还硬把‘退田’跟‘单干’拉到一块儿，更没道理了！”

我们议论了一会之后，他决然地说：“我想写篇东西，驳驳他！”

“可以写！写出来让我看看！”

这时我们都只是非常反感于姚文元的文章论点牵强荒谬，完全没料到这台戏的真正高潮何在。那一阵学术味挺浓的开场锣鼓把无数天真善良的人们蒙蔽了。

1966年3月，我动手术住院期间，罗克带了载有他的驳姚文章的《文汇报》来看我。《和机械唯物论斗争的时候到了！》这题目，当时就使我为之一振。文中“海瑞虽不是普济众生的菩萨，也无愧于守护一方的护法”等直刺论敌的偶句，至今还恍若眼前。虽因背景不明，这篇文章不可能击中姚文的真正要害，但在当时，仍可说是锋芒最利的一篇驳姚文章。一方是日益膨胀、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另一方是绝无披挂、微不足道的政治贱民。这是何等实力悬殊的较量！这位23岁的“黄口孺子”身上，有着怎样卓绝的胆略！

阴谋背后的迫害，总是在它已来之后，才让人们明白它原是必来的。

1966年夏秋间，罗克在一封信上告诉我：“……我已经被学校解聘了。校方说了如是云云的一些原因。真正的原因自然还是我那篇驳姚的文字。……最近去了几个地方，先到农村去转了转，后来又到工厂当了徒工，……备尝了人格受辱的滋味……”这种平静语气使我更感到了他对迫害者的愤慨和蔑视。但使我更受震动的是信的末尾：他要我给他写一张条幅，准备张挂在他的“冰窖”的墙上——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我深深感到，他在这时候以先烈李大钊的对联自励，决不是偶然的。相知数年，我自认为对他的信念和抱负的坚定深有了解，却从没想他竟有如此的慷慨勇毅！

这张条幅我还没来得及写给他，那些自己早觉幼稚可羞的旧时文字便突然焕发出多种可怕的深意来，于是率先进入

了隔离室……

一颗史无前例的政治氢弹在中国上空爆炸了。狂飙，烈火，席卷了城市，席卷了农村，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散播着余毒难尽的放射性污染……

“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关系民族命运的非常时刻到来了。罗克胸中蓄积已久的巨大潜能终于喷吐着火光迸射了出来！他履行了自己的誓言，在同中华民族最凶恶敌人的斗争中毅然肩起了时代赋予他的那一份重任。他那“血剑”、“油薪”般的战斗锋芒和坚不可摧的意志，使权倾一时的林彪、“四人帮”们为之震栗。他们举起了屠刀，他倒下了……

不，他们倒下了！他又站起来，笑得那么好！

他早已知道，他会笑在最后的！

……

需要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民族；造就英雄的时代往往也就是不容英雄存在的时代。一个可以大有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听不到他自己的笑声了。我，一个碌碌无为的幸存者，在写着忆念他的零散文章……

为不再重复这不幸的颠倒，愿人们记住他，记住他的精神，记住他从中走过的时代……

1980 年 6 月初稿
1981 年 2 月改定
于北影编导室

牟志京

《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

一 引 言

社会革命的实质是权力的再分配。1966年至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以其复杂性令人困惑不得全解，但在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上脉络分明。“文革”的复杂性在于其分配根据的多维性，无产阶级革命与走资派、保皇派与造反派，天派、地派、四三派、四四派，仅是几个权力割据的例子，“文革”研究的专家众说不一。但围绕家庭出身的一场风波，终局虽至今未有，是非却是早已鲜明的。

我在“文革”开始时是高中的学生，对政治的无知及对真理的幼稚的向往，使我从“文革”一开始就卷入了这种家庭出身的风波。一系列的巧合又导致《中学文革报》的诞生，出版了遇罗克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名义撰写的包括《出身论》在内的一系列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不小的一场风波。1980年起，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记述在中外报刊文献上虽时有所见，但多出于局外之手，传讹疏漏其中难免。今撰此短文，供有兴趣者参考。

二 背 景

出身与权力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前，即六十年代的前期便已形成。黑五类出身的学生上大学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是明显的一例。在入党、入团、晋升各方面，对出身的正反两向的歧视，亦是遍地抬手可拾。高干子弟在入学问题上开后门，对地主子弟在农村的人身迫害是出身问题的两个极端。

红卫兵作为“文化革命”的马前卒，从一出世就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并非偶然，那是对“文化革命”前的所谓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一个逻辑的发展与推广。加入第一代红卫兵组织的唯一资格是家庭出身。在红卫兵组织中地位最高的根据是其老子的地位。这确实是在古今中外的组织中颇为罕见的。

对联的荒谬在“文革”的疯狂衬托之下是隐形的，可悲的是，较之出身红的，许多出身黑的人对对联的拥戴似乎更为激烈。我本人就曾被一个出身黑五类的人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指为混蛋，其根据在于我不承认根据他的出身而断定他是混蛋。

出于无知或勇气，我在红八月前后在清华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贴下了反对对联的大字报。同天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发言时，遭一群红卫兵对我捶打唾弃，心中颇感滑稽。不久，在班上，又与同学辩论，被红卫兵和几个黑出身的人骂个狗血喷头。在学校的处境日渐险恶，终于遭到由一位红卫兵打手所率之众的殴打。借串联之机，到外地一去两月有

余，拜访了江南、西南、西北多处革命圣地，一路上天天烛下学毛选，虔诚之极，自愿下乡劳动，在从西安步行到延安之后，带着一身虱子回到北京。

不想，此时京城风向已转，第一代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有周恩来、江青出席的十二月十六日的工人体育场大会，四中学生许健康与王祖锷的发言分别宣判了反动对联的死刑和解散西城纠察队，吊销了老红卫兵行使党卫军权力的牌照，并造成了一个导致造反派或第二代红卫兵出现的真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红卫兵所推动的政治运动打倒了走资派，使老红卫兵中核心人物变成了走资派的子女。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变成了狗崽子，但是老红卫兵们毫无困难地断然拒绝了这一逻辑的必然性，并形成了以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为代表的一股非同小可的，与造反派对立的威悍力量，活跃于 1966 年底到 1967 年初。

三　《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的诞生

我在 1966 年 12 月底，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上见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感油然而生。我在对联的辩论中表现的是无私所生的勇气，天真所致的义愤，仅此而已。我所持有的理论武器和血统论一样地原始与空洞。《出身论》的作者却把出身升高到一个理论问题去研究，逻辑之严密，正气之凛然，文风之清新，无一不引人醒目。我当即将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抄下，找到六十五中的遇罗文。遇罗文是遇罗克的长弟，一副颀长的身材，带着几分书生气，相谈甚为投机。第二天他到四中回访，讲到扩

大宣传途径。我便利用自己当时在四中由反对对联的历史所形成的地位，向校长总务室借贷500元。通过一位小学同学朱大年，到三司宣传部开了一张三司的介绍信，从清华大学返家的途中，闯进了人民解放军1201印刷厂，找到业务科的金科长，出示介绍信后，印刷业务便不成问题了。纸张在那个大字报和宣传品铺天盖地的年头是十分紧张的。在六部口纸张批发部购不到，但经他们的介绍向农工民主党中央买到他们存的二令上好的道林纸。价格是贵了一些，付掉300元。所有这些事情在短短一二个月内办成，罗文不禁喜出望外。由他联系家庭出身问题小组，送来了一份新的《出身论》手稿，准备以传单形式出版。

我在仔细拜读了新稿之后，感到有诸多差强人意的地方，我特别反感的是，文章的调子中，在一些地方渗透出一股怨气。在另一些地方下笔刻薄，两者的结合，使作者失掉了客观理论的身份，让人情不自禁猜想他本人在出身上的恩怨利害。

我虽然对小组仍是十分崇拜，但却没有妨碍我对《出身论》的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的修改。在理论上我的新意几乎没有，却确实改变了文章的色彩。对于我来说，这一改装对我的重要性，来源于我对自己卷入这场辩论的一个简便或许是片面的认识——我在为一个自己没有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奋斗。

不料罗文在见到遭我涂改的《出身论》之后，一改我对他温文尔雅的印象，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却又换了一个嘴脸，回到四中，并向我道歉，说小组的人很欣赏我作的改动，《出身论》可按我的修改稿付印。

1201厂的金科长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不久，排版完毕，

传单大约三页，金科长询问如何处理所空的一页。为了填补一页的空白，办报纸的念头才忽然产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请了我四中的语文老师毛宪文做技术咨询（他出于对政治的谨慎，拒不参加组织），请朱大年的三中好友拼凑了毛体的版头，并由我起了一个朴素的报名，打出了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旗子。又由四中同班同学李宝臣写了一篇杂文，并选用了师大女附中陶洛诵、汪静姗写的一些活动消息、朱大年为首的三中"刺刀见红"的一篇文章，我连夜组排版、选字，并撰写了《出身论》的编者按和司令部的一个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文章。天亮之时，我把在四中小院的办公室鼾声大作的罗文唤醒，只身到1201厂交了稿，又经过校订、签字，《中学文革报》在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了。

四　《出身论》发表之后

遇罗克的大作，在《中学文革报》上以《出身论》为始点而非终点，在报纸的第二期到第六期上，分别发表了：

第二期：二月二日	《谈"纯"》
第三期：二月十日	《"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第四期：二月二十一日	《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第五期：三月六日	《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
第六期：四月一日	《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

《中学文革报》在创刊的第二天，就在社会上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其在四中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来访者不断，大

多数来访者抱着一个简单的目的即索购报纸。但也有相当多的个人以他们的切身经历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要反对《出身论》。

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曾在红卫兵运动早期的广为流传的讲话上引用对联）率百余之众砸《中学文革报》。我们的联络处的外墙就曾被糊满了侮辱咒骂《出身论》与《文革报》的大字报。

《中学文革报》的出版量每一期在三万到六万之间，与当时受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相比，印数微不足道。虽只在北京发行，但从全国收到的读者来信迅速地达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我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自己去邮局取邮袋，平均每天的来信就有几千封。处理读者来信变成一项庞大的任务。大多数的来信只是附款邮购，但来信的一个不小的比例却向我们倾诉了他们的遭遇和心声。其惨烈与真诚，往往使我们潸然泪下。不少农村地区的来信，地富子弟的遭遇令人毛骨悚然。

一个贵阳市的青年来信讲到，他在市中心闹市见到人们簇拥在一份长大字报之前，好奇之余，从头读起（那是不知哪位热心人抄写的全文《出身论》，洋洋约一万五千字的文章，要多少张纸头和功夫）。但谁想读到一小部分，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嚎啕大哭起来。为避免尴尬，便跑回住宅，痛哭之余又想起回去读，便勉强抑制眼泪，赶回现场。不想此回才读几行，便又控制不住……这位读者告诉我们，他就这样不知痛哭着跑回住宅多少回才终于读完了《出身论》。

我们的读者来信的另一个特点是，除西藏、台湾两省之外，颇为均匀地分布于全国各省。北京的来信，在数量和质量上，并无突出。

在《中学文革报》出版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各类小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多数报纸的销售滞缓，但《中学文革报》一直面临着相反的问题。我们在每一期出版之后，仅仅在市场上销出半数，另外半数留下以飨外地邮购和来联络处来访的人。

我因其他业务关系，很少参加卖报。但有一次随同去卖报，三轮车被围得层层不穷，无数的手伸过来，我的手向前一伸，便被塞满大把的钞票。拿起报纸一送，便不知被谁扯去，根本说不上找钱。三轮车一空，双手哆嗦不停，方知卖报之艰难。遇罗勉——罗克的小弟弟，向我讲到他卖报时，人们排着队追他的经历。

当时相当多的小报也卷入了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辩论。其中包括《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杂志。除《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和《只把春来报》三家外，其余都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持敌对态度。那三家友好报纸，分别由我的小学同学朱大年、刘姜仁和四中同班同学主持。我亦是头两家的客串编辑。李冬民的《兵团战报》以首都兵团的名义也登出了“取缔《中学文革报》”的“通令”。

《中学文革报》创刊之始，两名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神秘人物便定期造访。在第三期前后，他们对我传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我的指示，即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

《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对社会的影响在当时已不可忽略。报纸活动期间，中央首长时常会晤第二代红卫兵，并

有会晤记录。陈伯达就曾被直接问到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看法。他在一次会晤上，说没看过，人们递上一份《中学文革报》，他当时读得入了神，直到别人提醒他，请他回去再读。另一次会晤时，人们再问到他的看法时，他圆滑地回答："太长了，没时间看。"

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曾向我索取全套的《中学文革报》，讲他受中央文革之托，要为毛泽东准备八份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我们的报纸应在之列。我本人也曾混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与包括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会晤，亲自递交了一整套《中学文革报》。

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在 1967 年 4 月 13 日的一次讲话中，点名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中学文革报》的出版到此画下了句号。除第一期到第六期正刊外，并影印了第一期一万五千份，出了特刊约六万份，加上第一期《出身论》的铅印版约十万份。

五 遇罗克其人

我在第一期出版时，并不知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组成，之后到罗文家造访，与罗克首次见面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克与罗文几无相像，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副圈圈重重的眼镜，扇风耳、严重驼背，可谓其貌不扬。但他的魅力在动态之中。一张口，声音宏亮，性格爽朗，风趣横生，就连眼睛也能从厚厚的镜片后射出犀利的光芒。

罗文把我介绍给他之后，他半开玩笑地说"久闻大名如

雷贯耳”，爽朗地大笑起来。之后的交谈，顿时使我感到他并非一般人物，并猜疑他与小组的关系。

第二期出版后，我和他的交往渐深，他向我说明了他即是《出身论》作者的真相。基于当时的情势，他请我绝对保密。所以我们报纸的多数成员，在办报期间从未正式地被告知小组的组成。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一位突破时代的巨匠，“文革”时代对中国写作语言所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在政论文章中晰晰可辨。罗克的文章却在文风中出污泥而不染，不落毛风的语言，自成一统。读过他的文章的人，也不能不看到其文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词汇丰富，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罗克写作速度亦是惊人，我们当时的出版困难重重，事先不知下一期出版的日期。罗克讲，只要头一天告诉他，他便能第二天交稿。在报纸的各期发表的所有长文便都是这样一夜交稿的。

罗克并不是一个书痴，他的小脑十分敏捷。和我玩一种拍手的游戏，总能把我的手打得叶啪乱响。下象棋能同时暗对两局。我曾试着捉弄他，声称他所说的棋子不在其位，他沉吟片刻，便坚定地声称我所说不实。

我与他的交往日深，他自己住在正房与院墙之间搭成的一个窄窄的小屋中，北京的严冬之日亦无取暖，号称冰窖。我与他在这冰窖之中对坐，谈至天近拂晓。他的兴趣广泛，哲学、历史和文学是他与我交谈的主要内容，而不是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

罗克的政治嗅觉是敏锐的，当我提到自己在1966年5月写过批判姚文元的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时，他说到他是

不会在那时发表那样的文章的。他向我出示了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指出交稿日期是在1966年初，他自己则在1966年3月就已看出此场辩论的政治背景，因而从学术上去探讨只能招祸至身。

罗克是一个很机敏的人。1967年夏天在一同去东北的火车上，他曾被一个面露凶气的人问到："你认识我吗?"在不知由来的情况下，他给了一个巧妙而最有余地的回答："我看你面熟。"

蒯大富曾经对我们的报纸人员讲坏话，罗克一再托付我向蒯下书在公开场所辩论，可惜蒯从未应战。罗克对自己的口才是自信的。

罗克是在不断思索的。他曾与我和报纸其他成员同游北戴河、秦皇岛和沈阳三地，约我与他各写游记一篇。在沈阳街头，看到沈大量日伪时期的建筑，不快地问我，为什么解放之后多年的建筑不能与日本在短期内在其领土之外留下的痕迹相比。

在报纸之后，罗克开始了一篇新作——《工资论》，他向我列举了论资排辈的贻害，并以此为起点，建设性提出了工资政策的方案，可惜此文当时已无处可载，被捕之后不知下落。他更进一步地观察了当时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病，并设想改革的方向。郝汉是罗文的同学、好友，也是报社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成员，曾讲过罗克是"东方的曙光、宫殿的一角"，我想中国的十年之后的体制改革如能有罗克的参与，将不知获益多少。

罗克对毛泽东并非一笔否定的。罗克自己是一个造诣颇高的古体诗人，对毛泽东的诗词造诣由衷钦佩。特别喜欢的是《蝶恋花》一词。他在临被捕之前，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

长信，嘱托我在将来形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此信由我层层更改匿藏地点，人赴外地插队多年之后，竟不知下落，实在有愧罗克在天之灵。

六 《中学文革报》成员及其命运

创刊时，我们只有三人，罗文、我和我的同学王建复，四中语文老师毛宪文担任杂志编辑，他向我传授的编辑知识使我受益匪浅。《中学文革报》的各期版面选字大方、美观，毛老师的作用不可抹煞。王建复是一个在红八月中大喊过对联的人，串联时他与我同行，跑遍大江南北。回京后，我在四中成了在困难时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英雄，建复便又成了我的一个忠实的追随者。罗文初次造访，建复在场，便也成了报纸的元老成员。

陆续加入我们报纸的还有罗克的多年好友、轻工业学院的郝汉（当时化名马列），气象学校的两位女学生李金环和王亚琴，二十五中的遇罗勉，十三中的帖汉、闫世钧，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五十三中的韩基山，无线电学院的顾雷，二十五中的王嘉材，还有一位陈××，女五中的张×、王××，女十二中的张君若和张富英。

郝汉高个子，一张非常长、有喜剧效果的脸，取名马列，因为别人不可予以打倒。在开会时以年长智深的姿态时常对我的决策提出几分嘲讽。

李金环、王亚琴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工作艰苦、繁重，却毫无抱怨。

帖汉从名字到相貌都不像一个汉人，然而他矢口否认他

的外族血统，虽是初中的学生，他却显示了特有的稳重和才能，他是报社成员里唯一与我分担过编辑工作的人。

闫世钧出身革干，为人憨厚，为报纸的各项事务跑前跑后，总是一副笑脸。

韩基山社交广泛，带有几分江湖气。他加入后，我一到会场，他每每大喊“司令到”。在被动危急的时刻，不无认真地对我讲，“司令先行，有我护后”，在卖报、联络和其他事务中，立过汗马功劳。

四中的赵京兴、刘力前因一篇我们选用的文章，深受罗克的赏识，力主邀请加入，不想在第五期加入，第六期就退出，给报纸带来不小的损失。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首都兵团曾派了一个间谍打入我们报纸。此人我第一次见面就起了疑心，但罗文却极力推荐。之后，不仅我，其他的报纸成员也本能地感觉此人可疑，终于搞清其身份，并屡次向他宣布假情报，也博得大家一笑。

十年后的1978年，我召集大家重聚时，才知报社大多数非中学生的成员遭到了校方的监禁，这包括郝汉、李金环和王亚琴。罗文虽是中学生，亦未幸免。他后来与报社的另一成员张富英结婚，生活困难，卖掉了出生的孩子。

报社的成员中另有两位后来成婚，即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和四中的赵京兴，演出了一场众人难忘的罗曼史，在此不谈。

我的两个小学同学，男三中的朱大年与京工附中的刘姜仁也因为他们的报纸（《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与我们的关系，受到牵连，至少刘姜仁曾被长期在校监禁。

第三期出版时《红旗》杂志社的记者向我传达关锋的话后，我曾陷入激烈的思想矛盾，几天不在报社露面。再度召

集会议时，我向报纸所有的成员传达了关锋的话，指出前途的危险，并请求对牺牲无准备的成员离开报社。我不能忘记的是没有一个人畏缩。十三年后的1980年，在遇罗克平反的前夕，我再度召集部分成员相聚时，却从不少人嘴里听到了对当时的冒失的烦恼。我那时感到惘然了。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忘记在北京自来水公司的一间办公室，《中学文革报》的成员当时显示的勇气和之后他们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七 遇罗克之冤案

遇罗克在1967年底被捕之后，曾被判刑15年，罗克拒在判刑书上签字，但不想忽然改判为死刑。

我记得在其死刑的判决书里，其死刑的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出身论》只字未提。我不禁对当局的虚弱懦和无耻的程度感到吃惊和愤怒。

罗克如何涉嫌暗杀的呢？

1967年夏，东北武斗正盛之际，《中学文革报》的成员大部一同北上观一究竟。一路风险重重，不少人几乎丧掉性命。到长春时，在车站就发武器，站台上、草席堆下，全是武斗中刚死的人。几天逗留中，饱观炮火纷飞。暂别长春，我嘱大家将武器退还，以免给报纸落下话柄。

一年后公安局在对我的审查中，最开始兴趣集中于罗克“反动”言论，但忽然转向为罗文从东北带回手榴弹的下落。我对此确实一无所知，他们也就失去了对我的兴趣，数年后才得知罗文并没有退还长春领到的手榴弹，反而带回了北京。

罗文是一个喜欢化学的人。他曾对我说，他搞政治纯属

误会，也曾恶作剧地在我家撒下了几滴威力极大的催泪剂。在长春之行之后，他也给报纸的成员表演过火箭发射，其中的火药想必是从手榴弹中拆下来的。

手榴弹私下带回也就罢了，但罗文却在风声紧时，联络了几个靠不住的人在香山埋藏。公安局一恐吓，有人就将这一过程供出了。公安局曾试图让我证实罗克是这一切的幕后人，我当时不理解，直到见了罗克的判决书，才知公安局的当时的企图。

罗克、罗锦、罗文、罗勉兄妹四人个个聪敏过人，但在某些事情上，愚钝异常。如：罗克当年托罗锦藏日记，罗锦把日记藏于中山公园公厕；罗克、罗文推荐入报的人无一不成反面人物；后来，罗文从东北携回手榴弹；还有罗文、罗克拒绝销毁读者来信等等，就是一些明显的例子。

反过来说，公安局当时把罗文的手榴弹归结为罗克的暗杀阴谋并非出于愚蠢的推理，而是出于懦弱的陷害。我对罗文的痴呆应有包涵。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除关锋、陈伯达、戚本禹外，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曾作了一篇关于出身的长篇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有内部消息讲，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这虽未能从其他途径再经证实，却是合乎逻辑，并能解释刑定十五年到死刑的突变的。

十三年后的夏天，为罗克平反的时机到来。1980 年 9 月 21 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一文之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或转载关于遇罗克的文章。可悲的是，《光明日报》文章的按语，再次混淆出身与成份的概念，显示出对遇罗克的《出身论》的基本理论都缺乏了解。

与张志新的平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新闻界的报道之

外，官方未组织任何追悼会，罗克在平反之后仍只是一个民间的英雄而已。

八　结语和尾声

《中学文革报》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旋风风眼里存活的一个奇迹。如果说一个没有官方支持或“群众组织”为背景的报纸是独立的，那么，《中学文革报》是据我所知的中国20世纪后半叶第一家独立报纸，和其他“文革”中的小报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她的一个简单即永恒的主题——出身不同的人应当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我引以为豪的还有《中学文革报》的精美。从版面的安排，字体花边的选择，到校正的细致，直到今天仍可玩味。

我本人在报上的文章、社论等是使我今日汗颜的。不过也许应像对待其他18岁的少年一样，有所宽容就是了。

权利的平等不应因出身，亦不因性别、种族、肤色而有别。我在中国的60年代，在大陆中国为出身的平等而显示的行动，又演化成90年代为不同种族的学生有同等的申请入研究生院的权利的风波。那时是中学生，这时是教授，真理似乎一样简单，结果是一样令人失望。可幸的是，这一次失去的不是一条性命，而是一个职务而已。

自斯巴达克斯率众起义争取奴隶的人权而失败，已是几千年了。一种不平等取代另一种文明社会中之不文明想必是文明社会的永恒的条律。但社会的进步仍是可察的。普罗米修斯和遇罗克的可敬也就在于此。

最后，向当年《中学文革报》的成员和热心的读者们致敬。

朱大年

我与《出身论》的往事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我主动参与的时间最多只有一年（1966. 8～1967. 8），收获两大“罪名”，被多种形式压抑了十年，插队时更名改姓换地方也未能逃避一时，直到1978年考取大学才不了了之，真是一言难尽。其中一个“罪名”便是：宣传反动的《出身论》。

我自幼喜欢读书，尤喜历史与哲学。自1961年（初中一年级）开始至1965年底（高中二年级）积极争取入团的四年间，由单纯积极、困惑、反复检查自我，到大量学习马列毛著作，在现实对比中再度困惑、内心越来越不平……一次次与团支部的对话，一次次团员发展会，在对家庭的认识检查中，昭示的是出身差别带来的政治不平等。

1966年6月“文革”开始，经历了一段不知所措的时间。7月，工作组和校革委会将同学分成三拨，少部分干部子弟集中北京外语学校学习培训，大部分同学集中定兴县军训以加强纪律性，少部分同学分到西南郊苗圃劳动，改造思想。7月26日，听说各区培训的干部子弟们要在中山音乐堂开大会，我悄悄离开西南郊苗圃，独自赶到中山音乐堂。天黑，下着雨，我混进大门。在军装中和“滚你妈的蛋”的歌声中，听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还

是“绝对如此”的辩论。“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后来称为“老兵”）在社会上的暴虐行为，酷似宣扬“亚利安优等人种”的褐衫党，给1966年8月的北京永远留下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刻痕。

8月底到9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连写三论“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的大字报，鼓动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要首先战胜自己灵魂深处长期形成的自卑与怯懦，才能把握自己同样具有的革命权利。几乎同时，聚集起十几个同学组成了“刺刀见红”战斗队。从批判自身的自卑与怯懦入手，进而批判“血统论”，使“刺刀见红”战斗队战斗力很强。10月初，老兵开始去外地串联，学校革委会安排我们去昌平平西府梨园劳动。劳动休息时，让我们看贫下中农对那些剃着阴阳头的地富子女进行的人身污辱，名曰：批斗会。10月15日左右，我们悄悄徒步返回城里。想尽办法弄到出外串联的火车票。11月初，战斗队分两批来到长沙，与长沙一中谢若冰等领导的湖南井岗山会合。我协助他们办《井岗风雷》报。12月23日返回北京，战斗队已迅速壮大。12月26日“联动”成立，我们全力投入批判“联动”的宣传活动。1月2日北京展览馆礼堂的“联动”大会上，我战斗队成员上台辩论被打。这以后，几乎每天我都接到许多“联动”的恐吓电话。而同时，战斗队组织了很有效率的编辑部和动态组以及一批很积极的印刷、发行人员，每天向其他学校组织发行“动态报”（油印）。越来越多的反对“血统论”的外校组织和个人与我们联系，共同战斗。在这些人中，有后来与我共同创办《首都风雷》报的编辑们，有后来与我共同创办“四·三”派的《中学红卫兵报》的编辑们，有以反“血统论”为基调的大型歌舞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编剧。在这期间，我

们组织专人从学校借出一千元钱和一辆三轮汽车，并联系印刷、纸张等办报的具体事宜，准备好创办批判“血统论”和“联动”的《首都风雷》报的各种物质条件。

也就在这期间，小学同学牟志京给我带来了遇罗克的《出身论》。看后，内心产生强烈共鸣，认为这是所见过的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这以后的一天下午，牟志京、刘姜仁（小学同学、京工附中学生）和我在我家厨房聊《出身论》，决定各办报纸，相互配合起来，以不同方式，宣传《出身论》。由于我这里有组织、人力、物力方面的条件，所以在报纸的筹备、发行过程中做了许多琐碎的具体工作，由于涉及人多反而记不清了。例如“中学文革报”这五个字便是《首都风雷》报编辑朱维理（后来也是《中学红卫兵报》编辑）从毛主席手书的字中拼凑出来的，如“文”字是《解放军报》的“放”字右半边，等等。很快，直接宣传《出身论》理论的牟志京的《中学文革报》，专门讨论《出身论》的刘姜仁的《中学论坛报》，开设“辩论台”辩论《出身论》的《首都风雷》报相继问世，掀起了宣传《出身论》的短暂高潮。在《首都风雷》报上，我直接编撰了三期“辩论台”栏目，正反文章都由我编写。《中学文革报》的帖汉（13中学生）来往于我们之间传递信息和报纸，以便配合。我组织人力上街卖双方报纸。我与《首都风雷》报的另外两名编辑还专程携带《首都风雷》报和《中学文革报》到上海，宣传《出身论》，散发报纸。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学和我们站在一起，办报期间我同时筹备校内大联合。随着校外一些组织和报纸对《出身论》的批判，终至中央文革的公开定性，宣传《出身论》给我的组织及战友带来的现实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我离开了大联合组织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位置，开始了创办《中学红卫

兵报》及“四·三”派一些活动的组织工作。

1968年9月，为逃避继续批斗，在插队途中我更名改姓换地方，跑到呼伦贝尔的小山村插队，却没有因此躲过外调人员的频繁光顾。1970年夏，听到遇罗克因“思想罪”被枪毙的消息，给人的震撼非亲历其时不可言状。我决定处理掉身边的“文革”中的材料。材料中有“文革”中我写的文章底稿、《首都风雷》报的部分校样、《中学红卫兵报》的部分校样、全套《中学文革报》和《中学论坛报》等。我借口去兵团探亲，带着一挎包材料，坐火车到了哈尔滨。在松花江中流，我边踩水边将材料泡烂撕碎，让它们顺水东去了。从那以后至今，我再没见过《出身论》，再没见过那些报纸。

回忆那段往事，我认为：

1. 以出身差别为依据的政治不平等，“文革”前就严重存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对联将这种不平等说成是先天的，以固化其特权地位。“血统论”不过是“阶级斗争”延伸的极端化。赤裸裸地宣扬这种极端不平等，当然会使大多数人内心反感，甚至行为反抗。

2. 总体上说，北京中学生在“文革”中除“老兵”和“联动”外的各派组织，从没有进入过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政治斗争主流。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围绕着反对“血统论”，争取平等的“革命权利”这个主旨展开。这样多人念着毛主席语录，循着内心的指引，为争取自身的平等权利展开大量活动。这是《出身论》产生并得以传播的背景条件。

3. 自觉并敢于追求平等的人在当时是少数。尤其是从反对“血统论”的立场出发，向更深层次进行理论追溯，公开触及那个时代理论基础的“纲”的人就更少。遇罗克进行的理论思考以及为真理献身的勇敢精神，至今仍应令中国知识

阶层认真反思。

4. 遇罗克及少数人能够将《出身论》在那个短暂的媒体失控时期宣传出来，将“人生而平等”这个基本的启蒙课题，摆在长期习惯于封建专制与蒙昧的中国人面前，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难得的幸运。

5. 《国际歌》中唱道“让思想冲出牢笼”。以思想定罪，以致消灭肉体，完全是封建法西斯行径，是对人类进步的倒行逆施。

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社会的宽容程度对于当年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十年浩劫”的内容是丰富的，某些简单化的结论不可能“浩劫”走那段时空。历史不仅是包袱，更是镜子，它启示大家都要珍视自己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愿大家携手共建一种有效的制约机制，那确实保证人人平等的机制才能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遇罗克，安息吧！

写于 1998 年 10 月

陶洛诵

我和遇罗克的一家

人生是为正义而战

从“文化大革命”中死里逃生的人们常常谈论，目前还没有一部文艺作品如实地全面地描绘了1966年“红八月”遍及全大陆的大规模暴行。

正是红卫兵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促使我走上了一条反叛的道路，这充满荆棘、坎坷、血泪而又艰辛的旅程。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温情脉脉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着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化与道德的熏陶，只知人间有爱与诚实，不知恨与狡诈为何物。长到十八岁的我，一心想当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做个像父亲那样终日著书立说、搞科学研究的人。

谁又能料到，就在我十八岁那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学校里平时亲如姊妹的同学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出身最坏的，即家庭有问题的都是斗争对象。我因为对运动表现出抵触情绪，声明自己“沉默得像一条鱼”而遭到红五类

（即出身于革干、革军、工人、贫下中农的人）及其追随者们的批判。

8月6日，我目睹了我所在的学校——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把校领导揪出来，用棍棒打她们（四女一男，故用她们二字），罚她们唱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那凄厉的叫声至今不绝于耳。卞仲耘校长患有严重心脏病，经不起折磨当晚死去。第二天，红卫兵头目在大喇叭里威胁：“谁也不许往外说，谁说了一切后果就由谁负责！”

我的母亲在女十三中当语文教员，在劫难逃，头发被剃，挨过铁链子、枪托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逃也没地方逃，剃了头，公共汽车都不让上，只好每天送她走着上班，怕路上有人看见她剃头而欺负她，到了班上还得挨红卫兵的皮带。我天天护送妈妈去学校挨打，晚上再去把遍体鳞伤的妈妈接回来。我总害怕，早上送走妈妈，晚上能不能见她活着回来。

母亲唯一的过错是她出身“地主”。

我那年老体衰善良的外婆，被逼迫给自己缝个黑牌子挂在胸前，又被赶回安徽舒城老家，在烈日曝晒下死去。

我想起小学六年级时读的“苛政猛于虎”，当时我不解地问董老师：“这些人为什么宁愿让老虎吃而不揭竿而起？”董老师说：“那时的人们没这样的觉悟。”

我生活在20世纪科学发达的今天，就有这样的觉悟。

我纠集了几个儿时的伙伴和同班的好友，都是女孩子，搞到一台自制油印机，办了个油印小报与红卫兵斗争，散发给各个中学与红卫兵对立面的学生组织。就这样，我在六十五中“北斗星”战斗组认识了遇罗文。

遇罗文个子很高，穿件蓝色的短棉外套，戴着绒棉帽，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看过《出身论》这篇文章吗？”“没看

过。”我回答说。他随手从衣兜掏出一份厚厚的文章递给我，说：“你拿去看看吧，不过还得还给我，我就这一份了。”

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出身论》，感到痛快淋漓。文章笔锋犀利，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控诉血统论的罪恶，从理论上澄清了许多模糊的认识，主张人人平等，文章最后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青年起来斗争。读后真让人佩服作者的胆识。

当我还文章给遇罗文时，向他打听作者是谁，他含含糊糊没告诉我。

1967 年 1 月 26 日，新疆石河子地区发生了第一起杀人事件。首都中学生派十名能干的人组成了个调查团，其中有我一个。遇罗文听说我要去新疆，给了我一些铅印的《中学文革报》增刊，上面赫然印着《出身论》这篇文章，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遇罗文已与四中高二年级学生牟志京、王建复办起了铅印报纸，创刊号登的就是《出身论》，卖报时被群众抢购一空，又增印三万份。

我带着《中学文革报》随调查团去了新疆乌鲁木齐市。

从新疆回到北京，回家后放下旅行包就去找遇罗文，送给他两盒新疆特产葡萄干。他精神焕发，朝气勃勃，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今晚在西城一所空房子里有关于‘出身论’的辩论会。”他问我：“你去不去？”我找他，本想对他谈谈在新疆的见闻，见他的注意力全在《出身论》上，我不好扫他的兴，便说：“好吧，我去。”他马上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黄色入场券，上面印有地址，入场券是油印机印的。

辩论会在一所红漆大门里召开，被扫地出门的房主业已不知去向。我去时，大厅里早已挤满了人。我只好站在走廊上隔着玻璃窗向里观望，两派辩士各占一方，东面是身穿杂

色衣服的平民老百姓子弟，双方都神态严峻、紧张，不时为自己推选出的辩士鼓掌。一个身穿黑色制服棉袄，戴着宽大花边眼镜的少年沉稳地翻着面前的一大堆马列著作，引经据典地驳斥对手，我正好与他面对面，他的神情与周围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似乎不关心与真理无关的一切。”——我不由自主在想。忽听旁边有人赞叹：“这发言的人是谁?真了不起。”我扭头一看，竟是遇罗文。罗文在他哥罗克面前好像换了个人，矜持地冲我点点头。我已知道遇罗克就是《出身论》的作者。他个子不高，瘦弱，背微微有点驼，长圆的脸上戴着副白框眼镜，手插在风雪衣外套兜里，那件蓝绿色的风雪衣罗文有时也穿，无论颜色与样式都很美观。遇罗文对他介绍说：“四中‘红旗’派的，作为‘红旗’派的代表进了报纸的编辑部。”遇罗克说：“才初三，真不简单。”这个被遇罗克称赞过的人后来成了我丈夫。

遇罗克在临散会前走了，我一直听到完。散会时，人群像潮水般往外涌，遇罗文不失时机地蹬上椅子，大声宣布：“今天，大家都看到，‘血统论’被‘出身论’驳得体无完肤。”一个穿黄军装的红卫兵也不示弱，说：“这位编辑阿Q精神真强。”

我等着遇罗文，他头上冒着腾腾的热气，我们俩并排走在胡同里，我对他谈起石河子，被“八野”匪徒用枪杀死的无辜群众也分三、六、九等，出身不好的尸体乱扔着，出身好的享有花圈。我还听一个姓包的女孩子讲述南疆建设兵团对出身不好的青年歧视的情况，她是上海1964年支边的青年，家庭出身小业主，受尽了气，表现再好，也不让她入党。她一边诉说一边哭，我亦无言安慰她，只好抽出一份《出身论》送她看看。“这一切，使我感到出身是个全国性的社会问

题。”从新疆回来，我深感人为挑起的群众斗群众是多么不必要；而人人平等，不以人的出身盖棺定论是多么必要。

“我想加入《中学文革报》。”我向遇罗文提出。“好吧。”遇罗文深情地看着我，点点头。“我再跟牟志京说说。”

第一次见到牟志京是在遇罗文家。他留着分头，怀里搂着个大书包，翻着眼睛专注地听遇罗文讲话。他们在商量去长城游玩。遇伯母在一旁做饭，笑呵呵地说：“洛诵，你也去吧。”我没有心思游山逛水，遇罗克见我执意不去，显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扭过头不理睬我。

遇罗文也很爱玩，认识没多久就对我说：“有空时咱们去樱桃沟花园，那儿可有意思了，到处都是樱桃树。”

我们终于去玩了一次。《中学文革报》全体成员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遇罗文也去了。遇伯母蒸了些果酱花卷让我们带着，我们一大群人拥簇在遇罗克的身边，气象专科学校的女学生王亚琴、李金环恭敬地向他请教问题，遇罗克耐心地给她们做着解答，我觉得遇罗克像个青年领袖。牟志京喜欢摄影，他为大家拍照。

我和遇罗文一起到西便门印刷厂取报，又一起到王府井卖报。遇罗文能把平板三轮车蹬得飞快，把报纸分送给各个卖报点。争购《中学文革报》的热烈场面我从此再没见过：人们排成长龙般的队伍，举着钱，前胸贴后胸，买到的人如获至宝，没买到的人遗憾万分；有人用二十五倍的高价从人手中转买。人们买报那般切的表情告诉我，他们是在寻找真理之声，对于大规模的混乱人们是多么厌倦，对于压在人头顶上的等级制是多么憎恨。

牟志京从来不卖报纸，他认为这不是总编辑份内的事。

我参加进去时，报纸已经出刊到第四期了。我们每天到

自来水公司的一间空房子里碰头。有一天，牟志京和遇罗文争论起来。牟志京说："为什么总登'小组'的文章?"罗文说："你有什么好文章吗?你拿不出好文章，就登'小组'的，人们都爱看'小组'的。""小组"的全名是"北京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的笔名。

纸张被控制起来了，要弄到纸必须有清华大学第三司令部"司令"蒯大富的批条。我和闫世钧上清华大学找到蒯大富。天气已经不太冷了，蒯大富还穿着棉大衣，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方脸，戴副深色镶边的眼镜。我说明来意，希望他能批些纸。蒯大富不以为然地说："《出身论》是很错误的，错误的，不能给纸。"我说："咱们辩论辩论吧。"蒯大富显然不愿和我浪费时间，站起身来就跑，一边跑一边说："不屑一辩，不屑一辩。"周围的人看我们俩在院子里赛跑不禁哈哈大笑。

回到遇家，我对罗克哥哥讲了这件事。他高兴地说："你可真行，追得他满院子跑。"我说："这算什么，我是为了要纸。"罗克哥说："我给他写封信，约他到王府井辩论，如果他来了，把个蒯大富驳得哑口无言，不亦乐乎，你看怎么样?"我说："他恐怕不会来吧。"罗克哥还是把信发出去了，蒯大富呢，当然没敢来。

罗克哥哥给许多中央首长都寄去了文章，希望获得支持。《中学文革报》总编辑牟志京也存在着这个幻想。有位同学到牟志京家，说："快走，快走，中央首长正在人大会堂见群众。"牟志京急忙拿了几份《中学文革报》赶到人大会堂，牟志京解下球鞋带，把报纸捆好，请前排的群众传交给中央首长，他眼珠不错地追随着报纸，直到首长身边的警卫员接了才松口气。

事情却恰恰相反，当时身居要位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中学文革报》在艰难的逆境中作战，联动分子砸，四三派抢，谁都可以打击《出身论》来显示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印刷，第七期转移到天津去印时，戚本禹发话停刊，我被派往天津，通知印刷厂停印，《中学文革报》就此被迫停刊。

风雨飘摇中的一个乐观的家庭

遇罗文的家住在东四明星电影院旁的一条死胡同里，是座不大的四合院，本是遇家的私产，"文革"前就早早地交了公。他家住北房一大间一小间，遇罗克则住在最东面门冲西开的放煤间改成小条型屋里，屋里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

我认识遇罗文是在1966年年底，他家已遭红卫兵几次洗劫、抄家，遇罗文的姐姐遇罗锦在1966年12月21日被送到良乡劳教三年，罪名是书写反动日记。他家处处能感到被专政的窒息，却没有丝毫的不振作。

遇罗文希望我能够用自行车带人，他让我拿他练，我怕摔着他，他说："保证摔不着。"我除了敢带他还是谁也不敢带。

他让我练习蹬三轮板车，我觉得有失体统，说什么也不肯。

我对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满脑子都塞满了学校灌输的

条条框框，我有一句幼稚的话被遇罗文当作笑柄。我说："中国没有失业的。"遇罗文说："我们这边儿有姐儿俩，没找着工作，插队去了，这不叫失业叫什么？"以后我们俩发生争论，他就学着我的腔调说："中国没有失业的——什么呀！"

我想到前途感到渺茫，遇罗文一次偶然冒出几句："咱俩以后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去过鲁滨逊式的生活。"我一听正中下怀，便很现实地说："咱们插队去吧。"遇罗文立即无精打采地说："插队可没意思了，你没去过农村不了解情况。""你去过吗？""我哥去过，所以我了解。"他换了较和缓的口气说："'困难时期'你饿着了吗？"我立即想起自己成大眼灯的情形，说："够呛。"遇罗文感慨地说："你那时要认识我们家就好了，我们家一点也没饿着，我哥哥在农场干活，老给我们带回大米、白薯。"我遗憾地说："真是太可惜了。"罗文又告诉我一件事："在农场，有一对青年男女结婚时，谁都不参加婚礼，只有我哥哥去了，还送礼物给他们。"我惊异地问："为什么？"遇罗文勉强地说："那女的怀孕了。"一阵沉默。

罗克哥哥在遇家三兄弟里，个子最矮最瘦弱，他活泼、好动，说话尖刻不饶人。他喜欢玩打手板的游戏，一打起手板来，他的眼睛里闪动异常灵活的光，罗勉老被打着，每被打一下，罗勉就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被打的手背，腼腆地笑着，罗克哥哥就高兴地笑个不停。他还很喜欢唱京戏，他有一副好嗓子，声音很细，响亮，也很柔和，他常与罗勉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话："罗勉，你演那个胡传魁，我演那个阿庆嫂怎样？"罗勉笑而不答。"那你演那个没出场的阿庆。"说完，自顾自地唱起来。

罗克哥哥把罗文当成大人对待，和他讨论文学。有次他

对罗文谈起《红与黑》："斯汤达写于连在山顶上看鹰那段多好哇！"罗文赞同地点点头，不过，我很怀疑罗文是不是看过《红与黑》了，即使看了，是不是注意了这一段？

罗克哥哥抓紧时间拼命地看书，他那儿文学书籍不断，但丁的《神曲》，莫泊桑的《漂亮的朋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英国女作家的《呼啸山庄》……除了外国文艺，罗克哥哥还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他拿了一张纸，上面抄了好几首古诗词，对我说："你们师大女附中老师水平高，这几首诗词上有些地方我不懂，像'有凤来仪'怎么讲，是什么典？"我拿了去问语文教员杜老师，杜老师有的也讲不上来，罗克哥哥很是遗憾。

罗克哥哥告诉我："我考大学时成绩很好，可是不录取我。我去问班主任，为什么不录取我？班主任撒谎说我数学不及格，其实我数学得一百分。"争取高等教育的权利是罗克哥哥斗争的主要动力之一。

有次我发牢骚说："到处搞武斗，这叫什么'触及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罗克哥哥笑着说："应该叫'打击每一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被打击到了。"

遇伯父、遇伯母常常流露出对我们的担心，遇伯母焦躁不安地说："捏死你们，还不跟捏死几个小蚂蚁似的，你们别折腾了。"遇伯父也劝罗克哥哥不要写文章了，罗克哥哥有时嫌烦，就半开玩笑地引用"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遇伯父是"右派分子"，遇伯母的"右派"帽子虽摘了，但资本家帽子还有，他们被这么一噎，也不好说什么。遇伯父对我说："罗克是咎由自取，我们无能为力。"

我想让遇伯母高兴，用蓝色透明的玻璃丝编了个小钱包

送给她，她笑得合不拢嘴。过几天，我上遇家，看见遇伯母正在翻箱倒柜，拿出一个涂着金粉的漂亮的杏黄网兜，说："孩子，这是朋友送我的瑞士网兜，我一直没舍得用，送给你吧。"

遇伯母擅长烹调，她平时很少做饭，她和罗克哥哥每天去上班，遇伯父没有工作，每天在家里做饭，收拾屋子，余暇与棋友下围棋。

遇伯母有天下班回来，满脸惊恐未消，对正在扫屋里地的遇伯父说："崇基，这天可危险了，我发现电线漏电把顶棚快烤着了。我急忙报告了领导。领导派人修了后，说'多亏老王，不然就糟了'。"

她那天心情格外好，买了猪肠子，用碱水和醋水洗得干干净净，切成一小段一小段，裹上面，一个个炸成大红枣状，再切上蒜片，浇上酱汁，每个人分到几个，我把自己盘里的分一个给罗克哥哥，因为他还要带饭。

遇家每天门庭若市，有个叫王世伟的与罗克哥哥关系很好，他是后来成为罗锦第一个丈夫王世俊的哥哥，也是遇家的邻居。

还有个文质彬彬的戴眼镜的青年，有时来看看遇伯父遇伯母，罗文告诉我："他叫李立凡，是我姐姐的男朋友。"

我、遇罗文与四中诸君同登峨嵋山

牟志京的同班同学吴景瑞（大家叫他"毛子"）、张玉海等人办了个《只把春来报》，张玉海写了篇《论出身》，被红卫兵和联动分子说成是对我们小骂大帮忙。他们曾受到《红

旗》杂志私下的警告，报纸也就停刊了。

毛子给牟志京四张火车票，遇罗文、我、王建复和牟志京与毛子等六、七个人一起去四川，目标是天下第一山——峨嵋。一行人中只有我一个是女孩。

开始爬峨嵋山了，我唯恐落在后面被人耻笑，拿出在学校练长跑的劲头，总走在最前面，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第二天再爬时，只有遇罗文在我身边，其余人都不知去哪儿了。天下着小雨，我把雨衣让给遇罗文穿，他推辞了半天，我还是给他穿了，并帮他系上扣子，我淋着山雨，在这仙境里，幸福无比。

第三天，遇罗文也不陪我走了，他觉得老陪女孩子在一起让人看不起，剩下我孤零零的。

老山林中，万籁俱寂。我多少有点怕，一怕匪徒，二怕野兽。忽见前面有个人，单腿跪地给树拍照，树上刻着清晰的两个大字“四中”，“毛子——”我惊喜万分，虽然只在从成都到峨嵋县的路上与他攀谈过几句，此时此地却像见到亲人。他因为精心刻字耽误了时间。“你对学校还真有感情。”我说。他仍全神贯注“咔嚓咔嚓”地给树拍照。我候在一旁，看他把这项伟大的工作做完。“走吧。”他满身披挂地向我走来，简短地招呼了一声。

我肚子“咕噜咕噜”地叫起来，响亮得连毛子都听到了。一座寺庙奇迹般出现在眼前，毛子前去化缘。蹲在地里摆弄菜的老和尚理也不理他。我想：“峨嵋山前不久受到红卫兵的扫荡，大部分和尚被赶下山学习，留守的这个和尚把毛子一定是当成红卫兵了。”毛子并不介意，回来时递给我一根像胡萝卜般细的萝卜状的东西。我不再考察这个萝卜状的东西是否来路正当，焦急地等毛子削完皮，看他切下一小块留给自

己，剩下的全给了我。

尽管身上的背包早已转移到毛子身上，我仍气喘不停。快到金顶了，已听得到人语响。“毛子你先上去吧，这儿已没有危险了。”毛子看看我，转身迅速地向金顶爬去。一会儿，他捧着一大包花生粘来接我：“吃吧，我从杨百鹏手里抢来的。”

从峨嵋山回到成都，大家各奔东西，牟志京和毛子去越南，我陪遇罗文留在成都。

遇罗文病了，我跑遍成都市也没买到可口的食物，只好用饭盒盛了些鳝鱼面回来。遇罗文不高兴地说：“我以为你准会买些香肠什么的回来，没想到你就买回鳝鱼面了。”从没服侍过任何人的我，一腔热情换来一顿指责，十分不悦。

我们玩扑克牌消磨时间，罗文赢了，就拍着手哈哈大笑，“我又赢了，你真笨。”我气极了，不再理他。

罗文接到他家信说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返回北京。

回到家里，从小把我一把屎一把尿抚养成人的奶奶流下泪来：“你走怎么连招呼也不打，我们都急死了。”我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对亲人犯下了怎样深重的罪孽。为了我这个忤逆不孝之女，我那历史清白、政治上毫无瑕点的父亲在科学院被人贴大字报，曰：“教女不严”。我妈妈为我罪加一等，多挨几次批斗。我最对不起的是奶奶，连个赎罪的机会都不再有了。

遇罗克、遇罗文一行东北之行

从峨嵋山回来后，我静下心来，在家里跟爸爸与三个弟弟学英语，跟奶奶学“大学”、“中庸”，但有时仍很想念遇罗

文。

有天，我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去看他，他正在百无聊赖地缝自行车座套。我让大弟弟陪我来的，他在遇家门外等着我。我呆了两三分钟，看看遇伯父、遇伯母都还好，就回去了。

过了不久，东北打起来了，遇罗文、牟志京、张富英(后来成为遇罗文的妻子)、王玲、张君若和王家材等人去东北玩，遇罗克也去了。

我和李金环与我们班同学汪静娴去武汉玩，武汉太热，汗流如雨，我们呆了一个星期，实在受不了就回来了。

毛子与牟志京与我们分手后，乘火车到广西凭祥，又乘窄轨火车到了边境。他俩兜里揣着巧克力，开始翻山越境，为对付路上一人般高的草和苍蝇般大的蚊子，他们把领口、袖口系起来。牟志京很想家，毛子却一声不吭。他们终于翻过大山，走上了阳关道。走不多远，就被抓起来送回友谊关。

牟志京回北京没多久，即与罗文他们又去了东北。

毛子还想东山再起办报纸。但失败了。

毛子注定要当冒险家，"文革"爆发后，他是四中第一个去兰州串联的人。西单商场武斗时他在场，平白无故地挨了粒汽枪子弹，子弹打在右眼眶骨头里取不出来，引起瞳孔永远放大。

他要只身去东北，当天找我道别，邀请我到北海公园去划船。游人很少，我们俩泛舟湖面，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桨声与我们的谈话声。"我这次走，就不打算再回来了。我要把学生证放在死人兜里，让人们认为我死了。"我惊异地喊起来，无论我怎样追问，他也不说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想摆脱命运的桎梏。"我认为这是答案，就不问了。

毛子从此再也没有音讯。他的伙伴张玉海跑到缅甸参加"缅共"，在一次战斗中，身中六弹牺牲了。

罗文一行终于从东北回来了，我接到他一封信，叙述了他们在东北遭遇的一件事，漂亮的女孩子张君若被一群红五类剪了头发，因为问她什么出身，她老实地回答："右派。"遇罗文很激愤，信中写道："这是多么不公平，这是多么残忍！"

听回来的王家材讲，罗克哥哥总与这些中学生保持着距离，把自己区别开。

听王玲告诉我，罗文口袋里总装着我的一张照片，我听了很高兴。

张富英告诉我，遇罗文对她异常关心，还救了她的命。

牟志京则告诉我：张富英很爱助人，例如别人写信，张富英就去拿胶水，她总坚持这样做。

遇罗克让我把信送给陈毅儿子陈小鲁

遇伯父看我和遇罗文无所事事，就用夏目漱石著的《我是猫》一书作课本，对我们说："这是日本的名著，如同中国的《红楼梦》，在日本，人人皆知，这是真正的日本语言，你们好好学。"他逐字逐句地给我们讲，一心想把我俩培养成一流日语翻译。

我那股争强好胜劲儿又上来了，一心想压倒遇罗文，每天考试，我都比罗文背得熟，默得准，遇伯父就夸奖我。遇罗文不服气："你就会死记硬背。"我不示弱："你背好让我瞧瞧！"遇伯父说："学外语主要靠下功夫记。"罗文没词了。

罗克哥哥忙着写文章，他认为除了出身问题便是工资算

社会问题了，人们普遍对多年不涨的低工资不满。他对我和罗文说："我写好后，让香饵工代会给我发表，他们其实是个伪工代会。"他无所谓"真"和"伪"，只要给他发文章就行。

过了些日子，他对我们说："我把文章给他们，他们要把我的文章与他们的文章合并，那怎么行啊，我这文章是革命的，他们是修正的。"

11 月里的一天，我照旧背着书包去遇伯父家上课，那天罗克哥哥在家，伏在大屋的写字台上写信，全家人都在，屋子里静悄悄的。罗克哥哥见我来，抬起头，捏着笔对我说："洛诵，有两个密探总跟着我，我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我对他们说：你们总跟我干什么？他们也不作声。这事儿还真不好办。"我听了也有些紧张。嘴上却说："咱们没做违法的事，怕他们作甚。"罗克哥哥严肃地说："这可是没准儿的事，要是把你抓起来，你也没辙。我这儿给陈毅同志写了封信，他一直替出身不好的青年讲话，我想他是会理解我的。我要是把信寄给他，怕他看不到。听说陈老总的儿子陈小鲁在八中，这个陈小鲁大有其父之风，你把信送给陈小鲁，让他交给他爸爸，这就保险了。""我不认识陈小鲁。"我有些为难。罗克哥哥语重心长地说："洛诵，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我为他们说话是应该的，为了千千万万的人，即使我牺牲生命也是情愿的，可是……"我急忙打断他："我去就是，你别说了。"我接过罗克哥哥递过的信，信封上用蝇头小字工工整整地写着"敬呈陈毅同志"。罗克哥哥又说："你可以先看看。"我小心翼翼地抽出信来，信上写道："敬爱的陈毅同志：我是人民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学徒工，我目睹文化大革命中对出身不好青年的迫害，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受党培养多年的青年，我觉得有责任挺身而

出，为此，我写了《出身论》一文。您曾经谈过．在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中间不应当存在一条鸿沟……”在信中，罗克哥哥表达了对陈毅同志的尊敬爱戴与信任，并谈到自己去东北串联，看到大好河山，抒发了对祖国一片赤诚的情感。信的最后谈到自己目前被跟踪盯梢的处境，恳请陈毅同志帮他免遭不测。

我郑重地把信夹在日语书里，奔向第八中学。天气已经冷了，我穿的是蓝大襟衣服，下面罩着棉袄，戴着一双毛绒手套。

陈小鲁长得很像陈毅同志，他衣着朴素，领口露着紫红色绒衣，外表是一身蓝制服。我说明来意，拿出了遇罗克的信，他接过了信。我问他：“听说陈老总体重减了十斤，是真的吗？”他说：“是谣言。”我说：“请转达我们对他的问候。”他说：“好。”我问他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吗？他坦率地说：“我持不同意见。”尽管如此，他还是慷慨地答应转交。这时有个粗眉大眼的男同学笑着向他打招呼，他说：“这是计三猛。”听口气，计三猛好像是他们那派的一个著名人物。

罗克哥哥详详细细地问了我们的谈话，当他听说陈小鲁答应转交时感到很宽慰。后来他又让我找陈小鲁一次，陈小鲁说：“我交给秘书了。”我问：“陈毅同志看见没有？”陈小鲁说不知道。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早晨醒来，我记起夜里做了个可怕的梦，梦见四个警察在抄遇罗文的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抓住了我，我穿上大衣，戴上头巾和手套，急急忙忙向遇家走去。

一推开遇家房门我就傻了，与我梦中的情景竟然一模一样，四个警察在翻箱倒柜，一个军代表坐在床上，遇伯父与他的一个棋友被命令站在一旁。我，吓哭了。

……

相逢十一载后

十一年以后，我再见到遇罗文一家时，已经由一个单纯、热情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蹲过监狱、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了。

同牢房的女囚邢泓远写过这样一首诗："进来的时候是亚瑟，出去的时候是牛虻；进来的时候是姑娘，出去的时候是女将。赞美你，普罗塔尼亚的牢房，你赤烈的熔炉冶炼了多少纯钢！"

可是遇罗克哥哥却永远出不来了。这个有尧舜的心，荆轲血的人永远出不来了。血统论害死了无以数计的人，宣传者与执行者都没被判死，批判血统论的人倒被判了死刑。

磨难已大大损坏了我的容颜。当我找到搬到罗车胡同的遇家时，当时在家的遇伯父与遇罗勉根本认不出我。"我是洛诵……""啊，洛诵！"遇伯父拉着我的手，闭着眼睛，摇着头，叹息着。遇伯母下班回来，看见此情此景，眼泪立即涌了出来，她一边拭泪一边问："孩子，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这是 1979 年 9 月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遇家，这个受压迫最深重的家庭里我同样感到了春天。

罗克哥哥平反昭雪工作正在进行中；罗锦，这个我没见过却一直惦念的人就在北京，与一名工人结婚住在北三里屯。

罗文在 1968 年被"少管"一年，解除少管后先在陕西与张富英一起插队，后来随罗锦转到东北，因为受人牵连以"窝藏罪"被判处五年徒刑，冤案已被平反，正在回京的途中。

在我没见罗锦以前，遇伯母对我说：“洛诵，我们事先提醒你，罗锦的脾气和常人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以后别因为她影响了咱们的关系。”遇伯母又说：“我昨天还把你的照片给她看，孩子，我把你的照片给她看，罗锦说真漂亮。孩子，我把照片还给你吧。”“不，不，您收着吧。”她在这苦难的深渊里，在这颠沛流离的岁月里还保存着我的照片，我怎么能收回呢！

至于我和遇罗锦的交往，是以后的事。她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想起遇罗克一家对我的这份情谊，我真是百感交集。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家，中华民族已付出了几代人牺牲的高昂代价，曲折前进的历史洪流定会荡尽一切封建法西斯残渣，每个革命者的世界观都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人民将会做出最公正的裁判。

中国必定会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繁荣昌盛！

张朗朗

我和遇罗克在狱中

一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十几斤重的大黑铁环，像李玉和当年用的一样，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我们举手投足，全“哗哗”地响。

我们蹚着铁镣，很有点悲壮的劲头。自然想起“带镣长街行”的歌，然而那是夜半时分，是在北京看守所院内，连“告别众乡亲’的场面都没有。跌跌撞撞地走到二十三筒、二十四筒小院。犯人们管这儿叫“枪号”，官称“死刑号”。

每个人被关进一个木头盒子一样的单人牢房，我坐下来喘着，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每个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打开门，一一登记犯人的姓名、年龄。刚刚关上我的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过去打开他的房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话音未落，门“碰”的一声又关上了。我听见了，那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他在这样的最后关头，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机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

1970 年 3 月 5 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们知道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二

他是想用假装交待材料的办法，来拖延时间。为什么当局没有上当呢？我想：遇罗克和他们已经斗智了两年多了，互相之间已经太了解了，他们不会再上当的。

遇罗克的预审员外号叫丁大个儿，丁大个儿让遇罗克气疯了，见人就说：“遇罗克是个大花岗石脑瓜儿的狱油子！”

狱油子吗？他是，也不是。

在当局眼里，他确是个狱油子，简直是个讼棍。

他了解各种法令、规定、条例，往往能找出预审员的违法、违章的破绽，还能找到自己解脱的漏洞。他还知道审讯的各种方式、手段和不成文的各种程序，他甚至知道预审员们的姓名和背景，以及他们的性格、脾气。

每个犯人提讯回来，总要向他请教。他会详细地盘问所有审讯的细节：是谁问的？问了什么？怎么问的？别人怎么插话？谁发脾气了，谁又出来打圆场？什么地方狠追不放？什

么地方又假装糊涂放过，然后突然杀个回马枪？

他了解后会细细静想，然后分解揉碎了解释给犯人们听，告诉他们："这会儿是展开阶段，你就尽量往远处说，往没边的地方说。""这会儿你的问题，他们准备收口定案了。那是关门吃叫铁门栓。你要成心让他逮个耗子，一点儿什么不给那不行，他们没那么傻。"告诉你如何应付下一次提讯。

他成了号里的宋士杰，犯人里的免费律师。

三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1968年11月，我调号正好调到了他同一个牢房。那是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院里著名的那座K字楼。

他以略带嘲弄的笑容，向我这样自我介绍："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个走字。罗霄山脉（罗霄山脉是井冈山根据地之所在）的罗，克服困难的克字。"

说完又微微一笑。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我佩服那些在地狱中仍不丧失微笑功能的人。

虽然他微驼着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过早秃顶，完全是个书生模样。脑瓜其大无比，向斜后方竖过去，落个"冬瓜脑壳"的美称。

每天早晨起来，他还一本正经做广播操，长手长腿像大螳螂似的，动作可笑无比。别人笑他，他也一块笑。满身学生腔儿。可是他和一般书生不同，他好摇头晃脑地哼些诗文。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四

许多犯人，尤其是在外面当干部的犯人，会觉得遇罗克太尖酸刻薄。在狱中管学习的犯人官称："学习号"，我们的学习号叫李考良。遇罗克就说："李是李承晚的李，烤白薯的烤，凉半截的凉。"那李考良正经不起来，急不得恼不得。

当我们背诵"老三篇"之后，又学《将革命进行到底》，直念到疲惫不堪、头昏脑涨了。遇罗克这会儿会突然出奇制胜，激起众人的好奇，说几句招人兴奋的话。他发言了，慢条斯理——

"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满屋子顿时静下来，全愣了。几个积极分子像是突然见到狡兔的猎犬，省过闷来立刻跳将起来。争先恐后，七嘴八舌：

"什么？凡是存在的全部合理！那么蒋介石存在，他合理么？刘少奇存在，他也合理吗？……"

遇罗克一点不着急，继续微笑着蔫蔫地拱火：

"你们仔细想想，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么？"

等批判者的话一级级上纲，到了相当尖锐的时候，他忽然做"正色"状，说：

"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那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论述的！"

看着那些积极份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地笑了起来。开这种玩笑，在这个地方，可真得有胆！

五

他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

他常说：每个人对某一种事物总会“门清儿”，所以，任何人都会在某一方面比我知道得多。

一天，一位工人对我说：“别把什么都告诉他，他在不知道你的底之前，对你感兴趣得不得了。等他把你肚子里的玩意掏干净了，就不爱理你了。”

也许，他有时是这样，也许他不知道或不在乎这也会得罪人。他只关心自己积累了些什么，只想应该找一切机会多学点东西。好在我并不在乎别人重视不重视我，我也渴望得到交流。于是，我和他订下合同，每天休息时间，每人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题目，轮流讲给对方听。我给他讲的是“西洋近现代美术史”，他给我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他讲得那么内行，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真以为他曾是一个电影资料工作者。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间别的牢房里，刚刚从别人那贩来的。他通过给我讲来复习这部分知识。我的天，他真会利用别人的时间。好在我也不吃亏，那合同合理，是平等交易。我从他那儿又学了一招。

六

其实，他也喜欢宣讲。他主动要宣讲的时候，就不在乎

他合同不合同了。在我们号的几个年轻人要求下，他以讲辩证法为题，开了“形式逻辑”的课程，几个小青年学得非常入迷。可是，或由于基础的原因，他们往往听不明白遇罗克的讲述。他转过头来问我学过没有？我说：“在大学我学理论，这些我全懂。”他又兴趣很浓地追问起我来，我对这套没什么兴趣，有一搭无一搭地应对着。他胸无城府地直接了当地说：

“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不但是对客观世界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思维进行整理的过程；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思考问题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

我说：“我不是个纯理性化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学太晦涩、太复杂，我宁愿看些现代哲学。而现代哲学不同些，并不一定要用形式逻辑作为骨架。让·保尔·萨特和黑格尔是有极大区别的。”

他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后来他真的生气了，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类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家，全是无病呻吟。而居然会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没事干……”

他说了许多过火的话，我真一点儿也没生气。他至少有一个理想的投射点，他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认真。我还是佩服和羡慕这样的人。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能彻底，才能深钻下去。

七

一天，遇罗克从同屋另一个老犯人那里借来了延安版本

的《毛泽东选集》，拿它和“文化大革命”出版的版本对照来读。读得很认真，每篇都一字一句地校对。时而若有所得地点点头，时而又掩卷而笑——那是他习惯地嘲讽的笑容。

后来，那个老头受到了政府的警告，不敢再把他那套旧版“毛选”借给遇罗克看了。遇罗克若有所失，常常叹息。他悄悄对我说：“出狱之后，我一定找齐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有意思。”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像是馋孩子见到巧克力。我却不明白怎么会那么有意思。

他后来对我说：

“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说完还用力点两下头，嘴角又露出满意的笑容。

八

每天早上，放茅的时候，他总是挤到厕所唯一窗口边，向外贪婪地看着。我们只有这个窗口可以看得见外面的树和院子。牢房的窗子是漆成白色的，根本不透明。

那回我们俩正好站在一起，窗外的树枝刚刚冒出嫩绿的春芽。他伸出手去，想摘回一枝春芽，我也伸出手，可惜铁栏挡住了我们的身体，无法够到那个树枝。

他突然笑了，说：“我的手出狱了，我的手自由了。”我也挥着自己的手说：“我也自由了！”

每天吃完饭，他都会向管理员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有纸笔的。他说：要写思想汇报。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

犯，所以每天都会给他，他就用这个方便，乘机写下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写好以后藏起来。

我们俩曾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了一本《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回忆起来的，都一一尽入其中。几个月下来，数数也有三五百首了。

他比我记忆力好，多一半是他背出来的。

星期天，我们利用缝补的机会，拿针线装订起来。许多人都偷偷借去传抄，默默地念着、背着。牢房灰色的水泥墙上，似乎隐隐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沟流月的景色，那真是一种良性自我解脱方式，一种个人的小小奢侈。

我把自己那本塞到棉衣的棉花套里。心想将来有机会能带出监狱，也算是一种纪念。可惜在搜检牢房时，竟然被搜走了。我明白：告密者常在。

晚饭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诗词。我对新诗比较感兴趣，他却鼓励我写旧体诗。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有许多特有的内涵，特有的韵味。只有有了中国文化的根底才能真正理解、体会，也只有用这种形式才能表达中国人特殊的感受和情绪。

他微笑对我说一首盛传是乾隆所作的“登香山”，那正是遇罗克所填的词。词的最后两句是：

“来路崎岖征路长，哪堪回首眺望。”

他读完后，有些伤感地望着傍晚的天空——铁窗外的一角火烧云。

那时候，在他的鼓励下，我也学着写了些旧体诗词，请他指点。有时，我们贴坐在墙根儿，用块方格手帕当棋盘，一人手里拿一张废纸或手纸，两种颜色的纸。用那当棋子，每走一步，就撕下一小块纸。队长来查号了，我们不慌不忙把

手绢一折，往兜里一揣。我们把那叫做“隐形围棋”。我不愿意和他下象棋。他仗着记性好，胡走一气，一会儿就把你绕晕了。他似乎脑瓜里有个电脑储存系统，还装了一脑子棋谱。别说“桔中秘”、“梅花谱”，那么一本不大有人知道的卡，他都能头头是道给你聊半天。真不知他那脑袋怎么长的！

九

或许由于他特别自信，所以他的表情总是在嘴角挂着那么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似乎嘲讽着一切，七个不吝，八个不在乎。

但是，也有愁闷的时候。一到那时候，他总是向我说起他的家，自己的童年。他很爱自己的弟弟、妹妹。提起遇罗文，他总说：“他比我脑子清楚，比我认真。”提起遇罗锦，总是说：“我们家那个小姑娘。”

平时，他很少哼歌。可一说到童年，他会一本正经地唱起一首苏联歌曲：

“斯大林率领我们前进，大元帅号召我们去斗争……”

他唱得很雄壮、很投入，唱完后自嘲地笑笑。告诉我说：“那是在少年宫学的，当时和合唱队一起唱这支歌参加歌咏比赛，还得了奖。”他一回忆起这些，回忆起小时候，家中种的各种花卉，回忆起和弟妹们一起玩“官兵拿贼”……似乎，他曾有过一个金色的童年。

他突然问我：“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这支歌。”

我俩在黄昏的暮色里，站在炕板上，望着窗外朦胧的余辉，那面刮着的微风是自由的，而我们却要二十个人挤在这二十平方米的牢房层之中。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

“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唱得很认真，很动心，歌声那么沉重，牢房里的人都不作声，默默地听着听着……一个老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你们别唱了好不好？已经够难受的了，还唱这么悲惨的歌！”

遇罗克停了下来，回头看看哭了的老头儿：“这支歌一点也不悲惨啊！”

“算了，我们不唱了。”

我们坐下来。那时候，遇罗克还戴着手铐。每次吃饭之后，血管一胀就很难受。他总是想找些轻松的话题和我谈谈，借以分散注意力。我也讲给他我自己家，我的经历，我的兄弟姐妹。讲完了，我就说：

“我知道，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对，将来的生活，无论什么样子，过去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再有了。可是你怎么知道：将来就不会比过去更好呢？”他说完，又微笑着悄悄地哼起那支刚刚学习的歌。

十

他入狱的直接原因，就是那篇著名的文章《出身论》。

一天我们议论起：什么样子的作为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什么才是有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什么才是值得去牺牲的？

我认为自己入狱就不值得，纯粹是个历史的误会。我根本不懂什么政治，更不是什么政治家。只是因为自己太热情、太认真、太好打不平。结果，糊里糊涂卷入政治漩涡，极其荒唐地变成了个政治犯关在这里。

遇罗克想了想，说："我值得。"

我望望他，他直视着我——在这一点上，他比我要自信得多。

"你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所以，即使在我们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出现先天性的自卑感——一种政治上的软骨病。因此，我们这些人很难勇敢地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这次《出身论》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些。我很有满足感，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过了会儿，他又笑了，说：

"我本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能和一个出身好的青年，在相等的条件下较量较量。你来那天，我认为机会来了。我想：在监狱里把你整苦，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但是，你来以后，慢慢了解你了，发现其实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感觉，共同的语言。慢慢打消了当初的念头。"

我说："'血统论'肯定错了。'出身论'也免不了偏激。其实没住监狱前，认为警察都是好人，犯人都是坏人。刚住监狱那会儿，认为警察都是坏人，犯人全是好人。

"现在明白了：警察也有好人，犯人也有坏人。社会上一个人的角色是各种偶然、必然因素互动的结果，而当好人还是坏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遇罗克不置可否，微微笑着。他和我的确不一样。他是一个斗士。生活一直把他放在逆流中，一直放在必须斗争的环境中。他必须成为斗士。况且，他长期生活在底层，他有许多真正肝胆相照的朋友。这就是友谊在中国的含意：疾风知劲草，两肋插刀。

在监狱里，许多蛮不讲理的小偷、流氓，横行霸道、杀人越货的土匪、强盗，一听说他是遇罗克，马上肃然起敬。因为，他是《出身论》的作者，因为他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替这个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贱民”大声疾呼的人！他是一个勇士，而且是一个聪明、冷静的勇士，选择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关键的时刻打出了有力的一击。

十一

当他听我给他背诵一封著名的信件时，他至少安静耐心地听完。那是《牛虻》一书中亚瑟给琼玛的信：

“明天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换句话说：杂耍就要收场了。……”

我知道，他虽然读过许多外国名著，可他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是偏重于“国粹”。他在入狱前后写了不少视死如归的诗。他对自己的选择，非常执著，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和信念。

其实，他和我关在同一监号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真会被枪毙。他告诉我许多审讯员和他之间智斗的故事。

这方面他很独特，虽然有书呆子一面，却又能洞悉社会，知道世态炎凉，了解人生与人性。这也许由于中学毕业后，不让他考大学，他一直生活在底层，干过千奇百怪的各行各业。

他管过公共电话，种过草莓……据他说每几个月就转一回行。他不像别人那样：让预审员一拘一吓就麻了爪儿了，不知所措，胡说八道。他也不像我那样，是自己说过的话，就无可改变了，只能老实承认，自己硬不承认，心里觉得别扭。

遇罗克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对软硬不吃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

预审员最后实在对他没办法了，就干脆用公布证据的办法。预审员在向遇罗克展示出遇罗克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和在“毛选”书页天地空白中的评语后，问道：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话？”

遇罗克还是一声不吭，脸上毫无表情。预审员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遇罗克清清楚楚地说。没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蹲过监狱的人，不会明白，这种“顶牛”，是多大的道德勇气。

最后，又提讯过遇罗克，审讯室里坐了二十几个人，主审说：

“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

遇罗克一脸天真地望着他们，说：

“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嘞？”

“别废话！好了，不和你耽误时间了。你想想吧，还有什么话想和你家里说，五分钟以后告诉我们。”

说完，所有的预审员，全部陆续退场。只留下法警和遇罗克。五分钟以后，预审员又陆续回来了。

主审很得意地慢慢地说：

“遇罗克，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

遇罗克慢慢抬起头，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主审气得脸当时青了。吼着说：

"遇罗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等着吧！"

遇罗克微笑着，弓着背慢慢走回来了。

十二

他确实是个狱油子，他清楚牢房中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走狗，哪些人急于立功赎罪。他利用这些人之间的矛盾，声东击西，煽风点火，把我们这号二十多人搞得乱七八糟，天昏地暗。

我往往不明白，他干嘛要把牢房里搞得这么复杂。本来心情就不好，还折腾干嘛？他笑笑说：

"如果，咱们号很平静。我们每天连聊天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汇报上去。所以，索性把牢里搞得大乱，二十几个人的矛盾，谁也搞不清谁是谁非。我帮他们制造了几个反革命集团了，他们互相咬着没完。我的言行就没人注意了。再说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缩影，可以乘机练练手。"

他的确很成功，那些积极分子天天在努力罗织别人组织反革命集团的资料。我们就乘机自己聊天，谈诗论书，以逸待劳。

十三

他也不是狱油子。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其他犯人。

凡是一切狱油分子卑劣、阴险的迫害其他犯人手段，他从来不会用。他最多玩玩政治权术，治治那些有“狗病”的犯人。

他是为下不为上。因此，丁大个儿之流对他恨之入骨。

十四

遇罗克确实给我们很深的影响，不是那表面的轰动的影响。而是慢慢地深深地在我们心底的深层结构留下了磨不去的印记。

我想起他，总是听到他那嘲弄似的笑声。我不知道，人是否有灵魂；或许有，不然，他怎么老是让我们无法不去怀念他。

遇罗克，接着笑吧……

遇罗锦

乾坤特重我头轻

——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

提笔之前

桌上放着一份再审判决书。全文如下：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 中刑监字第 1310 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 年 1 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出于无法形容的复杂心情，我的心在颤抖着。眼睛紧紧盯住那七个字：

宣告遇罗克无罪。

历史宣告了他无罪。

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只允许他活了27岁。

历史还将宣告他是“烈士”、“理论家”、“思想家”、“实践家”……然而，我盼望这些他受之无愧的名称吗？不。

我不想对我的哥哥给予任何评价。在我的身后有十亿中国人民——由他们去说吧！我只有一件责无旁贷的、十年来一直想做的事——用我这支笨拙的笔，凭着浅薄的思想、直觉的感官，去写写哥哥这位普通人，去写写他都干了什么事。

他只有27岁。

但他的生活经历、生活给予他性格的陶冶、他所做的事情，即使是年龄比他大一、两倍的人——如果庸庸碌碌过活的话，也不能与他相比！

一 金色的奠基石

呼啦啦的队旗飘拂着哥哥的脸……大晴空的映衬下，哥哥——遇罗克站在第一排第一个，紧挨旗手。

红领巾，少先队的旗！哥哥是东四区一中心小学第一批少年先锋队队员。当他的班主任——穿着白汗衫、蓝裤子、戴着红领巾的王笃元老师俯下身来给哥哥授巾时，他的表情是那么庄严、神圣！他举起右手向王老师行第一个队礼，那激动敬仰的神情使在台下观礼的我格外感动！他向上扬起的右手伸得多么笔挺有力，紧紧并拢的手指，几乎像要弯过去似的。

那天，他自豪地一口气向家跑去，炫耀着红得耀眼的领巾。我兴奋地紧跟他跑着，他胸前鲜艳的红领巾多像一团跳动的火苗！街上的行人投来多少羡慕、赞叹的目光呵！

“妈！我入队了！”一进门他就大喊，“给我买个日记本吧！今天的日子最值得纪念，我要从今天开始记日记！”

从这一天（1952 年的一个夏日）起，一直到 1968 年 1 月 5 日他被捕，他的日记就没有间断过。

那时，他是否把自己淘气和欺负我们的事也记进去了呢？……

他天资聪颖又淘气，在家里，或在小伙伴之间，常以淘气为乐事。6 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放了学，先做功课，并不用大人催。课余的兴趣非常多——搜集成套的小画片、弹球、打克郎棋、下军棋、跳棋……他一旦掌握了取胜的规律，便无甚兴趣了，又向另一个游戏“进军”。

他是那么诡诈，常常引起多少同龄人的欢笑和气恼啊！

下军棋或打扑克时，他曾不止一次地以诡诈的表情迷惑住对方而取胜，自己开心得咯咯大笑。为了破除姥姥的迷信，他画张吊死鬼放在黑暗的小煤屋里，望着姥姥那惊慌的脸，高兴地说："啊，原来鬼都是纸做的呀！"在姥姥最尊崇的"菩萨过海"的日子里，给姥姥素馅的饺子里偷放大油，看着香甜甜吃着饺子的姥姥，故意地问："好吃吗？"一直到姥姥败了兴、认为对佛失了敬、无法再迷信方才罢休。捉迷藏时，他往往巧妙地绕到小朋友背后，突如其来地大吼一声，吓人一跳，他却咯咯地笑着跑掉了。他更喜欢的是在空旷的大院子里挖出一尺多深的陷阱，上面掩饰得毫无痕迹……多么淘气的哥哥呵！有几个月，他每天早上睁眼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抄起预备在床头的木头宝剑，趿拉着鞋，连衣服也顾不得穿，从他的屋里匆匆跑到我和弟弟的床前，猛然把我们的被子挑开。我们从梦中惊醒，他已咯咯地笑着返回，钻进他的被窝看起课外书来了……

他虽淘气，但却时时显出爱思考的"小大人"神气，加上成绩优异，班里的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小学究"。他身体健康，很少得病，但却个子瘦小，显得文弱。上课时，他从没有过不守纪律的行为，专心听讲，理解力很强。学校的歌咏比赛、朗诵会、演话剧等等，都少不了他。他总是十分认真，做得出色。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班上演苏联儿童剧《特别任务》时，他扮演女主角冉尼亚，他那自然的表情、清脆熟练的台词，是花了多少功夫在穿衣镜前练成的呵！

过队日，王笃元老师带着可爱的孩子，背着小锅去郊外野餐。多么有趣的时刻，他们挖土灶、找干柴、架小锅、擀面皮、包饺子……哦，水开了，这水喝起来比哪日的都甜，即

使不渴也要争先恐后地尝一口。饺子下锅了！春风、田野、飘拂的鲜红的队旗，草地上孩子们的笑声……哥哥最喜欢的小姑娘叶丽丽快乐地尖叫，像蝴蝶一样穿来穿去。

“她漂亮吗？”哥哥骄傲地问过我，“你看她眼睛多大！”

“嗯……”我不以为然，那眼睛实在太大了。何况她还比哥哥高半头呢？

多美的野餐呵！

每到暑假，他和同学、朋友去郊游，在家里编《暑期小报》、演木偶戏、演唱京剧，都是他主编、导演，并且演主角。他编写的《暑期小报》是一张八开的白报纸，四周画上花边，所有的童话、寓言都是他自编自写，还设立了“征文”专栏，让我和两个弟弟投稿。有时我们难得写上两句半，他便热情地予以鼓励，认真地把我们的“大作”登在最显眼的地方。闲暇时他常写些童话、故事之类，投往中国少年报社。频繁的退稿并不使他气馁，叫他失望的是回回看不到编者的具体意见，只有一张铅印的退稿信。尽管如此，他还是乐观地继续写、继续投，给自己取笔名叫“秃笔”和“千章侯”。

有一篇在《暑期小报》上连载的童话《小气球飘洋过海记》，最能代表他当时的思想状况——10 月 1 日少先队员们在天安门前放气球，其中一个小气球飘洋过海，飞遍了中国和全世界。它所见到的中国和苏联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美国黑人的受难、非洲的反殖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黑暗等等，完全是当时学校对我们的教育内容，而哥哥是完全相信的——又有哪一个“祖国的花朵”不相信老师的话呢？那时候，国内一派和平景象，大搞经济建设，人民热爱新中国，党和领袖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极高。学校贯彻的全是苏联式的教育。“苏联老大哥”是当时最流行的名词。哥哥把这些思想融

化在美妙的童话里加以描绘，让幻想自由驰骋。这不独是他奇妙丰富的幻想，更是他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他在小报上还编过一则寓言：《新龟兔赛跑》。大意是：一只“博学”的乌龟主动要求和兔子赛跑，兔子一下子跑到前面去了，而乌龟心想：“嗯，我不用急，我在书里见过，兔子在前面那棵大树下会睡觉的、会睡觉的……”结果，兔子并没睡觉，早就到达终点了。

“这则寓言有意思吗？”他咯咯地笑着问我们。

“有意思！”我和两个弟弟几乎异口同声。

“这讽刺了什么？”哥哥让我说，蠢笨的我竟答不上来。

“小笨小笨。”哥哥笑道，“这是讽刺资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呀！”

他从小学就开始涉猎中外文学名著，读各种儿童读物和报纸。每逢走过书店，他便要进去看一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订《象棋》期刊，钻研时兴趣无边。在景山少年宫举办的少年儿童象棋比赛中，他获得亚军。他一手紧握锦旗，一手抱奖品，兴奋地从少年宫一口气跑回了家……

他的生活充满着朝气，对什么都想钻研、都感兴趣、都想问个“为什么”。在他眼前，世间一片美好，金光灿烂。他爱班主任王笃元老师，胜于爱父亲。我和他同在一个小学，我们相差四岁，差四个年级。放学找他回家时，他往往摆摆手说：“你先走吧！”那时，他和两三个学生背着书包，在操场或教室门口，围着王老师，不知聊着什么，脸上显露着幸福和欢愉的神情。

1953年秋，作为资本家的母亲（她的资本共有一千元，还有另外两个人合股），经过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洗礼；作为和父亲自由恋爱结婚的母亲，被丈夫宣布为“不温柔”。而协

议离婚，孤身带领我们四个孩子和年迈的姥姥，决心离开那令人伤心的家，换一个新的环境，忘掉以前的一切。于是她用不多的积蓄买了东四北大街果局大院的一个小四合院，共八间房。我们和水獭胡同荒芜的“百草园”永别了。

严寒的冬日，哥哥和我每天步行去上学要走半个小时。西北风刺骨地袭来，哥哥回头催促道：

“小妹妹，快点儿！”

“你看，”过了会儿他又说道，“前面那个人走路，脚走得多直，多正！来，”他忽然调皮地目光一闪，对我耳语道，“咱们在那个人后头走，你看那人又高又大，穿的棉大衣真像一堵墙，准挡风，别出声。”

这主意真是格外有趣！但只要他一遇见同学，立即便抛开我，兴致勃勃地和同学聊起天来，好像根本不知道还有我这么个人似的，根本想不起回头望一眼，那时，我只好委屈地远远跟着他……

我们是多么想念水獭胡同的大荒园呵！在那翠鸟啁啾、树木繁盛的百草园里有哥哥多少难忘的回忆！他在作文《我的童年》里回忆荒园——怀念枣树，它曾用身体挡住向他投来的纷飞的雪球；怀念那一排排的塔松，它们像绿色的卫兵，捉迷藏时将他的身体严严地遮挡；怀念那棵四人才能环抱过来的大榆树，喜鹊曾在那里筑巢，春天枝上结满了密实实的榆钱。他更想念果实累累的梨树和落了一地的蓝紫的桑葚、藏在草根下的红红的干枣，合欢树绒嘟嘟的粉红色花朵，还有那些无名的野草、清香的小花和各色各样的昆虫……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对美的感受和幻想的追求，在《我的童年》里，迸发出多么卓越的才华！《一堂历史课》和《我的老师》，也同样以那奇妙的构思和爱祖国爱学习的美好感情，赢得了全

校的赞扬。如果不读那么多课外书，他的作文怎能如此出色呢？

这天二姨来串门，哥哥朗诵他那被当作全校范文的《我的童年》。

“枣树啊，在那雪球纷飞的打雪仗的日子里，是你用你坚实的躯干，挡住了我的身体……”他感情充沛、微含着泪水。仿佛怀念的不是荒园，而是一位永远别离的爱友。

“怎么样，二姨，”他问道，“您听了受感动吗？”

母亲只有这一个妹妹。二姨的性情和母亲正相反，她的性情是贤妻良母式的。哥哥从小爱京剧，与二姨分不开。二姨一来，哥哥常和她谈京剧，向她学习。演唱《玉堂春》时，二姨让我饰演王金龙，头上顶一条毛裤，算是乌纱帽。我是“哑巴”，坐在她怀里，全由她来替唱。哥哥演苏三，他的水袖就是白窗帘，他跪着唱“过堂”那一场，起来时，双手揉着膝向后退去，那唏嘘哀叹的道白，那逼真的姿势，使人既感动，又依稀觉得可笑。

“演得倒是挺像。就是那窗帘差点劲。”姥姥给了一句最公道的评价。

每逢“六一”儿童节，母亲特意请假带我们去玩一天，照张像留念。1954 年“六一”过后，14 号那天，下着濛濛细雨。我和哥哥正要打着雨伞去上学，哥哥对母亲说：

“妈，你给我五毛钱吧，我想和罗锦照张相去，我应当在没毕业时和她留个纪念。”

“等天好再照吧。”母亲望望天说道。

“不，就想今天照，来得及，我们迟到不了。”

其实那天我并不想照，可是哥哥却拉着我匆匆走到隆福寺照相馆，要照一张小二寸，并选一张四边是枫叶的图案。

“要布景吗?”摄影师问道。

“要。”

他搂着我的肩膀，那么高兴和亲切。对于他的心血来潮我真有点莫名其妙！可又想，他早就应当这样彬彬有礼，过去，他对我们太调皮了。

最有趣的是，两年以后哥哥还在这家照相馆照了张做鬼脸的滑稽相，洗成书签的形式分赠给与他要好的同学。

1954 年 9 月，他被评为六年来学习品行兼优的学生，得了奖状和奖品。母亲看到儿子的奖状，感到无比的欣慰。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母亲奖给他一本《新华字典》。那两天哥哥整日翻看这本字典，在字典里唯一的一页空白纸上写了一段批语：

“附新华字典意见：此字典，好虽好，但缺单字也，‘典’不能用此书。‘腻’字‘网’字都缺。此字典，词太少，还称何字典？只有白话，可称白字典。‘意’字写得不好看，许多即同，可称童字典。解释不够，可称不善字典。字等词等完全一抄，可称旧古字典。‘新华’二字由何说起，不如叫破旧字画书。”

他从小时候就爱尖锐地提意见。

明天就是毕业典礼了，他将做为毕业班的代表第一个发言。头两天，他对着大衣柜的穿衣镜，关上屋门，反复地练习。他对着镜子行了无数个队礼，一遍又一遍地有声有色地朗诵着，纠正着自己的姿式和语气。上午他练习了最后一遍，几乎一字不差地把发言稿背了下来。

“小妹妹，”他满意地嚷道，“明天看我的发言吧!”

下午，他轻松地玩了半天。

低年级各班选派优秀生去参加毕业生的典礼。一大早，姥

姥给我精心地打扮起来。哥哥洗漱完毕，背着手打量我一番，撇撇嘴品评道："哼，活像个没人要的布娃娃！"

这话真使人丧气！我简直想哭了。

大礼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毕业生一律穿着校服——白汗衫、蓝裤子、红领巾。红、白、蓝像是花海，呵，真美极了。

"毕业典礼现在开始！"

喇叭和队鼓齐鸣，旗手高举队旗绕场一周。队旗的红光在每个人面前闪烁。我们拿着纸花走进会场，齐声呼喊："向大哥哥大姐姐学习！欢迎你们常来母校！"毕业生们整齐地站立起来，向我们热烈鼓掌。

校长和教导主任相继讲完了话。

"六年级一班代表遇罗克发言！"

在一片掌声中，哥哥跑上了台。他显然在极力克制着激动，站在几乎与他齐肩的讲台旁。他右手的五指并拢得像入队那天一样笔直，手用力扬上去，不小心指尖碰到了讲台的边缘，台下发出一阵友善的笑声。这笑声将停，却又发出一阵更响的笑声。原来，他的鞋穿反啦。现在是立正站着，那穿倒了的鞋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们很快地被他那爽朗、清脆、激昂的声音所打动，他那白镜框后面晶亮的眼睛，他那庄严的面容透出的恋恋不舍的心情，他那清秀的五官和不俗的气质，像一块磁石把人们的注意力全吸了过去。

"……我们就要离开母校了，就要离开抚育我们成长的老师了。敬爱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和老师们，是您们循循善诱地教导我们，关切地启发我们……"

哥哥的发言通过麦克风，越过敞开的大窗，随着窗外一片槐树的香气，奔向云霄和日光里去了！无数颗心和他的脉

搏一起跳动。

“让我们再一次向您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随着他那庄严的又一次队礼，六年一班忽然全体起立，和哥哥一起举起了右手。呵，哥哥的脸多么严肃、神圣！校长、主任、老师们都站了起来，随着队鼓齐鸣的节奏声，热烈地回身鼓掌致意。我心里呵，充满着欲哭的激动！哥哥就在这雷鸣般的掌声中含着热泪跑下了台。当他激动地跳下讲台那高高的木阶时，险些绊了一跤，被站在台下的王老师一把抱住，紧紧地抱在怀里……

“王老师，我们走了。”

学生们都走光了，哥哥和几个同学还依恋地拉着送他们出校门的王老师的手，向他做最后一次告别。

“王老师，我们走了……”哥哥又一次不舍地说。

“常来看我呵，孩子们！”王老师又一遍亲切地叮咛，“到了中学，一定要积极争取入团！”

13 岁的哥哥，戴着红领巾，怀着一定要刻苦学习、长大要对人民有所贡献的愿望，离开了东四区一中心小学，进入第一志愿的中学——灯市口男二十五中。

这是 1954 年，一进中学，他便写了入团申请书。

呵，金色的童年！

金色的奠基石！

二 逆子、还是孝子？

哥哥是逆子吗？是的。

哥哥是孝子吗？也是的。

我家那时七口人——父亲、母亲、姥姥、哥哥、我和两个弟弟。

父亲出身于城市贫民，爷爷原籍在山东省农村，因生活困苦去闯关东，便在黑龙江省黑河落了户。爷爷很早就去世了。父亲15岁便在铁路上当一名小职员，养活奶奶和姑姑。他刻苦勤奋，边工作边学习，因考试成绩优异，名列前三名，被保送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土木建筑系深造。他白天上学，晚上翻译日文挣稿费并著书来养活自己。笔名是“罗茜”。作品的笔名使他决定了我们这一辈的名字从“罗”字起。

父亲沉默寡言，脾气温和，不善于交际，但是却有一定的见解，更希望儿子能胜过自己。哥哥刚一记事起，他就给哥哥讲自己小时怎样刻苦、怎样孝敬奶奶的事；稍大，便又以古人的榜样激励哥哥奋发学习和孝敬老人。父亲在我们面前从来是说话算数，不轻易许愿。一次，六岁的哥哥上了房，任谁叫也不下来，父亲哄他说：“你下来，我带你看戏去。”

“真的吗？”哥哥两手叉腰，站在房上神气地问道。

“真的。”

哥哥下来了，父亲责备了他，自己明明不想看戏，却当真带他看戏去了。

哥哥曾获得北京市少年儿童象棋比赛亚军。那次他一口气从景山少年宫跑回家，一放下怀里抱着的奖旗和奖品，就连连叹气道：

“唉！只差一个子儿！比赛都快停了，还是不分胜负，裁判说：‘注意，还差15秒！’我一走神，被他吃了车！唉，要不，冠军就是我的了！”

“这正是你不足的地方，”父亲说，“不是一个子儿，而是你还差得远呢。”

哥哥诚服地没有作声。

父亲多希望儿子能成为知识渊博的人哪！但父亲从不读理论书，他最相信的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纯业务观点。

母亲出身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大家庭。姥爷原是木匠，和几个兄弟、徒弟做木器家具出售。姥爷兄弟七个，都住在一起。到了母亲上高中时，大家庭才瓦解，各自分居。母亲只有个妹妹。由于母亲天性爽朗，又好运动，姥爷拿她当儿子看待。她不受拘束，生就了男人般的性格。母亲高中毕业时，凡能拿出一百块现大洋者，可去日本留学，母亲便去了日本，进中专学商业管理。

“七七事变”后，父母和许多爱国青年认为不可再在敌国求学，愤然回国，母亲因此中辍了学业。回国后，他们在同一单位——建设总署工作，母亲任打字员。父亲任工程师，两人有了接触的机会，结为夫妇。

1948年，母亲与别人合股，用1000元钱接办了北京市的一个小铁工厂——“理研铁工厂”。全家由徐州迁到了北京，母亲任经理，便成了资本家，工人有十多个。父亲在这个厂里做工程师。

父母亲加上慈祥的不识字的姥姥，给家中创造的气氛是和睦安宁的。在我们家庭中，是可以平等地对话的。

说哥哥是逆子吗？看起来——他又是何等孝顺！他对父母、姥姥彬彬有礼，从不顶嘴。

在小弟弟一岁、哥哥九岁的时候，父亲认为母亲不温柔而提出离婚。离婚以后，哥哥从没有说过一句对父亲不满的话。他理解父亲，他相信他的心地是好的，是正直善良的。相信他忍痛抛弃了我们是不得已的。哥哥以无比宽厚的心肠对

待父亲。他常去偷看父亲，甚至和父亲身旁的姨也处得十分融洽。然而他又很孝顺母亲，他从不惹母亲生气，深深理解母亲的刚强性格和艰辛，总希望自己能早一天分担母亲肩上的经济重担。1956年，那位姨和父亲离了婚。哥哥这时急切地盼父亲回来！为此，他做了多少努力呵！先是劝说母亲原谅父亲，不成；哥哥又去求助于母亲的好友：

“劝劝我妈，让我爸爸回来吧！求您做做我妈的思想工作，让我们一家团圆吧！”

这一天时机终于到了，哥哥和我们一起跪在母亲面前，他流着泪央求道：

“妈，叫我爸爸回来吧！……”

母亲和我们一起哭了起来，复婚便在哭声中决定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哥哥哭泣。

他在吃、穿上是多么不讲究呵！从不记得哥哥要求父母给自己买过什么。而他总希望能用自己挣的钱，使父母、姥姥、弟妹们愉快。

他18岁开始挣钱，无论是在农村、做临时工，还是在工厂，每月挣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直看到母亲要生气，才勉强接下零用钱。有时母亲给他5元，他往往说：“妈，我只要3元就够了。”

炎炎的夏日，未见他买过冰棍，所有的零用钱都用来买书、纸、本子。每星期从农村回来，他都给父母、姥姥买吃的，常给家里买大米、青菜、水果、肉类等副食品。每月给姥姥买戏票。休息日不惜大力去洗全家的衣服，洗得是那么仔细认真。

他爱妹妹、弟弟，他不愧是我们的表率。每逢我们的生日，他第一个惦记，送我们书籍、日记本或钢笔，在扉页上

题上他的诗句。他的题词是多么生动有趣呵！

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他总是劝慰父母要坚强，以自己那乐观的精神和敏感的预见鼓舞我们。我们从他那儿得到过多少精神鼓励和安慰！这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坚定了生活的信心。

说他是孝子吗？他在哪一件大事上不是逆而行之呢？他死后档案里还有一份小学的全校大会表扬信——北京团市委表扬这位在"三反运动"中检举父母亲的学生。哥哥所检举的，是父母将一名手指被机器轧掉的工人严叔叔解雇的事情。由于哥哥的检举，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严叔叔的工作问题才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有人认为这件事有损于哥哥的形象，可我认为，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哥哥那善良、正直的心肠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哥哥那叛逆的性格呢？

他虽叛逆，却是内向的。每每做出主张、说出见解都胸有成竹，讲究方式方法，并不招人反感。

1954 年公私合营，母亲第一批主动地交出了全部产业，担任厂长，又是全国妇女代表、北京市代表、工商联委员、民建会员。那时母亲兴致勃勃地整天开会，全部热情都投入工作中。1956 年的一个夏天，哥哥在全家吃饭时，一面吃，一面郑重地对母亲说：

"妈，有件事我想了好几天了：您现在是全国妇女代表，又是市代表、厂长，您还一度想入党，可是您却收房租，这与您的身份极不协调，您说呢？"

母亲沉思片刻："你说怎么办呢？"

"依我的意见，您最好把全部房产交给国家，连咱们自己住的房也照付房费。"

父亲想了想说："咱们倒也不指望租出去的十几块钱。"

"并不是指不指这十几块钱的问题，"哥哥说，"而是性质问题。不是靠自己劳动得来的钱我们都不应当要。"

"交出去也好，"母亲考虑之后，说道，"咱们住的这几间房不用交，有这样的。把那两家住的房交出去算了。"

"要做您就应当彻底，"哥哥说，"干嘛还要留尾巴呢？咱们应当像别人一样，该拿什么钱就拿什么钱。其实您完全可以做到不留这个尾巴。"

这天，在哥哥的劝说之下，父母同意交出全部房产，并且照付房费，决定明天就去房管局办手续。

"妈，明天我和您一块儿去！"哥哥高兴得脸直放光。

哥哥这时只有 14 岁，还未退队。难道，他和剥削思想划清界线是给谁看的吗？难道，他向谁表白过这些行为吗？没有！

逆子、孝子，多么统一地结合在他一身！

也许，不能用"逆子"和"孝子"之类的概念来形容哥哥。因为哥哥是人民的儿子！

三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1960 年高考后的一个夏日，一位青年一动不动地俯身坐在写字台边。左手支着额，手指插在乱发里，握着钢笔的右

手，压在那写满诗句的揉皱的纸上……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他凝视着窗外，像是在思索、回忆，又像在无限的痛苦中要理清什么东西……

根据高教部的存档成绩单证明，哥哥高考成绩优异，却连大学的最后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政审不合格！

是自己政治上不求进步吗？是自己表现不好吗？是学习成绩不优秀吗？是自己不热爱党、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吗？都不是。然而，却被无声地宣判为祖国的渣滓，成了科学、理想和事业的大门之外被淘汰的对象！

也许，他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是个一连串的错误？或许，他在痛苦的思绪中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给自己的思想、言行加以品评、理出头绪？莫非，他在权衡、决定着什么？……总之，他连午饭和晚饭也没吃，就用这样的姿式苦苦地坐了一天。

母亲和姥姥时时担心、难过地望望他的侧影——那雕像般的侧影。这一天大家都尽力保持安静，连打水洗菜都故意到院子里去，而不愿进里屋从他身后经过。

没有金色的衣裳……

我在沉闷中回想着哥哥……

那蓝天下呼啦啦的队旗；那掌声雷动，激动人心的小学

毕业典礼；12 岁就写了入团申请书……

初中，他自觉地给自己订了学习计划，开始有步骤地涉猎中外文学名著。每晚复习完当天的功课后，他不读完 50 页书决不睡觉。

“哥哥，”我问他，“你困吗？”

“开始那两天有点儿困，现在好多了，慢慢就能习惯。”

他认真地记读书笔记。初中三年里，中外文学巨匠的作品他都读，一本一本的读书笔记里记载着感想、心得和摘录。哥哥的高中同学王学泰回忆道：哥哥因学习成绩优异，初中时得过金质奖章。这，没听哥哥说过。总之，他的学习是优秀的。然而，初一的操行成绩却是“良”。第一次得“良”！这“良”在一般学生看，也许很不错了，但哥哥却觉得这个“良”字刺眼，心里是多么不快呵！他才切身感悟到中学的要求比小学高多了。他回想自己这一学期哪一点做得不够，是否由于有时说话太尖锐、好争辩，引起一些同学不快呢？他万万没有想到，“良”，正是出身一栏（到初中便有了履历表）填了母亲是“资本家”的结果！他只想做得更好，更严格律己，一定要得“优”！但他更没想到，1957 年父母成了右派以后，他的操行立即成了“中”——并直到高中毕业。尽管他多次鼓励我写入团申请书；尽管他学习成绩仍那样优秀；尽管他各方面严格律己；尽管他劝说父母交出了全部房产；尽管他的高中同学深深感到，他总有一股隐含的不可遏止的要摆脱家庭包袱的苦闷和愿望……但操行成绩上的“中”字，就像铁箍一样紧紧箍在他的身上。

1957 年的“反右运动”，父母都成了右派分子。母亲下放车间劳动，免除了厂内外一切职务。父亲被劳动教养，水利电力部开除了他工程师的公职。

哥哥在入团申请书中主动地写了父母成为右派这件事，当时学校还不知道。他仍希望接受团的考验。尽管他有些问题弄不清，但他认为父母的问题是不应当由儿女来分担的——他相信团组织是不会混淆的。

哥哥升入二十五中的高中部——即后来的六十五中。1957年9月，开学的日子比正常的日期（9月1日）晚了几天。哥哥入学不久，便参加了课外文学小组。在会上他时而活泼时而文静，有时也和人们开个小小玩笑，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在漫谈时，哥哥建议说：希望今后的活动形式多样一些，如办板报、组织看电影和戏剧，请老师多做一些课外辅导，讲一讲文学名著，大家共同讨论以增长知识等等。他的建议提得恰当得体，文学组真的采纳了他的意见。

两位学识很丰富的老师（一位姓黄、一位姓徐）给大家热情地讲《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他们生动俏皮的比喻、广博的引证、幽默的谈吐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不久，他们销声匿迹了，同学们议论说两人被送去劳教了。又过了些日子，领导叫同学们揭发黄、徐两位老师的问题，大家面面相觑，都愣住了。

“组长领着大家讨论吧。”领导说完离开了教室。

会场上是难堪的沉默。

“谁发言？”组长勉强地问道。

一个高二的同学清了清喉咙，站了起来：

“那次徐先生讲《红楼梦》时说薛宝钗稳重大方，像个青年团员，这是不是攻击团组织的右派言论？”

会场立即乱了，有人说算，有人说不算。哥哥在一旁静默不语，他内心里涌起无名的痛苦。散会后他对王学泰说：

“这算什么呢？徐先生当时讲的时候大家都笑了，现在说

成是他的罪行。可是我们呢?大家不都感到讲得很有趣吗?如果说有问题，我们每人都有份儿!”

父亲被劳教，工资早就没有了。母亲那小资本家的家底经过了“三反五反运动”，再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在经济上是个“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人，往往不到月底钱就花光，时时向姥姥借一两元、二三元以救急。存折上的500元到父亲劳教时，已是分文皆无了。母亲的70元工资。要养活七口人，因此，住房自动缩减为一间半。全家住一间半房，那半间又兼厨房，一家人出出进进，怎能没有杂音呢？哥哥看书时总是皱眉头，显示出我们吵得他生厌的神气，我们就格外地小心，但终不能不发出声音来。

“妈，”哥哥有一天说道，“能不能把小煤屋腾出来，做我的卧室和书房?”

“那怎么行?”母亲不同意，“那是住人的地方吗?连门窗都没有，又黑又潮，墙都糟了，也危险哪。”

“不行，要不我简直没法看书。你们也觉着不方便。我得去和房管所商量商量，看他们能不能帮助修理，安个门。”说罢他去了。

哥哥走了，我忽地想出主意——一定要帮助他！便抓起把斧头进了黑黑的小煤屋。

黑屋子散发出浓重的霉味。我摸索着登上了破烂堆，便往那窄小的北墙凿了起来。

“咚咚咚”，当姥姥闻声赶来时，我已在那又糟又脏的墙上凿了一个透亮的大窟窿，一柱光线照进这从不见阳光的小煤屋。亮光处，许多蜘蛛、土鳖、钱串子正匆匆向黑暗处爬去。

“哎呀!”姥姥生气地埋怨道，“你真够可以！也不和大人

说一声儿，就凿个大窟窿？可怎么好哇。”

“您看多亮！”我高兴地说：“这儿可以开个后窗户啦！”

“你这孩子！还不快出来！”

哥哥从房管所回来，一见这个洞立即开心地笑了：

“真好极了！他们已经答应来修，正好让他们开个后窗户！”

经过房管所和一位亲友的帮忙，盛煤的小屋成了哥哥的住房。这小屋，门向西，夹在北屋和东屋狭小的空间里，门上有四块小玻璃成了个“田”字形，除了那小后窗，这门上的玻璃便成了唯一透亮的“窗”。白天屋内光线暗淡，而且很潮，母亲担心对他身体不利，可是除了常晒被褥以外，也想不出其他好主意。

“罗锦，”哥哥高兴极了，“你来帮我布置一下，看怎么弄最好。咱们布置得漂亮点儿。”

我们用旧报纸糊了顶棚，找了块旧白被里当做桌布，木桌是哥哥自己钉的，连刨都没刨，桌腿糊上了几分钱一张的木纹纸。桌布上压块玻璃板，压着他的作息表和学习计划，上边放一个台灯和一些文具。他自做的小书架上，书放得满满的。

“墙上一定要挂点东西。”他望着四壁说道。

“挂什么？风景画？”

“不，我有。看，鲁迅的诗笺，徐悲鸿的《逆风》、《奔马》，这几张你看怎么样？”

“真好。哥哥，我给你做几个简易玻璃镜框！”

床上方，挂着他写的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他那淋漓的墨迹，给小屋增添了生气。

不用看屋主人，光看这几张诗画、这苍劲有力的墨迹，就

知道主人的胸怀和抱负。小屋横宽只有一米多，长六、七米，在这以后，这间小屋的主人用他的一切行动和事实证明了：他是一位怀有强烈时代感的巨人——他是与暴风雨搏击的海燕，决不是贪图安逸的企鹅。

“这真是天堂！”一切布置完毕，我们都有些累了，他坐在铺着厚褥子的木板上，满意、幸福地望着四周，好像他现在获得的真是一座“天堂”。

“今天我太高兴了！罗锦，都得归功于你凿的那个窟窿。”说罢他咯咯地笑了。

小屋的灯光呵，从此便永远点燃在我心中了。

每逢我走进院内，
都要深情地凝望；
桔黄、暗淡的灯光，
映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读的背影，
总是在眼前飘荡……

我多爱这小屋，多爱这暖盈盈的、桔黄的灯光呵！

往后一段时间里，哥哥顽强、刻苦地学习，主要读物不再是文学，而是哲学。

“我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他对我说，“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更为正确，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

政治课从初一就有，但解决不了他脑子里的许多“为什么”，尤其是1957年以后……

他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文学，现在只作为临睡前的

辅助读物，有计划地结合所读的哲学著作来看。他认为这样读更能加深对哲学与文学作品的理解。他对从孔孟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著作列了一个详细的读书计划，每天读至深夜。如果说，学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缜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有所得的话，那么，哥哥的明智、灵秀、缜密、深刻、庄重、善辩正是他博学的结果。史、地、文、哲……从古到今的书籍，哪一类书他不爱读呢？然而，他还有比以上几条更可贵更难得的，就是勇气和坚定。这勇气打哪儿来？首先是他坚信共产主义，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思想指南的结果。因此才敢于抉择、敢于实践，敢于斗争。

没有金色的衣裳。……

我继续痛心地回想着……

1958年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六十五中的校园里也建起了十多座小高炉，鼓风机日夜作响。学生们“炼”钢的炼钢，运料的运料。哥哥也和大家一样，高兴地忙碌着。但是看着那满是蜂窝的铁块时，他怀疑了：

“这是钢？”

“是钢。”旁边的同学回答。

“不对，不对。我在工厂里见过钢，不是这个样子。”

“怎么能不是钢呢？”这位同学也迷惑了。

“这还是碎铁，只不过把它烧结了。”哥哥平静而执拗地回答。他认为自己肯定正确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

“谁说我们炼的不是钢？”一位老师从别处走来，他是负责炼钢的。

“我说的，”哥哥有些嗫嚅，“我觉得……”

“什么你觉得!”他严厉地打断了哥哥的话，“你知不知道全民炼钢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抓的大事？难道你反对大炼钢铁运动吗？……”他声色俱厉，滔滔不绝地训斥着，说了半天，似乎说累了，才一挥手道：“还不赶快拉劈柴去!”他大步走了。

“训我管什么用?”哥哥不服气地向同学吐了吐舌头，“铁还是铁，钢还是钢!”

这些“蜂窝钢”堆在校园里，经过风吹雨淋生了锈，蜂窝里长了草。

哥哥说了一句：“是钢为什么不拉走!”因此受到班里的批判。是呵，父母都是右派，自然要把哥哥看成“小右派”的!

所谓教育革命，就是学校办小工厂，增加了下厂下乡的劳动课程，同时加强政治教育。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几乎每天下了课都开辩论会。例如：全民所有制优越，还是集体所有制优越？人民公社先进，还是苏联集体农庄先进？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到来？等等。没有人指导，只有同学们任意发挥。假、大、空话充斥着整个学校。

接着就是“红专”辩论，认真地读书被看成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哥哥放了学有时去北京图书馆或首都图书馆看书，便又受到班里的批判，说他不关心政治。

然而，哥哥在这类过程中所受到的压抑、他心灵的苦痛从不对家里说……那时他才十五、六岁。

没有金色的衣裳……

1958年，我结束了小学生涯，考上了第一志愿——女十二中。我小学六年级操行全是“优”，然而一到了中学，竟也和哥哥一样——“中”。评语上写着：“应和家庭划清界线”。由于已有了哥哥做前车之鉴，又由于班上像我这种情况的同学不止一个，所以心头只是郁闷，并不感到受的刺激太大。

母亲看了操行成绩当然没有责备我们，她用那不屑一顾的大咧咧的神气掩饰心中的痛苦：

“唉，中就中吧。我早算了：大学毕业又管个什么！你爸爸倒是大学毕业啦！中学毕了业就找个工作，到工厂里也满不坏。还得凭技术吃饭！中不中又算老几？咱又不想入党入团！”

然而，哥哥仍在争取入团。虽然他感到出身不好，入团是多么困难，而出身好的人入团又多么容易——这容易本身就是对我们一种打击。但是哥哥却还在团的门外做入团的“最后的挣扎”。

1959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屋里只有我和哥哥。我正要去上学，坐在里屋写字台前的哥哥把我叫住。我走过去，站在里屋的门边，看出他内心有些激动，觉得奇怪。

“罗锦，到了中学，你写入团申请书了吗？”他望着窗外凝神问道。

“我还不到13岁呀。”我倚着门框，无精打采地回答。

“没退队照样可以申请入团。我相信，团的大门是向每一个人，也应当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

“太难了，哥哥。”我沉闷地回答，“父母都是右派，妈又是资本家。”

“别灰心，看你怎样认识。妈妈剥削过工人，这是事实。原来营造厂的一位严叔叔手指让机器轧掉了，父母就把人辞

了。要是现在，能为这把人家辞了吗？临时工还要转为正式工呢。当然，父母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不止这些，比如爸爸从不读专业以外的书，没有什么信仰。妈妈思想有些庸俗。我们对周围的人，尤其是对自己，更要用正确的思想去衡量、去分析。”

他中肯的话语几乎使我掉下泪来。他凭什么入不上团？凭什么我们的操行都得“中”呢？

当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耳边还回荡着他的声音：

“我还不想失望……我希望你能入团！”

在他的鼓励下，我不止一次地写过入团申请书，虽然自己学习成绩较好，也很听老师的话，但照旧挽救不了我得“中”的命运。我再也不写了。终于哥哥也彻底失望了。

有一天，我和哥哥又谈到这个问题，他沉痛地说：

“我要求入团是为了什么？无非是更要起先锋带头作用。一个什么组织也不加入的人，照样会要求自己成为人杰。”

我望着坐在写字台边一动不动的哥哥……

1959 年 9 月，哥哥升入高三了。

这时，他已经树立了这样的幸福观：“人的幸福是和艰苦奋斗连在一起的。”他十分喜爱加里宁的那段：“凡是创造自己幸福的人，应该做全体工人与农民的幸福的匠人创造者。当他成为一切人幸福的匠人时，他就会成为自身幸福的匠人了。”

中学快毕业了。理想和前途在召唤哥哥。他加倍地用功和努力。

为了毕业更能“保证质量”，每到毕业班就要换极左的班主任。有些学校就是如此。

哥哥对我说：“我不喜欢这位新来的先生，对出身好的同

学笑脸相迎，一点小事也要对他们大加表扬，常常对全班夸耀他们父母的功绩，哪怕有的人学习并不好。而对出身不好的人呢，总绷着脸，如临大敌似的。这样的人也配做班主任！我写了个希望他一视同仁的条子悄悄递给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格外敌视我了。”

后来我上了初三，才深刻体会到哥哥这些话的分量。因为那时我们也换了班主任，“左”得很！

学习、探索、奋发！既然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哥哥便将一切希望放在业务上。他要用门门杰出的成绩来迎接高考。1957 年以前，父母立志要让四个孩子全上大学。1957 年以后，由于经济条件太差，政治上又受打击，母亲不得不改变了看法。她认为当一名技术员最吃得开，当工人也不错。

随着年龄的增长，哥哥渐渐孕育了一个理想的志愿——搞地质勘探。

他对我说：“我从小就想，长大了我做什么最有兴趣呢？那时候想过当作家。可是这几年，我有一个最理想的志愿，就是考地质学院。我跋山涉水，走遍全中国寻找矿藏，多有意思！我不但可以钻研业务知识，而且也能了解社会，熟悉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走到人迹罕见的地方，欣赏各种大自然的奇景。在跋山涉水中，还能磨炼自己的意志，也有助于写作。这个专业最理想了。”

当时，有些青年人把地质学院视为吃苦受累的院校而不愿报考。哥哥是不是认为自己出身不好，考大学文科根本没希望，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录取的希望还大一点呢？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原因。

哥哥当真为自己的理想做准备了。搞勘探必须有健壮的身体，哥哥虽无任何疾病，但是看起来却显得文弱。于是他

求母亲添了些钱，买了一副生铁哑铃，订了严格的锻炼计划。冬天，天刚黎明，闹钟一响，哥哥就“蹭”地从被窝里坐起，以军人般的迅速动作穿衣，叠被，用冷水洗脸擦身，做完体操后便轻装环跑东四米市大街、神路街、隆福寺等街道，满头热汗地跑回家来，给屋里带回一团新鲜的空气，脸颊也少有地红润起来。然后便站在院子里举哑铃，每天总是比前一天至少多举一下，坚毅地练着臂力。

“现在我能举 46 下了！每当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再也举不动时，常常高兴地报着数目。

18 岁了！哥哥生日这天，格外高兴。昨天晚上——4 月 30 日，他就对着穿衣镜照了半天，琢磨着明天照相的姿势和表情。并找出了明天要穿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一身旧蓝布制服和一件旧白布汗衫。他梳着油亮密实的黑发，一会儿往前梳，一会儿往侧梳，梳了半天，还是认为自己原来的学生式平头最好看。

“妈，今天我 18 岁了，”5 月 1 日早上，哥哥对母亲说，“您给我五毛钱照张像吧。”

“五毛够吗？给你一块？”

“不用了，先照张一寸的就行。照好了还可以放大。”他接过钱，欢愉地嚷道，“18 岁了，成人了！”说完高兴地跑向照相馆。

成人了！哥哥对前途抱着多大的希望呵！他学习更加努力，除必须学的俄文外，他又给自己加了门英文。

“高考一定要争取门门一百分！”他自信而又沉郁地说，“家庭出身不好，成绩再不突出，上大学能有希望吗？”

小屋的灯光熄的更晚了……

文艺创作和投稿仍是他的爱好。这时他已不再写什么童

话之类。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尽管文章很吸引人，编辑们也不敢采用——调查出身，是两个右派的儿子，父亲又被开除公职去劳教，谁敢采用呢？后来，哥哥投稿不再那么勤了，只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作品订在一起，名曰《前途文集》。文集真是一个文思与才华的集锦！他曾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陈静文的病》放进这文集中。小说刻画了一位成绩很好而因肺病休学的学生和一位极“左”的班主任，也刻画了学校医务室的一位好大夫“黄妈妈”。陈静文在病中的心理状态被描写得细腻而深刻，他是那位班主任极左思想的无辜受害者。而班主任所以那样“左”，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文章提出了一连串令人深思的问题。

“罗锦，你给我的作品提提意见，”每次写完，他总是第一个叫我看，“注意，要第一感觉，有什么说什么。”

我感到多么高兴和骄傲——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但尽管如此，我和他并不算处处知心。也许由于年龄的关系，他并不什么都和我谈。最知心的要数他的几个同学，他们常常找他，高谈阔论和笑声时时从小屋传来。有一次，他和一位同学聊得起劲，连晚饭都顾不得吃。他送走那位同学后，回小屋便写，然后才到大屋来吃那已经凉了的晚饭。我很好奇，到他的小屋看了看，那打开的笔记本正放在桌上，我站在桌边掠了几眼，原来记的是他和那位同学的谈话——关于文艺现状的讨论。如有没有人性、个性，有没有超阶级的东西，文艺应如何反映社会等等。用甲乙二人对话的形式写出，十分生动活泼。他们的观点，与当时流行的某些观点是很有差异的。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高考成绩优异，却连最末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难道这中间有什么差错？哥哥怀着一丝渺茫的希望一大早就去找班主任。

“那就在家等着嘛，”班主任冷冷地说，“做为社会青年也可以找工作嘛！”

哥哥全都明白了！

从早晨到天黑，他一动不动地坐着……

这一天，是他痛苦的一天、抉择的一天、新生的一天。是《出身论》在强烈萌动的一天。是他被迫走上政治斗争的险恶道路的一天。

四 上社会大学实践系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和任性，因此很难讲他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欲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

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哥哥正是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

第二天一早，哥哥写了一封信，尖锐无情地斥责了那个极左的班主任。我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

"……您这种做法，对无辜的心灵是残酷的扼杀。做为一个教师，这样做无异于犯罪。如果有一天我当教师，我决不像您这样对待学生……"

"唉，你写这干嘛！"母亲虽然深深地同情他，却又不满地说道，"你写了，他就能改了？"

"虽然改不了，"哥哥一面贴着邮票一面说，"也要触一触他的灵魂。"

"管什么用？你要不给他提意见，也许还不至于……"

"他对不提意见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就好了？"哥哥反驳道。

其实，哥哥那时候还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意识到这类问题深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根源。但哥哥决不忍气吞声，他要回击。他给高教部也写了信，控告班主任打击报复——他那时还没有更充分确凿的事实来证明，班主任的作梗其实只是社会上极左势力微小的一部分；但他要向扼杀青年的恶势力宣战。他用这封信向中学时代做了诀别，也用这封信表明了他决不退缩的抱负和恒心。

"没考上就没考上吧，不分配就不分配，没什么了不起。找个工作也不是找不着，早点儿工作，满好。"吃饭的时候，妈妈安慰着哥哥。

哥哥一直默默地吃饭，这时抬起头，平静地说：

“妈，我已经考虑过了，咱家经济确实很困难。但是我打算自学一年，希望您支持我再考一次大学。”

母亲听了一愣，随后，脸上渐渐阴沉起来。

哥哥继续说道：“如果说因为班主任作梗没能考上大学，现在我摆脱了他，倒是件好事。我想再试验一次，看在没有人作梗的情况下，我能不能考上？如果我再考不上，您放心，我再不考了，一定去工作。”

“有几个社会青年考上了大学的？”母亲皱着眉说道。

“既然高教部有这规定，就可以试试。或许，那些人的成绩都不太好？也未可知。我一定要再试一次。”

“五年不是简单的呀。”母亲沉着脸，为难地说道，“这五年，可怎么供应？一个大学生，每个月没有 25 元，下不来！申请助学金，咱们又不够条件，全家总不能不生活呀！”

“我想好了，妈。如果自学这二年的基础我打得特别好，上大学就不太吃力，尤其是英文俄文。我可以白天上学，晚上翻译点外文资料，挣些钱来减轻你的负担。泽涵的父亲在情报研究所，要点资料翻译不成问题，我已经问过他父亲了。”

哥哥在家自学。他找来了大学中文系必读的书目，虽然那些书他大部分都读过。他也不因此懈怠，反而加倍地用起功来。从线装的古书《史记》、《孙子兵法》到《新约》、《旧约》，他都要涉猎和钻研。为了他如此博览群书，亲友们曾担心地劝过他：“知识太多太杂了危险哪。”他们所说的危险，就是怕知识多了，头脑比一般人的复杂、想得多，对社会有看法，因而倒霉。然而哥哥听到这劝告只是不介意地一笑，他决心要做一个书本和实践知识都丰富的人。

他的学识常使他的学友们暗中钦佩。我听见他的高中学友刘健华和曹泽涵对母亲说过：

“伯母，罗克的水平我们都赶不上，可惜这么一个人才！……”

1960 年底，报纸上第一次号召青年人到农村去，去做有文化的新农民。

哥哥自愿报名去郊区公社当农民，把申请书交给了东四街道办事处。

“哥哥，”我说，“妈妈希望你上工厂呀，你干嘛非要去当农民呢？”

“我想了解社会，了解各个阶层，”他说，“从中也锻炼我自己，妈仅仅从经济上考虑，这是庸俗的想法。先别告诉妈。”

他一面等着批准，一面仍顽强地自学，在生活上也比以前更刻苦了。过去他上高中，母亲无论怎样紧，也要每月给他五元零用，他把绝大部分钱用来买书。自从未考上大学，哥哥便自动对母亲说：“妈，我只要一元就够了。”

“你总不能那么紧吧？”母亲见他执意不肯多要，有些生气地说，“咱们干脆来个折中，每月给你两块钱吧。万一你来个同学出趟门儿呢，手里哪儿能一分没有！”

哥哥同意了。洗澡，他在家里洗，这样又省了几毛钱。他无钱买书，便借书看。他把这一元钱用得不能再省，但是当我们生日时，他仍要送礼物给我们。有时还要带着干粮骑自行车和同学远游，买些纸、笔等等。每天早上，他骑着家里那辆旧自行车去北京图书馆，像上学一样地遵守时间，并坚持锻炼身体，毫不懈怠。为了把这一年当做两年、三年来学，他在怎样刻苦地用功啊！

那时，哥哥写了一个剧本《法官与罪犯》，内容是：一母所生的兄弟两个，由于弟弟一生下来便给了人，不通音信，长大后兄弟二人互不相识。在他们相见的那天，哥哥已成了罪

犯——为出身问题鸣不平的政治犯，而审判他的正是“出身好”的弟弟。他们的母亲是资本家，由于社会所承认的“衣裳”的价值，他们一个成了“反动透顶”的罪犯，一个成了响当当的“革命者”。

可惜这个剧本在文化大革命时和他写的许许多多文稿一起烧掉了。

哥哥的小屋，在我眼里，赛过所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我一定要画下它，留个纪念。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人们要纪念它。一天，哥哥去图书馆时，我进了这小屋，画了一张水彩画。我画下了它的全貌，多希望有一天它能成为一本书里的插图！

1961 年 2 月 6 日上午，只听邮递员在大门外喊道：

“遇罗克的信！”

哥哥跑出小屋。他一面看信，一面兴奋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

“什么好事，罗克？”院里的四家邻居都探头问道。

“红星人民公社让我在一星期之内去报到！”

邻居们听了大不以为然。

“我立刻去迁户口！”他匆匆走进屋，忙着找户口本、粮本、副食本。

“罗克呀，你急什么？”姥姥说道，“再有一两天就卖春节的供应品了，一年才这么一回，差一天你都等不了？”

“等不了，等不了。”他故意用淘气的声调说。

“再说，也得等你妈回来呀。”

“等不了，等不了！”哥哥做了个鬼脸跑了。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姥姥十分惋惜那些即将到手的副食品。

哥哥迁户口回来，吃完午饭，便收拾行装，首先放在包

裹里的便是书、纸、本、笔，其次放了个脸盆，拿了几件旧衣服。

“不要弄乱我的小屋，”哥哥嘱咐我们道，“星期天我还得用它呢。”

再见了，小屋！哥哥临走时最后向它瞥了一眼。小屋的门紧闭着，像在静静地等待主人的归来。

我们帮他拿着行李上了汽车。他在车窗里探出头来嘱咐我们：

“我会给你们来信的，叫妈不用惦记！”

汽车扬起一股尘烟，矫健的雏鹰向蓝天飞去了……

他走了，家里却像少了不止一个人，有些空落落的。我似乎有更多的时间去想他。这时，我回忆起他儿时到现在的成长过程，他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更深深地觉得，这是一位多么杰出、勇于奋斗的人才啊！

四天以后——1961年2月10日，接到哥哥的第一封信：

妈妈姥姥：

我平安地到了这里，一切顺利。领导对我很热情，将我安排在菜园小队。这小队包括温室组。初来乍到，远远看到几个碉堡模样的圆形建筑，原来是培养蘑菇的温室。菜园小队共三十个高中学生，我们算是农业工人，先发给工资二十五元。住宿舍、有食堂、饭票制。食堂菜给得很多，很便宜。主食是大米饭和馒头。我第一次领到工资，可高兴了。买了几块钱饭票，给您买了瓶好酒，给姥姥凭票买了半斤点心，还买了些大葱和鸡蛋。这些好吃的都放在床底下。剩下的钱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时交给您。

来到农村
一切尚好
夜间出门
谨防狗咬

罗克
1961年2月8日

“这孩子，没正经的！”母亲哭笑不得地说，“也不等我回来就迁了户口跑农村去了！和谁商量啦？真是要多任性有多任性！工厂找个工作还成问题？不听，非要跑农村受苦去！唉！幸亏是农业工人挣工资！”又对我们说，“还有你们一封呢！”

我和弟弟欣喜地打开信看起来：

最想念的妹妹弟弟们！

今天我已经上了社会大学的第一课——扛阳畦的草苫。二百来斤重的草苫，社员一扛就走，可我却感到十分吃力。队长要把我调到温室组去，我拒绝了。别人扛得动，为什么我就扛不动？咬咬牙，一天到底干下来了，虽然疲累不堪，但心里格外轻松。

愿你们常给我来信！

你们的好哥哥灯下草

“好哥哥”——他常这样调皮地自称。当然，他是受之无愧的！

星期六傍晚，哥哥回来了。他晒黑了，显得高了些，肩膀也显得宽了。他把钱都交给母亲，母亲让他留了五元零用，她感到十分欣慰。

哥哥又从中抽出一元对姥姥说："这一元您买戏票吧！以后我每月孝敬您一元。"

"好小子，"姥姥笑得合不拢嘴，"姥姥也花上你的钱了！"

"以后那一元由我给吧。"母亲说，"你的五元零花就是你的，每月我收你十块钱足够，我给你存起来。"

其实，父亲劳教还未期满，家里正艰难，母亲想把钱存起来是做不到的。

他在罗勉那本书的扉页上题词：

书本是海洋，
字句是波浪，
眼睛是帆船，
载着你呀，
到"抱着天的怀里"去游荡！

"这'抱着天的怀里'是什么意思呢？"

他解释道："这句是外国一本儿童诗里的——蓝天问大海：'大海，你为什么这么蓝？'大海回答：'因为我的怀里，抱着美丽的天。'你看，写得多美！"

他给罗文讲了一篇最著名的西班牙童话为什么好，又翻着《裴多菲诗选》说：

"'爱情、自由'是裴多菲最有名的一首，"他背着手，在屋里踱着，背诵道，"'爱情、自由，人们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献出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写得多好！柔石译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还有这一首，"他翻着书，找到那首《路上》，指给我看道，"这首写得也好。一个多年不见母亲的人

走在回家的路上，想着一会儿见到母亲将说些什么，但是一到家，什么话都没了，只是吻着母亲，‘像果实挂在枝头’，多逼真动人！”

“哼，你还知道这个！”母亲一撇嘴说道。其实，她心里不定多高兴呢。

母亲对哥哥的职业越来越满意。这不仅是哥哥每月给母亲十元，后来长了工资便给十五元，更因为这两年的副食紧张，多亏了哥哥每星期给家买奶油、撑死的填鸭等营养品。她常幻想着退了休到哥哥那里去养老，等哥哥结了婚抱孙子呢！可是，哥哥有女朋友吗？我从没发现过。也从没听见他和他的学友们谈论过女人。哦，那个儿童时代的大眼睛小姑娘，像童话般地消失了。虽然再没听哥哥提起过她，可我却不止一次地回忆起他那位儿童时代的“美人”：她那在郊外野餐时快乐的尖叫声；她在我们百草园里将一大把合欢花包在绿叶里的新奇的发明；她站在门廊下望着靠石柱坐着的哥哥，二人想入非非地说着什么……初中、高中，哥哥全是在男校度过，也许他爱过，但那是对男孩子的纯洁的爱，在他的日记里，记载过对一个男孩子的爱，就像对一个恋人那样钟情。但是他们什么行为也没有，所有的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动作，所有的只是哥哥在日记里的热烈澎湃的感情，那个男孩子却未必知道……成年了，美妙的儿童时代和情思勃动的少年时代过去了，却始终没有发现哥哥有过女朋友。呵，那是有一次，正值哥哥公休时，我走过他的桌边，瞥见一首他刚刚写完的诗，那一行行清秀的小字十分吸引我，便看起来。

桑田里桑树多美，
桑叶儿飒飒低语。

遇见了我的人儿，
我心里多么欢喜！

桑田里桑树多美，
蟋蟀将琴弦弹起。
遇见了我的人儿。
……

这诗既像民歌，又像自由体，读起来朴实亲切，朗朗上口。写在一张横格纸上，有一两处涂抹的痕迹。他写的是谁呢？是不是要投稿？不像……我不由一个个回忆起那里的女孩子来……会不会是她？我想起女宿舍里一位活泼伶俐的女孩子，是广播员，也是新去的农工，高中毕业生……正想着，哥哥进屋来了，我赶紧离开桌子，假装干这干那地瞎忙乎着，一面却偷偷观察他打算把这首诗如何处理。如果他是准备投稿，我倒会免去全部猜测。只见他站在桌边对着那首诗心事重重地发愣，然后沉思地拿起来，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撕了……

也许，那是朦胧的、由于各种因素而夭折的爱情？谁知道呢！

我知道哥哥绝不是禁欲主义者，虽然他的一生始终是严肃的。他的感情含蓄而丰富，他渴望爱。

1961年9月，我考上了工艺美术学校。心里高兴极了，竟举着报到通知书在院子里欢蹦了半天。

“这下我可有盼头了啦，”母亲那天多喝了半盅酒，显得很高兴，“熬出一个是一个呀。看来，只有上中专这条路最好。学校管吃管住，出来就是技术员，满不坏！”……

哥哥听了我考上中专的喜讯，兴奋地对我说：

“你缺什么？我一定要送你点儿东西。”

他去工艺美术服务部买了水彩、画笔和速写本，在那亚麻布面、印着奔跑的小鹿的速写本里，题上他的《祝词》

我祝你幸福；
前进吧，
你踏上了理想的道路。
但愿你许血于轩辕；
但愿你忠实于艺术。

我祝你幸福；
勤奋吧，
你锻炼得精力永充足。
但愿你征途中饱经风险；
但愿你青春的活力把万难排除。

我祝你幸福；
幻想吧，
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
但愿你开放得争梅斗菊；
但愿你吸吮大自然的温柔。
扬帆、
　　击鼓，
　　　祝你
　　　　幸福！
　　　　　好哥哥罗克

六一年九月。

晚上，我躺在床上，心里那么幸福、快乐，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哥哥那劲秀、清晰的笔迹。快乐之外，又隐隐地感到悲哀。我多么希望也能写一首祝贺他考上地质学院的诗啊。

哥哥酷爱大自然。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农村，每逢星期天仍不减从小就喜欢远游的兴致。他与要好的学友，偶尔带上我和弟弟们，去登山、游泳。下大雪去爬长城，秋天看红叶，夏日游昆明湖……这些成了他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内容。在自然的怀抱里，那柔和的风，那辽阔的景，一下子便荡涤了他胸中的苦闷，使他豁然开朗，感到自己是天地的儿子、国家的主人，感到奋斗之乐，不屈之美……呵，他从自然之母那里得到了多少美的感受和动力呵！每逢远游，他总要做一首诗或词来纪念一天的感受。

1961 年秋天，他和好友们登香山"鬼见愁"，作了一首词：

游仙·登香山鬼见愁

巨石抖，
欲把乾坤搂。
千古奇峰人共有。
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
山下渺渺茫茫。
来路崎岖征路长，
那堪回首眺望！

这首词，在1962年3月31日我生日时，他买了一个天蓝色塑料皮的大日记本，工工整整地抄在扉页上，送给了我。

1962年7月，哥哥和农村的两位好友，好不容易取得了公社同意，去报考师大中文系。他们多么想上大学呵！尽管三人成绩都很优异，却由于出身问题，硬是叫大队卡住了。血统论的流毒是无处不在的！虽然哥哥在家里不愿多提这事，不露声色，但他不定多痛苦呢。

1962年8月中旬，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哥哥对我说："你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呢，最近我们菜园忙不过来，招家属临时工，一天一块钱。你在家呆着也没事，不如去干上十天，还能挣十块呢，买点书也是好的。再说，你了解了解农村生活，对你也没坏处。"

"好吧。"我欣然同意了。

上午，哥哥让我和他一同去首都图书馆还书借书，为了让下乡青年们有书读，哥哥想方设法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每次可借阅二十本，哥哥自动担负起还书借书的任务。下午，我帮他拿着沉甸甸的书，一同上路了。书包里还有他给当地社员代买的茶叶等小物品。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完成社员托付他的采办任务。买回来的东西交代得一清二楚，不差分毫。我亲眼看到，那些男女青年都和他相处得那么亲热和自然。

我在家属队干活，哥哥在壮劳力组。这天，他那组也和家属队在一块地里劳动。家属们一边干一边聊着天，手脚却飞快！我使劲赶才勉强撵上她们。使我吃惊的是，哥哥干得并不算慢。他蹲在菜地里，一反平日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飞快地间着菜苗。他那不甘落后的姿势，那闪亮的眼镜、紧闭

的嘴角、瘦弱的后背，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当时我只佩服他，却并没想到他何以会这样顽强……

好不容易盼到歇息，大嫂们鼓励我说：

“行，干两天就好啦。你哥哥乍一来，还不顶你呢。”

“罗锦，干得下来吗？”哥哥从那边走过来问道。

“干得下来。”我勉强回答。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社员从那头走来，老远就喊：

“喂！伊拉克（社员们按照哥哥名字的谐音给他起的外号），昨儿个，那工分你咋给我记的呀？”

这时我才知道哥哥原来是记工员。

“怎么了？”哥哥望了他一眼，坐在田埂上，好像不屑于再看他似的，把目光投向菜地。

“我明明干了一天，你咋给我记了三憩儿？”

“下午那半憩儿你哪儿去了？”哥哥望着菜地微微一笑。

“你说我哪儿去了？”他显得很有理。

“还是你说吧。”

“我说就我说，不信你问问——”

“甭问了，”哥哥沉静地说，“你当我不知道呢？下午那憩儿，你大儿子来找你，你回去一会儿，回来打个照面又溜了，你当我不知道呢！”

几个社员笑了，直到这时，哥哥才轻松而锐利地盯了他一眼。

那个圆睁的小眼睛和哥哥的目光对视了两三秒钟，似乎还想耍赖，却又噗哧乐了，无奈地笑嚷道：

“好你个伊拉克，我算服了你了！也难说，你小子比别人多俩眼睛！”说罢，拾起一块土疙瘩随便一扔，悻悻地去了。

“这赖瓜？”一个社员不满地笑道，“记工员这差事不好当，

就是爱得罪人！”

“因为有空子可钻，有人才敢赖，”哥哥说，“如果都一丝不苟，没空子可钻，就没人敢赖了。”

“不是说，”一位大嫂一边往包袱皮里装间出的菜苗，一边说，“听我们当家的说，那次上馆子吃饭，有伊拉克在旁边，谁也不敢往兜里装瓷勺、小盘儿什么的，谁知他身上怎么有股神光儿？”

这句话把哥哥也说乐了。

干了四天，手上打了泡，一握农具生疼，腿酸腰也酸，我真不想干了。

好像什么也瞒不过哥哥，他似乎早已看出我的心思，一开始，他这么鼓励我：

“还有人想跟你交朋友呢。”

他看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又说：

“画呀！你不是带着水彩和纸呀？你看，这儿的风景多美，要是我，早利用中午时间画它一张了。”

“嗯。”我勉强地答应着。

“手疼吗？腰酸？不要紧，过两天就好了。这不比在学校下乡劳动。你们家属队的活儿算最轻的了。我们用锹翻菜畦，不比你们累？可我也干过来了。她们还夸你能干呢，坚持坚持就好了。”

第五天，我又勉勉强强干了半天。中午收工时，我向宿舍走去。钻过一片玉米地，只见哥哥也扛着铁锹从另一块地里出来了。一见我，他就从破旧的制服口袋里掏出个桃子递给我说：

“你尝尝，甜极了，我们这儿的特产，刚才一个社员给我的，我刚咬了一口就想起你。你要是嫌脏，用水洗洗再吃。”

本来我想用水洗洗，一听这话，心里十分感动，反倒不嫌脏了，就吃了起来。我们俩向宿舍走去。我没话，他也没话。好像他已知道了我心里在想什么。

“哥哥，”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想回家了。”

“你真决定走？”

“嗯……我还想多练练画呢。”

这话根本不值一驳。然而哥哥却不说什么，也不挽留，这反倒使我更加惭愧。

“好吧，”他的语气平静而温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今天吧。”我嗫嚅着说。

“嗯。晚上我送你去车站。九点钟奶牛场有送奶的卡车直达东单。坐那个车还能省几毛钱，又快。下午你不愿意干活就呆半天吧，我还是希望你再坚持干几天。”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觉得太对不起哥哥的爱护和关切，可是又不能摆脱怕苦怕累的想法，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午饭后。我坐在哥哥的床上，看到他枕边放着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两本哲学著作。这两本书，我记得他以前都看过。

书底下是他的读书笔记，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在摘录旁注着各式各样的批语，如：“哈，抓住小辫子了！”“可笑”、“深刻”、“妙”、“讽刺”、“注意”等等。有些是反问作者的语句，仿佛在他面前的作者是一位相当熟的朋友。

枕边还有一本俄文版的中篇小说《阿霞》。扉页上写道：“没用字典读完此书，足可纪念也。”枕上方的墙壁上用图钉按着一小方块白纸，写着本月的读书计划，劳碌了一天的哥哥，就是这样顽强地学习着。我的心哪，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天还不太黑，自行车在水渠那狭窄的土埂上行驶，中

间早已被行人踩成微凹的、光溜溜的羊肠小道。宿舍渐渐被甩在身后，与昏暗的夜色溶成一片了。水沟边黑黝黝的高大树木哗哗作响，似乎在催促着黎明的到来。美丽的影子倾洒在流动的河水上，映着月光，抖抖地闪动着。沁人肺腑的田野香气扑鼻而来，倍觉爽快。深沉、寂静、蕴藏着无穷生命的田野啊！

星星像一盏盏灯挂在天边，正静静地望着我和哥哥呢。他骑车带着我，我时时担心他万一摔倒。前轮有时微微一歪，我就一惊，真怕我们俩都掉到沟里去。哦，他微驼的却有力的后背，他这散发着亲切气息的破旧衣服，那每一条衣褶、每一根布丝都浸透着多少苦辣酸甜啊！我不由得轻轻捏住他衣服的后襟，仿佛生怕失去他。我们平安地驶过一段路，又步行着穿过了一片草地。夜雾打湿了草梢，我们的裤腿都湿了。一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静极了。只有苍黑的田野和银色的月光，只有我们踏着青草的唰唰声和蟋蟀那动听的鸣唱。一路上，我问他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他给我讲着……路过一片葡萄园时，他给我讲社员偷葡萄的巧妙方法——如何把守夜人引到另一边去……

到了奶牛场，正好有几个搭那辆车回家的女青年，她们叽叽嘎嘎笑着和哥哥打招呼，也都亲切地管他叫“伊拉克”。

一年来，哥哥的处女作《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和《评影片〈刘三姐〉》相继问世了。他高兴得在小屋里跳跃，险些撞破了低矮的纸棚。

他买了一条浅粉色的缎带，天蓝色电光线，订了一个大硬皮本，扉页贴着自己一张四寸的半身像，他对我说：

“今后，凡是发表的文章，我都装订在这大本子里，作为一个文集。”

文章的发表给了他无限的力量，他又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定名为《前途文集》。这个集子如今还在中级法院。

有一次，我读了一本美国小说《小妇人》，很想动笔给哥哥写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写信：

哥哥：

当暑假那天你带着我在田野上行驶时，我心里就骂着自己是逃兵，可是我又没有勇气承认。直到今天，想起我如何怕苦怕累，心里总不安。我读了一本《小妇人》，里面的乔多么像我呵！我真喜欢她的性格，可是不如她有勇气。后来，她嫁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穷教授，这结局似乎令人奇怪，可是又很能说明她的性格。我还看了一本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我真喜欢……

哥哥很快便回了信——

罗锦：

你的信我看了两遍，并把它珍贵地保存起来。我真高兴你能写出你的读书感想。可是，光是喜欢还不够。人的面前有两类知识。一类是业务知识，一类是人的知识，这两类知识我们都要认真地学习。《热爱生命》这篇小说，列宁曾给予高度评价。它道出了强者的力量，道出了生命的价值。《小妇人》我也看过，写得细腻逼真。我也喜欢乔的性格。但是，如果看书以喜欢不喜欢为满足，读书就成了消遣。应当学习作者熟练地掌握各阶层人物的语言和思想方法……你是搞艺术的，应当多涉猎文学作品，以此开阔自己的艺术眼界。我建议你订一个读书计

划。现在我初步帮你拟一个，供你参考：1.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2. 托尔斯泰的……

这封信里，他列了几十本各国的名著，我都未看过。我望着哥哥那清晰、劲秀、有些局促的笔迹，呵，他在我的心里一下子高大起来——哥哥，不仅是我的兄长，还是我的良师。他多么值得我敬爱呀！从这以后，我照哥哥的书单一本接一本地看了起来。后来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

这期间，母亲给哥哥介绍过一次对象。也许她看哥哥已经二十岁了，还没有女朋友，想实行做母亲的关心吧。然而仅仅这一次，却弄得大家尴尬万分。

说来话长。1961 年 9 月我考取美术学校，开学报到那天，哥哥曾特意请了假和母亲一同去送我。我们高兴地在汽车上说着话，一位长得挺漂亮的姑娘直瞅我们，她身边也有件行李。

"你是工艺美校的吗？"她凑过来问，"新生吧？"

"是呀。你呢？"

"我也是那学校的。今年读三年级了。"

"噢，"母亲望着她笑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德。"

"你哪一个专业的？"

"雕塑。"

"雕塑都包括什么？"哥哥问她。

她回答了哥哥的问题，我们又闲谈了些别的。

母亲对德似乎很有好感。每逢星期日我一回家，母亲就问到她。因此我也有意地和德接近起来。

1962 年哥哥的文章发表后，德对哥哥似乎很感兴趣，问

了一些哥哥的事。我把这新奇的发现告诉了母亲。父亲这时已劳教期满回家，每日在家里翻译外文资料挣些钱以补家用。

“你哥哥也不小了，”母亲说，“要说交个朋友也不算早了，可以多了解几年嘛。”

父亲这时插问道：“她漂亮吗？”

“你就知道漂亮不漂亮！”母亲不满地顶撞他。

“你看你妈，”父亲温和地笑道，“一问漂亮不漂亮你妈准生气。”

“我生什么气？”母亲一跺脚，从这个凳子上站起来，却又坐到另一个凳子上去了。

“我哥哥能同意吗？”我怀疑地问。

“他有什么不同意？”

母亲胸有成竹，“人长得挺漂亮，又是中专生，再有一年她就毕业了，就是技术员。这样的对象可不好找哇！再说，那天在汽车上，你哥哥一个劲儿瞅她，我早看在眼里了。”

我有点儿怀疑母亲的观察。

“这事应当先问问哥哥吧？”

“不用问，”母亲满有把握地说，“一问，见了面倒不自然。你只问问德就行了，她若同意，下星期日你请她到咱们家来吃午饭，我做几个菜。等我瞅个机会，让他们俩出去走走，这事就成了。”

看母亲那十拿九稳的神气，我也似乎相信了。

星期天，我和德一起进了家门。从父亲的眼光中，知道他对德还是满意的。母亲又像 1957 年以前每次迎接客人那样，张着两臂，微微哈着腰，迈着快步子，满面春风，像要拥抱谁似地从里屋走出来，热情地招呼道：

“噢——，来啦，姑娘！来啦，就等着你哪！”

德很有礼貌地向父母打了招呼。母亲忙着张罗，给她倒茶，一面闲聊着。

“我哥哥呢？”我问母亲。

“我叫他买酒菜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姑娘，中午在这儿吃个便饭，我做几个菜你尝尝……”

这时，哥哥买了东西回来，一见德便说：

“哦，那次在汽车上遇见的不就是你吗？”

他和德随便地聊着，母亲知趣地紧忙到里屋淘米洗菜去了。

我们三个闲聊了一会儿，母亲一定觉得该“趁热打铁”了，便端着正淘米的盆，站在里屋门口，笑盈盈地对哥哥和德说道：

“我看，你们俩不出去走走？一会儿回来吃饭？”

哥哥先是一愣，立即便红了脸，像抑制着无比的气愤，咕噜了一句：“庸俗！”便推开屋门，朝大门口扬长而去。

不用说我们当时都呆若木鸡，也不用说母亲气得脸直泛白。单说德吧，那处境十分尴尬。她很快便告辞了，无论我送她时怎么解释，她也不再理我。

傍晚时哥哥才回来，若无其事一般。见我们心绪不佳，他便也不理我们，吃完晚饭就回公社去了。临走时，他悄悄地瞪了我一眼，愤然地说道：“你也干这种事！”

哥哥走后，母亲气得发誓嚷道：

“我今后要是再管这小子，我不是他妈！”

我和父亲觉得很对不住哥哥——真的，我们的做法太不好了，为什么不事先征求他的同意呢？

很久以后，我才好意思问哥哥对这件事的想法。他说：

“我最反对介绍什么对象。何况你们连问都没问过我，怎

么知道我必定喜欢她？一个人最应当注重心灵的美。我觉得她很一般。”

一直到哥哥被捕，也没有发现他有过女朋友。也许是他没有遇到理想的人吧。或许，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更丰富的世界？

农村是哥哥进入社会大学的第一课。在那儿，他结交了和他志趣相投的朋友一同苦读；在那儿，他经受了艰苦的劳动磨炼；在那儿，他熟悉了广大的农民；在那儿，他开始认真地调查了社会之一角。

哥哥是最不幸而又最幸者。他不幸——在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极左思潮所带来的种种政治恶运；他幸运——正是这种逆境造就出后来的遇罗克。

呵，农村！大多数学生刚来时抱了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啊！他们幻想着老贫下中农的关切备至，幻想着大嫂们给他们缝补破了的衣裳……时过不久，学生们的幻想很快地自生自灭了。而他们不得不惊异地发现，始终态度冷静、始终情绪饱满的就是哥哥。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用瓜菜代粮吃。生活中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吃不饱，体力跟不上。

然而，哥哥从不叫苦，在田里仍是满头大汗地干着。初学农活时的笨手笨脚常常引起社员们善意的哄笑，每逢这时，哥哥只微微一笑，抬袖擦擦额头、鼻尖上的“白毛汗”，便又不自量力地干去。他在劳动中顽强的毅力，那单薄的身体劳动时的英姿，那始终持久的乐观和自信，感动了多少人呵。

由于下乡来的学生出身都不好，不久就传出一种说法：这是一些“反动学生”，不得不来的……

一位姓贾的戴眼镜的文弱书生，因“无理殴打温室小队

长，蓄意报复”，被开除了。

不久，又有五个学生被调走，分散到不同单位，因为他们结成了“反党小集团”。

学生们的心灵又罩上了阴影——在这儿，仍逃不过“与众不同”的命运啊！终于，有的人走了，被骂为“逃兵”；有些年龄大的，开始筹划未来的小家庭。

当许多青年感到委屈、失望、迷惘的时候，哥哥却显得那样清醒、乐观、坚定、有力。

对荒谬、反动的血统论，他怀着更深的愤懑。在他的《前途文集》中，他由衷地表述了自己的情绪。

上工路上，他一路谈笑风生，随便地同过往的熟人打招呼、开玩笑。碰到哪个女工大嫂抱着孩子，他会过去拉住孩子的小手，挤眉弄眼地作怪相，逗得孩子咯咯笑，他自己也笑成了孩子。

哥哥所住的宿舍在大队部院里，共住八个人。两个老农工，两个原市委党校教师——“右派”，一个下放的中学教员和三个新农业工人——哥哥、小叶和小王（和他同考大学的朋友）。

“少年幸遇读书风”——这是哥哥在一首诗里写的一句。

劳累了一天以后，同宿舍的朋友们又开始读书的竞赛——看谁最后熄灯。

哥哥让罗文做了个土台灯，灯柱和灯座都用木头削成，灯罩是用画报纸糊的，放在一张三人共用的“床头桌”上。这桌子，就是一只板条包装箱，口朝里，用砖支起来，像小学的课桌一样。箱面再糊一张报纸。

每天晚上，哥哥、小叶和小王，按照哥哥的提议，先轮流在桌上练习几篇毛笔字，然后便各自看书。

他读书很勤奋，并非处处都懂，倒是确实的。但他总是抱着一定的探索目的，尽自己的水平去穷究底蕴，吸取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哥哥具有这样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只要你不自甘颓废，那么在同他相处时，你就不得不调动起全部自尊和毅力同他"竞争"，以做一个值得他结识的人为快。他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会反照出你自己的盲目和虚浮，使你惭愧，促你奋进。当环境不利于人的求知上进，平庸颓废极易流行的时候，这种影响的存在是多么可贵啊！

在宿舍里读书的条件是艰苦的：拥挤、嘈杂；附近一个很大的粪池溢出难闻的气味；电井房机声不断。这里是蚊蝇最多的地方，宿舍既无纱窗，又无竹帘，只能任由蚊蝇横行。

为了静坐读书，要穿上很厚的布衣裤。将裤脚、袖头扳紧，外加一盒清凉油，才对付得了。盛夏，哥哥就是穿着这样铠甲似的衣服，一晚一晚地在灯下读着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及《世界哲学原著选读》……

经历了第二次高考落选的失望和打击，三个年轻人又希望去当兵，用热血表明自己的红心。但是，连体检都未被批准——军队里哪能要出身不好的呢？

他沉默了，彷徨了。菜园里再也听不到他那咯咯的笑声了。

"实在不行，我们就去钻象棋。看来只有这一样是不用看家庭出身的。"他对小叶说。

啊，这话多么使人心惊！"实在不行"这几个字，小叶还是第一次听到……

一天打歇时候，有个叫张小四儿的青年农工，平时常爱

同哥哥开玩笑的，这天不知说了句什么，两人竟抱在地上滚了起来。哥哥那瘦弱的身子好像突然增长了无穷的力气，简直不顾一切了。开始有些围观者还打气、助威，以为两人在玩闹。后来还是张小四儿发觉不对头了，赶快松开手爬起来，瞪着惊诧的大眼睛，喘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你怎么啦?! ……”

哥哥红着脸，谁也不看，带着满身的土，一声不响地坐到一边去了。他的神色很不好，激动中流露出内心的自责。

张小四儿还在一边吃惊地望着他：“怎么了，这是？真急啦！……”

是啊，他不能明白。他一向无忧无虑，因为他一身清白。虽然哥哥也一样……

哦，这是唯一一次哥哥冲动得失去了自制。过了好多天，他的情绪才渐渐恢复。但路上碰到什么人，也只是随便招呼一下，极少再开玩笑了。

为什么把人的肉体来源作为决定命运的根据?! 啊，血统论，你这无所不在的恶毒的幽灵！

重复的打击落在旧的创伤上，总是倍觉沉重。他一时止步，沉默了。

但在短暂的彷徨之后，他重又奋起，开始了新的寻求和探索……

三个年轻人合写过一本诗集——《凝秀集》，由小叶用小楷誊录，小王去“荣宝斋”装订，每人一册作为纪念。但这本宝贵的诗集自然没逃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他们合办过油印小报，这是哥哥提议的。虽然只出了一期，但是那期小报却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一期，小叶写了一篇《浅谈京剧音乐的板腔结构》，哥哥写了散文《涿

县纪行》。在那艰苦的环境里，他们怎样发着自己的光和热呵！

1963年夏，哥哥嫌宿舍太吵，租了老乡家一间小西屋，小叶和同室的小许也租了一间，和哥哥南北紧邻。

这间土屋狭小而低矮，四壁是黄褐色的泥墙；一铺后山炕占去地下近一半面积，中等身材的人伸手可及报纸糊的顶棚。前窗下支着一张岌岌可危的"桌子"，桌角一摞书，桌上是弟弟做的那个土台灯。案头壁上贴着一张"陋室铭"：

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

"这不使人难堪么？"小叶笑道。

哥哥回答："无论是'鸿儒谈笑'，还是'白丁往来'，耗费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无暇多顾了。"

他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哲学外，还自修俄语、日语，临睡前仍看各种文学书籍。

严冬，屋里像个冰窖。没有火炉，手脚冻得都伸不开。但每当他看到一段启发人的文字时，他的心都要热起来，常常忍不住走到邻屋去，把自己的幸福和激动告诉小叶他们，让朋友们和他共同享受书本的愉快。

小叶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一个雪花飞舞、脸盆里的残水早已成了冰碴的一天，哥哥闪披着棉袄进来了，举着一本书，赞叹地说：

"写得太好了！你也应该看看。"

"什么书，这么大惊小怪的？"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你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呵：'法学家既郑重地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

是的，是实践和书本的养分把哥哥育成了人民优秀的儿

子！

1964年初，他决定离职回城——进工厂从学徒工做起，当工人。

母亲反对说："我看，你那儿虽然是农村，生活水平可不低呀！虽然三十多块钱，可顶城里四五十元花——那儿东西又便宜，吃得好，开销又小，离城又近。将来在那儿成个家，也不错嘛。偏要回城，有什么意思？你都快二十二了，还当学徒工？一个月才拿十六块钱？……"

她怎能理解哥哥的心思呢？她怎能知道，哥哥还有更大的抱负呢？

哥哥一下定了决心，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他终于办好了手续，要离开可爱的农村，要离开他的难忘的陋室了。他将奔赴另一个广阔的天地，去磨炼自己，继续调查社会，学习社会。

行前，他在土屋的墙上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物去人非陋室留，
斯人知唱不知愁。

永远不会被哀愁击倒的哥哥，带着深沉的爱和恨，去了。他的心情，正如他在农村所写的一首诗：

千顷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亦长。

他去了。他是向着更艰难的环境大步走去的。

首先他必须自食其力，决不能在家里吃闲饭。

那时分配工作一年比一年难。一九六四年比起他高中毕业时，工作已经很不好找了。

他在东四街道服务站，作为社会青年，填了求职登记表，等待分配工作。但是，就连求职登记表上也有“出身”一栏！

工作迟迟不分，他又绝不想在家里多吃一天闲饭，于是一次次地去催办事处：

“我家里太困难，求你们先给我找一个临时工作，一边挣些钱，一边等分配。”

“工作？……”他们终于想起了，“看传呼电话的那个老头病了，要不你先替他干着？”

“行。”哥哥从来没有虚荣心和架子。

他看过传呼电话，在换房站帮助抄过换房地址。后来由一个熟人帮忙，又去首都图书馆做临时工：整理图书目录。还去中国情报研究所管理过外文资料卡片。所到之处，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即使当时这两个地方有招工名额，他也转不了正——这样的机关谁能要出身不好的人呢？政工组是通不过的。

一直到今天，首都图书馆的同志还感叹地说：

“你哥哥，多好的一个孩子呵！多少年了，他就是我们的老读者。在这儿工作时，没有人不喜欢他的。那么好学、聪明、会处人。唉！你哥哥一被捕，我们图书馆也挨了上头的批评——怎么让这样出身的人在这儿当临时工！”

又经过朋友的帮忙，哥哥来到安外蒋宅口小学担任代课老师，并代理过一段班主任。

他是怎样爱那些孩子们哪！一个非常乱、学习成绩很差

的班，在并不长的时间内，一跃而为全校成绩和纪律最好的班了。这不奇怪吗，不，因为哥哥最懂得孩子们的心。

“罗锦，”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给我画一张壁报，题目是‘光荣榜’。左边写‘谁是英雄谁是懒汉’，右边写‘光荣榜上比比看!’左下角画个懒汉，右上角画个用功的好学生。这样……”他用铅笔给我打了个格式，立即去买来一大张图画纸。

于是，每个学生名字后面插了一面活动的小红旗，就在这张壁报上比赛起来——看谁的红旗走在最前面。哥哥用自己的钱，买来铅笔、橡皮、小图书，奖励那些领先的小学生。这一鼓励非同小可！在孩子们的眼里，同样一根铅笔，老师奖给的比起自己买来的，大不一样啊！

他爱孩子们。这个班里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哪个老师也管不了。一天上课，一位最调皮的男孩子做小动作，哥哥制止不听，便叫他站起来。他气哼哼地站起来了，一脸的不在乎。

哥哥继续讲着课。过了会儿，叫他坐下，他偏不坐。有的同学笑了起来。

哥哥立即爽朗地对全班说：

“好，××认识到自己错了，老师叫他坐他都不好意思坐。我们大家欢迎他这种认识错误的态度。咱们一起鼓掌表示欢迎!”

大家笑着和哥哥一起鼓起掌来。

这学生偏又一屁股坐下了，装着不介意地晃了晃脑袋。大家又笑了。

“好!”哥哥又热情、肯定地对大家说：“这回，××是真正认识自己错了，他知道刚才老师叫他坐，他不坐是不对的

了。因此他坐下了。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变成一个守纪律的好孩子。咱们再一次鼓掌，为他能够认识错误表示欢迎！”

大家笑着热烈地鼓掌。这个孩子羞愧地低了头，红着脸，半天都没抬起来。而哥哥却像没看见一样，接着讲课……

从此，这个最调皮的学生对哥哥敬服得五体投地。而哥哥从不歧视任何一个孩子，一视同仁。并且常给有自卑感的学生更多的鼓励。

不光如此，每星期日，他不是带孩子们去过队日、爬山、游泳、划船，就是在他那狭长昏暗的小屋里给孩子们讲故事。他讲高尔基、列宁小时候的故事，鼓励孩子们要正直地做人，克服软弱和怯懦；他讲世界名著，各种童话，教导孩子们要诚实、善良、有礼貌。在那光线暗淡的小屋里。多少双稚气的瞪大了的眼睛在晶莹地熠熠放光啊！不论哥哥手里在做着什么，只要是孩子们一来，他便立即放下手里的事，满足孩子们的要求。

一次，我们玩具厂卖处理的铁制小手枪，二分一把。哥哥一听，立即掏出一元：

“快，罗锦，替我买五十把?”

“干嘛买这么多?”

“我给班上的学生一人一把。”

星期日，孩子们每人拿着一把小手枪，上景山和他玩军事游戏去了……

寒假，他组织了业余绘画小组，让我教孩子们画速写。教完，该做示范了，孩子们争着让我画像。哥哥指了指旁边一个期望地望着我、却又不好意思争的学生，微笑地说：

“给他画一张吧！”

当我把那孩子的画像送给他时，他的脸笑得像一朵绽开

的花。

和哥哥一起走出校门，才知那孩子就是最调皮的那位学生。

“我算把他治服了，其实他很聪明。”哥哥咯咯地笑着，这天真的笑声多像个调皮的大孩子啊！

后来，他又在朝阳区小牌坊胡同小学担任代课教师。不久，由于在报上发表了批评姚文元的文章，他被学校解聘了。

幸运的是，办事处负责分配工作的徐老师认为他是一个既有头脑又有才华的青年，多方努力推荐，他终于进人民机器厂当了学徒工。那是1966年6月。

爱人者永远是被爱的。那些纯真的孩子们，在哥哥离校以后，还常来找他。而他也依旧关心他们的学习和一切，给他们讲故事。一直到他被捕，孩子们还频频来打听。一开门，总见一两个或几个孩子流着泪站在门外，难过地悄声问道：

“遇老师回来了吗？”

望着那些泪流满面的小脸，家里的人怎能不深受感动！

爱人者才会被爱！

无论在街道、机关、学校，哥哥都看到了“血统论”带来的严重恶果，看到许许多多被损伤的灵魂。他记下了真实的统计材料。

1966年6月，哥哥刚进入人民机器厂，“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便开始了……

五 “恶毒攻击罪”

森冷的小屋再冷，

冷不过哥哥的目光；
地下的岩浆再热，
热不过哥哥的胸膛。
……

我永远不能忘记，1966年8月28日那天中午，我在屋里坐着，忽听哥哥在小屋门口召唤道：

“罗锦！”

我立即走进他的小屋，看到他的眼神十分不寻常，仿佛决定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我不由有些紧张起来。

“现在抄家风大兴，”哥哥站在桌边，望着我沉痛而严肃地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信件、笔记全部烧掉。你如果也有不必保留的日记，最好也烧掉。在烧它们之前，我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现在你就坐这儿看吧，看完我就把它们烧了。”

我只有用沉默来回答，心情像死神般可怕——日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呵！

“就是这本日记，”接着他拿起一本放在桌上的蓝皮“北京日记”，又说道，“这里面记的是我近一年来的思想。这些想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论如何我也舍不得烧了它。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吗？过了这阵抄家风就拿回来。”

“能！”我不假思索，就双手接过来，坚定地搂在胸前。他注目地望着我，似乎完全相信了。

“看吧。”说罢他背着手站在关闭的门前，向玻璃外的天空望去。我默默地走到小床边。床上那一叠叠的日记、文稿、

信件、读书笔记，似乎都在哀泣地望着我。而我的那一句“看完了”就将是它们被烧毁的宣判词。

从加入少先队的第一篇日记到成人的历程，像画展一样陈现在我面前。哥哥的性格像快速电影般在我脑海里掠过……这些披肝沥胆的日记，这些文思奇妙的文稿，这些与朋友互勉的信件，难道都不能活过今天？这不是日记和信件，这是青春的诗篇和生命的火焰！这一天，我才知道哥哥是怎样记日记的呀！一个何等敢于解剖自己的人！

从他高中时代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起，从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事物唯一正确的思想指南起，他就开始每天思过——把一天中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言行都无情地写在日记本上加以鞭挞。每星期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思一次过。他的勤俭朴素、刻苦学习、宽人严己、敢于向不正确的言行作斗争的勇气以及待人处世的方法，都是有意识地战胜自己的“私我”才达到的境界呵！

只要是他一时不明白的，他就要通过读书或实践的途径把它弄清楚。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他就坚决改正，决不再犯；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坚持不懈。而对与错，都有一个正确的标尺，即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

像这样敢于战胜“私我”的人，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他的做人准则和生活目标怎能不始终如一？怎能不坚强？怎能不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怎么会投降变节？处处严格地检验自己，这就是他的自豪和幸福！

有的人口头上也宣称他相信唯物辩证法，唯独缺乏解剖自己、战胜“自我”的勇气。他们不敢首先拿自己开刀，总是拿别人开刀。而哥哥在我们同辈人中，或在我们周围的人们当中，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第一个如此无情地解剖自己

的人！如果每人都能像哥哥那样，这世界该多光明！该会减少多少虚伪、欺骗和软弱！

我一篇篇翻着它们，屋里只听得见轻微的沙沙声，而哥哥仍然以那一动不动的姿势向天空凝视。森冷的小屋再冷，冷不过他的目光；地下的岩浆再热，热不过他的胸膛。我悄悄抬起了头，难过地望着他——他的目光是冷峻的，而在他的胸膛里，该翻滚着多么灼人的岩浆呵！听，隔壁院子里传来红卫兵的打砸声和不幸者的哭泣、哀嚎声；看，后窗外便是烧东西的袅袅青烟。思想要被铲除，肉体要被凌辱，还有什么属于人们自己呢？

当天晚上，母亲没有回来，与厂里的黑六类一起被群众专政了。第二天一早，我把哥哥托付给我的那本日记夹在我的二十本日记当中，放在一个花布书包里，跑遍了所有与我要好的同学的家。家家都在胆战心惊地烧东西，所到之处无不这样问我：

“怎么，你还不快烧了它？这时候你还穿裙子？”

谁也不敢藏它们，而且对我居然还要保留它们感到吃惊。我走得精疲力尽，心想，藏在公园的哪块石头底下或石洞里？然而公园全让大字报糊严了大门，好多天以前就禁止开放了。怎么办呢？已到下午，说不定今晚就抄家呢！这时已走到文化宫前面，很想上厕所，就进去了。厕所里静得出奇，又干净又敞亮。以前我到公园写生时常到这厕所来，对面一排高高的白油漆门总是用绳索穿着不打开。此时这一排紧闭的门，静静的就像一排卫兵。我忽然心里一动：日记拿回家太危险，不如放在对面的门里，明天一早我再想办法另行安置。对，只好这么办！一看左右没人，我便把这一书包日记从那干净的白瓷砖地上塞了进去。弯下腰看看，一点儿也看不见。心想，

只存放一夜不会有什么问题，总比家里安全。又看看窗外，见一个人也没有，才洗洗手，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全城就临时戒严了。原来这天上午毛主席要接见百万红卫兵，连自行车也不能随便通行。糟糕！我忐忑不安、坐卧不宁……下午两点，才开始通车。我紧忙赶到那里一看，不由愣住了——两排门大开，书包早已没了踪影。干净的地面现在尽是痰、纸屑和污浊邋遢的脚印。我忙找到两位打扫厕所的女同志，问她们看见一个花书包没有？她们只掠了我一眼，便耷拉着眼皮，一边扫地一边干巴巴地回答：

“没看见。”

此外再问不出一句话。

我自己的日记丢了倒是小事，然而却辜负了哥哥的重托！心里七上八下，万分懊悔！谁知道哥哥那里头记的是什么呢？唯有这本我没看，因为哥哥没叫我看哪。万一有“犯上”的话，不等于我出卖了他吗？我哭了半天，饭也吃不下，也没心思上班。父亲责备道：

“愚蠢哪，愚蠢！还有比你更蠢的吗？怎么能藏在那个地方？”

可是又藏哪儿好？棚顶会被捅破，墙壁会被凿穿，埋地里？小院里五家人，万一被谁看见听见？邻院就是街道积极分子，她的孩子经常往这院跑……或许，哥哥也是没地方藏，才交给我的吧？唉唉！我是怎样辜负了他呵！

哥哥下了班听到这噩耗，先是一愣，再没有说一句话。

父亲问他：“你记了什么犯事的话没有？”

他发呆地回答：“对陈伯达、姚文元有些看法。”

“蠢哪蠢！”父亲焦躁地瞪了我一眼：“还有比你更蠢的吗？

罗克呀，你也是，还不烧了，偏偏交给这蠢丫头！”

我惭愧得头都不敢抬起来，痛心地流着眼泪。哥哥却很快恢复了常态，只说了一句：

“小妹妹，我不怪你。”说罢便走进他的小屋。

这句宽宏的话更使我难受！一直到死，我也会觉得对不起哥哥！我辜负了他的重托啊！

原来公园管理处的人把日记交给了领导，领导很快转交到公安局。8 月 30 日，我厂领导找我谈话，问我在文化宫的厕所里藏了什么，显然他们已全部掌握了情况。

三十一日晚上母亲厂里的红卫兵来抄家。我和父亲正被强迫跪着，门突然“豁啷”一声被推开了。屋里的人惊异地望去——啊，深蓝的夜空衬托出哥哥那严峻、镇定、苍白的脸。他那锐利、冰冷的目光像闪电般直刺向惊愕的红卫兵；那坚毅、紧闭的嘴角，正直的鼻梁，发着寒光的白玻璃镜片，直慑人的心魄……

他站定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威严地望着他们。红卫兵们从呆滞中猛省过来，一涌而上，将他团团围住。但他铁塔般地立在那儿，锋利的目光使人发怵，竟没人敢拉他一把。

“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十分欢迎！”未等他们开口，哥哥便先发制人地果决地说道，“就是你们不来，我也要请你们来！但是——”

“你就是遇罗克？”

“但是十六条明文规定，报纸上也多次讲明，‘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你先跪下！”一位“勇士”照他的后脖梗猛拍一掌。

“你打人？”哥哥疾速地扭过头去，灼灼的目光紧逼着他，脸色煞白；那不可侵犯的凛然气度竟使那人缩回了手，悻悻

地避开了哥哥的目光。

“我犯了什么罪?”哥哥那冷透骨髓的目光紧盯着眼前的红卫兵。

“出身就是你的罪!”

“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一个人的道路却是完全可以选择的。请问，你们是如何看待家庭出身问题的呢?”哥哥朗朗地问道。

“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哥哥和他们激烈地辩论着，突然，门外又涌进一群红卫兵。

“遇罗克，走，厂子叫你去!”原来是哥哥工厂的——就因为那本日记。

哥哥被带走了，和许多“黑帮”、“狗崽子”关在一起。没过两天，我也因日记问题被厂里批斗，视为阶级敌人。我和哥哥的日记曾在“全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展出过，说这是“变天帐”。

他们从我的二十本日记里筛糠似地找出六句话(这六句话既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又没攻击党的领导，现在看起来完全正确；而其它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努力学习的话一概不算)，便说我“思想反动，根深蒂固”。

而哥哥那本日记里记的是什么呢?直到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才从法院里得到当时定他罪名的那些日记摘录——那些因丰富的实践、勤奋的苦读、周密的思考所产生的闪光的金子。

如果那所有的日记、文稿、信件都不烧掉，该有多少闪光的金子!

这不独是一位青年敏感的神经对生活的直觉和感应，而且是经过丰富的实验、痛苦的磨炼而开出的思想之花。它的

光芒足以照亮迷惘的人们面前坎坷不平的道路，足以暴露那些吃人的披着人皮的豺狼。哥哥既不认识高干子弟，又没有“内参”可看。他灵敏的政治嗅觉、深刻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他坚韧的斗志、远大的胸怀、利他主义的抱负，他严格律已、对真善美热烈追求的高尚品德，都是他结合社会实践，每晚在小屋里苦学、深思的结果。啊，一颗高贵的心！它是书本、实践和思考的产儿！那四溢着桔黄灯光的可爱的小屋，就是培育这颗心的产房！

哥哥的价值，正好在于这些被宣判的罪行上面！

六 《出身论》——时代的产物

“谁敢和我辩论？”

1966年11月的一天，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哥哥一蹦就跃上了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的石阶，双手叉腰、气昂昂地、挑衅地望着过往的行人。这凛然的无畏神气，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街道上拥挤的行人；那响亮豪迈的话语，像闪电般划破了反动血统论笼罩的铅样的天空。

很快就围起了一大群人，四处的人们络绎不绝地向他走来……

“谭力夫之流们，你们有人敢和我辩论出身问题吗？”

哥哥又一次向稠密的人群喊道。人们好奇地盯住他，而更多的人却你拥我挤地观看他身后刚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出身论》。那十几张粉红色的纸上写满了清晰、劲秀、有些局促的毛笔字——那是哥哥不顾在工厂劳动一天的疲劳，用十几个晚上抄写成的呵！早在半月前，哥哥、我和弟弟就用

刮印的办法，油印了五百份《出身论》，贴在各大路口和重要的机关、学校了。它像烈火一样燃烧、照亮了人们的心。在贴有《出身论》的地方，从早到晚都围着五六层人，在纸边的空白处，写满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语："好得很！向作者致敬！""大毒草！砸烂他的狗头！"人们询问着作者的姓名，然而只有"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一令人深思的笔名……

"你小子要辩论什么内容？"十几个气势汹汹的穿黄军装、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挤进最里层，手里攥着宽牛皮带。

"我要辩论的就是这《出身论》。"哥哥用手向身后一指："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还是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

"你小子要有胆量，咱们先辩论谭力夫的红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不！"哥哥严峻的两眼像射出了两道冰光，"辩论谭力夫反动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污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

"对！"人群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他妈的谁嚷？一群混蛋！"十几个红卫兵怒目横眉地乱叫："谁不拥护红对联，就砸烂谁的狗头！"

"其实，"哥哥的目光透着嘲讽和轻视："那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人群哄地爆发出一片笑声。

"说穿了，"这笑声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当然！"红卫兵们嚷道："我们认为，家庭影响就是大于社会影响！"

"实践恰好得出相反的结论，"哥哥斩钉截铁地回答："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哥哥雄辩的口才、充实的论据把红卫兵们那些对立的和貌似折中的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出身论》以油印的方式在北京城里点起了最初的火。在这动乱、血腥、恐怖的北京城里，出现了一位多么勇敢的战士！

1966年10月1日，母亲和我都被扣在厂内，哥哥和父亲被勒令不许走出家门，两个弟弟去广州串联，实是为了避难。姥姥因病住在二姨家。

10月2日下午厂里才放我回家。进了小院，走到哥哥小屋的门前，看到他正坐在桌前奋笔疾书呢！他写的就是那篇轰动全国、致使他得到死罪的《出身论》。

哥哥在这篇立论严谨、事实充分、语言辛辣的一万多字的论文里，阐述了两个大问题：

一、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他认为：

一个孩子"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的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因此，他认为："总的说来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社会

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哥哥认为：“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

二、重在表现

在这个大问题里，哥哥阐述了四个小题：1. 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2. 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3. 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4. 受害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出身问题早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到处受压抑。正如《出身论》一文所说：

……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连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出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印发调查乱班的材料，其

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指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盗行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阶级一说，从未见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也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

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可能。……

哥哥写完《出身论》以后，曾叫几个同学看过，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语言太尖锐，提出更改一些词语，少惹祸为好。哥哥适当地做了些修改，后来说："不能再改了，再改锐气就没了。"

当时铅印的《兵团战报》登了一篇关于出身问题的文章，

但观点羞羞答答，不敢涉及事物的本质，丝毫没有说服力。哥哥把《出身论》送到他们编辑部，他们认为文章太锋利，不敢刊登。

怎么办？又没有油印机。这时罗文、罗勉从广州来信说，他们在那儿和广东的几个学生办了一个小小的油印刊物，叫《北斗星》，想专门谈出身问题。并且介绍了一种最简便的刮印方法。哥哥高兴极了，立即寄去了《出身论》。不久，罗文就寄来了一张他们油印的纸样，字迹十分清晰。那天哥哥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立即买了纸，借来钢板和我在小屋油印起来。我们油印了三四百份。油印完毕，他把小屋的墨迹擦得干干净净——从那时起，他就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哥哥，"我问他："你为什么要用'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么一个笔名呢？"

"因为我不喜欢'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称，"他说："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但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天冷了，两个弟弟不得不回来了，并告诉我们《出身论》在广州引起极大的反响。我们又印了几百份。那时正值十二月初，我和弟弟骑车去满处张贴。为了避免人们拦住找麻烦，我们都是先贴最后一张，贴完第一页骑车便走。所贴之处人们无不整日围得水泄不通。

人们在寻找这不知名的作者……

哥哥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油印的《出身论》寄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每个成员，同时也给毛主席、周总理、陈毅、谢富治分别寄去了一份。

父母为此分外担心，劝阻道：

“罗克，可别惹事呀！那么多人都不敢说真话，就你敢说？危险哪！”

可是，哪里劝得了哥哥呢？他哪里是为自己才写《出身论》的呵。他觉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可以发表言论——哪怕是油印。他，作为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果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连句真话都不敢说，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行尸走肉式的生活他是决不要的，不自由，毋宁死！

就在到处是血腥恐怖的气氛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铅印的《中学文革报》为《出身论》而出世了！

发起人是我的大弟弟——六十五中学的遇罗文和男四中的牟志京、王建复、毛宪文（毛是老师）。

从油印到铅印是经过了重重困难的——首先是没钱。由于牟志京在男四中小有名气，是反对血统论的急先锋，便张口向学校借五百元。又通过他的熟人开出介绍信，准备到一二〇一印刷厂去联系。其次是没纸。当时纸张十分困难，这时，正好有个单位有十五令纸要退，于是便买了过来。第三就是如何保全自己，不被对立面的组织干掉。于是只好虚张声势，明明只有四个人，却起了个大名——“北京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为了使文章不要锋芒太露，牟志京将油印的《出身论》的某些字句又做了些修改，但观点并未变，改了以后得到了哥哥的同意。

第一期印出来了，但到手便损失了几千份。因为有些在一二〇一印刷厂劳动的学生正好是联动分子，他们一看这报纸便十分怀恨，当时抢去了几千份销毁。

第一期售出后反响非常强烈，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北京上空爆炸一般。第二天四中专为报纸所设的接待站就门庭若市

了。来访的主要是中学生，也有个别报刊的记者。很快，工人和各阶层的来访者也多起来。绝大多数人是因买不到报而来索取的，他们热烈地赞同和支持。也有极少数人是来谩骂的。电话铃声从头天夜里到次日响个不绝。接待站忙碌非常，来访的人应接不暇，只好全体人员出动（仅四名）。为了安全起见，还要故意把司令部架子拉大。

有人问："司令部在哪儿？"

"不知道，"几个人口径一致地回答："我们只是司令部接待组的成员，你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转达。"

有两姐妹找到接待站，哭着说："收下我们吧，哪怕叫我们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

"你们看过《出身论》吗？"

"没看过，"她们回答，"我们只是看了反面的骂《出身论》的文章，却觉得《出身论》极有道理，才来要求加入的！"

这样感人的例子多不胜举。

第一期售出后，加入了好几个人，还有哥哥特意邀来的一位大学生——从初中就要好的学友，这样，所谓的"司令部"便也初具规模了。

反响越来越大，遭到某些坚持"血统论"的人极大的仇视。第二期还没有出，他们就已经来砸过几次，将接待处洗劫一空。很多集会上《中学文革报》都成了辩论的对象。处境日益艰难，买纸和印刷都成了问题。一二〇一厂怕惹事，拒绝再印第二期。

这时，自来水公司的一个工人组织派人来联系，表示赞同《出身论》的观点。于是在他们那里借了一块安身之地，继续办报。

牟志京到一二〇一厂死磨硬泡了两天，终于把负责人说

动了，答应印第二期，但决不再印第三期。

第二期的头版文章，由哥哥写了《谈纯》。

当时有许多种铅印小报，有些报根本卖不出去。而街上的人只要一听说是《中学文革报》，便蜂拥来抢购。许多人唯恐买不到，便不按秩序排队，人人伸手递钱，那情景真是难以形容。

有一次罗勉去卖报，人们立即排了一长队，可是少数人不守秩序，队形乱了起来。罗勉一生气，抱起报纸就跑，想躲到一个清静些的地方重新卖。一回头，一长队的人跟着他跑……

又一次罗文和同学去卖报，人们竟把果皮箱撞翻，他们只好钻到一辆闲停着的客车里，从窗口里卖……

每一个卖报者都遇到举不胜举的难以忘怀的热烈场面。当时小报是二分一份，可是在换报纸的黑市上竟须用二十五份其它小报才勉强换来一份《中国文革报》。

第一期印了三万份，第二期印了五万份，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如《清华井冈山》和《兵团战报》等，每期都印五十万份。可是数《中学文革报》的读者来信最多。最初邮递员还管送信件，后来信太多，驮不动，索性叫办报的人自己去邮局取。每天都有半麻袋信，一次就是几千封。除了台湾和西藏两地外，各省都有信来。信件太多，根本看不过来，所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分头各看一堆信。

很多人在信里付了款，要求订阅。大部分读者表示赞助和关心，但也有少数人透露了某些顾虑。许多人在信中叙述自己在出身问题上所受的歧视和迫害，特别是农村的问题更为严重。不少二十几岁的青年被称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遭受着种种非人的待遇，读了令人愤郁不平。写信的人

无不对报纸寄予极大的期望，不少人竟天真地相信："中央文革"一定会支持《出身论》的观点的。

一些感人肺腑、事实充分的信由四中接待站转交哥哥手里，他都记下了地址，以便联系。这样的地址有上千个。哥哥是不爱哭的，但每次读信时，常常潸然泪下。亿万个青年的命运，和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从中感受到无比的动力和巨大的信心。雪片般的信件，更坚定了他捍卫和探索真理的决心。

《出身论》的精辟分析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 ……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门第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

《出身论》的传播范围不仅从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不少人还寄来了几十种油印、铅印的复制本。各省都有复印的，抄

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就更为普遍。

1967年1月中，湖南已经出现“湖南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湘潭、长沙已掀起了对《出身论》的辩论。……凡《出身论》所到之处，那里会燃起一片烈火。

四中接待站有多少热心的读者啊！一位三十多岁的四川人，向接待站讲述了四川地区血统论的猖獗，并表示坚决捍卫和宣传《出身论》的观点。每天接待站一开门他就到，帮助接待各地来访者，热情洋溢而有耐心。他说：“如果《出身论》错了，要抓人，我愿陪你们进监狱。”有不少人是干部子弟，他们并不因自己出身好而自傲。其实，《中学文革报》的一些发起人如牟志京和其他参加者，不少出身是很好的。

反对报纸观点的打砸抢分子们经常前来挑衅。有时几十个红卫兵涌进家来，声言和哥哥“辩论”，一个个气势汹汹，语录声口号声震天地响，将哥哥团团围住；而哥哥每次都如入无人之境，以镇静的态度和锋利的语言使他们震惊，使他们无数次伸出的拳头又都缩了回去。

哥哥还希望舆论更大些。于是他写反驳《出身论》的文章，和自己正面观点的文章登在一起，以此扩大影响。在第二期上以“常洞瑶”和“齐声唤”的笔名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接着，第三期至第七期，他又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写了《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和《谈鸿沟》（这一篇发表在《首都风雷》报）等文章，具体阐述《出身论》的观点。可是，奇怪的是：反对派的报纸却很少有具体的反驳，只有大量的谩骂，最常用的词是“诡辩”。

一次牟志京对哥哥说：“这些报纸，看来就靠诡辩两个字

活命了。”

哥哥严肃地听着，然后问道：“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什么叫诡辩？”

牟志京在哥哥的凝视中思索着，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词句。哥哥这时说道：

“当你的观点还不能被别人接受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诡辩。”说罢咯咯地笑起来。

洋洋洒洒的几十万言的文章，都是哥哥利用下班时间写的。他文思泉涌，提笔不停，这是他多年受压、多年思考、多年实践的结果呵！不过他始终以一个投稿者的姿态出现，并不直接介入《中学文革报》的事务，这不仅是他主观的愿望，也是为了彼此的安全。他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中央首长的支持，那样也许就不会有坐牢的危险；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与愿相违……。

预计将会到来的风暴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情势危急，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危险。哥哥第一次召集了《中学文革报》所有的骨干，镇静地对大家说道：

“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出了事，你们切记，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他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他早就发现暗探跟踪了，而他一点也没有沮丧的心情。他的精神和以前一样饱满，而且利用工余时间研究新的问题

——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工资论》。他列举了目前工资的不合理现象，研究出一套新的工资体制：即发给每人基本不变的生活费（无论是工人或农民），其余按本人的工作贡献发薪。他依旧不倦地探索着！

他甩开了暗探，利用一周的病假期间去了一趟北戴河，去看他从小就爱慕、却从未见过面的恋人——大海。呵，海！他奔向大海的怀抱，畅快地呼吸和遨游，多蓝多美的海啊！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雷日夜苦折磨。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

他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吟咏着内心沸腾的诗句……

暗探的跟踪和监视越来越明显了。1967 年 11 月，哥哥对不惜冒风险来看望他的好友牟志京说：

“现在对我的监视更严密了，到我这儿来太危险。今后不要再来了，出事的可能性很大。”

“你估计会出什么样的危险呢？”

“很难说，各种可能都有。但是我相信一点，如果毛主席看过《出身论》，他不会反对的。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替我妥善保存。今后万一我有什么不幸，你千万保存好，在适当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我相信有这么一天——人们会对《出身论》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哦，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哪！它是向全国人民的诀别书，是迸着血泪的最后的呐喊，是真理的忠实的宣言！他把信郑

重地交给了牟志京——当时家里人都处于危险状态，除了这位好友，谁能保存呢？哥哥的脸上只有严肃和沉重，完全没有平时那风趣和轻松的神情。仿佛也早已看到了自己的结局，然而，却又没有半点犹豫。

这封宝贵的信，却由于后来牟志京颠沛流离的生活，丢失了。

暗探无时无刻不在跟踪，哥哥给广东的两位友人写信道：

……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固然，如你所说，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发工资，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这时候遭到邮检不是很妙的事……我自己做人，当然还坦荡，不过假使遭事，将来还会更多。还是林杰有权力的时候，红旗杂志派专人做过调查，他们是专信谣言的，哪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一查对就可以搞清楚的，他们也深信不疑……

在另一封信里说：

……北京郊区大概决不会比广东农村好，否则

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因为我已经到了极限。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有活埋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无论怎样讲，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我相信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

这两封信都遭到了邮检。

1967年12月31日深夜，哥哥照例在他的小屋里闭门思过。然而全家谁也睡不着，盼着再能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那沉静亲切的声音。那是昨天早晨，哥哥一边洗脸一边对母亲说：“妈，我觉得要不好。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偷偷告诉我，我的档案已被公安局要走了。很可能我会被捕。”

这句可怕的话终于从他的嘴里说出，而他的神情却是那么平静自如，就像在谈一件极平常的小事。母亲呆望着他无言以答，她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晚了。父母最疼爱的大儿子，难道……

此时，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等着……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那间坐落在小院一角的小屋里，那静静的、一动不动的、溢着柔和的灯光的小屋……

老挂钟敲过12点，哥哥推门进来，对屋里忧心忡忡的一家人说：

“刚才我在闭门思过。思这一年我有哪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

屋里的人没有说话，无不受着巨大的感动。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在日记本里刚刚写下了这血雨腥风时期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68年1月5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人狠狠地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

被捕的那天，在他小屋的桌上还放着未定稿的《工资论》。

七　社会大学的最后一堂课

1968年1月5日（预审）

问：你有什么问题？

答：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

问：你还是谈谈你的问题。

答：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

问：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吗？

答：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好，我思想上还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没有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问：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了解你

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

答：毛主席的著作我学了，元旦社论我学了，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的。

问：你没有问题吗？

答：我即使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问：《中学文革报》是谁办的？

答：我一个人。……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我的《出身论》，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如果你们允许，我还要给毛主席写信。

问：你最好把背后写的那些东西亮出来。

答：几年以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问：你不用讲好听的……

答：我的日记被《红旗》杂志拿去了，你们可以看。我的日记中是表达我对党的热爱的，我永远跟着共产党。

问：……不管你多狡猾，群众也会把你揪出来。

答：……我请求你们让我给毛主席写封信，主席知道《出身论》是我写的，他如果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毛主席决不会说我够专政条件的。

1968年1月9日

问：你的日记为什么烧了呢？

答：我怕别人看。

问：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烧呢？

答：我认为没有保留价值就烧了。

问：你留下一本是什么皮的？

答：是蓝皮的“北京日记”。

问：这个日记下落哪儿去了？

答：下落我不知道，我交给我妹妹了。

问：你把情况谈谈。

答：这本日记记的都是我们厂子的真实情况。

问：记的都是你的真实思想吗？

答：日记写的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和写文章不一样，都没有经过推敲，青年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起伏性。

问：你不要诡辩，你看看这本日记是不是你的。

答：是我的。

问：这里边所写的反动不反动？

答：不反动。我思想上有缺点、毛病。

问：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应当怎样？

答：应当尊重。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话？

答：没有。

问：你这个人思想一贯反动，一贯耍两面派手法……你日记中对伟大领袖、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的仇恨……

答：我希望你们看我的主流。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地方？

答：没有。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毛主席的。

问：你交代不交代问题？

答：我这本日记由头看到尾，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了。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反动内容？

答：无论如何我对党对社会主义是热爱的，尽管我思想上还是有错误的。

问：你7月3日记，把学习毛选当作为残酷野蛮，这反动不反动？

答：这我有辩护的余地，我指的是教条主义的学习。

问：……今天不准你辩护，只准你认罪。

答：我指厂里拿学习毛选来压运动。

1月10日

追查“反革命小集团”，预审员问到两个人时。

答：你无非是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

问：如果有呢？

答：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

问：这已经定论……你不交代，是你保护了自己，又包庇其他反革命分子。

答：你说的我很惊讶，我根本不包庇别人……我有错误思想，但我可以保证我和安徽、北京任何人也没有搞阴谋活动。如果有，可以最严厉地判决我。

1月12日

问：我们可以告诉你，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对我们的仇恨很深。

答：没有。

1月13日

问：你攻击姚文元同志，比吴晗走得更远。

答：我和吴晗不一样，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

问：你的表演是你阶级本质的暴露……你坚持下去必然会得到更惨重的失败。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我没有事实。

问：你搞大量的反革命活动，怎么没有事实？

答：我没有搞反革命小集团。

问：……你的问题不交代，也跑不了，你……你是不是要顽抗到底？

答：我根本不是顽抗到底。

问：那你这算什么？

答：我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小集团，也没有这样的活动，如果我真有这样的事，你们可以最严厉的处罚我。

问：将来我们把大量事实摆出来你怎么办？

答：那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问：你现在这样顽固，到了时候有你后悔的一天……你不交代我们也可以处理你。你听见没有？你讲不讲？

答：（拒绝回答）

问：今天你又抗拒了一堂，我们再警告你，抗拒，我们一定要从严处理，在人民法庭你继续放毒……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

1月16日

问：你考虑了吗？

答：……我写《出身论》，以前我认为不是为我自己的，我是为无产阶级做事的。昨天通过你的谈话，我开始有了怀疑，我对于我的家庭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小学三年级我9岁时，赶上“三反五反”，我向派出所检举了父母的一些问题，受到团市委的表扬。班上同学王杰的父亲和我父亲认识，把

这事情告诉了我家里，从那以后我和家里关系一直不好。高中时候我也是和家庭划清界线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确实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造成的。但高中毕业后我还是愿意到工农中去锻炼改造自己，这样就到了红星公社……当时组织上信任我，让我管粮食，我们小队长是党员，他叫我在粮食中搞鬼，他也搞鬼，本来我很信任他，认为他是党员。出事后，我检举他，他没有受处理，却不叫我管粮食了，从此我情绪低落……

（关于劳模）时传祥他是掏粪工人，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报纸上常有他的报导和他的文章，文化革命时听说他组织捍卫团保刘少奇。江青说他是工贼，于是天天挨斗。掏粪工人出身当然清苦，可是一挨斗，祖宗也要变，现在说他出身是粪霸。

有一天他被拉到我们工厂里游斗，我见到他一次，戴大高帽子，两旁站着几个气势汹汹的小伙子，卡车绕场一周，大家都跑出来看，他是个胖胖的50岁左右的人，带着一副听其自然的态度，并不显得怎样不安。

关于时传祥还有一件事，有一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和他握手，大概还说了一句什么话，于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叫李琦的，用半中半西的手法画了一幅《同志》这样的画，座中两人，左边是刘，右边是时，上角题词摹拟刘的语云："你是掏粪工人，我是主席，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同志。"文化革命时，李琦便成了"黑帮"。虽然他也画过毛主席，那幅画还是我所见过的主席肖像画中最有风格最好的一幅，但也无济于事。

建筑业的劳动模范最著名的是张百发。几次出国，被当作专家聘请。他原是普通工人，组织了"张百发青年突击

队”，是砌砖能手、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共产党员，三天两头做报告。现在参加过人大会堂劳动的人，大都还记得，张百发怎样教他们捆钢筋，据说的确有两手……以后张百发被宣布为工贼，原来的事迹也都成了假的，而且假得出奇……

9月3日

问：1962年你说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以？

答：这是对我的污蔑，这根本不能联在一起的，我根本没讲过这话，这是莫须有！

问：你放肆！你是反动，你是卖国贼、叛徒！你放老实些！

答：这连影儿也没有。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问：这与你的日记吻合。

答：找不出来……

问：蒋介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跑了，你很“惋惜”，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是在1966年，你说蒋介石完全可以打回来。

答：这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问：你解释也不能解释没有了。

答：我对有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我大部分是拥护党的。

问：这是大事化小。

答：可是这本日记如果落在蒋介石手里，便要杀头。因为我说蒋介石的坏话多了。

问：你反动！你还在放毒！

答：不对。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的觉悟还是有

的。(你们) 这样不行!

问：你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你不向人民低头认罪说明你顽抗……以上问题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给你定罪。

答：我不承认。

问：我们给你交代党的政策你听进去没有?

答：不是听不进去，是没有影的事。

问：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

9月17日

问：哪一个敢暗害伟大领袖……

答：这是没有的事。

问：你对伟大领袖、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没有仇恨?

答：我没有。

问：你态度极坏，怎能从宽?……你服不服是你的事，怎样惩处你是人民的权力。

我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

遇罗克

1968年10月8日[1]

从以上审讯记录中不难看出，哥哥的回答是多么有策略啊!首先，他态度一直是平和的(除极个别处)，是承认自己有“错误”的——在“四人帮”统治的法庭里，他知道态度太强硬对自己是不利的，但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他什么也没

[1] 以上材料均摘录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存档。——作者注

有承认过，对谁也没有交代过，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正是这种"软中硬"的"狡猾"、"顽固"的态度，使审讯员们大为恼火。换了许多个审讯员对付他，一个月连续审问达七、八十次地折磨他，给他戴背铐、关禁闭惩罚他……可是哥哥没有一丝屈服。

他被折磨得头发脱落，脸色青黄浮肿，原来微微有些驼的背现在更驼了……但在复杂的监号里，他却以永不衰退的乐观精神感染着人们。

在监号里，他以那惯有的略带嘲弄的笑容向新难友介绍自己的名字。

"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下面去掉心字，再加上一个走之，罗霄山脉（罗霄山脉是井冈山根据地所在）的罗字，克服困难的克字。"

说完，又微微一笑。这在困苦中作出的会心微笑，给难友以多大的鼓舞啊！

当犯人们"学习"得疲惫不堪，背语录背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哥哥会突然出奇制胜，说几句引人兴奋的话。

一次，轮到他发言时，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这一下子，屋子里的人都愣住了。几个"积极分子"马上站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他猛烈抨击：

"什么？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蒋介石也存在，他合理吗?！刘少奇也存在，他合理吗？"

哥哥一点儿也不着急，微笑着继续逗着别人的火儿。

"你们考虑考虑，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吗？"

"你反动！……"等批判者的话到了相当尖锐程度的时候，他忽然收敛了嘲弄的笑容，做"正色"状，说：

“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论述的。”

看着那些积极分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似的笑了起来，那咯咯的笑声是那么开心。

而他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总对某一种事物“门儿清”（即内行），所以，无论谁都在某一方面比我知道的多。

哥哥在这儿学到了不少知识——水泥的全部生产过程，世界电影现状——包括各国影片的生产情况、年产量、频率和周转率，还有机械制造、西洋近现代美术史……监狱里常常换号，因此，他便把在另一间牢房里听来的给新号里的人讲述，通过讲述来复习这部分知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他所讲的那一门知识的内行呢。他是多么会利用时间学习呵！

由于处处受监视——队长监视，号里大家互相监视，这种聊天时常中断。往往一点事要聊好几天才能说完。

在这复杂的困苦环境里，哥哥希望大家都对哲学感兴趣，更念念不忘宣传他所相信的辩证唯物论。在牢房里，他借“学习毛选”为名，以讲辩证法为题，开了“形式逻辑”的课程。几个小青年学得十分起劲，因为哥哥很善于把抽象深奥的理论用几句话讲得通俗易懂。他在这里成了博学的老师。一位学美术史的大学生对辩证唯物论没什么兴趣，他喜欢现代哲学，这位大学生说：“现代哲学和古典哲学不同，并不一定要形式逻辑作为骨架。让·保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黑格尔的哲学是有极大的区别的。过去的哲学已经被这一代人摈弃了。”

哥哥很不以为然，和他论争，后来有些生气地说：“不行，

你得下点儿功夫把所有的观点深透地研究一下，好好学学再做结论。学哲学不但是对客观世界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思维进行整理的过程；学哲学可以使思想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正确，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类根本算不得什么哲学家，而你居然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没事干……”

哥哥是真正的辩证唯物论者，他从心底里相信它的价值。可是他却被另一些自称同样信仰的人关在监狱里，这个现实怎能不令他深思！

一天，他从同屋的另一个老犯人那里借来了延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拿它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版本对照来读，读得很认真，每篇都一字一句地校对，时常若有所得的点着头，有时则掩卷而笑，那咯咯的半嘲弄半天真的笑，使那老犯人不由注意起来。

“出狱之后，一定要找齐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有意思！”他两眼放光地对身边的难友说。

“怎那么有意思？”

“对照着看，能看出许多问题。从他们删改的地方可以看出，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在某些同号的人眼里，他是个奇怪的“书生”——微驼着背，带着深度近视眼镜，头发过早脱落，完全是个书生模样。每天早上起来还做做广播体操，满身书生味儿。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们哪里知道，就是这位“书生”，却能洞悉社会，了解人生。

他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他始终站在主动的

地位。他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一套早就熟悉透了。预审员气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向他公布证据——哥哥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和书页上的评语，问道：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话？”

哥哥一声也不吭，脸上毫无表情。预审员又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哥哥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和他们是说不清楚的，但他又决不愿意向他们低头。

没有在那个时间住过监狱的人，不会明白，这种“顶牛”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因为，拒不认罪本身就可以构成重罪。哥哥的确是煮不熟、熬不烂、踩不扁、砸不碎，响当当的一颗铜豌豆！预审员骂他是个最难斗的监狱油子！

监狱油子吗？他也是也不是。

他的确是个监狱油子。他了解监狱的各法令、条例，审讯的方式和手段——他以前看过的书现在用上了。甚至他能从蛛丝马迹中知道预审员的姓名和背景。每个人受审回来，他总要向他们打听，问了些什么？怎么问？从而了解形势。他向各个犯人提供法律的常识和参考的意见，告诉他应该如何应付下一次审讯。他清楚牢房里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最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走狗，并且善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掩护自己在牢中的活动。

“你干嘛要把牢房里的矛盾搞得这么复杂？”那位喜欢平静的大学生问道。

哥哥笑说：“如果牢房里面很平静，我们每天连聊天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汇报上去，所以，索性把牢里搞得大乱，二十几个人的矛盾，谁也搞不清谁是谁

非，我的言行就没人注意了。再说，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缩影，可以练练手。”

哥哥的确很成功，使几个积极分子互相争斗起来，互相指责对方组织反革命集团，而他却不受人注意了，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别人聊天。

他又不是个监狱油子。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从来不会在老弱病残者身上踹两脚，表示自己心狠手黑，借以镇唬其他犯人。他从来不会用诬告别人的办法博得管理员的好感和青睐。他对那些“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个小小的监号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是卑劣、阴险和自私高度集中、充分表现的场所，而哥哥在这里所玩的“政治权术”，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

几乎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哥哥都要向管理人员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有纸和笔的，他说：是要写思想汇报。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每次都会给他。他就利用这些纸和笔，乘机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写好以后藏起来。

他和那位大学生一起，编写了一本《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背下来的诗词，都尽入其中。几个月下来，凑凑也有了几百首。

星期天，他俩利用缝补的机会，拿针钱装订起来。许多人都偷偷借去传抄，默默地念着、背着。牢房的灰壁上，似乎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等景色——哥哥教大家作起古典诗词来了，并给他们讲解诗词的结构、作法和修辞学。

但告密者常在，一次检查牢房时，即使这些诗放在棉衣

的棉花里，也被全部搜走了。不过哥哥并不扫兴，依旧教大家写诗。他说：

“旧体诗有许多内涵，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也只有用这些形式才能表达中国人特殊的感受和情绪。”

他念了自己《登鬼见愁》那一首词，大家都喜欢其中的气魄。哥哥伤感地望着铁窗外的一角，那傍晚的天空——他多向往自由呵！

“我不会忘记你们作的诗词，”他鼓励大家说，“如果有一天我出狱，我一定编一本《狱中诗抄》，你们写的诗里有不少妙句。”

他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但是，也有愁闷的时候。他有时向难友讲起自己的家，自己的童年。他想念父母、弟弟、妹妹……

“我们家的那个小姑娘……”他总是这样提起我。

平时，他很少哼歌，可是一说到童年，他就会唱起苏联的一首歌曲：

“由斯大林率领我们去前进，大元帅号召我们去斗争……”

他唱得很雄壮，唱完之后又自嘲的笑笑，对难友们说：

“那是在少年宫学的，当时还和合唱队一起唱这支歌参加歌咏比赛，赢得了第一。”

呵，金色的童年！在他童年时代，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他 25—27 岁的年头，会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度过……那一切，那大眼睛的小姑娘、那愉快的野餐、那小学毕业典礼，一切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呵，一去不复返了……

“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他问大

学生，他想振作起来。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

他俩站在黄昏的暮霭里，站在炕板上，望着窗外朦胧的余辉，那里刮着的微风是自由的。而这20平方米的牢房却要挤住20个人。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
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动情地唱着，歌声那么认真、沉重，牢房里的人都默不作声，静悄悄地听着、听着……

“唉！别唱了！”一个老头终于忍不住了：“已经够难受的了，还唱这么惨的歌！”

哥哥回过头来，看着老头笑了：

“这个歌一点儿也不惨啊！”

“算了，”大学生扫兴地说，“我们不唱了。”

他们坐下来，那时候，哥哥比号里其他犯人多一样东西——手铐，这是因为他不交代问题而受的惩处。吃饭时摘下来，血液刚一流通又铐上，铐得紧紧的。血管胀得非常难受，疼痒钻心，又毫无办法，好一阵才能过去。每当这时，他总想找些轻松的话题和谁谈谈，以分散注意力。可是，只要有谁一戴上铐，立即被视为号里的危险分子，谁和他说话都要被别人汇报上去，人们恐惧和躲避的目光更像刀子一样刺进哥哥的心。人们，什么时候才能不那么愚昧呢？什么时候才

能不跪着生呢？每当这时，总是那位大学生比较有勇气，冒着自己同样受罚的危险，和他找话说说。

“金色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大学生感叹地说：“一切都过去了！”

“对，”哥哥微笑而镇静地回答，“将来的生活，无论怎么样子，过去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再有了。可是，你怎能知道，将来就不会比过去更好呢？”

“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哥哥不答话，只是微笑着悄悄地哼起那支刚刚学会的歌。

“我入狱纯粹是历史的误会，”大学生懊恼地说，“我根本不懂什么政治，也不是什么政治家，只不过是个热情的青年，却被糊里糊涂地卷进了政治漩涡，作为政治犯关在这里。”

“我值得。”哥哥想了想，郑重地说道。

大学生望着他，他直视着大学生的眼睛，自信地说道：

“你出身高干，过去生活一直优越，这所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我们从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最令我痛心的，就是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人总有种先天的自卑感——政治上的软骨病。以至有了说话机会的时候，也很难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我虽然被抓了，也许结局不堪设想，但能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出身论》是呐喊，也是我们这些青年能够发出的最强音了，文章的巨大影响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些。你不知道，那些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十分感动我，我不止一次地哭过。许多人寄来血写的信，捐款的、流着泪找到报社来的，……为了这些人，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他这发自肺腑的话语，使大学生深受感动了……大学生默默不语地望着他。过了会儿，哥哥又笑笑，说道：

“我本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和一个出身高干的青年，在相等的条件下较量较量，你来的那天，我认为机会来了，我想，如果你来高干子弟蛮横的那一套，我一定要把你整苦，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可是和你熟了，才知道我们很有共同语言。”

在监狱里，许多蛮不讲理的人物，一听说他是遇罗克，马上都肃然起敬。因为他是《出身论》的作者，是第一个站出来替这个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贱民”作公开辩护的人！他是一个勇士，而且是一个聪明的、冷静的勇士，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打出最有力的一击。

对哥哥的审讯已到收缩程度了，形势越来越紧张。

“你这死反革命，顽固透顶！”审讯员最后一次警告他：“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最后两分钟考虑后果！”

屋里的人都出去了，只剩下哥哥一个人。两分钟，最后的两分钟啊！难道，哥哥还需要什么两分钟吗？他从动笔写《出身论》的那一分钟起，不是已经决定为真理献身了吗？迄今为止，他的一切言行都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两分钟，对他来说太无必要了，因为他已经整整考虑了一生！

门被撞开，忽啦啦涌进十几个人，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煞是森严。

“遇罗克，”军代表厉声喝问：“你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哥哥沉静地回答：“我的牙膏用完了，请您让我家给我送一支牙膏来。”

“关入死囚牢！”

死囚牢……

哥哥被关在腐臭阴暗的“活棺材”里。一米宽、二米长、双层铁条门，下面有一个塞饭的小口。没有棉被、没有一切洗漱用具。夏日蚊蝇叮咬，虱蚤遍身，30斤重的镣铐更添了这些“小吸血鬼”们的狂妄和自由。严冬，没有火炉，寒风无遮挡地从铁条门吹入，浑身冻得麻木生疼。一间间的死囚牢关着待死的人。有的人疯了，吼叫声、求饶声使人毛骨悚然，简直足以使正常的人发疯……何况还伴随着肉体的摧残，在两三个月之中，哥哥和一些政治犯天天被拉到各大厂校机关去挨斗。他们的嘴唇虽被封闭着，但哥哥每次都用他那单薄无力、久已虚弱不堪的身体，死命地向上挣，决不肯低头。押着他的彪形大汉踢他、打他，台下的群众啐他、骂他；手腕脚踝全破了，镣铐无情地蹭磨着鲜血淋漓无法愈合的伤口，每天批斗回来，血迹斑斑，浑身青肿，活人像死人一样被拖进牢房。那滋味儿，不比死更难受吗？而哥哥是怎样惊人地在死神和魔鬼们面前，昂着他那不屈的头呵！他全身浮肿了，忍受着疾病和酷境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种种刺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寒冷的长夜……也许他精神分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他没有！他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支撑着，他想活下去，活下去！他唯一挂在心上的，就是琢磨着如何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上层领导人。他在狱中五次上书毛主席，给陈毅同志写过信，希望能有一线生机……

能尝到的滋味都尝到了，该考验的都考验了，没有谁能征服哥哥的意志。是的，没有人能征服他的心！

哥哥，这位在人间大学将要毕业的学生，用这首诗赢得

了“监狱”一课的满分：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人间大学的每一堂课他都上得那样认真。如果说“当人刚脱出自然界怀抱的时候，他只是个自然物，而不是人。人乃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的话，那么，哥哥是达到了人的水平。

这位优秀的学生，已经被准予毕业了——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10万人。各个单位都必须有人来参加，看台上、田径比赛场上都是人。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万人高举的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的跑道上，每五个警察押着一个。所有男犯人全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大牌子。

口号停止之后，主席台上的人开始宣判。他每念一个名字，就停顿一下，于是五个警察就把那个犯人向前推两步，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防止犯人呼叫），强迫他抬头示众，然后把头压低下去。有几个犯人（包括哥哥）坚决不肯低头，就有另一个警察过来用拳头狠狠地捶他们的头。宣判词全很短，三言两语，最后全是这样一句话：

“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个犯人全部宣判完了，主席台上那人说：

“以上各犯，均报请最高法院批准，验明正身，现在绑赴

刑场，执行枪决。”

话音未落，95 名警察一起用力，一下子 19 个人全跪在地上。在几个迅速的动作之后，他们全被五花大绑地拖了起来。这时观众席上、运动场上，激昂的口号声又响了起来。犯人们被带了出去，有的已经吓昏了，被警察拖着，尘土带起几丈高。哥哥拼命地挣扎，他不肯低头，也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几个警察吃力地推他，这时候人们清楚地看见：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仍然不屈地奋斗着……

哦，哥哥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他的名字，像过去的一些英雄一样，在祖国的大地上被亿万人传颂着。

我们纪念英雄，不希望热闹一阵子而烟消云散；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一个人在生的时候要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不要总是在他死后给他戴上桂冠；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每一个人自省——使遇罗克走上刑场，自己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单凭“四人帮”能杀死遇罗克吗？万一将来另有一个“四人帮”式的人物上台，在工人体育场上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盲目呼啸的海洋？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像他那样勤奋地苦读、勇敢地实践、冷静地思考、明确地生活！

1979 年一稿

1981 年二稿

张守仁　张　洋

魂兮归来

一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1980年10月2日上午9时。河北邢台南大郭村石园。

女烈士郑晓丹圣洁、肃穆的灵堂里，正为《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召开追悼会。

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母亲王秋琳，从燕山脚下带了花圈和祭品，风尘仆仆，南下八百里，赶到这古赵国所辖的地区，前来追祭他们亡儿的英灵。

罗克遗像前的供桌上，一杯清酒，一炷线香；两支白烛，两束黄花。黄花——傲霜的矢车菊，是晓丹父亲郑新潮清晨蹚着露水从旷野里一朵一朵采集来的，献上他郑家的一片心意。

素不相识、天各一方的两家人，被儿女们相同的命运感召在一起。他们都佩戴黑纱白花，按照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祭奠：既点香烛，也奏哀乐。灵堂里，香烟缭绕，烛光摇曳，哀乐低回，挽联轻垂。

双方的家长和晓丹的兄弟、妹妹，向遇罗克遗像肃立致敬。王秋琳望着镶有黑边的照片：罗克那两道倾斜的簇聚在一起的浓眉下，明亮的瞳仁里闪出深邃的光芒。仿佛他那线条分明的嘴唇翕动了，又听到他辞别时说的话："妈，如果我永远不回家了，您千万别难过。"母亲站在儿子遗像前呜咽失声，垂泪涕泣。这时主祭人宣读祭文。祭文曰：

"……西临太行，北望燕山，秋风萧瑟，草木含悲。正当即将公审国贼之际，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在石园兰斋，谨备祭品，悼念跟林、江反革命集团和封建反动血统论作英勇斗争的先驱者——遇罗克同志！

……"

人们会问：牺牲在北京的遇罗克的忠魂，为什么十年之后在邢台女烈士郑晓丹的灵堂里祭奠？

二

1966年的冬天，漫长又寒冷。12月里一个零下20度的清晨，北京地质学院东门内路两旁的席棚，完全陷入大字报的海洋。封冻一切的冷风吹过，大字报纸飒飒有声，上下翻飞，像生活那样，一片混乱。有个席棚前，围着一群学生，争看一篇刚贴上去的油印文章——《出身论》。人群里，有一个身材不高的圆脸姑娘，踮起脚尖贪婪地看着。她触文伤情，眼里噙着泪花，看不清面前的字迹。无法读下去，一个人便到地院大操场上，沿着边沿一圈一圈地散步，借以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她，就是地院附中高三年级学生郑晓丹。近年来，家庭问题像块巨石压在她的心上。她陷入苦恼的深渊。

但这能怪她父亲郑新潮吗？

郑新潮一九三九年从国统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审干运动中，他被社会部长康生诬陷为特务，列入枪毙名单，幸亏党中央及时纠偏，才得以活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辗转到了东北牡丹江创办军马场，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向前方输送了上万匹军马。1950年9月，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他时，表扬他“熟悉生物生态学、物种学，对改良马种很有经验，为我军军马建设打下了有利的基础”。1957年他因不同意取消军马场而被错划为右派，从此郑晓丹受到百般歧视……

她在大操场上转了一阵，又到东门里去读《出身论》。读着读着，想到自己这几年不能入团、被人骂为“小右派”的遭遇，又激动得痛哭失声。积郁在她心里的苦闷、屈辱、疑虑、烦恼，全由文章作者替她说了出来。她擦擦泪眼，抽泣着读下去。读不一会儿，泪花又蒙住了她的眼睛，她又转身到操场上去散步。冬天的早晨，实在冷啊。她哈了口气，立刻凝成乳白色的烟雾。附近屋顶上的大喇叭，开始哇啦哇啦地吼叫。街上不时传来一阵阵“拿起笔，作刀枪……”的歌声。恐怖气氛笼罩着这个城市……

郑晓丹第三次走到大字报区去读那份油印材料，仍然泪流不止。就这样，她往返于大字报区和操场之间许多次，才把全文读完。读完之后，就掏出纸笔抄写。抄完之后，又上街买了一份刊登《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把它珍藏起来。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城市里到处在批判，郑晓丹无处珍藏，便带着它回到邢台郊外乡下的家里。全家人看了，一致认为这是批判反

动血统论的战斗檄文，一定要把它保藏好。那时造反派经常到郑晓丹家里抄家，连玻璃镜框里的马恩列斯像也要拆开来仔细检查。郑晓丹和兄妹们小心翼翼地把《出身论》先后藏在顶棚上，砌入炉坑里，埋进泥土里，塞进墙壁里。有一次造反派又来抄家，把墙壁拆开，七千册藏书连《出身论》一起抄走！全家人焦急异常。郑晓丹从地上捡起被造反派踩脏的一幅画。那是法国画家让－巴蒂斯特·科罗（1796－1875）的名作《阵风》。画面上寒风怒啸而过，飞沙走石，摧林折莽，搅得天昏地暗，肃杀溷沌。晓丹对父亲说："爸爸，这场运动不也像阵风一样席卷一切吗？但是任何狂风都不能永远刮下去，它总有止息的时候。我相信，历史会耐心地等待着屈辱者的胜利。将来，还是有希望的。"

全家人群策群力出主意，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派晓丹弟弟冒险钻进藏着被抄走书籍的仓库里，把《出身论》"偷"了回来……

1968年2月，春节过后不久，郑晓丹听说《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已于1月初被捕入狱。她十分愤慨，夜不成寐，独自走到小院里。荒郊的夜月冷森森地照着庭院。榆树的枯枝，在大月亮地上投下凌乱的影子。查抄了十八次的家，已经破落得不成样子。她抬头望月，素月流天的苍穹明洁、安静；可是在这块大地上为什么这么疯狂？为什么古代的文字狱，到了60年代愈演愈烈、变本加厉？为什么这坟场一样荒凉的郊野也不得安宁？为什么"文革"顾问康生从延安时期就制造大批冤案，诬陷迫害老干部？为什么他现在又大喊要抓"叛徒"、"特务"？在康生一贯极左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离篱笆小院一百米左右，有一眼砖窑。社员们用黄土打

成的坯，放到窑里经过烈火焚烧，就可变成坚硬的红砖。人，不也应该像泥土那样不怕火炼吗？晓丹突然决定第二天回到地院附中。临别时她对母亲邵清廉说："妈妈，如果我死了，您不要悲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晓丹回到地院附中提出十八个问题，指出"文革"顾问康生是个大野心家，林彪、江青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中央文革搞的一套决不是马列主义……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闻讯，立即指使人于1968年4月26日把她关押起来，对她进行秘密刑讯。审讯者要她交代宣传《出身论》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郑晓丹不承认自己有罪，凶手们就折磨她。先是饿她，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她喊饿，凶手就把二十多个窝头都端到她面前，立逼她全都吞下去。她吃了几个窝头吃不下去了，凶手们摁住她的身子，朝她嘴里硬塞。塞进去，她吐出来；吐出来，又把窝头塞进去。凶手们要她交代，她沉默不语。于是就打她，打得她浑身青紫，眼睑浮肿。

她什么也瞅不见了。她闭上眼睛，想起了她的妈妈邵清廉。1943年初，妈妈携带大哥，向人借了盘缠，离开老家辽宁新民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路上，日本鬼子盘问她，阎锡山部队刁难她，好容易到了山西洪洞县，又雇了个毛驴奔黄河边上的三交镇。从洪洞县到三交镇三百里，到处是山。过了黄河，经过绥德，走向延安。谁知道妈妈一进延安南关招待所就被康生手下的人扣押起来，诬陷妈妈是化装进边区的特务，打她，折磨她，要她坦白交代。她能交代什么呢？……

25年后，康生一伙又指使凶手硬逼郑晓丹坦白交代。她能交代什么呢？凶手们见晓丹顽强不屈，就把拴着几十斤重石头的铁丝挂在她的脖子上。她汗流浃背，始终不承认诬陷

给她的罪名，表现出一个革命青年大无畏的崇高气节。6月5日深夜，又搞秘密审讯。凶手们把郑晓丹两条腿和桌子腿绑在一起，两条胳膊和椅子背绑在一起，对她严刑逼供。郑晓丹坚持自己的观点，宁死不屈。凶手们把她打得遍体鳞伤，血溅衣裳。垂危时把她送到北医三院，北医三院不收，又把她拉到公安医院。路上她突然苏醒，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呼唤："妈妈，这是块什么地方呀？……妈妈……"1968年6月6日清晨，这年仅21岁的姑娘，就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法西斯恶魔残酷迫害致死了！

鲜花般的姑娘，才活了二十一个春秋，就这样被人间蟊贼一瓣一瓣地蹂躏、撕碎！捍卫真理的姑娘，正是美好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魑魅魍魉们毁灭掉她的生命和肌体！祖国母亲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三

线香的烟缕在灵堂里萦绕。两个家庭的成员，绕堂瞻仰烈士的遗物。

灵堂左侧陈列着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晓丹生前看完这本书，曾对母亲说："妈妈，我一定要学习卓娅。"当时她在永定门外蕲家坑七圣庙小学读书。寒假里她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冒着风雪，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掏通被菜叶堵塞住的水沟，帮助淘米的小孩把洒在地上的米粒捡起来。晓丹班上有个同学，从小死了父母，靠奶奶糊纸盒、捡破烂过日子，经常迟到旷课。晓丹每晚到他家里，先帮他的奶奶糊纸盒，再帮他补习功课，深夜一个人在星空下摸黑回家。在

那春夜京郊的小路，我们的小卓娅甩着小刷辫，挥动着小胳膊，哼着老师教唱的《我有一个理想》的歌，像只小燕子似的快乐飞翔。啊，谁能忘却共和国那朝气蓬勃的年代！少年们学铁木儿，学刘文学；青年男女则把保尔的话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作为座右铭。生活如春天的草坪那样欣欣向荣，秋天的枫叶那样热烈火红。

枫叶，一片火红的枫叶，现在就陈列在灵堂的镜框里。那经霜不凋的枫叶啊，是我们晓丹心爱的书签。

镜框里还陈列着两朵喇叭花的标本。早晨开放的喇叭花，含露朝阳，一尘不染，纯洁无瑕，——这就是我们晓丹的情操。

洁白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大照片。这是1968年4月晓丹关押前不久在龙潭湖公园拍的。她站在一株青松跟前，圆圆的脸庞，小巧的身材，秀眉下一对明亮的眼睛，亲切地注视着人们。爽朗、活泼的眉宇间，已浓厚地罩上忧思的神色。一条辫子搭在左胸前，右手紧握住背包带，那鼓鼓囊囊的背包里，塞满了书籍。其时正在流行"读书无用论"，焚书成了一种革命的时髦，但我们的晓丹酷爱书籍。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啊！她那时读书的范围已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扩展，《离骚》、《满江红》、《过零丁洋》、《咏石灰》……是她最爱读的诗词。她尤其崇敬杨开慧，有次对父亲说："爸爸，杨阿姨死得太惨。如果杨阿姨能活到今天，那多好啊！西汉时有个贾谊，他在长沙做过一任太傅的小官，后人称他为'贾长沙'。杨阿姨为了真理，在长沙殉难，我看称她为'杨长沙'才最般配。"

此刻，郑新潮站在晓丹骨灰盒前面，指着一盆冬青树，对罗克父母说："这盆冬青树，晓丹生前常给它浇水，如今一片

青绿，长得这么高了。当年我报国无门，整天艺兰养菊，以寄托精神苦闷。晓丹寒假回家，正值寒兰盛开，幽香盈室。她抚弄兰叶，反复欣赏，高兴地对我说：'爸爸，听说朱总司令也养兰花。兰花是天下第一香，品格高洁。我将来也要养兰花，今后我这小屋就叫兰斋吧。'"

"兰斋"，竟成了纪念她的灵堂！

瞻仰者缓步来到灵堂正中的纪念碑前，两尺高的汉白玉上，刻工精细，字迹秀逸。碑心刻着：

郑晓丹烈士永垂不朽
一九七四年六月六日

这是北京城里几位曾经刻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老石匠，得悉郑晓丹被害之后，从房山石窝起了一块汉白玉，流着眼泪，一斧一凿冒险刻成的。民心啊，世界上最公正的天平！

小小的灵堂里，摆满了各界送来的挽联、祭文、悼词、花圈。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送来了挽联。同学们送来了悼诗。亲友们送来了花圈。晓丹二哥送给妹妹的挽联是：

太行风暴邢居遭劫忍痛别卓娅
燕市迷离龙湖失散含悲悼长沙

亲属们绕室一周，又回到遇罗克遗像面前。从千劫万难中保存下来的那份《出身论》，和晓丹一家同生死、共患难整整13年。纸边已经破碎、发黄，中间印有油迹水渍，现在重见天日，供人瞻仰。

1970年3月5日罗克被害之后，郑新潮全家守在这份《出身论》旁边，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尽管当时他们一家8口人，每月靠60元勉强度日，仍凑集了一笔钱，由老郑带到北京，想送给死者的父母，表示一点支持和安慰。郑新潮到了北京，找到了出版过《中学文革报》的四中，打听遇罗克的家，人们说不知道。他又从四中转到灯市口罗克母校二十五中，问遇家的住址，人们报以惊恐的目光。郑新潮踏遍了北京东城区的街道，找不到遇家的下落，失望而归。啊，在那世态炎凉的日子里，亲友们冷若冰霜，相继疏远，却有一个无亲无故的不相识者跋涉千里，逆着冷漠的习俗，忍受人们的白眼，担着风险送去一缕温暖，这是何等可贵的情谊！

人们的结合，有的由于物质的诱惑，有的由于友情的眷恋，有的凭借权力作媒介，有的依赖裙带来维系，有的因为相仿的际遇，有的因为一致的兴趣。而他们今天相聚，则是因为在封建法西斯重压下共同的抗争，无私的关怀。这，才是"同志"这个无比高贵的字眼所固有的光辉！

晓丹父亲本想请王秋琳介绍一下罗克一生的事迹，但王秋琳深为郑家的情义所感动，嘤嘤啜泣，泪流不止。邵清廉只得搀扶着她到灵堂旁边晓丹生前的卧室里暂坐歇息。

四

这里仍如晓丹生前那样，一进门，靠墙码着一摞箱子。另一边立着一个书柜，里边插放着晓丹生前爱看的书籍。紧里边是一张卧床。床边小桌上有一面小镜子，一把小梳子。小梳子上还夹着几根头发，仿佛晓丹不久前还在这儿梳妆，刚

刚离开这里似的。

两位母亲坐在晓丹的床上。床边挂着一张牡丹江军马场的照片。照片上有一匹白马，一匹棕马。晓丹（她生于牡丹江畔的拂晓）站立在两匹军马旁，抬起小圆脸望着这边。王秋琳瞅着马的照片，不禁想起东四北大街519号那旧居小屋里，罗克的床边，也挂着一幅马的图片。那是徐悲鸿的名画《奔马》：那匹马儿扬鬃撒蹄，勇猛驰骋，一往无前。罗克就是在他最喜欢的那幅《奔马》下，奋笔疾书，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下了那篇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反动血统论的《出身论》。有一次他到街上去张贴《出身论》小报，有人气势汹汹地威胁："你等着，小心你的狗命！"他毫无惧色，对朋友说："我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如果为了《出身论》而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在那样危险的暴风雨的岁月里，我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声音。"一九六七年年底一个寒夜，罗克悄悄对母亲说："妈，看这情况，我要坐牢了，您要做好思想准备。"1968年1月1日，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授意逮捕罗克。1月5日，罗克离家之后，从此一去不回……

邵清廉解开一个包袱，把晓丹的血衣一件件翻给王秋琳看。睹物思人，邵清廉唏嘘抽泣，眼泪滴在染着晓丹血迹的衣裳上。母亲的眼泪和女儿的血印洇湿在一起。王秋琳的眼睛模糊起来。她看到的不再是摊在床上的血衣，而是摊在监狱台阶上的罗克的遗物：一副戴了多年的眼镜、一支金星钢笔、一件没舍得穿的新背心，还有一身旧衣裤。那套旧衣裤克儿用被镣铐锁住的双手，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罗克是怕家里人看到了上面的血迹，心里难过啊。罗克他爹往领取遗物的单子上签字时，浑身战栗，拿笔的手抖得写不成

一个字。落在纸上的不是一滴滴墨汁，而是一串串眼泪！王秋琳提醒着丈夫："咱们的儿子死得刚强，咱当爹妈的不能当软骨头。眼泪不能在他们面前流。"她接过笔，签了字，然后对老伴说："走，回家去哭！"便一手拉着老伴，一手托着亡儿的遗物，挺直腰杆走出了监狱……

现在，两个母亲坐在床沿上，相互诉说满腔的辛酸事。过去，这撕心裂肺般的悲哀向谁诉说？她们甚至不愿跟丈夫提起，提起了怕丈夫伤心；她们不愿跟儿女们念叨，怕儿女们听了难受；她们更不愿跟亲友们说及，怕遭到亲友们的嘲笑！多年来，她们所遭受的屈辱从不向人倾诉，她们只是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深夜梦醒，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暗暗抹泪。今天，她们遇见了比亲姐妹还亲的亲人，她们的话呀，就像邢台的达活泉那样，滔滔不绝地喷射宣泄出来。而她们的眼泪，就像泉水一样，涓涓流淌。

母亲的眼泪啊！哪一块土地上，像我们的母亲们那样，流过这么多的眼泪，受过这么多的屈辱？她们身受着失去亲人的伤痛。她们承担着生活的、精神的、经济的、政治的千钧重压。浩劫、动乱、党难、国难、家难，最大的苦难落在母亲们的肩上。"梦里兰斋慈母泪，望儿山上雁惊寒。"她们面对惨淡的人生。她们正视淋漓的鲜血。她们支撑着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她们牢记魑魅魍魉犯下的旷古罪行。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尼洛夫娜，相信儿子巴维尔宣传的真理；我们的母亲们赞扬儿女们对真理献身的精神，深信正义终会战胜邪恶，冤死者终有昭雪之日，以此在漫漫长夜里安慰自己痛苦的心。她们终于挺下来了，熬过来了，盼到了今天，盼到了屈辱者的胜利。

坚韧不拔、坚强无比的中国母亲啊！

晓丹的遗物中间，有一双补了又补的墨绿色短袜。邵清廉抚摸着袜子上的补丁，心疼地说："我这闺女，从小克己为人，有同情心。我们在北京住时，北海公园有个花匠家庭生活困难，晓丹就把衣服送给他家的孩子们穿。"

王秋琳说："克儿也一样。1966年冬天，姥姥七拼八凑给他翻做了一件棉袄，早晨他穿着去上班，到晚上回家时却只穿着两件单衣，冻得身上打颤。原来他把棉袄送给了一个被轰走后回来上访的街坊。"

晓丹和罗克的母亲，互相夸着自己死去的儿女。王秋琳望着窗外的蓝天，忽然幻想地自言自语："十多年前，如果克儿和晓丹得以相识，他们倒是挺般配的一对。"又痛苦地回到现实："如今儿女们走了……我们不迷信，但我希望在九天之上，他们的英魂不孤，能有个伴儿多好，像蓝天里的两朵白云，互相依傍，比翼齐飞，互诉心曲，永伴知音……"

邵清廉颔首点头，怅戚地望着窗外。

这时，郑新潮正好从灵堂那边走进来。他听了罗克母亲的话，沉吟有顷，没有回答。他把两位母亲引到灵堂外的院子里。

10月初的阳光，照着这绿树掩映的篱笆小院。院子中心摆着两盆菊花——一盆金黄色，如光辉四射；一盆紫红色，似杜鹃泣血，红黄相衬，彼此辉映。从苏州移来的两丛翠竹，在秋风里萧萧瑟瑟，相互应和。蓝天里那两朵轻絮般芳洁的白云，仍在缱绻依傍，结伴而飞。而在浓密的榆荫下，已堆起一个小小的石山。这里的石头，有的是郑新潮从附近田野里、村道上搬来的，有的石头是他用辛勤培育成的几百盆菊花跟人换来的。郑新潮养过战马，熟悉动物生理、动物生态，对植物生理、植物生态也很有研究。他培育的菊花，品种名贵，

开花不掉叶。人们扛着石头争先恐后地向老郑交换名菊，一盆菊花换一块石头。石头堆积多了，这里便取名为石园。

石园，纪念时代强者的墓园。现在，郑新潮的几十年沉冤已经昭雪。他皓首白发，身穿军装，指点园子里的石、竹，对 1957 年的错划也已得到改正的罗克父母说："石碎不改其白，竹焚不改其节。我们两家儿女的英灵安息在这里，像广州郊外黄花岗下并排埋着七十二烈士的忠骨，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起纪念着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遇罗克和郑晓丹，他们为真理而献身，《出身论》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生前是同志，死后是战友。我已写信给济南军区炮兵部队的老战友，请他们到山东梁山泊的山岗上选一块花岗岩运来，再请那几位刻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老石匠，为罗克刻块纪念碑立在这里供人瞻仰。不知你们两位是否同意？"

遇崇基听了老郑周到的设想，十分感动。罗克十年前牺牲在永定河边荒郊野外，连把骨灰也没找到，今天总算有了归宿。遇崇基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建筑。他熟悉建筑史，他知道世界上许多名人、伟人死了之后都采用花岗石建筑陵寝，修造纪念堂，刻凿纪念碑。用花岗岩来刻碑，这是对时代强者最好的纪念。

坚强，是马克思最喜爱的品德。花岗岩的坚强精神应该永远赞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抗逆风、顶恶浪、坚定不移、坚强不屈，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应有的风骨。正像罗克在 1966 年 8 月 26 日的日记里写的那样："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坚强。"

开始坚强，最后坚强，这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杰出人物所共有的精神。历史上种种邪恶势力，曾用监禁、流放、活埋、火刑、绞架、大

刀、子弹、棍棒，摧毁、扼杀、消灭一个个坚持真理的思想先驱者们的肉体。但是，真理是枪毙不死的，正义是掩埋不住的，善美是消灭不掉的。而执刑者自己，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永远耻辱的印记。

在我们民族这十年大灾难中，是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郑晓丹等烈士的星星之火，燃成了1976年“四·五”运动百万群众齐怒吼的燎原之势，陷林江反革命集团于汪洋大海的火阵之中。这些烈士是人民的精魂、民族的脊梁、祖国的英雄。他们将永远彪炳于不朽史册之中。今天，我们举国上下，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向四化进军的日子里，将永远铭记住：是先烈们的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拓出了新长征宽阔的道路……

哀乐声里，两位烈士的父母，把院子中心那两盆傲霜的秋菊，移献到石山面前。他们遥望苍天，肃然祷祝。

啊，华夏恶魔正公审，石园家祭告忠魂。

忠魂兮归来矣！



评论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屈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

宋永毅

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九月，正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伴随着老红卫兵皮带的呼啸声在社会上风行一时，红色恐怖下的人们连乘车、上医院都不得不被迫报上自己的成份（即家庭出身）之际，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北京学徒工却对此既不以为然又忧心忡忡，为了向社会公开他的独立思考和向血统论发起正面挑战，他开始伏案潜心写作一篇名叫《出身论》的文章。他，就是遇罗克。

《出身论》初稿于 1966 年 7 月，开始只是几百份油印的传单。它们产生于遇罗克每月 20 元左右的菲薄的学徒工薪水，是他用自己的工资买来钢板、蜡纸刻印而成，并由他弟弟遇罗文等帮忙张贴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及电线杆上的。遇罗克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在回答别人这一笔名源起时，他说：“我不喜欢什么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

在 1966 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中，北京男四中学生牟志京，“于极偶然中，在一根电线杆上看到最初的《出身论》油印件，署名是‘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读过之后，牟志京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他自己反对‘对联’的血

统论，还只是出于天性和直觉，而《出身论》的作者则广征博引．条分缕析，颇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牟志京当即便按照油印文章上所附联系人地址、赶到六十五中。在那里，他见到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经商量后，他们决定把《出身论》变成铅印，广为散发。牟志京便向四中借了五百元钱，去解放军1201印刷厂联系印刷。经牟志京、遇罗克修改后的《出身论》共有三万多字，在排版成一个对开四版的传单时竟空出了一大块，于是牟志京灵机一动，干脆取名《中学文革报》，主办单位的名称起了个更响亮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国文革中第一份纯民间背景的报纸便如此诞生了。

《出身论》如一声惊雷，炸开了当时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第一期三万份报纸竟在数天内一售而空。很快又出专刊六万份，正是一纸风行，京城纸贵。人民群众还自发地将它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广为散发。这一情景，与血统论的代表作《谭力夫讲话》是由各级下令广为印发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正好从中窥见民心向背。《中学文革报》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近4封全国除台湾和西藏外所有省区的群众来信，坚决支持《出身论》。《中学文革报》自1967年1月创刊，至4月因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共出版了六期。遇罗克在上面共发表了六篇论文：

1.《出身论》（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2.《谈“纯”》（第二期，1967年2月2日）

3.《“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第三期，1967年2月10日）

4.《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第四期，1967年2月21日）

5.《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第五期，1967年3月6日)

6.《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第六期，1967年4月1日)

此外，他还有一篇《谈鸿沟》，发表在首都《中学论坛》的创刊号（1967年2月27日）上。

这些论文构成了《出身论》的人权主义体系，又很快形成了一股为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思潮，自然也遭到血统论维护者“联动”等的反对。他们不断冲击辩论会场，抢砸报纸编辑部……从林彪、陈伯达到戚本禹之流都在他们当时的讲话中或正面或侧面地批判过《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大方向错了”，“有人利用出身问题挑拨我们党与广大青年群众的关系”。由此可见，《出身论》触动的不仅是旧体制的维护者们的利益，它动摇的是包括文革派在内的整个思想体系。它自然而然地成了林彪、四人帮要合力绞杀的异端邪说了。

即便对《出身论》只投去匆匆一瞥，也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观点是两个字：“平等”——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这样，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面——成份与出身

不好的人，其险恶用心便昭示于天下了。

由于《出身论》是在与血统论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对血统论的鼓吹者——那批狂热的大多为干部子弟的老红卫兵的批判，必然使遇罗克的笔锋涉及到反特权这一敏感课题。从而使《出身论》等文章成了最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和批判特权阶层的文章。在遇罗克看来：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并指出血统论完全是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谈鸿沟》）。这样的思想在文革初期的中国真可谓惊视骇听，而它又非常接近现代民主主义的人权思想。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遇罗克的《出身论》完全无愧为一份黑暗王国中耀眼的人权宣言书，而年仅二十余岁的遇罗克为此祭上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

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1965 年 11 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遇罗克写了《论“清”官非“官”》（一万六千多字）、《人们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万五千余字）和《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一万四千字）等论文投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文汇报》等，对姚文元进行全面反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稿件自然遭到了退稿。遇罗克在收到陈伯达把持的《红旗》杂志退稿后，在当天日记中嘲笑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

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这篇文章里,他点名批判了姚文元的谬论。他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降临,我们整个民族的行为与思想都陷入混乱之际,遇罗克却自始至终保持着清醒。他首先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966年2月6日的日记中,他就批判了陈伯达不该像吹捧封建统治者那样来吹捧毛泽东。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遇罗克还一眼看穿所谓文化大革命幕后的权力斗争实质,他在6月4日日记中针对狂热的民众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谓北大7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他尤其反对煽动青少年斗老师,破四旧等反文化的野蛮行为。他在6月17日日记中写道:“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像新市委所言:‘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8月23日他又写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

门面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好一个焚书坑儒”。

在8月3日的日记中，遇罗克写到：“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志鑫的大会……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但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遇罗克的目光鞭辟入里地看到了群众运动背后的危机，正如后来有人评论的：“群众批斗干部，是因为干部的官僚化与群众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官僚化并不完全是干部个人的作风，它正是人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结果。但是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给干部罗列的‘罪状’首要的恰恰是，因为干部们反对了毛泽东（这真是冤枉！）这证明1966年下半年，人民群众本能的反官僚制度的要求却被披上了为国家更加专制独裁而战的战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是林彪提出来的，谁高喊了它呢？是人民，但这根棍子最后把谁打痛了呢？还是人民！”

遇罗克之所以能“举世皆浊我独清”，和他在1960年因出身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有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从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学到卢梭的人权平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都下过苦功夫钻研。这些都培养了他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现代迷信的批判。

然而，疯狂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如同遇罗克当年的伙伴们在回首当年时所言：“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

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为此，《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但遇罗克仍坚强不屈，五次上书。1967 年下半年，他又转而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准备撰写《工资论》，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贡献发给。同时遇罗克估计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在 1967 年的总结中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 1968 年 1 月 5 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以"企图暗杀毛主席"的完全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于 1970 年 3 月 5 日。那一年，他才 27 岁。人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出身论》揭露了所谓"阶级路线"的现代种姓制度的本质而惨遭杀害。30 年岁月并没有尘封住《出身论》的光华，今天重读遇罗克的一系列论著，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在温和的言语后对"平等"的竭诚追求与现代人权思想的熠熠光辉。

遇罗克与他思考的时代

印红标

遇罗克是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的思想先驱者，被誉为沉沉暗夜中划破夜幕以全部青春和热血放射出理性光华的陨星。时代的黑暗险恶，突显出他思想的深刻和个性的坚强。评说遇罗克，不能不同时考察他所生活奋斗的特殊历史环境——文化大革命。

一、非同寻常的历史机遇

遇罗克是文化大革命的抗争者、受难者，同时又是文化大革命给了他在常态下不可能享有的发表社会政治见解的机会。遇罗克人生的矛盾性在这里，历史的悲剧性也在这里。

文化大革命与以往政治运动的明显区别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赋予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权利。[1]

---

① 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外宾的谈话，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本文注释均为作者注。——编注）

以往政治运动一般是自上而下地进行，领导动员，层层发动，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从而使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人掌握运动的领导权。斗争的矛头通常指向党外、党政基层单位或者少数领导人，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四清等运动。党内斗争主要在高层进行，并且限于党内，如1959年围绕彭德怀的斗争。大凡运动不论其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都是这样的模式。只有1957年短暂的整风“鸣放”时期，一度有过发动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党内整风的迹象，但是斗争矛头很快转向党外，反击那些帮助整风的人士——“右派”。

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由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直接号召和鼓动群众造反，冲击党内领导“当权派”，重点“整”其中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意味着不同程度地绕过执政党的部门、地方和基层领导，削弱乃至剥夺了他们的领导权，使他们陷入被动挨整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一改平时对群众言论和活动的管理方式，最初是开放大字报，继而允许群众成立红卫兵等组织，允许串连、游行、集会、散发传单、出版报纸刊物。在放宽言论、出版、结社的同时，参与运动的社会群体也逐步扩大，并且逐步向底层、向疏远领导层的人群发展。运动的积极分子最开始是依靠党政组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模范人物；继而转向家庭出身好，即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所谓“红五类”家庭的人，不再计较是否党员团员；接着家庭出身也不复成为障碍，党内党外一般群众纷纷登场。

运动为普通群众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机会，而对

于遇罗克至关重要的是1966年10月，中央明确地提出要批判血统论。所谓血统论指当时流行的、以家庭出身判定人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的主张。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重要讲话，陈伯达要求为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他还把血统论列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之一。他说，所谓“自来红”、“老子英雄儿好汉”实际上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①

可以认为，陈伯达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当时红卫兵正奉行血统论，干部子女掌握领导权，阻碍运动向冲击领导干部的方向发展。中央要求地方和基层领导人为错整的群众平反、要求批判血统论显然是为争取更多的群众，将运动矛头引向党内当权派扫清道路。海外有学者称此举为“打人权牌”。

文化大革命戏剧性的变化为遇罗克提供了机会。运动开始时遇罗克持批判的态度并身受其害，他曾以一个工人的身份撰文反驳姚文元，被他所在工厂强制“学习”，他居住的小屋也遭查抄，他撰写的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出身论》只能放在抽屉里而不能发表。但是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油印散发了《出身论》。支持他观点的几名中学生1967年1月创办《中学文革报》，刊登

---

① 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1966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10月编印。

了《出身论》，创刊号印刷3万份，马上售罄。以后遇罗克又先后在《中学文革报》、《中学论坛》上发表了数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从此他的文章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传遍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些，在文革前的常态下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运动初期也是不可能的。①

群众性造反运动的发动和兴起，给了遇罗克难得的言论机会。他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但是也没有因此而像很多学生那样抱着对领袖的感激投入党内"路线斗争"，走上造反派的道路。他努力保持警惕，冷静地把他的批判局限于与血统论有关的问题。他始终使用"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既不轻易暴露真实姓名，又不愿采用当时造反派常见的"战斗队"之类名称。他是《中学文革报》的精神支柱，却又总是通过他的弟弟——一个中学生——与报社联系，很少直接出面。或许以往的经历和挫折使他不得不有所顾及。应当说，遇罗克是有准备、有策略地利用这个机会。这是他与造反派的不同，也是文革领导者所不愿看到的。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决不是为遇罗克这样的思想者提供言论的自由。遇罗克可以讲话的时间并不长，从1966年10月算起，只有半年。1967年4月，当运动的领导者们要求对群众运动加以约束的时候，遇罗克的言论就越发显得难以容忍。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讲话，宣布《出身论》是反动的。他说《出身论》"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

① 有关遇罗克的情况参看：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光明日报》1980年9月21、22日；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花城》，广州，1981年第4期。

“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他要求造反派“批它的反动思潮”。[①] 此后，《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遇罗克5次上书毛泽东进行申辩都如石沉大海。他的处境随着一轮一轮运动日益险恶。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之时，是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清理阶级队伍，要求在党内党外清查“阶级敌人”。1970年1月，所谓“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开始。3月，遇罗克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杀害。文化大革命要以青年思想者的鲜血证明其“必要性”，祭祀它的新秩序了。

遇罗克是因言论致罪的。他猛烈抨击的家庭出身歧视政策和血统论，不是文化大革命一个早晨突然出现的。文革以前，共产党内“左”的错误已经根深蒂固，不仅久闻而不知其臭，而且不容他人说半个“不”字。直到群众造反运动风起云涌，党政领导陷于瘫痪的时候，遇罗克才有了发表自己合理主张的短暂机会，却又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仅是他本人的悲剧，而且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无道，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

① 戚本禹在与其他领导人1967年4月14日接见北京中学红代会代表的讲话，见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967年5月。此资料记载讲话时间是4月13日，估计是因为接见在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进行。

二、关于平等权利的论争

遇罗克撰写《出身论》等文章，向血统论宣战，义无返顾地为受血统论歧视、压迫的青年争取平等的权利。遇罗克毫不含糊地指出：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遇罗克强调，家庭出身不同于“成分”，共产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针对当时流行的种种貌似公允实则歧视的作法，他说：“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作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①]

在以后的文章中，遇罗克进一步提出：“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我们讲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曲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不在于他的性格、不在于他的年龄，

---

① 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即遇罗克）：《出身论》（1966年7月初稿，9月定稿，11月修改），《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北京，1967年1月18日。

而在于他的表现”。[1]

这里，遇罗克提出了他最有价值的命题——平等，即所有的青年在就学、就业、个人发展、人格尊严、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应当一律享有的平等权利。它不应因为家庭出身不同而有所区别，差别只存在于后天的努力；这是中国青年应当理直气壮地享有的权利。但是当时一部分青年的权利却因为父母，而不是本人的原因，被以“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名义剥夺了，而且不准提出异议，谁提出谁就是阶级立场问题。

血统论的狂热吹捧者老红卫兵不承认这种平等。他们公开地宣称并实行赤裸裸的歧视和压迫：“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以及他们的狗崽子，和大大小小牛鬼蛇神斗到底！”[2]“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3]

以维护基层党委和工作组为特点的“保守派”也不能接受这种平等。文革前和文革初的基层党委、工作组实行了日益严重的家庭出身歧视政策，追随他们的保守派学生的态度不难想象。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在一篇后来影响全国的讲话中，一方面维护工作组，一方面讲他的阶级路线观。他

---

① 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即遇罗克）：《谈鸿沟》，《中学论坛》创刊号，北京，1967年2月27日。

②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估计成文于1966年6—8月间，被作为批判资料重新发表于《兵团战报》，北京，1966年11月26日。

③ 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高655班核心组：《做顶天立地的人》（1966年8月），被作为批判资料重新发表于《兵团战报》，北京，1966年11月18日。

蛮横地责问“出身不好”的学生：“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斗争中求团结。先把你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他很是听不惯“平等”二字：“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里有什么平等？我们有许多哥哥姊姊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生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作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①

这种用旧政权迫害革命者子女的现象来论证血统论合理性的逻辑当时颇为流行，但是认真想一想就不难发现论证者实际上正是丑恶传统的继承人。如果连株连亲属也要向专制统治者学过来的话，那么新社会又新在哪里呢？

遇罗克勇敢地蔑视由来已久的家庭出身歧视、“文革”中登峰造极的血统论以及血缘传承的社会政治特权，据理力争所有青年本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最初激烈反对遇罗克的是老红卫兵。1967年初，当遇罗克有机会在小报上发表文章的时候，血统论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老红卫兵也是今非昔比，江河日下。他们赖以维系其特殊地位的革命父母——领导干部受到了冲击，“老子”是否英雄成了问题。他们失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宠爱，也丧失了曾

① 《辩论会谭力夫发言记录》（1966年8月20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远征军驻重庆联络站编印：《东方红（有关批判谭力夫讲话材料专辑）》，1966年10月17日。

经在学生中享有的权威。但是他们仍不愿彻底放弃优越感。

1967年1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了文章《评〈出身论〉》。文章开篇就断定《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文章说，《出身论》作者错误的关键在于“抽去在人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这条纲。”文章反对遇罗克提出的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所受的社会影响也首先并且最多地是受他家庭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影响。”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针对遇罗克提出“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的要求，文章坚持工农子女和干部子女在就学、参军、担任机要工作等方面天经地义地应该享有优先权，不能平等。文章最不能容忍的是《出身论》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文章断言：这是“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要造反，要翻天”，即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①]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已经改变了1966年夏季的霸道口气，在理论上向比较策略的正统提法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靠拢，但实质仍然是不肯放弃以“阶级斗争”名义掩饰的优越或特权地位。

造反派对《出身论》的态度十分微妙。造反派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大多有受血统论歧视迫害的经历，很多中学生造反派组织就是在批判血统论的过程中成立的。他们反对血统论，但是又受着正统教育的深刻影响，认可家庭出身——这个前提的不平等，寄希望于通过“重在表现”来救赎，认为这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中有人明确支持《出身论》，但

---

① 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1967年1月)，北京四十一中《风雷激》编辑部：《风雷激（〈出身论〉有关资料）》，1967年5月编印。

这是少数。一些人内心与《出身论》的观点有某些共鸣，又感觉遇罗克的观点过于激烈，“心理有些阴暗”。在中央表态以后就不再讲话，他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而造反派的主流派则敏感到《出身论》与正统政治观念的差异，认为血统论和《出身论》从两个极端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从而两线作战。署名“第五研究小组”的一篇文章《论出身》很有代表性。文章说：“家庭影响并不是很小的。家庭影响更不是简单的‘服从’社会。相反，家庭影响是整个社会影响中的一个强大的因素。”文章说，遇罗克的《出身论》无视剥削阶级家庭的坏影响，是主张“无出身论”，实质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唯出身论必须批判，无出身论也必须批判，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我们认为：出身不好的人，其家庭影响就是不好。（当然不能绝对化）这种影响也决不是小小不言。如果他们要进步，就必然与坏的家庭影响发生矛盾，就必然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与家庭发生矛盾。要革命的青年决不能回避这个矛盾（事实上也回避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正视这个矛盾，在思想感情上与家庭彻底划清界线”。[1] 1967年2月至3月，遇罗克最后发表在《中学论坛》和《中学文革报》的3篇文章，就是与造反派进行辩论。

应当承认，上述造反派文章所说“家庭影响是整个社会影响中的一个强大的因素”是客观事实，然而问题在于家庭影响的差异是否应当作为不平等的依据，是不是应当淡化直至忽略家庭出身。在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和社会激变时期，对

① 第五研究小组：《论出身——批判出身问题探讨中若干错误思想》，《只把春来报》，北京，1967年3月12日。

敌对阶级子女的警惕虽然有失公道但尚可理解。然而随着政权的稳定和和平建设的到来，不是淡化而是强化由家庭出身造成的不平等那就是明显的荒谬了，并且令人怀疑在堂而皇之的革命外衣之下是否另有所图。不幸的是，当时的正统意识形态为不公平的现实制造了种种“理由”。一切公开论辩只能在正统话语体系中进行，对很多问题遇罗克的难以直言，这是论争中对遇罗克的不利因素。

遇罗克呼吁的所有青年政治待遇和社会待遇的一律平等，在今天看来，是对人权的呼唤。50年代以后，人权被认定是资产阶级的观念，从教科书上消失了，致使一两代人不知人权为何物。但是人们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要求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遇罗克为之奋斗的维护人格的尊严、保障全体青年就学、就业的平等权利，社会和政治的平等待遇等等，分明是人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社会和政治的权利，一句话是人权。遇罗克的言论是确凿无疑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观资料，应当引起当今中国人权问题研究者的注意。

三、关于特权问题

为反驳清华附中红卫兵，遇罗克撰写《“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文中，他尖锐地提出了特权的问题。他说：联动的主要成分是“没有改造好的高级干部子女”，“这些高干子女处于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是物质的和精神的特权阶层，是“一个新型的少爷阶层”。遇罗克发挥了他对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

辟了，贝尔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股东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在中国搞复辟，不必请蒋介石回来，不必原来的资本家重新作经理，有联动这样的贵族特权阶层、新兴的资产阶级就足够了。[①] 显然，遇罗克所说的“复辟”主要是指以革命名义出现的特权阶层掌握政权。当时“资本主义复辟”是普遍议论的话题。遇罗克猛烈抨击干部子女特权的观点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不可避免地带着30年前的时代局限，带着毛泽东晚年思想影响的清晰烙印。他反击血统论时所运用的某些概念和观点，例如：关于“特权阶层”的概念、关于“新生资产阶级”的概念、关于运动“主要矛盾是95%以上的革命群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的矛盾”的观点等，都是当时干部群众普遍热烈讨论的话题，也是造反派偏爱的观点。遇罗克的论述不是为进行党内斗争服务，而是为了研究社会问题，批判血统论，因而与造反派有所不同。

特权问题是苏联模式国家的一个突出的弊病，是国际性的现象。它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背道而驰，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失望，动摇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共产党的敌人就此进行攻击；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们对其进行尖锐的批评，同时不懈地找寻根除弊病的出路；而一些既得利益者则对此讳莫如深。这一切使问题变得复杂而敏感，长期以来与特权问题相关的冤案时有发生。遇罗克敢于直面人生，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他所提出的、在老红卫兵和联动身上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特权地位、特权阶层的问题，至今仍然是研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正视和研讨的问

①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即遇罗克）：《“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1967年2月10日。

题。

遇罗克最可贵的品格是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批判态度。他只服从真理，而不简单地以最高政治权威的是非为是非；他关注文化大革命，而又始终与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保持距离。为此，遇罗克承受着多年既定政策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巨大压力，又面临来自老红卫兵和造反派主流派两方面学生的攻击，但是他没有屈服，没有退缩，勇敢地为自己的信念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三、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

从遇罗克发表的批驳血统论和驳斥姚文元的文章来看，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社会性的家庭出身问题和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问题，而不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之类党内斗争问题。这是遇罗克抗争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的矛盾错综复杂，其中对全局起重大作用的主要有三个。其一，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即所谓“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所谓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参与党内斗争是发动群众运动的原因，也是对群众运动的要求。其二，文化领域的斗争，中心是进一步强化执政党对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主要表现为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再教育”。其三，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被领导的群众与党政领导“当权派”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激化，进而被引导为党内斗争服务。

遇罗克关注的家庭出身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问题。要实现他所呼吁的一切青年的平等权利，不仅应当肃清红卫兵推行的赤裸裸的血统论，而且要改变文化大革命以前即已经形成，“文革”初期愈演愈烈的家庭出身歧视政策。为此，遇罗克的批判不限于文化大革命，而是对着所有贯彻和维护这种歧视政策的事物，包括文革前共青团、高考和招工等工作中的弊端，也包括文革初期基层党委或工作组实行的十分严重的歧视政策。这就和党内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求有了契合之处。但是遇罗克论述的基点是平等的权利而不是路线斗争。他成熟的地方在于没有放过机遇，又没有走得太远。他不去专门讨论党内“路线斗争”，也没有刻意攻击哪位领导人。他是从批判血统论的角度去援引党内斗争可供利用的资料，而不是从党内斗争的角度观察和批判血统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批造反派学生，他们也是血统论的受害者，但是他们习惯地把中央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源泉和归宿，主动地把批判血统论纳入党内斗争的轨道。他们谴责道：关于（血统论）对联的辩论“猖狂地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十一中全会上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进攻，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向毛主席的路线进行疯狂反扑所做的舆论准备。对联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单纯的阶级路线问题，……对联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生死搏斗的问题，也就是关系到文化革命能否深入发展的问题。关于对联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批它个落花流水。上揪下扫……”[①] 中学生造反派的这种状态或许多少有些现实利害的考虑。他们缺少政治资本和靠山，批判血统论向

---

① 《宣判反动“对联”的死刑》，《兵团战报》，北京，1966 年 12 月 21 日。

干部子女挑战，没有中央的尚方宝剑不可想象，但是从以后的发展看，造反派也确实是以捍卫"革命路线"为己任的。至于遇罗克对姚文元的反驳，则是从"清官"等学术和文化的角度，从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提出问题，着重点同样不是党内斗争。

遇罗克的处境使他与领导层存在很大的社会距离，他的文章很少涉及党内问题，这与张志新、史云峰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抗争者的思想和言论有所区别，后者关注的中心在党内，他们被害的主要原因是批评林彪江青，为刘少奇等领导人的遭遇鸣不平。

遇罗克和联动的关系及历史命运值得一提。文化大革命中，二者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却又先后被打成"反动思潮"或"反动组织"。文化大革命以后遇罗克和联动均获得平反，但是二者显而易见的社会政治差异不会随着平反而泯灭。如上所述，遇罗克是在为社会平等而战。联动的前身则是追求特权、劣迹斑斑的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背离了他们的期待，冲击到领导干部即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本人的切身利益，他们才从文革的"闯将"变为抗争者。联动的正面价值在于政治层面——党内斗争。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动正是在文革的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上对抗运动的主流，反对揪斗老干部，抨击中央文革小组。至于联动的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谋求特权的倾向，在家庭出身问题上排斥他人的态度，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

遇罗克和联动的社会联系明显不同。遇罗克在受血统论伤害的青年，特别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中享有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些青年基本来自远离领导层、政治地位不

高的家庭，他们在政治歧视和压迫面前往往是无助的。当年没有见到哪位领导干部为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说公道话。文化大革命以后对遇罗克的颂扬多来自社会基层和知识界，仍然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对遇罗克的颂扬，其中包括某些有老红卫兵或造反派经历的人。他们认为应当为遇罗克平反，但是不宜宣传，因为遇罗克的观点未必正确，算不上是英雄。[①]

与遇罗克迥然不同，联动的社会联系主要在干部子女和领导层。联动对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抨击间接地表达了领导干部层的政治意向。在 1967 年著名的“二月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为联动辩护。李先念质问道：“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②] 连文革领导者也不能不重视老一辈革命家的声音。1967 年 4 月 22 日，按毛泽东的指示释放了在押的联动成员及其他老红卫兵。释放当天，自周恩来以下几乎全部中央领导人，包括江青、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些中学生。此非常之举耐人寻味。文革中后期，联动长期得不到平反，但是这没有妨碍不少有联动经历的干部子女通过某些领导人的干预，经过一般青年所不可能企望的不公开渠道，即“走后门”参军。

遇罗克和联动的冲突，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中国青年当中由家庭出身歧视政策和血统论等原因造成并激化了的种种社会政治及思想意识的矛盾。青年中存在一道“鸿沟”：一方面是忍气吞声的权利和利益的受损者，另一方面是趾高气扬

---

① 作者 1985 年参加一次有关红卫兵问题的座谈会，与会的某些前老红卫兵和红代会头头谈了这样的观点。

② 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第 210 页。

的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者和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存在不同，立场观点必然相左。家庭出身歧视政策和血统论的既得利益者——老红卫兵和联动，很难与不甘作天生“贱民”的权益受害者遇罗克有共同语言；而在揪斗领导干部“当权派”问题上的受害者老红卫兵和联动，与旁观者遇罗克同样不会有共鸣。在争取社会平等、反对血缘特权的层面上，遇罗克是正义的，而联动是社会弊端的既得利益者；在党内斗争的层面，即所谓发动群众斗争党内走资派的问题上，联动的抗争是积极的，而遇罗克则宁可援引支持批判血统论的文革领导者。

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具有不尽相同的发展逻辑和评价尺度。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互相交织，关系复杂。在推进文化大革命和抵制文化大革命之间，固然存在着对抗；而与文革正统进行抗争的诸多异端也并非同舟共济，有些还是势不两立、形同水火，为社会平等而战的遇罗克与维护老干部的联动的冲突就是一例。

遇罗克离开我们已经将近30年了，那个以家庭出身问题压制人，摧残人，吞噬人的时代也已经过去20年了。中国人在推倒现代迷信，解放思想，医治动乱创伤，重建家园的同时，填平了遇罗克所深恶痛绝的家庭出身的“鸿沟”。今天，出身再也构不成“问题”了。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忘记历史。遇罗克以他单薄的身躯、无畏的勇气拼死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呼喊，为社会的正义、平等而苦斗的精神属于昨天，更属于今天和明天，因为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理想还需要人们的奋斗，甚至牺牲。

捍卫常识的代价

雷　颐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可能很难想到，遇罗克的《出身论》仅仅是说出了一些现在看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在三十几年前竟会引起人们那样强烈的感情冲动和社会轰动，不是激烈反对就是坚决支持。而且，为了捍卫常识，作者遇罗克竟然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因此，只有对“那个年代”的背景有所了解，才能“读懂”遇罗克，才能理解这以生命为代价的文字的意义，才能认识到这一“常识”之作在中国当代思想中的特殊地位。

就大环境而言，从1957年起，中国的政治形势便不断“左”倾，“阶级斗争”日渐为“纲”。在青年学生面临的所谓“红”（政治态度）与“专”（文化知识）的关系中，越来越强调“红”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文化知识被作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被批判、被禁绝；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一度在青年中影响颇大的苏联文化也被冠以“修正主义”而被批、被焚。一代青年，就是在这种极端封闭的“革命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极为孤陋畸形，充满所谓“革命理想主义”色彩，坚信自己肩负“亲手埋葬帝、修、反”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随着对“资本主义复辟”、“剥削阶级时刻要夺回失去的天堂”的宣传不断加强，

青年中更产生了一种草木皆兵、近乎病态的政治敏感。

在学校和青年工作中，日益“左”倾的“阶级路线”使家庭出身，即父辈、更多的是祖父辈的阶级成份越来越大地决定了个人的命运。“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在上学、就业、入党、入团、参军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严重的歧视。其实，知识分子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对新社会、共产党一样充满热爱，同样充满共产主义的理想色彩，因此而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有一种“原罪感”，总想“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够“无产阶级化”。由于家庭背景，他们中的许多人知识面较宽、视野较广，却又习惯于自我压抑。一方面，他们对从父辈影响中得来的某些“非无产阶级”文化有某种深深的留恋，对日益严厉的文化、思想批判有种格格不入之感；另一方面又自觉努力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情调”。一方面因在入党入团、升学参军等问题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不理解，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对自己家庭出身的一种应有的惩罚。这种矛盾产生的内心痛苦，长期难以纾解，大都抱“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谨慎处世态度。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更是求“清白做人”而不得，背着难以摆脱的精神重负。

在这一代青年学生中，最为自信、活跃的是所谓“革命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由于客观的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他们具有较为开阔的政治视野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当然接班人”、“舍我其谁”的优越感、特权意识在他们身上溶为一体。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最可靠的“接班人”，所以很早就表现出直接的政治参与愿望。在入学、入团

等各方面他们都享有特权，一些人甚至被“保送”入学，学校中的“学生干部”几乎全为他们所包揽。1964年“四清”运动中，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部分高干出身的学生提出不仅在教师中、而且在学生中也要进行“四清”，进行“阶级排队”，要在学生中进行激烈的“斗争”，对“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进行更严厉的整肃。几乎同时，毛泽东关于“教改”的谈话首先在他们中流传。由于“得风气之先”，他们根据毛的讲话精神，认为现在的学校仍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修正主义统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此时他们已如箭在弦，当“文革”一开始，他们就组成红卫兵，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成为一支在强权支持下令人望而生畏的冲锋队。

他们很清楚，自己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自己的后盾，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明确说道：“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红旗》，1966年第11期）

他们首先破除的是考试制度。因为虽然“文化”的比重已大幅度下降，虽然他们在入学的分数线上享有优惠，但“考分”毕竟在无形中成为对等级特权的一种挑战。因此，他们提出应按“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录取学生，用保送和推荐制取代考试制，其实质是要实现特权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不仅把许多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打成“黑帮”、“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关进“牛棚”，而且在学生中“组织阶级队伍”，按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革命烈士、革军、革干、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和“黑五类”或“黑七类”（地、富、反、坏、

右、黑帮、资本家）子弟。“黑七类”子弟被称为“狗崽子”，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必须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甚至被强迫打自己的长辈。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红卫兵的信条，被谱成歌曲传唱。红卫兵的发起组织之一，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一文开篇即宣告：“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在通篇的豪言壮语之下，潜藏着的却是强烈的身份观念、等级意识。对身份、门第的强调，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出身、背景极为重要，被称为“身份社会”。红卫兵以“阶级”为标签宣扬“血统论”，可说是封建糟粕借尸还魂的绝妙例证。

以“血统”把学生分为“红五类”与“黑七类”子弟的作法引起不少学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不满和反感，但面对掌握“国家机器”而为所欲为的红卫兵，他们却又敢怒不敢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因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而长期受歧视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以极大的勇气撰写并散发了《出身论》一文，力图从理论上对“血统论”进行批判。他的主要论点是从社会实践出发，论证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因此家庭出身对于决定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重要。“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遇罗克孜孜以求的是一切青年都享有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他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今天看来，《出身论》只是用最简单的事例说明了最简单

的道理，但在“红色恐怖”的当时，这却表明了一种独立思想的精神，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以一人对整个“国家机器”，这才是真正的孤独的挑战者，而最终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常识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但其实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一旦常识受到普遍的破坏，生活就会极其可怕，此时人们才会感到常识的重要。而捍卫常识竟要以生命为代价，则是最可怕的时代。



编 后 记

丁 东

当我五年前开始研究文革中的民间思想的时候，最深的感受就是原始资料的宝贵。这些资料的难求，固然因为保存本身需要冒太多的风险，所以大都屡遭劫难；同时也因为后来没有得到整理出版的机会，往往长期尘封，或保存在私人手中，秘不示人。保存历史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见诸公开的传媒，否则随时都有湮没的危险。因此，推动这些民间思想史料的公开出版，一直是我的心愿。然而，做起来却不容易。一方面需要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一方面需要寻找适当的运作方式与市场接轨，把这些条件凑在一起很难。

整理出版遇罗克的遗著，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所幸的是，和徐晓、徐友渔先后说起此事，他们都十分认同，马上全力以赴。同时还得到了宋永毅、杨健、印红标、李恒久诸位朋友的无私的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四面八方集中了本书的全部内容，并以最快的速度编印出来，奉献给读者。

文革既是本世纪中国的一段最不容忍独立思想的年代，又是启动了一批先驱者独立思考的年代。许多思想的火花，往往来不及燃烧，就被国家机器的暴力扑灭

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遇罗克的命运非常特殊，一方面，他为思想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年仅27岁的生命；一方面，他的思想在生前却得到一个空隙，从而大面积传播，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其中有的是赞同者，有的是反对者，有的是公开反对而内心赞同者，有的是当时反对而后来赞同者。做为一个青年思想家的个案，他可以辐射出许多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书的宗旨主要是展示遇罗克的思想和生平事迹，只收入了很少的研究文章。我相信，这本书出版以后，会引起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文革史等各个领域研究者的兴趣。

对于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等报纸上发表的七篇文章，本书保持了当时发表的原貌。我认为，在1967年的语境里，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遇罗克在引用当时掌权者的言论和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理论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合法性，同时把当时已经打倒的领导人的观点做为批驳对象，这都属于表达的策略。遇罗克的深层思想，并不在于认同或否定哪个领导人的哪个具体说法，而在于为50年代以来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到文革中登峰造极的、变相的种性制度下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声张权利。这才是文章的精神实质。如果比较一下遇罗克为《中学文革报》发表而写作的文章和他留给自己看的日记，就会发现，他真实的思想要比为公开发表而写作的文章更加独立，更加彻底，更加纯粹，更加深刻。当然，我们也相信，有历史感的读者的关注重点，不是计较他的文章正面引用了谁的话，批判了谁的话，利用了当时那些主流宣传口径，而在于体会他当时所表达的中几大地上最先进的人权觉悟。所以，在编辑过程中，即使遇到与今天流行的

认识明显不一致的文字，也力求保持原貌，不作任何删节，只是个别人名以××代替。

今天的中国，不论人权意识，还是人权状况，与文革年代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压得千百万人喘不过气来的"黑五类"，如今被反其意而用之，成了一种保健食品的品牌。"家庭出身贫农"，已经进入民间的笑话。悲号变成调侃，血泪化作招贴。然而，在告别现代种性制度的恶梦同时，人们似乎也淡忘和疏远了遇罗克那种不惜点燃自己照亮黑暗的崇高精神。编这本书，也是想同这种淡忘和疏远抗争。

筱敏在谈到另一位文革中的民间思想者李九莲的时候，写过这样一段话：她被枪杀了，她的思想再也不能生长。而得以继续生长的，是另一些幸存者了。她的思想，在今日的学者们眼中，远说不上成熟。然而今日学者们思想的权利，以及拿前人思想做学问的权利，是许多如她一样的被枪杀者争夺来的。我们要不时地告诉自己：我们是幸存者。我们的幸存，是由于有人在我们的前头承当了不幸。

对李九莲，我们这样缅怀；对遇罗克，我们也这样缅怀。

跋：忘记历史，悲剧还会重演

遇罗文

将近20年后的今天，人们才又有机会缅怀遇罗克，不能说不是我们的悲哀。

自从1980年，全国报刊大张旗鼓地给遇罗克平反，称他为英雄以来，我遇到最多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政府给没给他定为烈士?给家里多少抚恤金?"

今天，我给大众一个回答：没有谁授予遇罗克烈士称号；给我父母的，只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是的。"烈士"称号难道需要恩赐吗?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就是最好的回答。

罗克的事迹见报后，我家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我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遭遇，是整个民族命运的缩影。在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善良的中国人眼里，希望从中看到民族的希望。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她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的态度。

人们希望对许多事情有个"说法"，但往往又很失望。

我父亲是个有作为的工程技术人员，他首创的"竹筋楼"小区经过40年的风风雨雨，至今还屹立在良乡镇

上。随着施工的结束,他旋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并被劳动教养多年。80年代中期,他被通知得到“改正”,补发两年工资。这就是20多年折磨的代价。“右派”是改正了,但还保留着“汉奸”身份,因为他曾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过。

母亲因为没有被开除公职,尽管被降薪降职,“改正”右派身份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父母是超脱的。在给罗克平反后,公安局专案组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物质要求,只要求将因受《出身论》案件牵连第二次入狱的我尽快从东北监狱释放出来。

我们有幸在这里回顾过去,请不要忘记“文革”期间死于非命的冤魂。罗克曾让我们帮他收集许多惨绝人寰的资料,准备予以逐步揭露,但没有机会发表。他不会去理睬这个路线、那个路线,他最关心的是人的尊严。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奥斯威辛、格罗斯·罗森等集中营。那同样是20世纪人间的悲剧。为了警告人类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让人们忘掉它,许多国家建起纪念馆,德国总理跪下忏悔,以便更深地记住这段历史,避免悲剧的重演。从而也使人们减少了对日耳曼族的恶感。

萧乾先生说得好,我们只抓住“文革”闹剧的几个演员,而没有抓住导演,就无法保证没有第二次文化革命。因此他建议建立“文革纪念馆”。

我很感谢本书的编者们,他们使许多人知道或记起了,中华民族还有大讲“血统论”这段历史,或许以后因此不再讲“血统论”了。但是有人说,“那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讲了"。其实，现在应届高中毕业生，还要父母所在单位的党委证明其父母的出身、成份和政治表现。

因为有许多人关心，现将我和亲属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母亲，王秋琳，于 1983 年 5 月去世，享年 63 岁。她是个无比刚强的人，对人总爱面带微笑，但内心的痛苦死后我们才从她的日记中知道。她最后一次日记是那年 5 月 1 日，是哥哥的生日。她又想起了哥哥四、五岁时，每天坐在台阶上等母亲下班的情景。有一次母亲走到他身边，他才惊醒，羞涩地说"妈妈，我睡着了。"母亲上下班每次经过工人体育场——宣判哥哥死刑的地方，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

父亲，遇崇基，于 1988 年去世，享年 73 岁。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弥留之际，已经不认识谁了，嘴里还叨念着"罗克，罗克……"

遇罗锦，从 1986 年以来一直在德国居住、写作，过着清闲的日子。我多次劝她回国看看，她总是拒绝。我想，是因为这里会引起她太多痛苦的回忆。

我和弟弟遇罗勉，一个学机械，一个学电子，自认为是绝好的搭档，所以一直在一起工作。近年搞"水刀"的研制。制成的"前混式水切机"被专家称为世界首创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比国外同类产品先进得多。

我还要介绍一位在书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最值得我敬佩的人物—郝治（牟志京文中误写成他哥哥的名字——郝汉，还把魏雷误记成顾雷，纪亚琴误记成王亚琴）。他是哥哥中学同学，也是我家的世交，说话幽默而

有见地，是我们《中学文革报》中唯一的大学生——轻工业学院的。为了掩盖他父亲是右派的身份，化名马列。在血统论盛行的年代，仅右派出身，就足以“证明”所作的一切都是错的了。他能考上大学，简直是个奇迹，为此勒令他休学一年。

罗克每次写完一篇文章，首先要给我和郝治看，让我们帮助修改。我能提出的意见不多，而郝治能出不少主意。罗克被捕后，我俩被看成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或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分别被“群众专政”，关在学校里。我的命运比他强，在学校里处境好些。他被关在黑暗的楼梯间，每天遭受一次毒打，吃的只有窝头咸菜。两个多月，他至死不承认什么反革命集团。但是他也知道，这样下去必死无疑。于是绝食7天，校方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不再毒打，放他回家。他走到阳光下才看到，自己的枕头已被血凝结成一层硬壳。他是我知道的最有骨气的硬汉！

后来我的命运又不如他了，由于有手榴弹一案在身，也是出于审讯的需要，从群众专政又升级为拘留审查，关进了哥哥正被关押的半步桥监狱。当时受《出身论》一案牵连，被判10～20年徒刑的还有：安徽的丁广武、沈阳的孙刚、广东的杨玉鉴、银川的云杰。

《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唯一的一幅漫画，是一位年轻的右派工人画的，他叫任众，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委托我向《中学文革报》知道他身世的成员表示感谢——因为没有一个人检举他，否则他的处境不堪设想。是的，不仅是他，我们每个人都珍重那段纯洁、高尚的友情。

1998年12月22日